# 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 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9,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15$\frac{8}{4}$ 插页2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000

书号 10208·177 定价 1.40 元

# 目　次

# 爱　情

德里·蒂博尔

牢房的门开了，看守把一捆东西扔到犯人脚旁。

“拿着！”

这是一个口袋，上面贴着号码。B站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看守。

“这是你的衣服，”看守说，“换上！回头给你理发。”

口袋里是七年以前脱下的衣服和鞋子。衣服皱皱巴巴，连手掌大的平地方也没有，鞋子发霉了。抖开衬衫，也是扑鼻的霉味。当他换完衣服，理发员来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被带到监狱办公室去。走廊里有十来个已经换上便服的犯人在等着，尽管如此，还是第一个就把他叫进去了。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下士，旁边还站着一个下士。在他们前面的一个大尉缓缓地在这狭窄的屋里来回踱着。

“靠近一点！”坐着的下士说。“姓名……母亲的姓名……回哪里去？”

“我不知道。”B说。

“怎么回事？”下士问，“你不知道回哪里？”

"不知道，"B说，"我不知道你们把我送到哪里去。"

下士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嘟囔着说，"哪里也不送你去。你可以回到妻子那里去吃午饭，晚上可以和她睡觉。懂了吗？"

犯人没有回答。

"那么你究竟打算到哪里去？"

"榆树街十七号。"

"布达佩斯，第几区？"

"第二区，"B说。"为什么释放我？"

"问这许多干吗？"下士板着脸说，"释放你，不就完了！能离开我们这里，你就该够高兴的了。"

从隔壁屋里拿过来了他的贵重物品——一块镍手表，一支钢笔，还有一个相当旧的、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墨绿皮夹子。皮夹是空的。

"在这里签字！"下士说，推过来一张手表、钢笔和皮夹子的收据。

"这个也要签！"

也是一张收据——在监狱里的劳动工资，一百四十七福林。下士当着他的面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在桌上，"收好！"B重新从衣袋里把皮夹子拿出来，把钞票和硬币一起塞进最里面的一层。皮夹也是发了霉的。最后给他的是一张出狱证。"被捕原因"这一栏是空着的。

在走廊里又等了约莫一个小时，然后连同其他三个人被送到监狱大门口去。但在未到达大门口之前，一个从后

面跑步赶来的下士叫住了他们，把其中的一个人叫出，由两个带冲锋枪的看守押回到牢房的那个建筑物里去了。这个人刚刮过的脸顿时发黄，象是胆汁涌到头上来似的，眼神也浑浊了。

他们三个人继续向大门走去。

大门口的看守检查完出狱证，交还给B，告诉他：

“那边有电车。”

B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跟前的地面。

“还在等什么！？”看守说。

B还是站在那里，看着地面。

“快走！”看守说，“还在那里等什么！？”

“我走，”B说，“那么我可以走了？”

看守不理他。他把出狱证放进衣袋，然后走出大门，走了几步想回头看一眼，但他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勉强自己不往后看。他仔细听着后面有没有脚步声。他想，如果他赶上电车以前背后还没有伸过一只手按在他肩上，或者象刚才那样从后面传来声音叫他回去，那么他确实是被释放了。被释放了！

当他走到电车站，突然回身，身后没有一人。伸手到裤兜里一摸，空空的，没有手帕可以擦一擦额上的汗水。这时正好开过来一辆电车，从电车的拖车里下来一个满脸麻子的看守，和他几乎擦身而过，小小的眼睛长时间敌对地看着B。B没有向他问好。而是迈步跨上了电车。

就从这一分钟开始，他没有向看守问好，当电车开动的

这一瞬间开始，生命重新在他周围开始了。这感觉有点象电影院里放映机发生故障，有一段时间银幕上有画面却没有声音。在那沉寂的大厅里，当观众似乎也不复存在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在一句话或一个字的某个地方，声音重新出现在演员动弹着却不发声的嘴上，象骤然触发了似的，整个空间顿时充满了音乐、歌声和语言。这时，一切色彩都爆发般地显现了。迎面过来的电车闪着那样鲜艳的黄色，好象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它隆隆地在一幢耀眼的灰色两层楼房前从轨道上疾驶而过，以致B担心它永远停不下来。在街的另一边，两匹红得象罂粟花的骏马拖着一辆空车飞奔。车辆的辚辚声似乎和那在蓝天上浮动的云朵浑成一体。一个小小的翠绿的花园向后飘去，它后面是一间敞着窗户的厨房。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人熙攘往来，都穿着合体的便服，各不相同，而且把人们都衬托得仪态大方。行人中间有许多显著矮小的人，有的只有普通人的膝盖那样高，个别的还由别人抱着。至于女人，呵，她们可真是……

B感到自己的眼眶充满着泪水，便向车厢里面走去。女售票员柔和悦耳的声音象音乐一样沁入他的心扉。B买了票，坐在角落的一个单人座位上，闭上眼睛。他担心，如果不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失去自制。有一次他睁开眼睛，看到对面人行道上啤酒厂的门口，一个男人正在抚摸一个青年姑娘的脸，他又下意识地伸手到裤兜里，再一次发觉没有手帕可以擦一下刚冒出来的汗。这时上来一个工人，坐在他对面，提包里挤着十瓶啤酒。

女售票员笑起来：

“要这么多啤酒干吗？”

“同志，我是有家室的人，”工人回答说，“我的妻子喜欢看我喝酒。”

售票员笑着说：

“光看着？”

“光看着。”

“您这是黑啤酒？”

“黑啤酒。”

“淡啤酒要好些。”

“我妻子爱看我喝黑啤酒。”工人道。

售票员笑着道：

“你转让一瓶给我行吗？”

“黑的？”

“黑的也行。”

“干吗？”

“带回家给我丈夫。”售票员笑着说。

“既然您是黄头发，干吗他爱黑啤酒？”工人笑着问。

售票员笑着。到站了，B下了电车，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到哪里？”过了一会儿司机问，因为B一直没有开口。

“到布达，”B说。

司机回过头，打量着客人。

“过哪一座桥？”

B心不在焉地重复:“过哪一座桥?”

“您第一次到布达佩斯来吗?”司机问。

“过玛尔基特桥。”B说。

车开动了,B直挺挺地坐着,没有倒在靠背上。车窗里飘进来温热的汽油味、灰尘味和电车车铃的叮当声。两边人行道上洒满阳光,沥青的路面上人影交错,在人们移动着的脚前互相掠过,好象使街道变得更热闹了。一个饮食亭子的橘黄色条纹的帆布伞下,在猩红的光影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吸着烟。再过去一些,在拐弯角上,一棵挺拔的小栗子树在轻轻摇曳,生气勃勃的树冠缝里闪着晶莹的阳光,在街上投下稀疏的阴影。

“要是路过一家纸烟店的话……”B对司机说。

过去三家门面,车就停住了。面前是一家蔬菜铺子,门口的摊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小红萝卜、元白菜和红苹果。旁边就是一家纸烟店。

“您坐着,”司机回过头来,“我去买。您要什么牌的?”

B看着小红萝卜,手轻轻地颤抖着。

“科苏特牌?”

“好,”B说,“还要一盒火柴,谢谢。”

“没有关系,回头和车钱一起算好了。只要一包?”司机一面下车,一面说。

“谢谢您。”B说。

“您现在想抽吗?”司机回来了。“我的内弟也在里面蹲过两年,他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买包烟。接连抽了两支

‘科苏特’，然后才回家。”

“我身上看得出吗？”停了一会以后B问。

“嗯，多少有点看得出来，”司机说，“我的内弟当时的脸色也这样象有病似的。当然，从医院里出来的人脸色也不好，但他们的衣服不这么皱。您在里面待了多久？”

“七年。”B说。

司机吹了个口哨，“政治问题？”

“对，在死牢里待了一年半。”

“这回放您出来了？”

“好象是，”B说，“我身上看得很明显吗？”

司机耸起双肩，接着同时放下。“七年，”他又重复了一遍，“难怪。”

B在上山电车站附近下了车，剩下的一段路他要步行回家，因为在和妻子见面以前他想习惯一下外面的生活。司机不肯要小费。“您会很需要钱的，同志，”司机说，“哪里也别随便花，只拿来保养身体！每天吃肉，半升好葡萄酒，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再见，”B说。

在斜对面时装商店的橱窗里有一面窄长的镜子。他在镜子面前站了好久，然后走开了。由于帕莎雷蒂路行人太多，他改从一个网球场旁边的小林荫道上坡，穿过海尔曼·奥托街往前走。这里是许多正在建筑的小片住宅，向前面的山脚延伸过去。他感到一阵头晕，便在一片草地上坐了下来。这时候妻子反正不会在家，在这里坐半个小时回去

也来得及。草地的对面是一家小院子，栏杆里面有棵盛开的苹果树。B凝神看了一会，然后站起来，向栏杆走去。白蜡似的、微微发亮的花朵密密地长在树枝上。在树枝下面很难透过花丛看到好象是在轻轻颤动的靛蓝色天幕。每朵花的深处，在每片由宽向窄逐渐收缩的花瓣末端，是一抹浅浅的玫瑰色，更使人感到花瓣的洁净和高雅。在花丛中蜜蜂嗡嗡地往来奔忙，象是无数条金线点缀着花朵构成的白缎子。整棵树好象都在轻轻摇动，有如在清风中打开了一张薄薄的纱网。B静静地站着，倾听着这棵树的絮絮微语。在花丛深处，他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到天幕的空隙，那上面是一片静止不动的薄罗似的白云，宛如在那遥远的天际，在眼前这棵树上面的高处另外还有一棵盛开着的苹果树。他就这样，通过这棵可以捉摸的树，看着渺茫的、无法捉摸的那棵树，慢慢地感到一阵昏眩。

他因为忘记给表上弦，所以也不知道下车后回家的路上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走过去几步，在一个灌木丛旁边，他呕吐了几口，觉得轻松多了。又步行了约摸半小时以后，穿过一条路边长满果树的在阳光下沐浴的小街，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们住在二层。院子门内，一边一棵白丁香，他沿着楼梯向上走。

他按了按自己屋子的门铃，没人开门，门上也没有人名牌。然后他又折回来，走到地下室守门人屋子门口，敲敲门。

“您好，”他向开门的女人问好。她也老多了，瘦了。

“您找谁？”

“我是B，”B说，“我的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天哪！”这女人叫了起来。

B看着地面，“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天哪！”女人又叫了一声，“您回来了？”

“回来了，”B说，“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女人松开门把，靠在门框上，“您回来了？”她重复地说“天哪！噢，当然，她住在这里。”

“我孩子呢？”B问。

女人明白过来了。“他很健康，”她说，“很健康，什么病也没有。是个很神气、很漂亮的大孩子了。天哪！”

B沉默着。

“请进来！”女人颤声说，“请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我早知道，你是受冤枉。我早知道，您早晚是会回来的。”

“我按了三次铃，可是没人开门，”B说。

“请到我们这里坐一会儿。”女人重复说，“谁也不在家，房客们也都出去了。”

B沉默着，看着地面。

“您妻子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女人说，“您不进来吗？他们要下午才回来。”

“住了房客了？”B问。

“他们为人都不错，”女人说。“您妻子和他们相处得也还可以。天哪，您回来了？”

B沉默着。

"钥匙在我这里，"等了一会儿女人说，"请上楼休息休息。"

墙上挂着两把钥匙，女人摘下一把，顺手带上门。

"请上楼休息休息。"

B看着地面。"您也上楼吗？"他问。

"当然，"女人说，"我指给您看她住哪一间。"

"她住哪一间？"B问。

"您知道，一共有四个房客，"女人说，"她租出去了两间。您妻子和孩子住那间下房。厨房和浴室是合用的。"

B没有说话。

"那么走吧，"女人问，"也许您愿意在我们这里等她回来？要不您在我们这个小床上躺一会儿？"

"厨房和浴室是合用的？"B问。

"噢，当然是合用的。"女人回答道。

B抬起头，看着女人的脸，"那么我也可以洗个澡？"

"那自然。"女人微笑着说，轻轻地用手扶着B的胳膊肘，象是怕他倒下。"你当然可以洗，怎么不可以！？您们不也住在那里吗？我不是说过，厨房和浴室是合用的？我本来还可以给您烧点热水，因为我们冬天还剩下一点柴火，可是那几个房客好象把浴室锁了。"

B又沉默了，看着地面。

"那么走吧……也许您愿意在我们这里待一会儿？"女人问。"请进来，我在厨房，不会吵您的。您可以在床上躺一躺，说不定还能睡一会儿。"

“谢谢您，”B说，“我还是上去。”

下房的窗户是朝北开的，和其他下房一样。窗口是一棵椤树，左边可以看见古盖尔山由于覆盖着松林而发黑的山顶。椤树的树荫把屋子染上一片绿色。当他一个人在屋里坐下的时候，呼吸开始缓和下来了，感到了他妻子的气味。他在窗口坐下，深深地吸着气，看着这棵椤树，处处感到妻子的存在。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口用旧了的白漆柜子、一张小铁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要上床，必须把椅子挪开。但他没有躺下，只是坐着，吸着气。桌子上堆满各种东西——书、衣服和孩子的玩具，还有一面小圆镜子。他照了照自己的脸，还是和刚才在上山电车站那家商店的橱窗里看见的一样。他把镜面朝下放在桌上。烟灰缸上放着一个带白圆点的红橡皮球。在桌上也感到了妻子的香味。

当他重新在窗口坐下时，女守门人送来了一茶缸咖啡牛奶和两块点心。他吃掉了。不久之后，住在同一层的那家主妇也送来了一杯咖啡牛奶，以及黄油面包和香肠，还有一个红苹果，就象在街上看见的那一种。她在桌上放下盘子，噙着眼泪，不几分钟也离开了。当一个人的时候，B把这份东西也吃了。表一直没有上弦，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在窗口坐了有多久。窗子下面是个小花园，四处静悄悄的。椤树镶着白边的浅绿色树叶缝中偶尔飘进来一丝微风，轻轻地摇动着映在粉墙上的下午的阳光。

当闻够了妻子的气味而再也闻不到什么的时候，他下楼走到院子门口。不一会儿，妻子在转弯角上出现了，四五

个男孩子围着她。快到门口的时候妻子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甚至还停了一下，接着便向他奔跑过来。B也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她飞奔。当两个人快要靠拢的时候，妻子又停住了，好象有点不大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又快跑起来。B看见了她身上那件灰地黑条的长袖开司米毛衣，这还是被捕以前给她买的。妻子是空气与肉体的一个特殊的、最不寻常的混合体，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可以用任何事物比拟的一个存在。在这一时刻他所感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七年监狱生活中脑子里关于她的一切想象的总和。

当他们终于从拥抱中松开的时候，B靠在栏杆上。妻子身后几步的地方，那四个孩子以好奇而不理解的神情看着他们，他们大概有八九岁，不是五个，而是四个。B靠在栏杆上，逐个看着他们。

"哪一个是咱们的？"

妻子这时才开始哭了起来。

"上楼去吧！"她一面哭一面说。

B搂着她的肩膀。

"别哭了。"

"上去吧！"妻子失声哭了起来。

"别哭了，"B说，"哪一个是咱们的？"

妻子推上院门，向屋子跑去，穿过丁香树丛，进了门洞。她还是象当年离开的时候那样苗条，跑起来还是那样轻快，那样有弹性，和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为了逃避一头乳牛的那次一样，既恐惧又敏捷。B也上了楼，在房门口追上了

她，妻子已经开始安定下来，只有还象年轻女子一样的胸脯在毛衣下面起伏波动。她已经不哭了，但眼眶下面依然残存着泪痕。

"最亲爱的，"她轻声说，"我最亲爱的。"

她轻轻地叫着，每一个声音都似乎和另一个不同，他恨不得把这些都吞下去。

"进屋吧！"B说。

"屋里现在还住了别人。"

"我知道，"B说，"进屋吧。"

"你已经进去过了？"

"我进去过了，"B说，"哪一个是咱们的孩子？"

到屋里，妻子跪在地上，把头倒在他怀里，又哭起来。在她深金黄色的发丝里已经有几根白发在闪着不协调的颜色了。"最亲爱的，"她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我最亲爱的。"

B抚摸着她的头发。"日子很难过吗？"

"我最亲爱的，"她轻轻地说。

B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我老得很厉害吗？"

妻子抱着他的膝盖，紧紧地把身子贴着它，"你还是走的时候那样。"

"我老得很厉害吗？"B问。

"只要我活着，就永远爱你。"妻子悄声地说。

"你还爱我吗？"

妻子的背颤动起来，大声哭着。B把手从她头上移开。"你还能习惯我吗？"他问，"咱们还能象从前一样地生活

吗？”

“我任何别人都没有爱过，”妻子说，“我只爱你。”

“你一直在等我吗？”B问。

“我仿佛一直和你生活在一起，”妻子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你。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要是你不回来，我就一个人死去。看见了孩子，也就和看见了你一样。”

“我变了，”B说，“我老了。”

妻子哭着，紧紧地抱住丈夫的腿。B又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们还能生个孩子吗？”妻子问。

“也许能，”丈夫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起来。”

妻子站了起来。

“我叫他上来好吗？”

“等一等，”B说，“我还想和你待一会儿，对我说来，他现在还有点生疏。他在花园里吗？”

“我下去，”妻子说，“去告诉他等一等。”

当妻子回来的时候，B背朝门站着。他的背好象窄了，有点弯了，他没有回过身来。妻子在门口站了片刻，“我告诉他，给爸爸采一束鲜花，”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显得有点发干，“邻居的院子里丁香花正在开，我叫他采一大束花送给爸爸。”

妻子跑到他身旁，抱着他的肩膀，紧紧地把身子贴着他，“我最亲爱的，”她悄悄地说。

“你还能习惯我吗？”

"我任何别人都没有爱过，"妻子说，"日日夜夜和你在一起，每天都跟孩子说你的事。"

B转过身来，拥抱着妻子，仔细地察看她的脸。在透过窗户射进来的、渐渐暗淡的光亮里，尽管妻子显得比七年的每一天中在他脑子里出现的形象要美丽得多，他还是以几乎是轻松的心情看到，她也老了。她闭着眼睛，半张着嘴，从洁白的齿缝里流出的温馨的气息喷到B的唇上。在她苍白的脸上，在浓浓的睫毛周围闪着晶莹的泪珠。B吻了吻妻子的眼睛，轻轻地把她推开。

"你要爱咱们的孩子！"妻子的眼睛依然闭着。

"我会的，"B说，"我会习惯，而且会爱他。"

"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也是你的孩子，"B说。

妻子搂着他的脖子说："我给你洗一下身子。"

"好极了。"

他脱下衣服，妻子铺好床，让丈夫赤身躺在床上，打了一脸盆热水，拿来一块肥皂和两条毛巾。其中一条叠成好几层，在热水里浸湿，打上肥皂，从头到脚擦得干干净净，一共换了两次水。B的手不时抖动起来，但从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安定下来了。

"你会习惯我吗？"他问。

"我最亲爱的。"妻子悄声说。

"晚上你和我在一起睡吗？"

"是的，"妻子说。

“那么孩子睡在哪里？”

“回头我在地上给他铺好床，”妻子说，“他睡得很香。”

“你整夜都和我在一起吗？”

“是的，”妻子说，“只要我活着，每夜都和你在一起。”

柴鹏飞 译

# 解与结

兰捷尔·尤若夫

## 一

亚当菲·亚当教授在医院里已经不担任什么职务了。他在这所医院里不再是医生，而是享受病人的待遇。人们出于敬意，但也不妨说是出于慈悲，把他养在医院里，因为别处没有人可以照顾他，而又不愿意让他到受不到照顾的地方去。

他是一个"老木乃伊"，一个"老古董"。年轻的医生背后都这样叫他，亚隆·安布鲁斯也这样叫他。

但是亚当菲教授偶尔也穿上白大褂，到病房走一走，向病人们点头致意。在当年，每个病人都想从教授的眼光里看到自己病情的信息，护士和年轻的医生们每当看见教授愠怒的神情便会惊慌起来。

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谦逊的、无足轻重的影子了，人们也并不反对他穿着白大褂到处走走。

老教授有时一连几个星期也不离开他那当年的诊室改造成的病房。有一段时间曾经传说他有一次因为找不到便

壶而又憋不住，尿了一鞋子。但自从手术室的护士长玛尔基特负责照料他以来，人们连这件事情也忘了。玛尔基特是亚当菲极盛时代给他当助手的，她现在不让任何人接近老教授。

这天早晨亚当菲又穿了白大褂在住院处信步闲逛。主治大夫和脸色有点苍白的青年医生亚隆·安布鲁斯正在检查一个刚由救护车送来的病人，他们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大概根本没有注意到老教授在场。

病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身材高大，开始有点发胖，患急性腹膜炎，发着高烧。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病人心脏的情况很不好，如果动手术，多半会死在手术台上。

"不能动手术，"主治大夫决定，"把他送到四号病房。"

护士正准备把病人推走，亚当菲教授突然举起手，以不容置辩的声调说，"立即动手术！"护士把车停住了。

"教授，可是病人的心脏……"

"立即动手术！"

"教授，您没有听他的心脏……患者……"主治大夫有礼貌地微笑着向教授解释，但是亚当菲制止了他：

"我知道。只要看看患者的皮肤颜色我就能断定他经受得了半个小时的手术。"

"腹腔已经全部化脓。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手术恐怕一个小时也不一定够……可能在手术台上死亡……"

"如果不动手术会怎么样？"

主治大夫看着昏迷的病人，轻声地说了个保守的数字：

“四十八小时。”

“好吧，准备！我主刀。”

医生们面面相觑。如果患者死在手术台上，那实在是件不愉快的事。因为不光是医院的声誉会因而受损，而且还会使医生的自信心受到影响。

“你听任他吗？”亚隆·安布鲁斯小声问主治大夫。

“反正都是一个结果，听他的吧。”主治大夫悄悄地回答，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然后转身向亚当非，“如果您允许，亚隆大夫和我给您当助手。”

老人骄傲地点点头，走向水管。护士和手术室里的其他人鸦雀无声，机械地跟在后面。

手术象往常一样慢慢地开始了，之后又习惯性地运转起来了，接着象一只发条上得过紧的钟表一样飞速地进行着。

这位在亚隆·安布鲁斯眼里只是件古董的老人熟练地打开病人的腹腔，其准确、迅速和优美是他从来也没有在别人那里看到过的，他甚至跟不上教授的动作。在灼热的手术灯下两个医生和手术台上的护士都出汗了，亚当非教授也把脸转向那位最年轻的护士，请她擦去汗水。

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病人经受下来了，手术成功了。

“祝贺您，教授！”主治大夫喘着气说。

老人用手背擦去鼻尖上的一颗汗珠，自负地微笑着，点了点头。

护士推着车走了几步，亚当非突然喊了一声：

“等一等，别走！”

护士当即停住了。

“还要打开，还没有结束．某个地方恐怕还有问题……我要看一看。”

“可是教授……”亚隆·安布鲁斯嗫嚅着。

幸亏主治大夫解了围。他一手搂住教授，同时怒气冲冲地向护士扬扬头，护士慌忙地把车推走了。“明天，尊敬的教授，”他紧紧地搂着亚当非，“明天再说，现在病人得休息一会儿。”

但是老人一把推开了主治大夫。

“你在说什么？你没有看见，事情还没有结束吗？”

“喔，手术是非常成功的……”亚隆·安布鲁斯想说点什么，但是主治大夫打断了他。

“悉听尊便，教授！”主治大夫愉快地说。

“给我推回来！”老人向着远去的推车几乎带着哭声说，“给我推回来！”他重复着。

“对不起，”护士长不由分说，在教授裸露着的手臂上打了一针。只有玛尔基特护士长可以这样做，——她每天给教授收拾屋子，给他换掉脏床单，铺上新的。她向那最年轻的护士伊丽莎白命令式地用力点点头，两人一边一个扶着教授走了。

玛尔基特护士长从左边看着赫赫有名的教授，他显得信心十足，宛如一个凯旋而归的将军。但是另一边，年轻的护士伊丽莎白感到教授浑身一颤，她身上的分量突然增加

了，教授失去了自制。伊丽莎白抬头一看，亚当非的脸变形了，嘴弯了，眼睛失神了。“哟！”姑娘惊惶地喊起来。

亚隆·安布鲁斯正好面对她们站着，教授的两种面容他都看到了，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等一等！”立即顺手拉过一辆推车，把半瘫痪的教授抱上去。

主治大夫也跑了过来。“快！冰！注射！”他抬头看看亚隆·安布鲁斯，“唉，嗯。”摆了摆手。

亚隆·安布鲁斯和护士一起把车推走了。

主治大夫颓然倒在一把椅子上，现在显得一点也不潇洒，双手按住太阳穴，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足有十分钟。护士们静静地收拾着工具，玻璃和金属在重新流进新鲜空气的手术室里发出清脆的叮哨声。

当亚隆回来的时候，主治大夫还是这样木然坐着，这时他从椅子里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屋去。亚隆·安布鲁斯默默地跟在后面，也觉得双腿发软。

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主治大夫在两个有刻度的杯子里各倒了五十毫升烧酒。

“但愿你少看到这样的事。”他向年轻的同事喃喃地说，自己将酒一饮而尽。

亚隆·安布鲁斯只用舌尖舔了舔酒，点点头，信口问道：

“老头儿多大年纪了？”

“只有七十三岁……”

“和我父亲一样大……”亚隆轻声说。然后和主治大夫

握握手，转身走到外科主任办公室，要请三天假。

“家里有事吗？”主任问。

“也可以这样说，就算我预支假期好了。”

“过度疲劳，在所难免，好吧……”主任也听说亚当菲的事了。

当女秘书为他办完手续时，亚隆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我马上想去看看爸爸。”

“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事，你知道，我往往爱心血来潮。”

“好，也真该去一次了。我就给你收拾。”

## 二

当一切就绪，已是傍晚时分了，亚隆·安布鲁斯坐进自己的小斯科达汽车，慢慢地离开了市区。

这是初春的夜，在绵亘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呼啸而过的卡车打破宛如凝成一体的沉寂。

汽车轻快地在路上奔驶，要再快些也是可以的，但他不愿意到得太早，而且自己的手似乎也不是那么有把握，他的神经还没有从上午的这次手术中恢复过来。

亚隆大夫今年二十九岁，结婚已经两年了，在家里是父亲最小的儿子，因此他才得到了求学的机会。现在大哥在生产合作社当饲养员，二哥是拖拉机手，两个姐姐早已出嫁，母亲也已经逝世，父亲住在当拖拉机手的哥哥安道尔家

里。在前不久给他的信中——是他嫂嫂代笔的，因为老人家不爱写信——他父亲说自己身体很好，退休金够用，叫他放心。

小小的斯科达悄然地在公路上疾驶，车灯照亮了仍是光秃秃的在路两旁耸立的白杨树。

“真可怕，”亚隆·安布鲁斯想，“七十三年……”夜风使他打了个寒噤。“真可怕，”他说出声来。在驾驶盘上这双有力的、灵巧的外科医生的手现在显得有点陌生，好象不完全是自己的。

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一句奇怪的话，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他妻子读给他听的：

“一生中的某一个小时、某一天也许是有逻辑性的……但整个生命却是混乱的。”

那时他只是点点头，但这话真正的涵义在此一刻霍然显示在他面前。他为人谨慎实在，无论现在，还是当年在大学，都很少涉猎与医学无关的事情。他自问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及那些富裕人家的子弟，这一认识反而推动了他前进。他也深知自己并不比两个哥哥聪明，如果没有他们，或者自己出生得比他们早些，他也不可能当医生。这就使他从来不敢过度自信，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全班成绩最优良的学生，从而为他作外科医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刻，在车上，他决定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他深信妻子会理解到这是做子女的责任。要是自己的毕业誓言连对父亲也不履行的话，如果不这样做，还算什么医生呢？……

他想在清晨到达，那时家里的人会刚起来，被子还没有叠好。

亚当非教授的床是玛尔基特护士长管的，他父亲的床怎样，是不是也很整齐呢？现在，老年人已经不为营养不够而苦恼了，他父亲有自己的一份退休金，受到人们的尊敬，什么也不缺……但尽管如此，不能设想有什么因素使父亲非留下不可而接不走。

当车开到离村庄不远的地方，天际开始出现淡淡的白色和浅绿色，黎明到来了。路那边是早年浸麻的池塘，虽然他从来也没见到过在那里浸过麻。小时候在冬天，每当放学，总爱穿着钉鞋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的冰上滑来滑去。强项地伸在冰层上面的黑黑的水草常常把他们绊倒，撞痛了膝盖，有时连胯股也摔得很厉害，但还是爬起来再玩……今年，严格地说来，没有出现严寒的日子，浸麻池可能连一星期也没有冻上。现在，曙光的第一道光芒已经射到深绿的水面上了。

## 三

他晚了，他把人们在早春的起床时间记错了。哥哥已经挎上背包，工作服下面露出干净的衬衫领子。只有孩子们还在床上。

嫂嫂正在从一个壶里倒牛奶。

“爸爸在哪里？”他急不可待地问。

"到地里去播种了。"哥哥笑着说。

"拖拉机手还在家里，退休的人倒播上种了？"

"你对爸爸还不了解？"嫂嫂爽朗地笑着说，"他只要想走，谁也拦不住。"

"跟我来，去看看爸爸。"哥哥说。

主妇把孩子们叫起来，兄弟二人走到院子里。

"坐车去！"亚隆·安布鲁斯打开斯科达的车门。

"回头座位上都会蹭上油，还不如坐我的摩托车去。"

他们骑上啪啪作声的摩托车到了地里，走到一台拖拉机附近时，年轻的医生拍拍哥哥的肩膀，"这是你的拖拉机吗？"

"对。"

"停住！"

"我再带你一段。"

"我自己走去，还远吗？"

"不远，就在坡那边。"

几分钟以后亚隆·安布鲁斯已经到了坡上，远远望见了父亲。

老人倒背着脸，在干活。走一步，停一下，手臂抡一个规则的直角，再走一步，又停下，手臂再抡一下，象人们在祝福时做的动作那样。老人穿着黑衣服，脖子上系着一块白布，两角翘起来，象是小孩子系着一个围嘴似的。

老人慢慢地走近地块的边缘，又走了几步，再撒一点，然后站住，转回身来。还这样，走一步，停住，手臂一抡，做一

个象是祝福的动作，慢慢地过来了。

"爸爸！"

老人抬起头来，现在才发现儿子在这里。

"嗨，安布罗①！是你？我就去，"他还是走一步，停一停，走一步，停一停。每走一步都伸手从白布兜里抓一把，然后撒到地里。

当他走到的时候，和儿子握了握手："好，孩子，你还想着你爸爸，"

"您不是退休了吗？"年轻人握着老人棕色的大手，

"是退休了。"

"怎么好象和没有退休的一样？"安布鲁斯微笑着抚摸着父亲的手。

"现在是播种季节。"

"不是有机器吗？"

"机器是机器，我不抢它们的活。但是你看这个！"老人向扎着口的大麻袋扬扬下颔，"我播得和播种机一样多。"麻袋就在他刚才播完种那行的尽头躺着。

"您播什么？"

"你没看见吗？"

年轻的医生弯腰看看播过的土地："苎麻。"

"对，苎麻。"

"这里从前不种苎麻。"

---

① 安布鲁斯的昵称。

“是我头一个种的，现在大家都种，划得来。”老人把布兜从脖子上摘下来，坐在麻袋上，指指身旁，示意儿子坐下。

等儿子坐下来以后，老人轻轻摸着布兜，“还是用你母亲做姑娘时织的布做的，连床上也没铺过。”

“您舍不得用吗？”

“就只留下这一块了。用来播种也算对得起它。”

“是啊……”儿子笑了。

“你刚才说机器播种了？……那不错，可是马也还需要，人力也需要。以后如果用飞机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用飞机？能用飞机播吗？”

“现在还不成，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老人笑起来，“人家说已经有用飞机除草的了，那真不错！播种我还行，可是除草，我还跟不上孙子，孩子们的腰腿灵活。”

“嗯，是这样。爸爸喜欢合作社吗？”

“喜欢不喜欢都是一样，没有别的。不过我倒是喜欢的。我有退休金，不靠别人，我所以来播种，因为不是非来不可。”

“但是我所以来这里是为了把您接到布达佩斯去。”

“布达佩斯？好孩子，我不去。这里的儿媳妇我熟了，你的妻子我只见过一次。什么时候见的？……还是你们刚结婚的时候吧？”

“我保证……”

“我知道，她也不错。可是我愿意留在这个儿媳妇这里，

我不爱象换衬衫一样地换地方。也不值得换，我的日子不多了。”

老人的手还是那样坚强有力，一如往昔。但是年轻的医生一直在观察老人的脸和脖子。父亲比过去瘦了，气色也不很好，有点象八月的干土……亚隆·安布鲁斯能从人的气色上看出不少问题，他从亚当非教授的学生那里学了不少东西。

“谁说日子不长？”他象主治大夫那样愉快地笑着，这也是在医院里学会的。“您还会抱着布达佩斯的小孙子跳舞呢。”

“会的。你姐姐的大女儿到复活节以后的星期天是结婚周年。可是明年无论谁结婚，恐怕……”

老人解开麻袋，把两层的布兜装得满满的。现在它有点象从前农村妇女背孩子的布包一样的了，他在站起重新去播种以前对儿子说：

“你回去吧，我也等一会儿就回去，十二点到家。”

安布鲁斯只是站着，看着父亲的脚印——笔直的一条，好象用尺子在春天松软的泥土上划过的一条线一样……等到八月的时候，这块土地就会变成棕色，干燥而发黄，就象他父亲的脸皮似的。

老人又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了，在地上踩出新的一条线，紧紧地挨着上一趟播下的种子。播过的地方均匀地散落着苎麻的种子，在线的另一边儿乎一颗也没有。

“你快回去！”老人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命令儿子，“否

则我的儿媳妇会不高兴的。”

## 四

几个侄子和村里的孩子们在院里围着安布鲁斯的小斯科达挤来挤去。嫂嫂拿出油煎饼款待远道来的客人。

他并不感到有丝毫倦意，但在嫂嫂的劝说下还是决定躺一会儿。这是他父亲的床，铺着老式的粉底红条床单和枕头。他看了看，摸一摸：清洁、整齐而且柔软。他还是睡着了。

中午，教堂响起了钟声，他父亲回来了。

嫂嫂穿着干净的衣服。食具都是城里买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整整齐齐，双手、脸蛋发着健康的红色，挨着坐下来吃饭。开拖拉机的哥哥在地里吃。

安布鲁斯不安地看着父亲。

“爸爸，您累坏了吧？”

“嗯……要是干一天，恐怕就太累了。现在这样还可以。反正今年是最后一次了。”

“在布达佩斯确实没法种东西，最多只能在阳台上种几颗豆。”

“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年秋收我大概还能看得见，明年的播种我说不定是看不见了。”

“哎，爸爸！”儿媳妇说，“您总是这么说话。”

“不总是这样，去年我就不这么说。”老人往杯子里倒了

一点酒，“连这酒喝起来味道也不如从前了……”

“所以我说您应该跟我走。我找个好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我，您知道，是个外科大夫。我陪您去看内科，找位有名的内科教授。”

“你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老人朝儿子挤眉弄眼，“你一定懂。”

“我只懂外科。动手术，接骨头。”

“那么你这个大夫真不怎么样。就好象，比方说，我到集上去买马只懂得看牙一样，看这马是几岁口，但是马的腿要叫别人看。马的肚子叫接生婆看吗？”

“不全这样，但是也有这么点意思。人的构造是特别复杂的。”

“构造管构造。可是人，他自己知道，只要活着，就要播种，因为人终究不只是一个构造。谁来收，那没有关系……我不喝，你喝吧，孩子。”

“我也不喝，我还要开车……”

“你今天就回去？”

“要是爸爸跟我走，那我当然留下，等您收拾，等您跟别人告别，还有别的什么事……您最好仔细想一想，防患于未然……”

“我明白，没问题，你看，今年我不还能播种吗？”

“而且还是播苎麻。”儿子想岔开话题。

“俗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可不想要这个名称。”他愉快地向儿子笑着，“我不会做千年老古董的。一切事情都

要顺理成章。”他指指几个小孙子问：“你，你们怎么样？”

“大概是明年。现在可以有孩子了，工资够了，我不为钱拚命，现在真是可以有了。就象眼下人们说的那样，明年‘计划’一个……”

“噢，明年。计划，不错。我也计划……但是可惜，你要走了。夜里恐怕要下雨，沥青路面会很滑。”

分别的时候老人伸出手，亚隆·安布鲁斯弯下身子，吻了吻父亲的手背。

“这算什么？”老人不满意地说，“你都长胡子了，还……也许……”他突然停住了，抚摸着幼子蓬松的头发。

亚隆·安布鲁斯挂上三档。当他开上长着白杨树的那条路时，天已经越来越暗，雨点开始掉下来了。温暖的春雨洒在玻璃上，象眼泪一样地流下来，刮雨器有规律地在玻璃上划成一个扇形，白杨树和路面闪着亮光。

亚隆·安布鲁斯脑子里闪过一句话，那还是他学文科的妻子在他们结婚以前的某个宁静的晚上从一本古老的书里念给他听的

“如果你因为看太阳而眼花，

那你应该从自己的眼睛里找原因而不要怪太阳。”

**柴鹏飞 译**

# 穿灰衣人和他的母亲

保洛陶伊·博丽丝

在月台上，母亲受到儿子和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姑娘的迎接。

“妈，这就是我多次写信提到过的贝波！”

其实，安德拉什从未对母亲提到过贝波，他压根儿就不给母亲写信。母亲过生日时，也只给她拍个电报了事。偶尔来了兴致，就给母亲挂个长途电话。而母亲呢，则拖着隐隐作痛的双腿赶到门房去接。在一阵阵咔啦咔啦的噪音和令人不胜其烦的呼叫之后，好不容易才听到儿子的声音，她的喜悦差不多也就微乎其微了。

“你还带来了鸡呀？何必这么劳神费心？”

“小心提兜！里面有鸡蛋！”

“贝波，你看，她真是个最最称职的妈妈！而你，妈妈，来亲亲这个小蚊子。我们是上星期结的婚。”

“就这么……你应该给我打个电报来。”

“为什么……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个月。现在她已是我家的正式户口。这个小蚊子跑不了啦！”

“您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宝贝？那年头没有避孕药吗？”说

着，贝波跑到前面，一头钻进汽车里，坐到方向盘旁边。她把挡风玻璃擦了擦，又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快点！”

我会和她处惯的，母亲自我安慰着。以前，爱娃和珍妮我不是都处惯了吗。我勉为其难，尽量做到和蔼可亲就行了。那时，也只有到了晚上，我才把笑脸和衣服一起脱下来。我对着黑暗发问：我的儿，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呢？她的眼睛就象是未熟的醋栗。你怎么会想到要娶一个能跳六米八〇的女人作妻子呢？而且这个女人唯一的志向就是跳得尽可能远。请原谅我……在你的房间里，不是奖杯、奖章，就是照片。爱娃在训练场上，爱娃与芬兰跳远冠军拥抱，爱娃领取银奖杯，好，好，我什么也没说。只要你能幸福就行。可是你并不幸福。从你碰到什么就乱揉乱摔这点上就可以看出来。隔着墙壁，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相对无言地坐在那里。但这不是那种融洽无间的恬静，而是空虚无聊的寂寞，是无可奈何的沉默。服点安眠药吧，我的儿！以前，你睡觉从来不用服安眠药的。可是自从爱娃闯进你的生活以后……她哪怕对你稍稍温存一点也好。你怎么偏偏就要她呢？这个砂纸一般的女人?!

妈妈挽起儿子的胳膊。“她模样挺俊的……但模样俊并不包括一切。”

“多可爱的小妞！”

“不太年轻了点儿吗？”

“年轻?!”安德拉什热烈地说。“她是三年级大学生。”

妈妈拭了拭额头。“差十六岁……”

“十七岁。”

“我要是你的话……”

“我知道，妈妈。明天我带你到高拉教授那儿去一趟。”安德拉什想把话岔开，但是母亲继续说她的：

“……我就会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要娶这么年轻的姑娘。”

“你别靠着我……你的腿就这么痛吗？”

“痛得很。”母亲执拗地说，反而以全身的重量倚在儿子身上。

“你们肯定在谈论我呢！”贝波插进来说，“你是不是向妈妈夸耀说，是我缠上了你，非要和你结婚不可的？大围巾在那儿。你把伊尔姆什裹一裹。”她对母亲说：“我以后叫你伊尔姆什。你好，伊尔姆什！”

“你看，她多有意思！”

“可爱的人儿，”妈妈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可爱，”这来自五内的声音是规劝式的、强制式的。她耸耸肩。

安德拉什摩挲着妈妈的手。“你的手真粗糙。”

“但愿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你怎么这样说？你有什么毛病？你就是腿有点疼。贝波，家里有咖啡吗？喂！请在路口停一下车，我去买点咖啡、桔子……”

“我动脉硬化。”母亲说。

“是谁诊断出来的？”

"托多尔·山尼。瘸腿铁匠的儿子。现在他在我们那儿当医生。他家住在萨拉兹地边。山尼冬天也穿着胶鞋，因为他没有皮鞋。他的胶鞋还是拉多那孩子送给他的呢！"

"别说山尼了行吗？"安德拉什有点烦躁地抢白了一句。

"我的脚趾发麻。"

"这不算啥了不起的毛病。"安德拉什想到妈妈有病，心头腾起一股无名火来。妈妈受罪，他也得跟着受罪，还不能抱怨。要怜悯妈妈。但是要温存体贴，他做不到，要做到这一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需要时间，需要自我约束。他对贝波许诺了一个随和的、能做事的妈妈，结果却来了一个哼哼唧唧的、病病恹恹的老太婆。这将使得他每天晚上都要受着深深内疚的折磨。

他端详着妈妈的脸，仿佛在把它与保存在自己脑海里的印象作一番比较。妈妈的眼睛曾是这样深陷吗？嘴瘪得成了一条细线。左眼角上的瘊子以前有没有，他也不记得了。她的小帽皱皱巴巴的，戴在头上就象是果酱上长出的一层霉皮。

"你怎么戴着这么一顶霉皮似的帽子？"

老太婆瞟了他一眼。"别大惊小怪的。"她轻声说。"有动脉硬化病的人戴着它可以多活几年。"

"你什么病也没有！"安德拉什的语气是命令式的，"你的气色很好！"……妈妈会死去的。安德拉什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他仿佛看见妈妈已经被裹进被单里。被褥、枕头等

等东西凌乱地堆放在地上。“她长眠了。”护士说，然后就收拾她的遗物。“请到办公室办一下手续！”他在门房还要给贝波打个电话通知她：可怜的妈妈，她……此刻，他还没有感到损失沉重，他想的是殡殓、下葬等等这类事务，还要处理家具什物。“上帝作证，你的气色很好！”他不由得又叨念了一句，但脑际却浮现着这样一幅图景：妈妈躺在松松堆起来的土丘之下，几株枯萎凋零的小草在坟头摇曳，潮湿的木十字架发着暗黑色。回到家里，那些旧得发亮的家具，使人触景生情，暂时被葬仪掩盖起来的悲痛猛然暴发出来。那钩织的桌布、绒布床套、玫瑰色的瓷灯罩，无不勾起对妈妈的怀念。……紧张、忧虑、良心谴责、中断了的工作的重担……

“你的气色很久没有这么好了！”他有些发狠地说。

“我真不该对你说。一说你就有点上火。”

“伊尔姆什……你给我们炸油饼吃吗？”

“她需要休息。”安德拉什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他从母亲鼻子上擦掉一片煤灰，很快在她头顶上，在帽子被发髻撑起来的地方吻了一下。“今天这一天算是完了。”他有点懊恼地想。答应昨天就写的文章只好拖到明天了。头一天，说什么也不能把妈妈一个人撇下不管。她还等着他问问家里人的情况呢。其实安德拉什对家里人不感兴趣。时间已经冲淡了对他们的记忆。

“做饭你不累吧？”贝波问母亲。“老吃冷东西吃得我的胃直起鸡皮疙瘩。什么白菜卷、葱爆牛肉……这只野兽吃白菜卷都快吃死了。”

老妇人咬咬下嘴唇，下巴上的肉不由得抽搐起来。她管安德拉什叫什么？“野兽！”让做母亲的吞下这口气，她做不到。珍姬固然懒惰，干什么事都拖拖拉拉，甚至上班还要坐出租汽车，但是她在提到安德拉什的时候，总称他是“我最亲爱的”。

“拉约什大叔让我向你问好，”母亲转向安德拉什。“他总把自己作过你的启蒙老师引为骄傲。他说，象这样品行优良的小孩子，在整个年级里也是不多的。老实巴交、心地善良……”母亲狠狠地回敬了这个乳臭未干的丫头一句。这话的意思她一听就该明白。

“我才不老实呢！”安德拉什点上一根烟，猛吸了两口，又掐灭了。得，话匣子打开了。妈妈该没完没了地唠叨起他童年时代的事情了。这童年时代，经过妈妈不断用想象来充实，就象一盘生日蛋糕似的甜蜜而丰富。“我用笔匣把库陶什打得满头是血。”究竟是一种什么自相矛盾的心理促使他讲起这个来了？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让妈妈留在那由她自己拼凑起来、最后终于确信不疑的五彩缤纷的天地里呢？说他心地善良，也正是妈妈浮想联翩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确实，每当她睡不着觉、黑暗象沉重的帷幕遮盖了一切的时候，从她眼皮底下就会钻出一个小男孩，爬到她身边，请她吃棉花糖，还把自己最漂亮的玻璃球拿给她，哼着歌，直到她沉入梦乡。

“那是因为库陶什偷了你的橡皮。他还把一只苍蝇塞到你的墨水瓶里去。”

妈妈重温着往昔的生活，絮絮叨叨地讲起那已流逝的岁月。而安德拉什却在想：可怜的妈妈，这些陈年旧事多么令人生厌啊，我早已听腻了。可是他还是努力做出一副倾听的样子，以免母亲觉察出他心不在焉。然而，母亲毕竟还是感觉到了，尽管这点她连对自己也不愿承认。她仍旧不停地说着，他则随时应答着，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

“我多么盼着你来呀！”安德拉什提高了嗓门说，尽力压抑着那几乎冲口而出的不耐烦的声调。他扶着妈妈下了汽车。她变得多么瘦小啊！大衣直扫着鞋跟。她需要一件新外套！可这次去希腊旅行的钱还没有付，得十六张一千福林的票子呢。反正春天快到了，干脆给她买件羊毛衫得了。外套最多还能穿一个月。当然，明年还要穿，倘若……旅行前的准备和路途上的劳顿，使妈妈憔悴不堪。

不必担忧，高拉会使她恢复正常的。老年人就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毛病，好让人家重视。亲爱的妈妈，你当然是重要的。我一直准备给你写信谈谈贝波，但总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我总是安排不好自己的时间。

“你回头躺一躺，我给你煮点儿好咖啡。”

妈妈缩在电梯的角落里，解开外套，从脖子上取下围巾。“这还是我过生日时伊丽莎白送我的。”

我的上帝！她刚过生日！安德拉什早把这日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你准猜不出，我会送给你什么礼物。”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琢磨你喜欢什么。”是的，她喜欢什么呢？安德拉什拭了一下额头，象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表演左思右想的样子。买台电视机？自己的开支本来就够大的了……便宜一点的礼物也可以达到目的。来双山羊皮鞋吧。给高拉教授买瓶拿破仑科涅克酒。妈妈在她简朴的一生中，只喜欢实用的礼物，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她不感兴趣。明年无论如何要……也许在圣诞节吧。到那时不会象眼下这样捉襟见肘了。他可以给电台写点东西，编一本通讯集。他不晓得别人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收入的，而他总是入不敷出。把自己的咖啡壶送给母亲？或是那把从南斯拉夫带回来的生菜叉？那可是件精美的雕刻品。

安德拉什在门前站住，他把钥匙插进锁孔。屋子里传出顿脚的声音，还伴着一声声吼叫。

“你又撒野了！”贝波喝道，并用拳头在门上猛擂了一下。

本该和妈妈说一声。安德拉什有点神经质地把钥匙转来转去。

妈妈向他投来疑问的一瞥。

“我给你买了电视机！”他急忙说。“你可别怪我怎么又乱花钱！”

“反正我不放你们进来！滚蛋！”一声得胜者的欢呼响彻了整个楼梯。“滚蛋！滚蛋！滚蛋！”

“我揍死你！”贝波摘下她的猫头鹰一样的太阳镜，对母亲说道：“伊尔姆什，你别吃惊。这儿有我带来的一个孩

子。”

在门厅里站着一个小男孩，正用脚往墙上乱踢。“滚蛋！滚蛋！大屁股！”

“看我打你！”

“这小男孩是谁？”

“你是问这个小无赖？这个小野兽？”

“我的心肝宝贝……”安德拉什劝解地搂住贝波的肩膀。“这个小男孩是贝波的。现在他也是我的了。说说你叫什么名字？”

“比利姆——鲍劳姆——布鲁姆！”

“你的名字挺怪。”

“爱怪不怪！”

“够了，别再耍贫嘴了！回到你自己的屋里去！妈，电视机明天到货。或者我干脆让寄到罗姆哈尼去吧？”

“你看这小家伙怎么样？挺有意思，是不是？”

妈妈的目光落在窗帘上。那上面有火红火红的斑点和黄色闪电般的条纹，仿佛火焰飞腾。摇椅被拂在墙角里，不过它居然还在，倒真是奇迹。每个女人离开时，都要从房子里带走点什么，而新来的人又带来另外一些使人不安的东西。爱娃是个自私的女人，在她的治理下，家具破败不堪。灯光暗得甚至还不如奖杯的光泽。到了珍妮手里，房间中央是一张沙发床，上面靠垫狼藉，一派懒人的气氛，皱皱巴巴的衬裙散发着体臭。这个女人随时都作好着厮搂厮抱的准备。薇隆卡则是在鲜花丛中生活。那时节花可真多，花

瓶装不下，连黄瓜瓶和罐头盒都用上了。住宅因之而生机盎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家，惹人喜爱而不想离开。母亲真不愿相信，薇隆卡会是个演员。那朴素无华的衣服、不加修饰的面容……在她学习角色时，简直就象一个受苦受难的小姑娘在啃生涩艰深的课文。她大声背诵着台词，时而蓦然停住，鼻子一抽搐：现在要哭了！然后用黄油抹一块面包，再涂上蜂蜜，哭将起来。

母亲在剧院里看薇隆卡演过几次戏。在回家的路上，她喃喃自语道："我实在看不出个门道来。"在剧院里，她几乎忍不住要对邻座的人说："这是我的儿媳妇！"然而，她始终没能说出口。后来，有一次她突然发现节目单已经被自己揉成一团，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难过。薇隆卡在舞台上说不上很美。其实呢，她倒真是很美的：满头稠密的金发，晶亮的双眸宛若星星。（卖肉的常把最好的排骨留给她，而蔬菜水果店里的售货员，则把橱窗里当样品的、擦得发亮的水果卖给她献殷勤。）有一次，母亲梦见薇隆卡从舞台上消失了，哪里也找不到她。

几次来布达佩斯，母亲都要去看望薇隆卡，而她则做好咖啡，满眶热泪地等着母亲。每次总要到最后，母亲才有机会向薇隆卡提出忠告，劝她想开些。母亲对她是温柔体贴的，但爱莫能助。安德拉什告诉母亲事已如此，不要为薇隆卡的命运操心，干脆忘了她完事。但薇隆卡要把心中的怨艾向母亲倾诉，让母亲分担她的痛苦。而母亲也深感她委实可怜。这一起度过的下午也就成为一种珍贵的回忆，深深

地埋在母亲的心中。安德拉什问什么来着?……当然……是孩子。

“贝波离过婚吧?还是丧夫寡居?”

“我把咖啡端来。”安德拉什没有回答。

“亚尼是我中学时代在一次夏令营结识的。小伙子和我是同年级的。”贝波泰然自若地说。

母亲坐在摇椅里,开始以短促的节拍前后摇晃起来。她欲言不能,强咽下去的话象潮水一般撞击着她的胸膛。这个穿灰衣服的男人是她的儿子。她不能再给他以任何保护了。她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些事情上需要保护,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给他带来危险和痛苦。来了这么一个贝波,还带着一个拖油瓶。安德拉什,这可怜的……

“一会儿我来打开行李。你把新外套带来了吗?”安德拉什问母亲。“新外套也有十五年了,”他向贝波解释说,“还是我首届婚礼时妈妈让人做的呢。”

贝波脱掉毛衣,露出赤裸裸的身体。她既没穿衬裙,又没戴胸罩。就这么光着套上一件衬衫。

“那个年轻人不想要你吗?”

“哪个年轻人?”

“这孩子的父亲。”

“我连想都没想过要嫁给他。因为我不爱他,你不要为他多费心思,伊尔姆什。说起来你也不懂。如果我到了你这样的年纪,恐怕也会不懂的。你喝咖啡放几块糖?”

“你刚才说……你缠上了我儿子。”

“千真万确。”

安德拉什笑起来。“使用了吓人的强制手段。”

“我拒绝了任何劝告。我只需要他，我怜悯他。他开始秃顶了，有六颗假牙。但是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些什么，而且从不为这生气。”

“简言之：没有我你就没法活。对不对？”

“我把伊尔姆什的床拉到这屋来。”

“你先回答我！”

贝波给他背上来了一下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笑意。硬梆梆的漆黑的头发就象是铁铸的一般，没有一绺是柔软的。

“这是晚上的节目。然后熄灯睡觉。”

“妈妈不相信你是那么爱我。”

“这与她无关。这是我们俩的事。”

老太婆从摇椅里站起身，“我给鸡喂点水。”说着，她把身后的门关上，又慢慢地坐到一条凳子上，等安德拉什跟出来。那穿灰衣服的人要来，可是被阻止了。母亲忽然觉得，她并不认识这个穿灰衣服的人。只有他的声音还能引起一些昔日的回忆。当她一人感到寂寞时，曾与这声音絮语交谈。这声音曾多少次伴她入眠。

眼前的一切逐渐模糊起来……多么乱七八糟的梦啊！那穿灰衣人一再浮现在眼前，嬉皮笑脸、插科打诨，似乎竭力掩饰着什么。原来熟悉的声音渐渐消失了。电话铃响起来，收音机在广播，又是一阵电话铃响。从外面传来爱娃絮

橐的脚步声。一扇门突然打开了，前厅墙发出一声呻吟……。在带有花纹的玻璃窗上，现出了安德拉什的身影。孩子们在园子里跳圈玩。这不是自家的园子吗？长着接骨木，还有茶藨子丛。鸡从破篱笆的缝隙里钻进钻出。那个人影越来越呈褐色，渐渐下移，摇曳着，颤动着，在珍妮的肩上跳来跳去。绳子上晾着蓝色府绸衬衫，领子是剪下来的下摆做的。安德拉什不愿意穿，扯掉的衣领落在地上……。他也站到圈子里去，这个大懒虫，许多孩子围着他转。转眼间，他们又成了大人，穿着褪了色的衣服。时光在流逝……他们的脸也模糊不清了……她又似乎看见安德拉什在赶火车。他总是最后一分钟赶到车站。……安德拉什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攥得她手指发痛……蓦地，她又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小得象一个大头针尖……安德拉什把她带到陌生的房子里……穿灰衣人与珍妮一起出现了，向她索取旧熨斗、铜捣臼，还到阁楼上搜集旧瓦片。当他和妈妈两个人在一起时，只说一句话："别责问我，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以后给你写信，来看你，给你寄东西。"他往空气里吻了一下就扬长而去，母亲为他采摘的玫瑰花也忘了带走……。薇隆卡在咯吱咯吱地嚼着甘蓝，口中念念有词：看，给您这茴香和牛蒡花；给您蒿草，蒿草……草。

妈妈在凳子上坐着，缩成一团。她真想舒展一下身子，一头倒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发发牢骚。最主要的是能发发牢骚出出怨气，使她压抑的心情松快一下。究竟是何种冥冥中的力量驱使她的儿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换女人？这是什么

样的弱点啊！

“你带来了啥东西？”那小男孩在母亲跟前蹲下，双手技着膝盖。

这是个羸弱瘦小的孩子。可怜见的，在你母亲怀你时，一定用什么苦药粉打过胎，或者要用束腰带把你勒下来。你真不该生下来。可是既然你来到了这世上，为什么又偏偏缠上了我的儿子？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你。谁也没跟我说过。既没有信来，也没有谁捎过话提到你。对这一切，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那悭吝的爱娃……只关心自己的身体。”

那小男孩咿咿呀呀地唱起来，一下子窜到她膝上。

母亲浑浊迷惘的眼睛打量着这孩子的脸。

“安德拉什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我那时用甘菊粉给他洗头，然后给他梳个漂亮的小分头。他刚学会写字，就用粉笔在门上写‘妈妈’两个字，还是大写字母①。当我把这些讲给珍姬听时，她就打哈欠，或者吃药。可我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气死你！”

里屋的人根本没注意她还留在外面，坐在破盆烂罐堆里。她打算数五十下，如果数完了他们还不……要是薇隆卡的话，这会儿该叫她了。发着馨香的薇隆卡会啪哒啪哒地在她脸上吻着，招呼她进屋去。她记得，安德拉什小时候从他的作业本里把那些“五分”都剪下来贴到圣诞树上

① 表示尊敬和爱戴。

去……她数到了一百。

"薇隆卡是个天使。不错，她好哭。"一些断断续续的话语浮现在母亲的脑际："如果你跟他去说的话……那样大的事情……你曾经答应过……现在晚了……我不会乞求的，宁愿……没必要！"

"当然，事后——"她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事后一切都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我真懊悔。她一参加演出，就胃疼，直想呕吐，紧张得发抖，诅咒自己怎么当了演员。如果不演出呢，她又六神无主，在自己那些花中间往来徘徊，仿佛走在坟场里一般。"她的声音有气无力，"为了她，我的心都要碎了。"

她注视着那孩子的瞳孔的移动，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就象在阅读似的。

该点灯了。哟，数到多少了？她在寂寞时数数的习惯是从爱娃在时开始的。她咽了口唾沫，又念叨起来：二百二十五，我会聪明起来的，我会爱她的。通常她数得很慢，一天也数不了多少。有时数完了，期待的事情也没出现，有时还往回倒着数。总有一天会习惯的。这样对安德拉什有好处，如果真的对他有好处的话……

那穿灰衣人已经把她忘掉了。她背靠着墙坐着，一条腿向前伸，好象随时准备跳起来。她不去教授那儿。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又有什么用！吉赛尔大婶有四个孙子，所以她值得保养心脏、节制肺部活动、控制血压。而我呢？母亲凄楚地想。

"我要回家了。没有我你们也生活得很好。"她喃喃自语道。其实，她脑子里根本没有要走的念头，无意中冲口而出的话却使她认真起来。"对，就这么办，安德拉什不同意也罢，乞求，发誓，许诺，都没用。明天就乘早班快车回家……。当那穿灰衣人醒来时，我乘坐的火车早已远去，连烟都看不到了……安德拉什会后悔不及，那微弱的呻吟声只有我能听到。即使如此，我也不回来。"母亲的声音是嘶哑的，仿佛是一条绷紧的带子被拉得更紧时发出的声音。"我再也不来了。我今天要爱这个，明天又得爱那个，够了！真是心力交瘁……可她们毕竟是安德拉什身边的人。我应该爱她们，就是珍妮也不例外。她连喝茶也得掺半杯甜酒，喝白酒就象灌水一样，只有最后一口才是咽的。""她是个酒囊饭袋，"有一次穿灰衣人笑着说。母亲用手捂住青筋纵横的苍老的面庞。"我再也不来了。现在就……"

那蹲着的小男孩从她眯缝着的眼睛里消失了。在厨房的地上放着她的行李卷和两只鸡。灰色的天空从窗户投进来清冷的光线，落在她的发髻上。发针象闪电一样刺痛全身。

"又是一个新女人，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贝波。小蚊子。我凭什么要使自已相信，应该爱她……我已经疲倦了。安德拉什的眼角净是皱纹。她们向他微笑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她使劲跺着脚，感到一种不着边际的痛苦，真想大声喊叫把这痛苦压下去。

"我爱她什么呢?！为什么要爱她?！和别人鬼混生了个

孩子！而且毫不感到羞耻！哪怕她对安德拉什有一点点爱情也好！这个荡妇！当然她需要安德拉什，象这样情愿接受一个私生儿的蠢男人到哪儿去找？她居然还对他的假牙说三道四！”

“妈！”安德拉什出现在门口，嘴大张了一下又闭上，吸进一口气。“你糊涂了？”

“她讲故事呢！”小男孩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打开了电灯。

“我讲故事……”老妇人的眼睛里凝结着恐惧。

老年痴呆症！安德拉什想。蓦地他感到恼火，又有点害怕。这两种情绪互相交织，又互相抵触。

“老年痴呆症……”贝波嘟哝了一句。

“她什么毛病也没有！看你，又来了……为什么非要指明不可呢！无非是她上了年纪，而你又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就这么回事！”

“那也是痴呆症。”

她的嘟哝声已经变成了吼叫。接着“呼”的一声响，打断了这吼声。贝波猛地关上门出去了。

“我讲故事……”

安德拉什走到母亲跟前，抓住她的手腕。“来！”

“我数到一千了……”

“贝波开玩笑呢。你……站起来吧！”

“刚才挺黑的。”

如果妈妈能听到他心里发出的那孩提似的求助呼声就

好了！“你的咖啡要凉了。”

老婆婆按下门把手时，瞥了安德拉什一眼。眼前这个四十岁的、穿灰衣服的人在火车站曾笑个不停，他的笑容就象是没有灯罩的电灯一样刺眼。转瞬间，他变成了三十岁，正急不可耐地拽着她的手。倏地他又变成了十七岁，忧郁使他的声音变得粗野而嘶哑，而现在……现在则成了，或差不多成了那个刚才还在这里的小男孩。

“小家伙，过来！问奶奶好。说：吻你的手，奶奶。”

那小家伙拿着两个盖子敲了一下。“吻你的手！”

“奶——奶！你好！比利姆——鲍劳姆——布鲁姆！”小男孩使劲咽了口唾沫，好象吞下去一整块酸糖似的，“爱怪不怪！”

刘思岳 译

# 最后一次列车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脚下，这个坐落在森林边缘的小城仿佛已经死寂了，孑无一人的街道，人去楼空的房屋，落日的余晖在空荡荡的窗户上闪闪发光。只有火车站附近还有点生气，特别是站台上难民麕集，从山峦深处不时传来沉闷的炮声，掠过难民群，就象海浪把岸边的沙砾拍击得更紧一些，使这些小小的生灵更加紧密地缩成一团。

他抓了一束草把皮靴擦擦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峭壁。绕了个大弯来到车站小吃部，可是那里已经关门，他又挤进小饭店，这里也停止营业了。不过，桌边还坐着许多富裕人家的全家大小，吃着不是装在普通的旅行袋里，而是装在标着自已家族姓氏的高级皮包里的食物，喝着暖瓶里倒出来的咖啡。他又返回站台，走进纸烟店。里面没有任何商品，只有几张褪了色的画片，上面有的印着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堂，有的是储蓄所前贝姆① 的塑像，有的是俯瞰着这个小城镇的海尔曼·奥托观景塔。

①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独立战争中的英雄。

烟铺的女掌柜还站在柜台旁。她在抹口红，眼睛哭得通红。

“还有烟吗？”中尉问。

“都在玻璃柜里。”

“但这肯定是不卖的。”

“瞧您说的，”女掌柜泪汪汪地看了中尉一眼说：“您以为我要把这些烟留给谁呢？”

中尉已经两天没抽烟了。他买了所有的烟，把口袋都塞满了。点了一支，贪婪地吸起来。

“还有火车吗？”中尉随口问。

“也许还有到瓦拉德的。”

“什么时候开车？”

“可能马上就开，”女掌柜答道，“但是宪兵会把所有穿军装的人赶下来的。”

“我不过问问，我是到前线去的。”中尉说。

“到前线可以，”女人抬起哭红的眼睛看了中尉一眼，说，“可我已经没有便衣了。”

“我要这有什么用？”中尉疲倦地说。

“我已经把我丈夫留下的衣服全都给人了。”

“这对我无所谓，”中尉说，“反正到了瓦拉德还要搜查车的。”

“但是穿着便衣可以躲过搜查。”女掌柜说。

“噢，穿便衣可以躲得过。”中尉说。

中尉发觉自己的左手神经质地敲着柜台边，就赶忙把

手插进口袋。同时发觉自己正在不安地左顾右盼，便抖擞了一下精神，看着人群。但却又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无聊地东张西望。这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姑娘。

开始只看见一个棕色的点，后来变成了一张被太阳晒黑了的细嫩的脸。接着，就好象用调好的望远镜观望似的，一张美丽的面孔清晰地出现在中尉面前。这么漂亮的姑娘他可能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似乎姑娘也在看他。当然也许是一种错觉，姑娘可能正在看火车是不是来了，也可能什么都没看。不管怎么说，人们再远也是能感到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的。

"有谁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躲到车头后的煤堆里。"

"谢谢您的主意。"中尉漫不经心地说。

"如果机灵的话，还可以跳上已经开动的火车。"女掌柜还在说。

"这并不难。"中尉应付说，继续注视着那个姑娘。

"那您快去呀！干嘛还在这儿站着？"女人催促他。

中尉隔着窗子向女掌柜致谢。女人已经不再眼泪汪汪了，但口红抹得满嘴都是。

中尉向那个姑娘走去。

"您上哪儿去？"女掌柜把头探出窗口喊道，"不应该往那边走！"

中尉从远处就看到姑娘坐的凳子旁边立着一个小木箱，当他挤到那里，便把木箱放倒，坐在上面。他低着眼皮，看到姑娘的手动了一下。她戴着镶花边的白手套，透过手

套上的孔隙可以看到她被太阳晒黑的皮肤。

中尉久久不敢开口，甚至连看都不敢看姑娘一眼，姑娘也没理他。他们的内心似乎向眼睛发出了禁令，好象互相一看就会发生什么未可预料的严重后果似的。他们坐得那样近，彼此连呼吸都能听到，在那最靠近的地方甚至插不进一张锯条……。中尉踩灭刚抽剩下的烟头，然后又点着一支。在把火柴盒放进衣袋前，习惯地晃了晃，从火柴盒的响声中他似乎得到了勇气，向姑娘身边挪近了一点，用极其细微的声音说："我叫奥托·阿尔贝尔特。"

姑娘什么都没说，连动都没动，只是把手指往手心里蜷曲了一下。中尉稍等了片刻后说："我没有非分的念头，只是希望您和我聊几分钟。"

姑娘仍然没有回答。中尉又等了一会儿，现在更难开口了，因为挫折使本来就不大的那点信心也丧失了。

"至少，您可以告诉我您的姓名呀！"中尉终于鼓起勇气说。

小鸟在起飞前的一瞬间，并不改变体态，总是一动不动，但我们仍然知道它要立即飞走。这位姑娘此时也没有动，可是肌肉在皮肤下面抽搐了。中尉吃了一惊，赶紧说：

"请您别走！我什么都不说了。您就看我一眼吧！您瞧我一眼后，我保证再不打扰您了。"

姑娘犹豫了一下，终于慢慢地看了中尉一眼，仿佛一个大理石雕像费了很大的劲才扭过自己的头。不管怎么样，中

尉终于看清了姑娘的面庞。

“谢谢！”他说。

已经是深秋天气了。落日的余晖给月台的玻璃顶抹上了一层金黄，在铁轨那边，栗子树也浴着金色的阳光。山峦深处传来大炮的轰响，好象大地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不断地裂开，但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夕阳中，姑娘的棕色皮肤也闪出诱人的光泽，好象与太阳交相辉映。中尉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的姑娘。他虽然感到口渴，但是并不想起身，只希望坐在这里，看着姑娘，不让这光阴消逝。

这时候，站台栏杆旁不断增加的象鱼子一样挤成一团的人群，突然松散开了，给一队头插鸡翎、全副武装的士兵让出一条路。他们共六个人，端着刺刀，脖上挂着月牙形的小牌，上面写着“战地宪兵”。领队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的准尉，他没戴领章，军人气也不很足，倒有点象一个满脸粉刺、野心勃勃、门门功课都想得优等成绩的中学生，然而正是这野心使人不寒而栗。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地搜寻着什么。他对每个人都查看两遍：首先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虎视眈眈，凶狠地紧盯着对方。中尉和姑娘已经被内定为自己的审查对象了，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停下盘问，而是继续巡逻，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他返回来，走到中尉和姑娘面前，看着中尉，却向姑娘要证件。

“姓名？”他问。

“那上面写着呢！”姑娘答道。

“我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姑娘一开始没有回答，当她听到火柴盒的哗啦声时，脸红了，稍微离开了点中尉后才说：

“巴尔达·玛丽亚。”

“您母亲姓什么？”准尉问。

“利埃布戈特·葆乌拉。”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住址？”

准尉问什么，姑娘回答什么。在此同时，三个宪兵走到中尉身旁，这样，两个人就被围在他们中间了。宪兵们没有接着往前走，也没有松开圈子，只是提防着中尉。

准尉继续问：

“你们是一块儿的吗？”

姑娘的脸又红了，想了想后说：

“不是。”

“可是，你们刚才在一起谈话。”

姑娘又想了想说：

“我没和任何人谈话。”

“您打算到哪儿去？”

“布达佩斯。”

“到谁那儿？”

“我母亲那儿。”

“您母亲住在布达佩斯吗？”

“不，她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先去那里的。”

"您母亲住在哪条街?"

"瓦姆哈兹广场八号。"

"您知道房子是什么样的吗?"

"知道,我在那里上过学。"

"窗户朝哪个方向?"

"朝盖勒山的城堡。"姑娘准确地回答。

"请便!"准尉说着把证件还给姑娘。

对中尉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那就是说:中尉先生并不认识这位小姐。中尉先生到这儿只是想买点烟,根本没想要到后方去,恰恰相反,此时您正赶路去前线……"

准尉问到这里又向前逼进一步。中尉虽然没有看,但是却感到这些宪兵象钳子一样更紧地夹住了他。

"中尉先生,您的部队在哪里?"准尉问。

"在此地。"中尉答道。

"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此地教堂广场,塑像前。"

"谁的塑像?"

"我没有仔细看,可能是贝姆。"

"对!"姑娘说。

"请您别打扰中尉先生!"准尉朝着姑娘说,然后继续问道,"塑像在哪里?"

"储蓄所前。"中尉答道。

"是在那里。"姑娘说。

“请您不要插嘴！”准尉对姑娘严肃地说，然后又问，“中尉先生，您的下属在干什么？”

“待命。”

“等什么，等待早晨教堂的钟声吗？”准尉讥讽地问。

“等待出发的命令。”

“塑像离这里多远？”宪兵准尉继续问。

“走十分钟的距离。”姑娘答道。

“请您不要开口，我不是问您！”

“步行十分钟的距离。”中尉重复了一遍，

“好了，说的都很对。我也并不是刚从天而降，中尉先生，我可以请你不要离开这里吗？”

“我不离开这里。”中尉答道。

宪兵准尉和一个士兵耳语了几句，然后向出口处走去。姑娘向四周看了看，发现他们身边的士兵都走了，才松了口气，半信半疑地问：

“都走了吗？”

中尉向周围连看都没看一眼，答道：

“走了。”

“这个人是什么官，是尉官吗？”

“是个准尉。”中尉答道。

“他说从天而降是什么意思？”

“这是开玩笑。”中尉微笑着说。

“他能和您开玩笑吗？”

“战地宪兵干什么都行，”

“和一个中尉也可以开玩笑吗？”

“和上校都可以，”中尉说，“您就叫玛丽亚，还是有什么习惯的爱称？”

“就叫玛丽亚！”姑娘回答后又问，“宪兵肯定走了吗？”

中尉环顾四周。宪兵头盔上古铜色的羽翎在人群中不时闪现，一直在离中尉和姑娘不远的地方。

“肯定走了，您害怕吗？”中尉问。

“我只是为你担心。”

“很担心吗？”

“有一点。”姑娘答道。

“只是一点点吗？”中尉问。

“不，很担心。”

“我也很为您担心，非常，非常担心。”中尉说。

沉默片刻后，中尉晃了晃火柴盒，接着抽起烟来。

“您烟抽得真多，”姑娘不安地说，“我刚才还以为您是逃兵呢！”

“您在哪儿晒得这么黑？”中尉问。

“这里的浴场，我们家的。”姑娘回答后问道，“您现在要到前线去吗？”

“是的，”中尉答道，然后问，“您有对象吗？”

“有过，是未婚夫。上帝保佑，但愿他不会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他是干什么的？”

“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我不让他上前线。”

“你们吹啦？”

“他娶了别人。”

“为什么？”

“我们的浴场又小又破旧，”姑娘解释说，“只有十二个小衣柜和一个有许多裂缝的水池，而且经常没有水，大部分人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游泳。”

“那为什么？”

“为了其他原因，”姑娘说着脸红了，“全城都暗暗注意着谁去浴场，和谁一块游泳晒太阳。在这里这意味着……，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懂得。”中尉说。

“药房老板家的人对我印象不好。他们说，谁在浴场工作谁就不可能规矩……，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您说，我说的对吗？”

“对！”中尉说。

“也可能这一切都是借口。他们无非是想给他们的孩子找个有钱的姑娘。唉，我的上帝！”姑娘长叹一声问道，“您为什么不和我一块上火车呢？”

“这不行呀！”中尉说，“你爱这个年轻人吗？”

中尉晃晃火柴盒，又点着一支烟。姑娘带着责备的神气看着纸烟。

“我并不真心爱他，”姑娘说，“他只想要我一件事，他只愿意和我一起在游泳池玩玩……。可是，我只能属于我非

常爱的人，我只能嫁给这个人。您信吗？”

“信。”中尉说。

“结婚后，我想先要个男孩，再要个女孩。如果这两个孩子普普通通，平平庸庸，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之后我还想再要一个有点某种才能的男孩。”

“什么才能？”中尉问。

古老的栗子树投下巨大的树荫。姑娘忧郁地凝视着由金黄变成古铜色枝叶繁茂的树冠。

“这还说不准。或者精于乐器，比如小提琴，或者当个歌唱家……，您觉得什么好？”

“也许小提琴好。”

姑娘沉思了一会儿说：

“现在，我也觉得小提琴好。到那时候，我想陪着我的孩子到世界各地演奏。我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和其他听众一起鼓掌祝贺他的演奏成功。谁都不知道，他的母亲也坐在听众之中，甚至连孩子自己也不知道。”

“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中尉诧异地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怕他紧张。我在妈妈面前脱衣服都觉得不好意思呢！”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不让孩子发现您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暗暗地跟着他，比他晚一天动身 那时，当地报纸已经刊登他的照片了。”

“您真是个奇怪的姑娘。”中尉若有所思地说，“您很喜

欢旅行吧？"

"是的，很喜欢。"

"到哪儿？"

"哪儿？到所有的地方。"

姑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几乎带着愉快的心情。

"反正现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时候，全世界都会开放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旅行，因为再不会有战争了。"

"为什么再不会发生战争了？"中尉问道。

"因为战争就是因为各国的国界引起的。今后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国界了，如果没有国界，当然就不会再发生战争。"

"您相信这些吗？"中尉出神地问。

"怎么，您不相信吗？"姑娘睁圆眼睛看着中尉，惊奇地问。

"我相信。"中尉想了想说，把身子转向另一边，因为一个头插红色鸡翎的宪兵扭头在看他。他掏出火柴晃了晃，点着一支烟。

后来，姑娘又谈起战争结束后将会是什么样情况。那时候，这个火车站会多么安静呀！火车将会正点运行。现在不断传来炮声的山峦也会变得十分宁静。最后，姑娘又问道：

"您的愿望是什么？"

"是什么？"中尉考虑了一下后说，"没有什么。"

“我知道，您的愿望就是抽烟。”姑娘微笑着代替了中尉回答。

“是的，是抽烟。”中尉肯定地说。

“抽烟有什么好处？”

“我还没有想过。”

“那么，您想想吧！”姑娘说。

中尉深深地吸着烟沉思起来。过了片刻，他说：“例如，手边总有点烟就感到舒服。”

“还有呢？”

“衣袋里装得下。”

“还有呢？”

“总之，烟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好。”

“您说得太妙了。”姑娘笑着说。

“太妙了。”中尉也笑了，“您还不明白，这种说法确实是真知灼见。 因为有的人……和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也可能生活下去。他一无所有，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人。他总觉得：一切都会马上完结，也许过五分钟，十分钟，或者一刻钟……他借烟聊以自慰，寻求乐趣，抽完一支扔了，再点着一支。总之，只要他活着，每分钟都想得到一点好的东西。”

中尉沉默了，姑娘也沉默了。尔后，姑娘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中尉说：

“但是，现在他有亲人了。”

“是的，现在有了。”

"因此，再不需要烟的恶臭了。"

"是的，不需要了。"

"那么，请您把所有的烟都拿出来吧！"

姑娘把中尉所有的口袋都翻了过来。她两手捧着翻找出来的好多包烟送给一个坐在破烂包袱上的肥胖的茨岗女人。回来后，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中尉说：

"您把正在抽的也掐了吧！"

中尉又抽了一口，扔到脚下踩灭。

"您不会再想烟了吧？"

"不会了。"

"我的价值等于一支烟吗？"

"超过它亿万倍。"

他们坐在一起，沉默着，变得那么平静深沉，就好象把所有想说的都说完了。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一起，没有任何企求，享受着沉默的愉快。他们多么希望，就这样坐到战争结束，坐到那永恒的未来。但是，一种嗡嗡的声音，说得更确切些，这几乎是一种使人觉察不到的，象滴水似的嗒嗒响声，一下子就把这甜美的静谧打破了。起初，人群顿时沉寂下来了，屏息静听；继而，当断定这确实是火车过来的声音时，马上就乱作一团。疯狂的人群把中尉和姑娘拖拉、推搡、夹裹着向列车拥去。在人群中，他们很快失散了。中尉竭力想冲开一条路找姑娘，但是杳无踪影。人群中大包小包翻滚着、跳跃着，孩子在人们的脚下哭叫着，沙砾碎石从狂奔者脚下四处飞溅。嘈杂的人流中，这里那里不时闪

现的宪兵帽子上的深红色鸡翎，好象一件由密密麻麻的人组成的粗纺织物上跳出来的断线。

中尉终于找到了姑娘。这时，姑娘正从车厢的一个窗口探出头，向走到眼前的中尉边招手，边说：

“您走近点！”

中尉走到窗口前。

“那些宪兵是在找您吗？”姑娘小声地说。

中尉说，不是。

“那您为什么不和我一块走？”

中尉说，这不行。

“您必须要重返前线吗？”

中尉回答说，必须返回。

“可是，难道不能找点什么借口吗？”姑娘问。

“找什么借口呢？”中尉问道。

姑娘考虑了一会儿，脸上顿时豁然开朗起来，问道：

“不能请假吗？”

“这倒可以试试。”中尉答道。

哨子响了。车厢晃动了一下，开始徐徐移动。

“就这么办。这要谁批准？”姑娘问。

“我的上级。”

“是他签字吗？”

“不，这要由团长签字。”

中尉同送行的人们，同挥手告别的孩子，同泣不成声的肥胖老妇，随伴着挥动着的手帕和宪兵头上血红色的鸡翎

都一齐顺着缓缓移动的火车向前走。

“团长会签字准假吗？”

“这我不知道。这不仅要团长批，”中尉说着不得不尽可能地加快步子。

“还需要谁批？”

“将军。”

“他是个很严厉的人吗？”

“并不那么严厉。”中尉回答说。

“那么，他就会签字的！”姑娘喊道。

“也许他会签的。”中尉也喊着回答。

“为什么说也许？”姑娘喊道。

“差不多肯定会签字的。”中尉喊道。

列车开走了。

中尉站住，气喘吁吁地挥动着手，直到姑娘晒得黑黑的面庞慢慢消失。而后，中尉凝眸注视着夹杂在许多伸出车窗外灰色手臂中间的一只十分显眼的金色手臂。后来，这只手臂也消失了。中尉把手伸进口袋，摇晃着火柴盒，但是一支都没有了。

安 利 译

# 故国依旧

欧特利克·盖扎

## 一

雅柯比是在三月初，即比实际需要提前两个星期到达这座欧洲名城的，他曾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而现在，当他五十岁生日时，该城要授予他金提琴，以表彰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几天来，他一直在街上徜徉漫步。上午、下午、晚上，他都在寻觅着什么，足迹踏遍了那些与他往昔生活有关的地方。然而，他什么也认不出来了。这座城市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他心绪不宁。明显消瘦了，几乎可以说是形销骨立。当他独自待在旅馆里时，这个高高的、瘦瘦的人总是那么坐卧不安。而当着人们的面，他则佯作微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一副开朗惬意的样子。来时在飞机上，他一直默默不语，不时从舷窗里俯瞰下面城市的模模糊糊的轮廓。他还穿着夏装。空中小姐不无体贴地提醒他说，现在这里差不多还是冬天，气温不会超过摄氏十度，最好穿上暖和一点的衣服。

雅柯比正研究着旅行手册上的地图，试图把它与下面的景物对照一下。大地上，只有那条白链一般的河流清晰可见。在河流那一边，有一个三角形的点，在阳光下闪烁。他很想知道那是什么。空中小姐从他身旁走过去。雅柯比把旅行手册信手扔到一堆报纸上。他没有理会空中小姐的关照，并非不讲礼貌，也不是由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而是因为有点晕眩。这是他身体虚弱常有的伴生现象，是他自己所熟悉的、很快就会过去的不适感。他用食指从额头上揩去两滴汗水，从报纸堆里抽出一本画刊，递给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妇女。接着，他悄悄从兜里掏出药，吞服了一片。

画刊上有一整页有关他的文章。“在阔别四十一年之后，雅柯比·彼得重返故城，其间，他以自己的提琴征服了世界。”这篇文章毋宁说是由一组照片拼成的，文字很简短。雅柯比身穿燕尾服；雅柯比穿着游泳裤和爱因斯坦在一起；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雅柯比不在场）。该城四十年前之风貌；将向雅柯比奖授金提琴的市长；市立音乐学校大门。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新居民区的儿童游戏场。雅柯比对这篇文章不觉莞尔，做了个怪相，用外国语轻声对坐在他旁边的那个长着倔强的脖颈的、约莫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伴说了句什么。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光临过这座城市。虽然他迁出该城是在十一岁那年，但后来还曾来这里度过一年半时间。实际上，这座城市并不是他的故乡。他是两岁时来到这里，并在这里长大的。他出生在这个国家一个不大

的、群山环抱的城市。至于说到征服世界，为了能提前两个星期来到这里，他取消了海外的两个音乐会，便是明证。

在旅行手册的地图上，沿着铁路线的走向，他找到了南火车站的位置。其实，不管他怎样摆弄地图，铁路是看不出来的。他把旅行手册丢在一边，阖上眼睛。脑袋胀得更厉害了，头晕也不见减轻。会过去的，会过去的，但在头晕消失之前，他将完全陷入一种身不由已的空虚之中。眼下这种空虚感只是刚开始袭来。虽然他精神有些恍惚，但头脑还是清楚的。三十年前的一个早晨，他离开这座城市远走异国他乡。发生在南火车站候车大厅的事至今历历在目。在候车大厅的玻璃穹顶下，那个与他没有缘分的姑娘，身穿雨衣，和他一起踱来踱去。她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即将乘坐的列车旁的。他们早已互相道别，说好永不再见了。雅柯比对她说过，他不爱她。天知道她是怎么打听到他何时动身的。雅柯比一时感到慌乱窘迫。那姑娘并没有大哭大闹、纠缠不休，也许只是由于一往情深、不能自已，至少想听他说句安慰的话。雅柯比陷入了尴尬境地。他笨拙地、语无伦次地辩白着，差不多是充满敌意的，起码是冷漠无情的。其后不久，有人写信告诉他，那姑娘在街上遇上了车祸。

她被汽车撞了？被电车轧死了？还是腿被轧断了？或许她想自杀？如果只是受伤，痊愈了没有？雅柯比始终无从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局如何。“在街上遇上

了车祸。"几年里、甚至几十年里，他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那姑娘被碾得血肉模糊的、他所熟悉的躯体。这幅图景，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他，或清清楚楚，或隐隐约约，不管他睡着还是醒着。还有一个荒唐的念头时时攫住他：是他把那姑娘推到电车底下去的。时间长了，对此他从习以为常到感到厌烦和懊恼，曾多次力图把这幅图景连同那荒唐念头一起逐出脑海。然而，自从他自己死亡的可能性也提到日程上以来，他对那次可怕的车站谈话，产生了一种"悔不当初"的感觉。这件事，总有点不对头。当时，也许可以这样说：谁让你来的？下地狱去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走吧！也许可以说：跟我来吧，让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或者至少说：让我们等着吧，等到火车开动，然后双双跳到火车头前面去，了此一生，别在这儿活受罪了！

别在这儿活受罪了，别在这儿活受罪了！雅柯比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用手在额头上摩挲着。坐在他旁边的漂亮女人向他问了句什么。她的话音很轻，飞机的轰鸣使他听不清她在说什么，而且她讲的是外语。雅柯比忽然想不起来他们是用什么语言交谈的。英语？葡萄牙语？还是西班牙语？他站起身，吸了一口气，套上一件针织坎肩，然后从女旅伴手里拿过那本画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贝多芬"。那女人只认得这两个字。雅柯比便把这篇不那么准确的短文翻译给她听。"雅柯比·彼得因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高级使命而更为遐迩闻名。他的这次访问，

因我国正拟与他二十年来为其公民的大洋彼岸那个国家发展贸易和文化关系而显得格外重要。去年，他演奏的贝多芬的十首小提琴钢琴奏鸣曲，被灌制成唱片，荣膺万国竞赛大奖。令人不胜遗憾的是：在他这次重访故国举行的音乐会上，我们却一首也无法聆听，因为这位艺术家不久前与他的钢琴老搭档分道扬镳了……”这最后半句话雅柯比没有翻译出来，但他的女旅伴还是往这篇文章上端的照片瞥了一眼。雅柯比身穿燕尾服，站在领奖台上，在他身边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侧身低首的长发女郎的脖子。

这本画刊的最下端是一幅许多孩子奔跑嬉戏的照片。这些孩子不是在游戏场的秋千上、攀登架上或别的什么新型游戏设施上玩耍，而是在更远一点的地方，背靠着墙，好象在做“大嫂，剪刀在哪儿？”的老游戏。雅柯比仿佛看到，一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正没命似地从“房子”里，也就是从树干那儿跑过来，高举着一只手嚷嚷着：“捉住我也不算！”至少在雅柯比的脑子里出现的是这句话。在另一张不那么清晰的照片上写着：

昔日——一九一五年——的草料市——今日的戴朗诺施威泽广场

当年他家住在广场左边的新世界大街。这条两旁都是六七层楼房的街道终点就是草料市。雅柯比在自己的记忆中竭力搜索着。在照片上看到的老式电车中，哪一路通向他当年居住的街道呢？171路？还是车牌是NB，或者MI

的？那个从电影院旁迤逦转上山腰的很陡的小巷子叫什么名字来着？还有对面那座安着大玻璃窗的咖啡馆叫什么？“大都会”？ “大世界”？ 在照片上似乎可以看出一个“大”字。“大……咖啡馆……”

从草料市再过去一点，曾有过他和他童年伙伴的一个小小的天地。那是一片斜坡草地，上面有几幢别墅。 他记得，在他的伙伴中有个女孩子，做游戏时好耍赖，每当她看到自己快被赶上或超过，总是摇晃着小辫子，高举起一只手嚷道：“捉住我也不算！捉住我也不算！捉住我也不算！”

“那你回家去吧！”有一次雅柯比气冲冲地对她说。那时他九岁。

## 二

在突然出现的静默中，小提琴家的女旅伴问他：“您究竟为什么要现在回国呢？”这时，旅客们开始活动起来。一个秃顶男子挤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摇了摇，用外语急匆匆地说了句什么。 他的女旅伴开始抹口红。雅柯比想起来，演出公司曾通知他，电视台和报界都将派人到机场迎接。他俯身从飞机舷窗往外望去。可不是！在下面有不少人，人头攒动地等候着。其中有摄影记者、新闻电影摄影师、记者等等。他把软草帽戴上，又摘下来，坦然地向那个女人借小镜子一用。需要整理一下仪容啊。 他坐下来照了照镜子，力图摆出一副落落大方、雍容优雅、笑容可掬而又不失尊严

的样子。眼下这副样子出现在摄影机前是不可取的。他从舷窗里看到，一个年轻人——显然是演出公司派来的——正向这边挥动花束。他镇定下来。如果这个人能凭照片认出自己来，说明他的仪表没什么问题。于是，他把提琴盒挟到腋下，脸上带着训练有素的微笑出现在飞机舱口，向所有迎接者挥动了一下帽子，就面对着摄影机镜头——而不是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稳步迈下舷梯。他笑容可掬，流露出一种内在的开朗情绪，同时却又显得矜持而庄重。然而，那些摄影机拍的并不是他。等发现时已经晚了。

记者们和摄影师们围上了一个胖胖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演出公司的那个年轻人急得扯着自己的头发，拿着那束花去追电视台的一个工作人员。片刻之后，这两个人又返身向雅柯比这边走来。那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兴奋得神采奕奕，打了个手势，又继续走。原来，他的同事们和电影摄影师们正把那个胖胖的国务活动家拉回飞机，请他再重复一遍下飞机的动作。演出公司的那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继续追着，那束花已经挟到腋下。雅柯比茫然地接受三四个同机乘客用不同的语言与他道别："再会，亲爱的音乐大师，希望很快能再见到您！①""亲爱的雅柯比先生，实在好极了……②"他又开始感到晕眩，慢慢踱进一幢建筑物里，坐到第一张长椅上，又吞服了一片药。

---

① 原文是法语。

② 原文是英语。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很长时间，也可能只是几分钟。他木然端坐、毫无所思，世界好象从他周围消失了。头脑里仿佛又响起了飞机的轰鸣，伴随着一些不连贯的说话声。都是些外国话，杂乱无章，不知所云。他失神地茫然四顾，脑际仍然萦绕回旋着一些仿佛从一盘录音带里发出来的完全陌生的声音。（例如，我亲爱的先生，确确实实，正是为了不错过您的音乐会我才绕过这里的。……①我明白了，雅柯比先生。不过您三十年没回家啦？我的意思是说，那可不少年啦，难道不是吗？若说四十年就不太确切了……②）他忽然恢复了理智，原来一个警察彬彬有礼地请他到里面去一趟。（您真太好了，亲爱的音乐大师。③当然喽，亲爱的朋友，下星期三，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④）他被人们指点着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去那儿，最后来到一道墙上标有“外国人护照办理处”字样的走廊，走进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只见一个穿便衣男子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他向雅柯比示意不要坐到这张写字台前面，而是坐到对面靠窗户那张写字台前面去。（亲爱的大师，这也许是了不起地不准确，然而这正是为了您四十年前的同胞能够得到一个机会，使他们不至于错过您的音乐会，即使这个城市不朽正好不是您的出生地也

① 原文是法语。

② 原文是英语。

③ 原文是英语。

④ 原文是法语。

罢。……①）

“请到窗户那边去。”那穿便衣男子吩咐道，自己也站起来走到靠窗户的那张写字台后面。他开始以一种寒暄的口气询问雅柯比。叫什么名字？想在这个国家逗留多久？来此有何贵干？为什么恰恰呆到下星期三？付给您报酬吗？什么市长？您能否证明这点？有无营业许可证？有何担保证明您会离开这个国家？……

雅柯比的回答显得有点吞吞吐吐。那个男子又从头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打了个电话。他对旋即进来的打字员口授了头两个问题和小提琴家的回答，让他打下来。片刻之后，那个官员抬起头来望着雅柯比说：

“我不能发给您入境许可证。”

雅柯比没有作声。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们静静地坐着面面相觑。那个男打字员仰坐在椅子上，怯生生地抠着手指甲。小提琴家却泰然自若。他不太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在这所简朴的小办公室里，祖国的语言象潮水一样冲击着他，使他颇有醉意。甫下飞机，他那已谙熟的外语词汇系统便开始失灵，就象是敌人一样地被祖国的语言包围了。各种告示、招贴、扩音器的声音——看门人、摄影师、父母和孩子、警察——打电话、广播——冷漠地、随便地、傲慢地……不言而喻，在这里人人讲这种语言。人们似乎是串通一气合伙来对付他，用祖国的语言与他交谈，使他

---

① 这是雅柯比在神智有些不清楚的情况下脑际出现的一些乘客对他说的话，英语和法语混杂在一起。

宛如在梦中一样。他的回答被打字机用祖国的文字打下来。他想，如果能跟那个穿便衣的男子从头再来一次问答就好了。

出口，入口，“旅客问讯处”……你想象一下，我的小天使。算了吧！他妈的！刮脸刀片大王。“闲人免进”。在这间挂着“闲人免进”牌子的房子里，雅柯比对头一个问题“姓名？”——就象他三岁时一样——回答说：“雅柯比·彼得，家住新世界大街二十七幢楼三层二号。”小时候，大人教他，倘若迷了路，必须把这一套话说给陌生人听。时隔多年，居然还能说得如此流利，雅柯比不由得心中暗暗得意，就带着拖腔又重复了两遍。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男人没有插话，对于各种离奇古怪的事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但关于金提琴的事他却诘问再三。还两次追问雅柯比的固定住处。“没有。”雅柯比回答说。“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可是您的护照上写着呢？”“那是以前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没有了？”雅柯比有点慌乱，又迅速更正了一下他的用语：“不再有了。再也没有了。”“您是说，那已不是您的固定住处了？”“我是说，已经没有了。”

窗户，窗户，雅柯比想。Finestra, window, fenetre.① 打开窗户，彼得。别坐到窗台上去。别打破了窗户。雅柯比想到了真的窗户。卧室的窗户。奥托家的窗户。厨房的窗户。春天里，打开的窗户。下雨天，他房间的窗户。窗户，

① 意大利语、英语和法语，意皆为“窗户”。此外，“窗户”是匈牙利领事工作中的术语，意为“同意居留”。

窗户，窗户。窗户。这个精明强干的穿便衣的人对他说，窗户。雅柯比的脸上浮现出轻松而认真的神情，代替了刚才那副好象对着电视摄像机似的强笑。他从内心里感到愉快和舒畅。

“您刚才说，您将得到一把这么大的提琴？”那官员用手比划着问。

“不，不是。”

“那是多大呢？”

“一个小小的。”雅柯比回答说。“袖珍的。小不点儿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不然的提琴。一个不丁点儿大的金提琴。一个小不点儿的、微不足道的、小小不然的、不丁点儿大的……”

那穿便衣男子有点不快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不是。”雅柯比诚恳地说。“您也许想在这里重新定居？”“这我还没想过。”“您没想过要留下？”“也许想过。也许我想过这一点。”

也许，也许，这个回答不好，雅柯比想。他之所以这样回答，也许只是因为他可以使用“也许”这个词。其实，他并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那穿便衣的官员看来失去了耐心。他摆了摆手，管他呢。他口授了两点意见，让打字员打下来，并向小提琴家索取某种保证。这使雅柯比想起当年他认字的时候，在一家洗染店的橱窗里，在一块年代久远的长长的三棱木招牌上看到的一个生词。那洗染店位于与他家隔着儿幢楼的街口上。洗染店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

在其橱窗正中间靠前面的地方，横放着一块涂着亮漆的三棱木招牌，上面写着：

米尔纳·H父子洗染店——保证质量

也许更早些时候他就曾听到过“保证”这两个字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在书报里也一再遇到它，却始终搞不清它的确切含义。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推销雨衣和帐篷的，上面写着：“保证不漏水”，他琢磨这个“保证”大约是某种他所不知道的皮匠或裁缝的手艺：是鞣皮子？是防腐处理？是用特制染料或油脂，也许甚至用蜡来浸泡？还是某种梳棉或织布技术？然而后来，他在桥那边的马路上，在一家商店橱窗里看到一架缝纫机，又有点糊涂了，那上面除了价格外，还标有“保修两年”的字样。这个“保”字似乎与上述意思是矛盾的。他无法领会，保修这架铮亮的小机械与鞣革桶、纺车、织布机或炉子怎么能联系起来，这个词的用法越来越多，最后又落到最初碰到时所猜想的意思上，与米尔纳·H父子联系在一起。雅柯比的一本书里有一幅插图，画面上是雄浑的北美高原景色。远景是瀑布，近景的巉岩之上，有一男一女。在这张图的下面有一行文字：“印第安好汉说：‘我保障女士的安全。’”这个罕见的用语显然是这本青年读物翻译上的蹩脚之处。但是对于雅柯比来说，它却着实具有魔力，使那遥远而陌生的世界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这个洗染店的“保”字，竟有如此众多的含义，如：鞣、浸、纺、织、修，等等，还有传奇豪侠的色

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大丈夫气概；言必信，行必果；或者浅显一点；翻山越岭，穿过科迪耶拉山脉[1]，远走高飞；隆隆作响的火车驶过悬崖绝壁；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找到船破落水而失踪的父亲……

那勇武的印第安人再也不能与米尔纳·H父子分开了，插图上的他，裸露着青铜色的上身，赤手空拳，以一种矫健而优雅的姿态跨步登上山岩。雅柯比和他的小朋友们偶尔因谈话入神，不知不觉地在洗染店的橱窗前站住了。当然，这是很少有的事，因为差不多所有其他事情都比这更有趣，但毕竟还是在那里站住了。他往往把右脚搁到橱窗下面的台阶上，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机械动作。这时，他的姿势就和那插图上的印第安人一样。

“贵重金属允许携带出境的数量有明文规定，并需要持有营业许可证。”那穿便服的男子说，打断了雅柯比的遐思。“请在这里签名。”

## 三

这位既高又瘦、心绪不宁的雅柯比一个人待在旅馆房间里。电话铃又响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他转过身，微微仰起上半身，半坐半躺地伸手去接电话。他和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面对墙壁已经好长时间了。这所房子挺大，豪华，

① 在玻利维亚。

但并不舒适，给人以空荡荡的感觉。他的衣物扔得到处都是，为的是到处都有点东西，但房子仍显得空荡荡。“不，哪里！……”他对着电话听筒说。“看来我们在机场互相错过了。没什么关系。今天不行。今天我没空。无论如何不行。明天，明天。谢谢。”他小心地把电话放下，站起身来。他想，这间房子连窗户也没有，只是一面墙是玻璃的。

他戴起围巾，穿上衣服，象真有急事似的匆匆走出旅馆。服务台递给他几封信。先生，您的信。[1]另一封信上有的地方称他为先生[2]，有的地方称他为雅柯比先生[3]。他撕开两个信封，把第三封信——是用手写的地址——塞进衣兜里。然后毫不犹豫地向门外走去，向右转身上了街。

经过一座桥时，他在当中停了一分钟，看了看湍湍流水，从兜里掏出那手书封皮的信，连拆也不拆，撕碎了撒到河里去。过了桥，他乘了一段地铁。接着又是步行。市容已经面目全非，但他还是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小广场。因为只要沿着大马路一直走就行。

那骑马人塑像就立在那里，还有瓦格纳咖啡馆。那些台球桌应该在咖啡馆里靠小巷子的那一边。雅柯比正要穿过街道，碰上了一队游行的人。这些人拿着牌子，队伍井然

---

① 原文是法语。

② 原文是葡萄牙语。

③ 原文是意大利语。

有序。行人中有不少人拥在队伍后面看热闹。正当游行者穿过广场，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从一座大楼那边突然响起一阵喧哗声，开过来几辆警车，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但是转瞬之间，广场、大街和小巷便空无一人。本来就寥落的交通停止了，游行者、行人和警察都一下子无影无踪。没有人开枪。

那些窗户上，那些新建的高层楼房里，也都阒无人声。客店、学校、公共汽车……哪里都不见人影。住宅里无人居住。就在这般空寂的城市里，在这儿，在这清晨孑无一人的街道上，曾有一次，那个姑娘从他面前跑掉了。他追上了她，两人拉拉扯扯一阵子，那姑娘又挣脱了。在塑像下面，他又追上了她，急切地辩白着、哀求着，但是那姑娘还是离开了他。那是一个夏天发生的事。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他和她曾多次在瓦格纳咖啡馆里幸福地吃早餐。也有时吃得很不痛快。有一次除夕，在瓦格纳咖啡馆里，乐队奏起了“西波涅”伦巴舞曲。清晨，他们在塑像下掷雪球玩，在雪地里继续跳伦巴舞。

那些台球桌已经不在了。取代它们的是一个小小的可以独自出入的小茶座。雅柯比从朝向小巷子的门拐进咖啡馆，走上第三层楼。门上是一个陌生的人名。他没有揿门铃，也没有什么留恋，便转身离去。他循着原路，又乘地铁回到桥那儿，再从桥那儿回到草料市。

在新世界大街原来的二十七号和二十九号楼的旧址上，耸立着一幢新的办公大楼。大楼的拐角处，那家洗染店

还在。然而，那个橱窗却已不是当年那样清新典雅了。它现在是按最时髦的，即上世纪末的那种式样布置的，和当年他祖母家的饭馆橱窗差不多。他没有找到奥托家的房子。他在两三家大门前站下，仔细察看，但都不认得。当然，他就是找到那所房子也是枉然。奥托早已无影无踪。他年纪轻轻就夭亡了。他的双亲也早已不在人世。雅柯比并不是找他们。也不是为了找他们的住宅。甚至当他看到这里是一幢与周围不太协调的高大建筑物时，还松了一口气。他也许正是想来证实这一点，奥托家的老宅确实没留下任何痕迹，连一粒微尘都没有留下。他想起了一个姑娘温柔的面容，她长着孩子般的前额，随着"西波涅"舞曲闯入了他的脑际。她的名字叫弗洛拉？也许是芳妮？或是桃拉？比安彩？不，她还是叫弗洛拉。当时她十五岁，他二十岁。没准儿两人都是十几岁？不，不。弗洛拉是钢琴系学生。她的下落如何？反正都无所谓了，他想。他要找的是草料市和大咖啡馆。

广场是陌生的，就象它的古里古怪的新名称一样。那大咖啡馆也没有找到，否则是能认出来的。旧址上，是一幢类似超级市场的建筑物。雅柯比走进大楼的商店转了一圈，在楼上图书部，他在各种地图中挑选了半天，最后找到了一本介绍这座城市的建筑物的书。他买下了这本书，因为里面有些过去时代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沿河林荫道一角，有一个小商亭。这正是现在这幢二十三层大楼的所在地。这本书使他想起那个小山坡上、教堂旁边、顺山势辟成的

小公园。这小公园在两张陈旧的城市鸟瞰图照片上依稀可见。

那小公园位于草料市上方，比他们的山坡草坪还要高些。在这块草坪上，他曾经呵斥那个耍赖的小姑娘。“捉住我也不算！捉住我也不算！”“那你就回家去！”那小姑娘委屈地哭着跑掉了。雅柯比当时犹豫着，喊了一声，又转回身子。但最后还是追了过去，很快就追上了她，把她抱起来，又把她拉回到大伙儿那儿。女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如果把你捉住了，你不要老说捉住你也不算。”“但是我老是被捉住！”“因为你小嘛！”“那捉住我就不算！”“谁要是被捉住了老不算，就没法儿玩了。”他劝解了半天也没用，那女孩子又跑了，边跑边哭喊着：“捉住也不算！捉住也不算！捉住也不算！”“让她去吧！”其他人对雅柯比说。他们注视着远去的小女孩，只见她哭哭啼啼，一只手发狂似地向空中挥动，在山坡上拚命奔跑。

但是那小姑娘第二天又到草地上来了。而现在，雅柯比到这座城市已经是第三天了，他还是什么也认不出来，或者说，即使有些景物依然如旧，对他来说也是恍若隔世。但他还是放弃了上午的排练，又走上了山坡小公园。被派来给他伴奏的那个女钢琴家，他不喜欢。她是一个穿着粗呢裤的年轻姑娘。这里的人安排她来伴奏，大概算是尊重雅柯比，因为看得出来，他们很看重这个姑娘，至少她妄自尊大。她是一个冷漠的、生硬的、自负的女人，而且排练时总是迟到，每天上午都有什么别的事，就这样，第三天上午，

雅柯比和她只练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向她表示了歉意，然后叫来一辆出租汽车，到草料市去了。

很可能他们确实不是因为轻视他而安排这样一个冷冰冰的、穿粗呢裤的女人当伴奏。这女人说不定前途无量。然而，小提琴家却感到她的演奏矫揉造作，令人难以忍受。他沿着山坡往上走。草地不见了；全是建筑物。但是那个供人散步的广场，教堂下面那梯田式的小公园，却面貌依旧，和照片上一模一样。这里四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靠上面一点，他甚至找到了那条他们当年放东西的长凳。还有地上那些石子、花草，大概也都是原来的。可雅柯比仍然什么往事、任何故人都回忆不起来。他蓦地感到，自己完全是个异乡之客。一念及此，他几乎是奔跑着逃离了此地。

## 四

他不是为此而来的。他来到这杳无人烟的孤岛，是为了找到因航船遇难而失踪的父亲。他来这里，是因为他这个勇敢的印第安人要保障女士的安全，是为了把一位过去的女郎从悬崖绝壁之间带走。他之所以来此地，是为了解开一个谜。他从市长手里接过了金提琴，人们向他鼓掌，他鞠躬致谢。他微笑着。他的笑容优雅高贵、落落大方，又显露出他内在的严肃深沉。晚宴他也挺过来了，只感到一阵比平时轻微的晕眩。在旅馆的客房里，这个羸瘦的、高高的、坐卧不安的男子，脱去燕尾服，放下金提琴，躺在床上，

面向墙壁。第二天，很幸运，那个穿粗呢裤的姑娘放弃给他伴奏了。

不，他不是为此而来的。他不是为此而学会了走路，学会了以人们的语言讲话的。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间谍。是某一个外国的代理人。他的证件是完美无缺的。他带着他的安玛蒂[1]周游四方，只是受别人派遣行事，——在人间为天使们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很久以来他就有病。这是一种空虚感。每当他委顿不堪时，就会产生这种空虚感。他会觉得自己也化为乌有。这与其说是疾病的朕兆，还不如说是他演奏时的伴生现象。固然人们对此毫无察觉，因为他善于以人们通晓的语言拉小提琴，使人们无从发现他有病。但是，他不是为了这个学会拉小提琴的。

他和那个穿粗呢裤的姑娘在市立音乐学校一起排练时，随着这种空虚感越来越强烈，对那姑娘硬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C小调奏鸣曲里的做法就越反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攫住了他，使他几乎要呕吐。第二天，人们告诉他，那女人辞去了为他伴奏的工作。谢天谢地！一个上了年纪的音乐学校教师接替了她，而且是诚心诚意的。

这是个戴眼镜的六十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他的头部姿势很怪。有一次伴奏时，他出了错，雅柯比不由自主地朝他瞥了一眼。使雅柯比诧异的是这人比那个女人不知强了多少倍。老人的后脑勺和小孩般的脖颈引起了雅柯比的注

---

[1] 安玛蒂是十六、七世纪意大利制作小提琴的世家，这里指优质小提琴。

意。他不由自主地一再越过提琴窥视那个上年纪同胞的后脑勺。这使他感到惬意。这是这个城市里第一样使他感到似曾相识的东西。

艾丝黛拉是这姑娘的名字，就象爱情的化身，发着晶莹的光芒。这是漆黑夜空里闪烁的星星。她叫艾丝黛拉，不是弗洛拉！当年，他总是躲在这所市立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或在大门口，希望能看到那孩子样的前额和无限温柔的小脸，艾丝黛拉，来，艾丝黛拉。但雅柯比爱的是别人。他很清楚，他爱的是别人，不是艾丝黛拉。他们之间只有友谊。他等候那女孩子，和她到处游荡，把她拉到学生食堂，送她回家，或者参加音乐会。他感到她的脸，那孩子般的脸、前额，是属于他自己的。

那老钢琴师又弹错了。不料，这竟一下子激起了雅柯比的演奏热情。他不但喜爱老人那男孩子般的后脑勺，而且对他两次错弹也感到自有妙处。几个月来，也许是多年以来，他从没象现在这样领会到音乐的真谛。奏鸣曲演奏完了。那老人纹丝不动地端坐在钢琴前面，轻轻叹了口气，举起双手，又无可奈何地放下，一言不发。最后，站起身，右手伸向小提琴家，摸索着。雅柯比这才发现，他的眼睛有毛病。他可能只是勉强看得见，或者就是瞎子。他的眼镜片发灰，不是蒙上水汽，而是用这种颜色的厚玻璃做的。雅柯比双手捧住那老人瘦骨嶙峋的手。

他们说妥，老钢琴师参加音乐会的演出。雅柯比扶着老人的胳膊，把他一直送到走廊尽头。其实，那老人根本不

需要人扶，他的步履惊人地矫健，在这幢熟悉的建筑物里尤其如此。即使在街上，也很难看出他是一个盲人。他的手杖也不是白色的，而是一根漂亮的散步用的手杖。“您知道不知道格里纳乌什·奥托这个名字？”小提琴家突然问他。老人停下脚步，思索了一番，但是没有回答。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雅柯比说，“他是个神童。他也常在这所音乐学校里演奏。”

“人人都曾经是神童。”那老教师说。

雅柯比想，我可不是。有一次，他曾对一个记者谈过——以后也曾多次提起——，他是在五岁时，为了一个朋友才开始学习拉小提琴的。虽然实际上他学小提琴的时间要晚些。起初，奥托的听觉引起了他父母的注意。奥托刚开始弹钢琴时，还没有钢琴高，只是举着手弹。有一回，他家的一个客人听到，屋外传来一声噪音，这孩子似乎是习惯性地当即弹出两个准确的谐音。每当奥托听到任何一种不期而然的声音——汽车喇叭响、电车的叮当声、人的喊叫声、铃声、水龙头的哗哗声，甚至狗吠猫叫，他都要跑到钢琴那儿，完整地弹出来，然后满意地继续和雅柯比在地毯上玩耍。他很快就被送到音乐学校去学习，他也挺愿意去。可这样一来，雅柯比下午就没了伴儿。在他的恳求下，雅柯比也被送进了这所音乐学校。 在学校里雅柯比是个过得去的学生，听觉也没什么问题。而奥托呢，却很快便显示出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天才。

不久，雅柯比就对钢琴感到腻烦，而改学小提琴。只有

一件事比较麻烦，就是每次回家都得带着小提琴。后来，他们可以独自上学了。放学后，他们可以随意游荡，绕路回家。但雅柯比总是得在脖子上挂着那娇气的乐器。尽管带着它，他和奥托也没少去山坡上玩。但这玩意儿毕竟是个累赘。

有一次，他们翻一道石围墙。雅柯比一不小心，那提琴盒碰掉了。奥托在下面一下子接住了它。琴码跳了出来，但提琴本身没有伤损。嚯！我的老兄！真险哪！他们好生乐了一阵子，肚子都笑疼了。那天，他们笑啊，笑啊，笑得前仰后合。坐到长凳上，他们还在笑，腿摆来摆去的。在回家的路上，在山坡公园的斜坡上，在拐弯的石阶上，他们都在不停地笑。

雅柯比又到新世界大街去逛。没想到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得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启示。雅柯比对乘公共车辆相当缺乏经验，在电车上被人挤来挤去，东倒西歪。有个人站了起来。只见一个小男孩，拉着他母亲的手向这个人空出来的靠车窗的座位挤过去，一边嚷嚷着："妈妈，咱们去坐！"那年轻的母亲俯下身子轻声哄着他，让他别嚷嚷。这时，一个胖女人把那空位子占了。小孩子不满地嘟哝着。到了下一站，又有一个靠窗子的座位空了。那小孩子尖嫩的声音又响起来："妈妈，咱们去坐吧！"他母亲有点难为情地哄劝说："别嚷嚷，我的孩子。人家也累了，他们都比你年纪大，你为什么偏要坐呢？"那孩子难过地哭起来："我不愿老在屁股中间站着！"

电车上的人哄然一声都笑了。雅柯比不由得向那边望去。那年轻的母亲因惹人注目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她羞红了脸，把孩子搂到身边。可不是，这孩子才不点大，他的脸刚刚够到那些挤在车上的乘客们的臀部。小男孩把自己的脑袋拱到母亲的怀里，气鼓鼓地哭着，使劲摇晃着脑袋。雅柯比凑过去，蹲到他身旁，也是在屁股中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雅柯比在自己的衣兜里摸索了一阵子，但是只找到了几枚零钱，还有一个弱音器。那孩子对弱音器倒挺感兴趣。雅柯比觉得，先得跟他聊聊才能使他接受这个玩意儿。“我叫彼得。你叫什么名字？”雅柯比问。那孩子嗫嚅着。雅柯比听不清他说什么，因为他只是小嘴唇蠕动了两下，就往里吸气。后来那孩子又怯生生地问了句什么。虽然声音很轻，雅柯比还是听懂了。“我是小提琴家。”他也轻声说。小男孩终于有礼貌地、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弱音器。就这样，他们在不过腰部的高度一起乘着车。

雅柯比这天很运气。他终于看到一样他所熟悉的、使他感到愉快的东西，就是那个老钢琴师的后脑勺。现在呢，又可以进行一次有意思的谈话了。（“如果你是小提琴家，那我就不要你的弱音器。因为你也需要它呀！”小男孩说。“是的，但是我还有好多呢！”“有多少？”“好多好多。我也说不上有多少。”“大概是多少呢？”雅柯比想了想。该说多少呢？“三个。”他最后说，“也许是四个。”“那不算多。”“是不算多。可你瞧，我一次在小提琴上只能安一个。”这次是那个小男孩思索了一番。“那倒是。”他终于信服了。）这天，雅

柯比终于找到了格里纳乌什·奥托家的房子。

他在洗染店的橱窗前蹲下来，象在电车上一样。他观察好久，但是一无所获。橱窗里是铜灯、茶壶、纸花以及其他一些谁知是什么东西。这不是米尔纳·H父子洗染店，怎么看也不是。他又走上小山丘上的公园里，没有坐到长凳上去，而是坐到长凳旁边的地上。他想从近处看看地上的小石子。他又向草坪那边挪了挪身子，在草地上寻找蚂蚁、昆虫。 把指头伸进湿漉漉的草丛里摸索了一会儿。最后，他挑了一块小石子，装进衣兜。在回旅馆途中，他又沿着新世界大街一直走到底，一路走，一面漫不经心地在手掌上扔小石子玩。最后又随手把小石子掷掉了。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他深深地弯下腰，好象想仔细看看什么东西和价钱，也许是别的什么。他发现，开始热闹起来的大街上没人注意他。于是又继续往前走，在一些大门口蹲下来观察一番。终于，他找到了他朋友的旧居。他在一家大门的拱门的一边，认出了他所熟悉的石头。

## 五

这拱门是用大块粗石整齐地砌成的。宽阔的新世界大街的西侧和路面，已经罩在阴影里。但是在大街的这边——即东边，建筑物的门仍然浴在这三月夕阳的余晖之中。对过一些较高建筑物投过来的阴影已经开始爬上二层楼。而在奥托家的大门口，阴影还只是刚刚到达墙根。这黄昏的

阳光虽然清澈，但显得柔弱无力，正射到大门上，摩挲着拱门石。象是燃烧着的石面上，现出一条条长长的阴影，仿佛是许多黑色的针，构成了他前所未见的奇特图案。那些石块，熠熠发光，好象获得了生命一般，似乎在显示着它们隐蔽在粗糙笨重的外形下极其细腻、从未被人们所认识的真正的灵魂。落日的余晖，穿过敞开的大门，把门槛里的阴暗角落也照得通亮。大街上，晚风习习，使人感到了凉意。雅柯比听到一声电梯门响，脑际立刻浮现出楼梯间的形状。他还记得楼梯间的位置。但是他感到最熟悉的，一下子就能认出来的还是那些石块，不是石块本身和那些阴影构成的图案，而是它们的本质和内涵。是音乐，C小调奏鸣曲。“天哪！”雅柯比想。他用手臂撑着膝盖直起身来。

阳光里开始融进血红色。街道渐渐趋于寂静。一驾马车辚辚驶过，喧嚣声也随之而去。越过草料市，越过河面，渐渐远去，然后又从复活节岛、赫布里底群岛那边、从南方传回来。“天哪！”雅柯比心头一阵颤栗，“我在这块土地上待过。”

有一次，也是三月的一天傍晚时分，他曾在这个大门洞里站过。当时一家人正要远离此地。那时，他又想起了从前的某一个三月，他和奥托一起从网球场回来。或者是更早的一个三月，他回家去吃晚饭。那时，他也是从一个低低的地方，也就是从成人臀部的高度看这座城市的。在电车上，他也往往被大人们挤来挤去，有时也免不了向母亲抱怨。“我想当一名残废军人，”有一次他说。他倒并不是完

全为了想坐那专为老弱病残保留的座位。他们常常翻越围墙的那个荒芜的、陌生的园子对他们说来无异是一片神秘的、巨大的原始森林。到处是茂盛的灌木丛和数不清的密密层层的野生植物。一翻进石墙里，他们就感到恐怖。但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们去探索这座园子的奥秘，再说他们也喜欢有这种恐怖感。有一回，在回家路上爬墙头时，雅柯比的小提琴盒从上面掉下来，就象是从城堡的箭楼上落下来似的，被奥托接住。嚯！我的老兄！过了教堂以后，他们爆发了一阵大笑，简直是一路滚到了新世界大街。在每个橱窗前他们都要站下来瞧一瞧。什么雪茄烟、画报、假腿、假肢、调味品……楼梯间、育儿室……一切都是从很低的角度，即离草地或地毯很近的地方来看的。

大街的单号门牌一侧，包括这边的孩子、商店和通往山坡的一些小街道，都是他们的天下。大街双号门牌一侧，即西边则是另一个世界。那边的孩子、商店、小巷也都不一样，简直是陌生的、神秘莫测的。连那边的门洞也都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有一家住着一对奇异的夫妇。雅柯比听人说，他们会让桌子跳舞，召唤神灵。还有个女孩，是一个卖菜人的女儿。据说只要一句话，她就会撩起裙子给你看大腿。此外，还有个又聋又哑的乞丐。有一段时间，雅柯比和他的伙伴很怕他。

不过，雅柯比总是沿着新世界大街单号门牌一侧回家的。在经过草料市时，他踢雪玩。在灯光通明的圣诞节橱窗前站一会儿，瞧一瞧里面的东西，还有广告。什么雪茄

烟、画报、假腿、电影院、绸衣料、临时大减价，诸如此类，老一套。又是广告，扣子，一百种扣子。这也谁都知道。接着是一个穿军服的乞丐，带着架手风琴坐在路边。这样的人多的是。然后就是"米尔纳·H父子洗染店——保证质量"。在这个角落还有个售报亭。有一段时间，雅柯比有个习惯，见到什么东西上面有文字都要从头至尾读一遍。每次路过这个售报亭，他都要读一读那些用图钉钉着的报纸的标题。过了售报亭，是一个邮箱，对邮箱上面的字，他照例一个字母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经过一家大调味品商店，就到家了。

他常常用一条腿蹦着上楼梯。大人不在家时，他和奥托有时装扮成残废军人，用绷带吊着膀子，一条腿着地，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或者摇头晃脑，手足乱抖，装精神病患者。有时，他们还装扮成瞎子，伸手探脚，摸摸索索的。这与其说是出于取乐，不如说是出于羡慕。雅柯比有一次在电车上说，他也想当残废军人。

有时，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军服，上面还挂着几个旧奖章。在新世界大街尽头对过的人行道上坐着的那个又聋又哑的乞丐，据他们侦察是个骗子。一个危险的骗子，没准儿还是个间谍。在他的军服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标明是"一级残废"。他只会对行人呜呜作声。如果有人对他说话，他就使劲摇头，表示他是个聋子。他看上去很年轻，长得也不错，还戴着一副眼镜。有一次，雅柯比鼓足勇气，往他怀里扔了一枚铜板。他生怕那个家伙用惯常的呜呜的声音向他

表示感谢。 可是那个聋哑士兵只是默默地向孩子点了点头。打那以后，雅柯比路过时常常给他扔一枚铜板。

秋去冬来。下雪天，那人也坐在老地方。春天到了，那个士兵每天下午都在那里，坐在靠墙根的矮矮的小箱子上。雅柯比和他的伙伴已经在对他进行侦察了。一开头就很明显，他不是乞丐。这从他的脸上、手上、耳朵上和脖子上，一看便知。其次，他听得懂人们言谈的话语。也就是说，他是在装聋作哑。晚上，总有个年轻女人来找他。这个士兵是何许人？间谍？贵族？还是海盗？将军？不，他是个特等射手。这从他身上的绶带上可以看出来。有一两回，傍晚时他们跟踪他，想探知他和那姑娘到哪儿去。他们要拐进那对巫师夫妇的大门里去了！没有。他们继续往前走。还有一次，雅柯比吓了一跳。他远远地看见一个警察走近那士兵，要查他的证件。他要原形毕露了。快逃吧，你这家伙！雅柯比心里一阵儿紧张。他会一拳把警察打倒在地，旋即跳进一辆急驶而来的汽车逃走。但是没有这样。只见那警察把证件交还给他，向他敬了个礼便走掉了。他的证件没有问题，雅柯比思忖道。他是个大国际间谍。

复活节快到了。雅柯比上午在山上三泉街上学。下午是提琴课。有时要跟着母亲到桥那边去作客，还有其他成百上千的事要做，因此他们不能始终跟踪侦察。雅柯比就和奥托秘密通信来保持联系。复活节，雅柯比通常是到他出生的那座环山小城去看望祖母。

因为他们人小，可以轻易地、不引起怀疑地监视那年轻

的士兵。一天晚上，雅柯比带上他的提琴盒，和他的朋友一前一后，相隔十步，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跟踪那个挽着苗条女人的聋哑士兵。过了草料市，那对男女从大咖啡馆后面拐进一条窄巷子里。奥托落在后面了，因为在新鹦鹉游乐场正门，干活的石匠和木匠们把他吸引住了。雅柯比继续跟踪。那士兵和姑娘又拐进一条更窄更破的巷子里，不见了。雅柯比急忙追过去，只看到他们进了一座大门。但是他不能确认进的是哪个门，因为这条巷子里的几幢简陋公寓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晚上不能单独出门，这也妨碍了侦察活动的进行。雅柯比要做的事很多，常常分心，对其他一些人的侦察工作往往也半途而废。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对巫师夫妇的侦察，对菜贩子女儿的试探更是大触霉头，以惨败告终：当小伙子要撩她的裙子时，她涨红了脸，"啪"地给了他一记耳光，跑掉了。这件事，四十年来，他连想都不敢想，成为深藏心底的创伤，当然更谈不上去继续侦察了。

有一天晚上，雅柯比在紧挨着洗染店的售报亭的报架上读到一张报纸的大字标题："历史性的时刻——谈判已经开始——世界的命运将于明日一决"。报贩子已经走了，这张报纸是用图钉钉在已经空了的报架上的。是吗？雅柯比想。明天，这我必须知道！然而第二天，不知是因为他从山坡上绕了个弯回家，还是因为有其他事情，他没有再到售报亭那儿去看个究竟。或许，他压根儿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始终未能知道，世界的命运怎样了。也可能他看到

的是前一个星期的报纸。

后来，对那聋哑乞丐的跟踪也放弃了。一天上午（因为晚上不能离家外出），他们又跟上了那个乞丐，并且根据雅柯比的线索，找到了那幢乞丐和他的女友进入的房子。他们步行登上最高一层楼，沿着回廊走了一圈。在天井里的石地上，有个人在劈木头。一个大卡车轮子靠在墙上。从回廊上可以看到住家的厨房和朝向天井的房间。从一间房子里传出钢琴声。有人在练习舞曲。这跟这座楼很不相称，也不符合上午的气氛。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小宝贝……①他们驻足倾听片刻。接着，在洗衣服的小屋子那儿出现了一个女人。他们一无所获，便回家了，但并没有失望。不是这所房子，他们自忖道。

复活节过后，当雅柯比从外地回来时，他们的侦察对象已经不在老地方了。他永远消失了。他们的侦察不得不告结束。既然他们看不到他了，也就等于他已不复存在。他们之所以对这个残废士兵感兴趣，其实只是因为他在人行道上坐着时，头部姿势有点奇特，也挺优美，而且特别还因为他又聋又哑。就象一副马蹄铁。如此说来，他的使命也就该到此为止了。他为天使们打探人间之事，比如，有没有人能如此高贵优雅地挺着脖颈？这样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其他都不甚重要了。雅柯比为委托他的人们打探到这个长着一副奇特的后脑勺的哑然无声的士兵。至于以后怎样，

① 原文是英文。

那就不是他的事了。

很久以后，雅柯比觉得在某个地方又见到那个聋哑士兵。那是一年秋天，也许是他童年时代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有一次，他和全家人一起到草料市的大咖啡馆吃晚饭。饭后，他对大人们那冗长的闲聊、饮酒感到厌烦，便借口去盥洗室想到外面转悠转悠。餐厅的过道一端，有座楼梯。雅柯比沿着楼梯往下走，不料误走到咖啡馆附设的鹦鹉游乐场的地下室里去了。地下室的各个房间都显得空荡荡的。在走廊——也许是前厅——的木板墙上挂着些半裸体舞女的照片。有几处灯光闪烁。陆续有招待、舞女来到，都还没有换衣服。一个清洁女工在地下厅里收拾桌子。空旷的地下厅笼罩在幽暗的红色天鹅绒般的灯光里，迎候着人们的到来。在大厅的一角，一个男人坐在那里弹钢琴。雅柯比只能看到他的后背。他穿着一身夜礼服。琴声很轻，只是信手弹给自己听的。雅柯比在门口站住了，聆听着。他想等他转过身来。他的后脑勺似乎在哪儿见过，弹奏的那支曲子，雅柯比也很熟。雅柯比在门口伫立多时，但是那个人始终没有转过身来。陆续到来的女招待和舞女，谁也没有理睬他。

## 六

西波涅？蹲着的雅柯比陷入沉思。他缓缓地站起来。这昔日的乐曲飘走了。艾丝黛拉在何方？还有那个与他无

缘的姑娘、那个清晨里阒无人迹的大街和那个火车站玻璃大厅又在哪儿？那时，一切都处在A大调乐曲里，而现在洋溢于空间的是C小调。那让人说不出名称的旋律也完全两样。这是苹果，这是窗户。他回家去吃晚饭。他们到网球场去。远处传来电梯门响。晚风习习。阳光渐渐转成红色。纯净、空旷、宜人。

"天哪！"雅柯比想，"我来过这个地方。"我看到过夕阳的光芒摩挲着这里凸凹不平的拱门石。我在这里看见过野草、小石子和在屁股之间挤来挤去的小孩。还有苹果、窗户。但是，这拱门石使我想起了什么呢？那年三月，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在这个大门口站了站。看到拱门石，想起了去年的三月。而现在，这些石块又使我想起离开时的心情，想起了某种状态和性质用人类语言还无法表述的东西。感觉、状态、气候？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也许，"雅柯比想，"它是造物的一瞬间，处于大地万物皆无定名的混沌时代，充实而又单纯。它产生于语言形成之前，产生于小提琴的乐声之前。我怎样向天使们汇报呢？我应该满足于这一瞬间的可以捕捉到的细微片断。譬如，这个年轻的残废士兵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他虽然如此渺小，却也是被悟出来的那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也有他自己的重要性。

虽然不是这首伦巴曲，而是那首更古老的舞曲"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小宝贝"① 使雅柯比·彼得很快联想到那残

① 原文是英语。

废士兵的后脑勺，他仍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通过他的五内和所有细胞都能感觉到，这究竟是什么。这是不可捕捉的瞬间的可以企及的、可以说得出来的片断，是那年轻士兵的哑然无声、他的纹丝不动的后脑勺。但是，用什么乐曲来表现这哑然无声呢？用什么舞蹈来表现这木然不动呢？谁能来帮助他？雅柯比·彼得沉思着。

是那业已失去的朋友和一个虚妄的故事来帮助他了。前者是实有其人，后者则是故事，是侦探小说。雅柯比没有进入那座房子。十九岁时他曾回到这座城市待过一段时间。那时，住在这里的只有奥托的姑姑——那位老姑娘，格里纳乌什领事的妹妹及两个老佣人。奥托正在国外某地，他的双亲已经去世。雅柯比曾去看望过那位年迈的女士——说起来她还是他们家的远亲，以及奶妈和当时还留在这所住宅里的一切。可是，从这个玛蒂尔德姑姑嘴里也没打听到多少奥托的消息。奥托不与任何人通信。他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在分手几年后，雅柯比还曾遇到过他一次。对此，雅柯比却是不胜伤感。这位老朋友成了个迟钝、乖僻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痴呆了。他的举止、谈吐无不如此。但是，却又不能说奥托变成了傻子。他的面孔仍然那么富于魅力，亲切可爱。“如果奥托是傻子，或者说神志不正常，”雅柯比想，“那么我也同样。”与当年和奥托形影不离时相比，我既没有变得聪明能干些，也没有变得勇敢些——更象那个印第安好汉。雅柯比从奥托的老姑姑那儿得到一个地址，给他朋友写了封信，后来又寄了张明信

片。但是犹如石沉大海。雅柯比无奈只好作罢。于是一切联系都中断了。不久以后，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奥托去世的噩耗。还听说，格里纳乌什领事在他妻子死后也自杀了。家破人亡，人去楼空。但是，如果说他们家已经一贫如洗，那么奥托是怎样生活的呢？还有他姑姑、奶妈、厨娘又是如何打发日子的呢？还有那幢老宅——雅柯比记得三十年前他去探望时的情景——又是怎样保持得依然如此井井有条的呢？他没有走进那座房子。

一星期后，他终于还是走进了那座大门。还有两天就要举行音乐会了。演出公司代理人忧心忡忡。“票卖不出去。真不凑巧。谁在这个时候来参加音乐会呢？怎么偏偏赶上这个时候？”“怎么了？”“就因为这些事件。”“什么事件？”“我的天！你不读报吗，艺术大师？”

雅柯比有些发窘地辩白道：“哪里，我是经常读报的。”的确，他是经常读报的，但那是从前。即使从前，他也不是天天读报。有一次他读到报上的一则消息：“世界命运将于明日一决。”但是后来结果如何，他没有继续了解。“正是演出那天晚上，主席要发表广播演说，”代理人说。“我们必须早点开始，好让人们能及时回家。”

然而，音乐会大厅并不是门可罗雀。诚然，空位子不少。“在最后一分钟，还会来许多人的。年轻人总是最后一分钟到。”那个双目失明的老钢琴师解释说。雅柯比第一次看到他穿着燕尾服。雅柯比注视着他，目光久久不愿离开。

“我找到了我的朋友。”他向老人说。

“当然。”老人点了点头。

“是前天晚上。”

## 七

前天傍晚时分，他跨进了那座大门的门洞，停住了脚。然后又向前迈了一步。他不敢四下张望。“您找谁？”房屋管理员问。雅柯比意识到，他的举止确实令人生疑。“没什么，没什么。”他有点吞吞吐吐地说。一个女人从楼梯上下来，在房屋管理员身边站下了。看来需要进行一番解释。“没什么。”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原来住在这里。”“是谁？”“反正已经无所谓了。”雅柯比摆了一下手。“他叫什么？如果他是您这位先生的朋友，总该知道他的姓名吧？”“格里纳乌什·奥托。”听到这里，那个女人颇为失望地走出大门去了。房屋管理员也有点扫兴，用大拇指向身后指了指：“二楼，往左。”

已经欲退不能了。从墙上挂着的房客名单上可以得知，在这幢住宅里，还有三四家陌生房客。有人把雅柯比领进那间以前作育婴室的屋子。更确切点说，是把房门打开一点，把他推进去，然后从外面把门关上。他只是向雅柯比打手势，比划，指点，因为嘈杂声把他们彼此的话都吞没了。

房间里已经相当昏暗，但是没人打开电灯。房间左侧

和右侧的通其他房间的门，被家具顶住了。左边是一口红色桃花心木的衣橱，紧靠着衣橱是格里纳乌什领事当年的写字台。从衣橱再过去一点的房角处，放着一张铜床，铺着被子。床上坐着三个人，手都揣在怀里。 其中一个是外表象个企业家的男人，另外两个是女人，一个上了点年纪，显得受宠若惊，另一个年轻一点，从她和善而风韵犹存的脸上，看不出她究竟多大年纪。他们向雅柯比点了点头，欠了欠身，示意他坐到一张扶手椅上。雅柯比的体重使那张扶手椅几乎变了形。它摇晃了几下，好象要散架似的，但最后还是挺住了。一架大钢琴占据了房间相当大一块地方。对着雅柯比，背着窗户，坐着格里纳乌什·奥托，正用呆板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动作按着琴键，为他的客人们弹奏着一支肖邦的曲子。 琴声一点也不悦耳。他头也不抬，没有注意到雅柯比进来。

也许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但什么也没看见，目光又落到琴键上。实际上，他也并没有看那些琴键。他的肩头痉挛似地颤动着。不时抬起头向后一仰。这个房间的窗户是朝东的，对着园子。在明亮的窗子上，那弹琴男子的轮廓格外清晰：高高隆起的前额，瘦削的突兀的鹰钩鼻子。红日西沉，屋子里更加昏暗了，这个瘦瘦的人影也益发显得轮廓分明，仿佛是贴在明亮的玻璃上的一个秃顶老人的剪影。

钢琴声持续了很长时间。雅柯比脑袋里嗡嗡作响，和室外的吵闹声交相呼应，几乎没法相信这不是一场梦魇。谢天谢地，总算弹完了。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客人们毕恭毕

敬地起身告辞。“对不起，对不起。您知道，老师常常为我们演奏。”

“对，我常为他们演奏。”格里纳乌什·奥托一边说着，一边抓住老友的手使劲摇晃着。他嘿嘿笑着，对着雅柯比挤眉弄眼。但是房间里已经非常阴暗，他的表情是无用的。同时，雅柯比正在寻找电灯开关。

“这里，这里。我来。”奥托急忙说道，把瘦长的手指伸到衣橱后面去，打开了电灯。他还不是那么老，脸上仍然浮现着那种热情的、富于魅力的微笑。“等一下，我去告诉奶妈一声。这可真叫人喜出望外。我肯定她没想到。”奥托嘿嘿笑着，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去。

雅柯比孤零零地站在杂乱无章的破旧什物之间，一时不知所措。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家具、油画……。不想再看它们了。他瞥了小玻璃柜一眼，顿时感到兴致索然。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头隐隐作痛，而且很长时间了。可能从他坐到那张摇摇欲坠的扶手椅上的时候，甚至也许从他刚听到外面的噪音时就开始了。应该蹲下来，从近处看看地毯上面的图案，他想。可是他终究没有这样做。既无兴致，也无力气。

格里纳乌什·奥托回来了，有点扫兴的样子。原来奶妈不在家。“你看，老弟！这好奶妈！已经七十开外了，还到处走来走去的，身体那么结实。感谢上帝，她硬棒得象橡子一样。”他拿出一瓶里奎尔甜酒，和两个布满尘土的小酒杯。“说起来，现在家里就我们两个人了。那厨娘，好维吉，已经

死了十年了。 玛蒂尔德姑姑比她死得还早。 幸好房子还在。你知道，那些年头有多艰难……”雅柯比想点一根自己的烟抽，但他的老伙伴说什么也不让。“等等，彼得，你等一会儿。”说着，他开始在各个抽屉里、柜橱里翻找起来。折腾了好一阵子。

“奥托，你别瞎忙了。快过来坐下。我时间不多。”

“不，不。应该有烟的。且稍等片刻。”

他一边翻找，一边又说起来：“老弟，为了保住这座房子，我们真是千辛万苦。你不会懂的。有一次我得了病。我们俩都慌得不行。我劝奶妈听我的。因为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她会被赶出这房子的，毫无疑问。她没有养老金，什么也没有。 你知道我是怎么办的？”他终于找到了一盒烟卷，兴高采烈地举给雅柯比看。

“别人送的，外国烟。”他又斟了一杯浓稠的甜酒。两人碰了杯。可是那烟盒怎么也打不开。奥托用笨拙的手指鼓捣着，揉搓着，从底下把那层彩纸撕开了。雅柯比想从他手里把烟拿过来，但他把手抽回去了，继续说他的：“你知道我是怎么办的？”他的脸上现出幸福的神情，又嘿嘿地笑起来。“我们结了婚！我和这个好奶妈结了婚！你想象不到吧？现在好了，她安全了。房子是她的了。我还有退休金。我现在在市立技工学校当音乐教员。你瞧，我们反正是不会分开的，不是吗？”他向老友狡狯地眨了眨眼。他们把退休金发放处给耍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件事办得漂亮。

这件事办得漂亮。虽然这所房子，雅柯比想，只剩下一

间下房和这间育婴室。看来，其他房间，包括当年玛蒂尔德姑姑的房间，都已住上了生人。他又把手伸进衣兜里掏烟。但是他朋友又阻止了他。奥托把那包外国烟打开了，取出三四支歪歪扭扭、差不多快断了的烟卷递给雅柯比。他还想再斟点甜酒。

“你的手没有受伤吗？奥托？”

“没有。没有。”奥托有点诧异地望了望雅柯比。“怎么会呢？”

“没什么，只是可惜了这包烟。老弟，你瞧瞧。”

可不是。两人相视大笑。“你知道，我从来不吸烟。”奥托自我解嘲地说。不知怎的，他忽然抱怨起来，说对举行音乐会简直受不了。在他还是孩子时，家道中落，他也成了孤儿。在国外，在外地，他演出的地方越来越少。他情愿干其他任何营生。后来，他还当过一段钢琴调音师。

“我对举行音乐会实在受不了。我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你是不会理解的，彼得。日复一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翻来复去就是那一套……而且还得不断地学……唉，说这些你反正也不理解。”

“我不理解？ 我是拉小提琴的，你这蠢货！”雅柯比有点愠恼地打断他的话。“我是有名的小提琴家，喂，知道吗？”

奥托有点愕然地看着雅柯比，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蹙起了眉头。不一会儿，脸上渐渐恢复了笑意，又是那样神采焕发。“票卖不出去。”雅柯比的脑际掠过一丝阴影。管它呢，

他想。可惜，不管又不行。不好，实在不好。对于他来说，演出成功不仅仅意味着金钱，也不仅仅意味着他艺术上的分量和地位，成功决定着他的精神和气度、道德和灵魂，即他整个的心灵世界。他熟谙名声的重要性；如果人家给他照相，他会自动地、训练有素地摆出一副高贵优雅而又深不可测的模样。何况，这次音乐会本身就是重要的。格里纳乌什·奥托站起来，拥抱了雅柯比。

“祝贺你，彼得！”他热情洋溢地说。“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老弟！就该这样！好极了！”他以沉重笨拙的手势来加强赞赏的语气，终于逐渐领悟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衷心地为他的朋友高兴。奥托又斟上了酒。为此应该干杯；再来一杯，好彼得！他嘿嘿地笑着，使劲摇晃着脑袋，调皮地望着雅柯比。他的目光一会儿又变得有点心不在焉起来。

他的喜悦是那样真诚，使得雅柯比也不由得受到了感染。雅柯比开始讲起前年举行的一次音乐会的情况。但是，雅柯比讲到一半时停住了。显然，奥托听他朋友的讲述是很费劲的。他对雅柯比的事感到由衷的喜悦，但转瞬间就忘了。后来也没再提起这个话题。好象他连想也没想过雅柯比是否过于看重自己的小提琴艺术了。

这不仅有失体统，而且简直就是使人不快的，甚至是难堪的。

一场恶梦，雅柯比想，不禁黯然神伤。然而，当他突然向格里纳乌什·奥托提出一个问题时，声音里却丝毫没

有不快。这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

“奥托，你还记得那个我们曾经跟踪过的聋哑乞丐吗？”

那一位摇了摇头。不记得了。

“有一次，在草料市后面，咱们曾到过一座怪里怪气的公寓大楼里。”

奥托又摇了摇头。雅柯比又问了他几件往事，甚至连当时自己的全部思想都讲给他听。奥托起初虽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但却是毫不勉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看得出来，雅柯比是郑重其事地讲述这些的。

最后，他硬把被他弄得不成样子的香烟塞给了他的朋友。

“谁要这鬼香烟！”雅柯比说。

奥托固执地硬把那盒香烟塞进小提琴家的衣兜里，然后按着他朋友的肩头，开心地笑了。他客客气气地、合乎礼仪地送朋友出门。在门厅里，他压低声音对雅柯比说：“你在这所住宅里找到了我，感到惊奇，对不对？这儿一切照旧，不是吗？”

“我还是应该下决心把烟戒掉。”雅柯比想。他又开始感到头晕发慌。

“我们经历了艰难的日子。这你是不知道的，彼得。”格里纳乌什·奥托仍是悄声细语地说。“但是一切照旧，你感到惊奇，不是吗？老弟？”

“是的。”雅柯比同样轻声回答。“说真的，是这样。”

他脑袋里的压迫感更厉害了。在大街上，他东倒西歪地踉踉跄跄，好象腾云驾雾一般。第二天，一直躺到下午好几点钟。他起来踱步，让人把牛奶送到房间里，又躺下了。次日凌晨，他从沉沉的梦乡中醒来，时间是五点半。他几乎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感到如释重负。

他没有任何感觉。心头上的一切压力、精神上的麻木和不祥的空虚感都荡然无存。取代这一切的是一种纯净的、清新的、豁然开朗的情绪，就象那显现在窗户上的纯净的、轻曼柔和的、渐渐降临的黎明。

## 八

音乐会大厅是空空荡荡的。他并没有“管它呢！”这样的念头。怎么能不管它?!他当然很清楚，这种情况非常令人遗憾。但是这个他也没有想。“反正还会有很多人溜进来的。当然，是那些无票的年轻人。”那双目失明的老钢琴师说。“我找到了我的朋友。”雅柯比回答道。

那老人点点头：“当然。”他穿着一身燕尾服。这衣服是那样天然合体，仿佛他以前穿的都是伪装，现在原形毕露。雅柯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白色衣领里那孩子般的褐色的脖颈。这脖颈无限柔软，又坚不可摧——这是一副娇嫩的男孩子的脖子，又是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男天使的脖子。

“一个孔武的印第安人。他保障世界的安全。是我的

朋友。”

“当然。”

上午，雅柯比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副标题：“谁保障世界的安全？”在台上，他也一个劲儿地从小提琴后面盯着那老钢琴师的后脑勺。前天他曾对奥托说，他已经认出了那个人，就象他认出奥托家大门口的石头一样。他认出了他的头部姿势，还有那男孩子般的后脑勺。奥托全神贯注地倾听，自始至终倾听着。奥托也已经意识到，雅柯比是个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但是显然他感到别扭、不习惯。他对此表示由衷的高兴，但又很快转了话题，不再提起。仿佛他认为，不言而喻，雅柯比也并不特别重视这件事。而小提琴家呢，也没再提到这个话题。他连票也没给奥托一张，甚至根本没提到要举行音乐会。

这天晚上，雅柯比演奏得相当出色。象历来一样，博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他和钢琴师事先约定，演奏结束后，他们不谢幕退场，而要一直留在台上，等候掌声平息，免得那盲人出场又进场地来回费事。在压轴的C小调奏鸣曲演奏完毕以后，那老人在台上坐了很长时间。如同他们第一次排练时一样，不知所措地叹息着举起双手又放下。掌声在继续。雅柯比最后只好把老人扶起来。那双目失明的老钢琴师在向听众鞠躬致谢之前，用纤细的手，颤颤巍巍地抚摸着小提琴家的头，吐出一句话：“我可爱的孩子。”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仿佛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孤岛上。

前天，雅柯比曾对奥托讲到过自己的发现：那个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坐在新世界大街人行道上的年轻的戴眼镜的士兵，其实并不是聋哑人。他们的怀疑没错。这士兵是个音乐家。在战争中双目失明。那个常来找他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在游乐场谋到一个差事之前，他每天上午在家里练习爵士乐曲。从他头部姿势也可以看出，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在鹦鹉跳舞厅当钢琴师一直到什么时候？谁知道呢？也许，他后来每天上午还练习过其他乐曲，而不只是舞曲。也许他已经成为一个第一流的钢琴家。晚年则成为音乐学院的教授。谁知道呢？

奥托频频点头。没错。他对警察也能出示无懈可击的证件。百分之百的战争残废。我敢肯定！只不过他是瞎子，而不是聋哑人。他隐瞒了这些去行乞。他有意缄口不语。

那老钢琴师直到现在也很少说话。人们对雅柯比赞誉有加，五体投地；出神入化；音乐泰斗；仙乐一般；不可企及；妙不可言……。但是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说过："我可爱的孩子。"他们俩孤孤零零地留在舞台上。还有一些掌声，但那是从出口处传来的。听众们正向外涌去。他们没有要求再加演一个。

音乐厅里已经开始关灯了。

雅柯比蓦地转向他的上了年纪的同胞。

"老师，您还记得这个曲子吗？"他问道。说着，他开始拉奏起来。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小宝贝。①

他在几根弦上强有力地来了三、四下拨弦。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小宝贝——②只见那老人不假思索地坐回到钢琴前面，弹出第一个和声。

在已经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还有十来个音乐学院的学生没有离去。当他们刚听到这声音时，还以为是艺术家在给小提琴调音。但是很快地他们楞住了。他们听到，雅柯比·彼得和那个老盲人钢琴师，正以娴熟的技巧、默契的配合和激越的节奏，演奏起一首古老的狐步舞曲。

**刘思岳 译**

①②  原文是英语。

# 阿　门，阿　门

图尔佐·加博尔

“您也到电台门前去了吗，先生？”

“不，只在附近看了看。”

“可以问问您那边的情况吗？”

“很复杂。”

“对。是这样。情况确实很复杂。”

小小个子的老先生缩在门洞里，银色的小胡子在他气色很好的脸上显得特别有气派，他身上穿着一件破毛皮大衣。这是一条偏僻的市区小街，此刻杳无行人。从民族博物院方向射过来的忽红忽蓝的亮光在房顶上空闪耀着，那是火光和子弹的曳光。枪声不断传来，老先生仰头看看天空。

“您也许知道，那是什么火光？”

“几辆卡车着火了。”

“真特别。”片刻的静寂。“就在附近？”

“一辆在卡尔文广场，另一辆在民族博物院旁边。”

“要是民族文物遭到损失，那是令人惋惜的。”老先生轻轻地跺着脚，沉默了。接着，他打量地看着我。这是一双漂

亮的蓝色眼睛，在他日趋衰老、绅士派头的脸上显得特别年轻。"可能会是什么结果呢？"我感到他在考虑：可以说多少？说到什么程度？要怎样提问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答复。"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接着说，"事情会朝现在这个方向发展。您先生认为，如果我可以这样问的话，事情是不是本来可以避免的？"他又不出声了，在等待，在犹豫。"就我本人来说，对于张贴在树上和橱窗上的那些打字机复写的传单不免有些吃惊。要是在前一阵子，这样的话连想一想都是不免……但是无论如何，报上的那些争论，政府的失误……"可以感觉得到，他是字斟句酌的，力图把话说得无懈可击，说得既要达意又要抽象。"也就是说，事情使得那些压抑多年的情绪抬头了，不免有所表现。"

街上热闹起来了，虽然已是时过半夜，但从民族博物院和国会大厦方向三三两两地不断过来了不少情绪激动、毫无睡意的人，激动地谈着死人、游行和军队。男的穿着风衣，女的穿着长可及踝的晨衣，外面罩着件显然是匆匆出门时随手披上的短大衣，只要有人说一件新闻，立刻便会有好几种分析和猜测。对于任何事情，哪怕是早一秒钟发生的，一经说出，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各有不同。一辆带斗的摩托车颠簸而过，它的一个轮胎被子弹打穿了。斗里躺着一个草草包扎过的昏迷的妇女，驾驶摩托车的是一个身穿皮袄、满脸怒气的年轻人。当他们在门前颠过时，这里已经站着不少人了。一个人说，这位妇女是被从一辆卡车上射出来的子弹打中的。一个穿着便袍、头发散乱的老

太太起劲地叙述着民族博物院附近被打死的两个孩子的事——那时山多尔街打得很激烈，汽车火焰冲天，孩子们正想穿过马路，先是那个男孩子被打中了，接着小姑娘也死了。

“可惜。”老先生叹了一口气，“正值少年……您还待一会儿？”他伸过手来和我告别，当然先摘下了手套。“好象时间不早了。”

“两点半。”

“到清早我们会知道得更多些。一夜平安！”

“一夜平安！”

* * *

我们在二楼分手。在这楼道里，外面的枪声和各种噪音已经很隐约了。老先生走上三楼。我听见他轻轻地关上门。

夏伊·盖扎博士在早年的政治生活和议会斗争的混乱年代里，一度是年轻法学家的领袖。在紫菀花革命①中作为司法部的高级官员负责处理财务问题，之后，在西蒙尼一赛马当政府②中当了几天司法部长。据说他拉丁文出众，是国际上有数的几位新拉丁文诗人之一。盛年时还当过教

---

① 一九一八年十月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参加者都佩戴紫菀花，亦译作“秋玫瑰革命”。

②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九日。

会的法律顾问，后来写了一篇《圣母颂》的拉丁文诗得了教廷勋章。大战前夕作为一个财务机构的总裁退休。

在楼里大家并不十分熟悉他。几年前，当他和妻子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象两只蛀虫一样跟着陈旧的家具进了这所公寓。在一次偶然的事情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他就住在我家上面。那是一个晚上，一位满面红光穿着非常讲究的老先生和一位浑身散发着香气、穿着灰鼠大衣浓装艳抹的太太敲我家的门。两人都拎着东西。“对不起，夏伊博士是住在这里吗?”我说，在楼上。他们对于自己打搅了我们深感遗憾，说了一连串的道歉，然后匆匆上楼了。大门口停着一辆老大的黑色奔驰车，司机也拿着一大堆东西正在往楼里走。接着他也敲了我的门，我也给他指了路。第二天下午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来到我家，行礼如仪，感谢我给他的客人——他的弟弟、科苏特奖金两次获得者夏伊·卡兹梅尔博士指点了方向。后来好久没有见面，其间只是他夫人向我们借过一次电熨斗，来还时借给我母亲看一本——据她自己说，是非常有趣的书——德文的《圣徒及其追随者》，后来借打过几次电话。这位夏伊·盖扎博士老先生，现在在市郊安焦尔福尔德区的一个木料场当夜间看守。他的夫人梅达(体态华贵，比他高出一头)，给一家手工业合作社做小兔、小狐狸、小耗子这类玩具。

这一夜他们显然过得非常不平静，但别人也不例外，我们也如此。第二天上午还和头天半夜一样乱。幸而我们这条街上没有发生战斗。象这样充满弯弯曲曲的小巷，与闹

市相比，可以说是穷乡僻壤的小地方，火热的战斗和别的灾难一般都是不太光临的。即使当年的大战也只是一掠而过，掉下几颗炮弹，掀起几个房顶，震落几块墙皮，如此而已。我们在这里就象生活在一个罩子里似的，世界上的一切只是在我们上面、旁边或是远处发生。

*　　　*　　　*

我们还没有醒来就有人按门铃了。在铃声和狗叫声中，我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去开门。

“哎呀，”夏伊妮抱歉不迭。“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怎么也不会来了。”

“哎，没关系，请。”

“我的外孙，小盖扎，”老先生在一旁解释。他身上还是外出时穿的旧皮大衣，光秃秃的翻毛皮帽子。“他是个学生倌，有点爱管闲事，我们担心他会被卷到事件中去。您可以允许我给我女儿打个电话吗？……”

电话就在身旁，一打就通。我走到另一间屋子穿衣服，可以听见打电话的声音。

“我是爸爸，”老先生非常有教养地把声音压得很低，好象旁边睡着个病人。“小盖扎怎样？感谢上帝……千万不要让他上街！一定要小心！你母亲要和你说话。”现在是梅达夫人的声音：“心肝，哎呀，吓死我了！你们那里好吗？太可怕啦，你说得对，……可把我急死了。心肝，要当心哪！小盖扎，是你吗？坏小子，不，你准是去了，你这个坏东西。别

让你姥姥不放心。你说，你说，你没有上过街！把手放在心口上说句老实话，嗳？好啦，好啦。我还要和你妈说话。……你们吃的东西够吗？"

当我走出屋子的时候夏伊妮还在一个劲地打电话，一副严肃的神情，脸皮焦黄。染黑的头发烫成两个大波浪盖住了耳朵。

前部长靠壁炉站着。

"您是党员吗？"他突然问。

"不是。"

"我的弟弟是党员。得过两次科苏特奖金。"

"我听说过。"

"啊，当然了。"恨不得钻进电话去的夏伊妮还在说着。但是声音很小，显然不愿打扰我们。"我试图听一点新闻广播，"老先生打量着我的反应，"可是布达佩斯的电台光是放流行歌曲。您说，那边究竟怎样了？官方为什么没有态度？"我确实一无所知，和他一样。"有的电台，"他进一步试探，"说咱们这里发生了革命，您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是可能的吗？您对事物一贯抱乐观态度吗？"有一家打开收音机，传来了《酒店皇后》曼妙的乐曲声。老先生不胜忧虑地说，"我女儿住在东巴街，那里不很安全。我们住在城里，可是不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这很特别，对吗？街和街，区和区都显得特别远似的。在这会儿，加里福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离开我们象比大弯路要近得多。"他又沉默了，"我希望知道，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接着他以

非常古怪的声调加了一句:“我不相信社会主义。”

夏伊妮总算说完了,但没有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您知道我女儿说些什么?”她还是坐在那里,“在她们那里,费伦茨瓦罗什打得厉害极了,她听说兵营都被轰平了。但科尔温电影院里的人还在死守。”

“这么多的武器哪里来的?”老先生问道:“您觉得这……这……”他寻找着适当的措词,“这事件是事先有准备的吗?星期天有个熟人,一个老同事来看我,他说,要发生大事情。”

夏伊妮立刻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插嘴道:

“我告诉我的小梅达,要她们到地下室去。”老先生还想继续说他星期天听到的新闻,可是老太太坚决接过话头:“您说,这到什么时候才了结?难道我们就这样在恐怖和地下室中过一辈子吗?我们老得打着铺盖卷,饿着肚子等待?您们吃的东西够吗?”

“家母平常只买够两天吃的东西。”

“太惨了!”她同情地叹口气。“您这里光是家里人吗?因为我的老经验是,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会有来来往往、来吃饭的客人。在最不应该来客人的时候总是有人来。”

* * *

我们这所楼的大门很厚,是橡树做的,大战时中了颗追击炮弹也没有穿透。我们站在门前,上面也有若干住户下来张望。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街上没有行人,只有远处传来

机枪的声音，有时是几下枪声合在一起，有时是一颗子弹呼啸而过，象是乌鸦拍着翅膀越过近处又飞向远方。我们对面是本街唯一一所大楼房，这是一所装饰得过分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在我们看来，这里住满了勇敢者，门洞里总是站满了人，只有当近处出现枪声时才跑进楼里去。有一辆汽车在那里停住了，从车上抬下一个浑身血污粗粗包扎过的年轻人。二楼打开了一个窗户，传出了一个妇女的尖叫声，接着是一个流行歌曲的旋律。年轻女人从楼上冲下来扑向汽车，帮着抬年轻人。楼里的人对此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但是让出了一条路。

“这个年轻人，”夏伊博士说，“据说是国家保安局的人，昨天晚上就被抓走了。”他沉默了一会，苦笑道，“匈牙利人对匈牙利人。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汽车开走了。昨夜，全市，甚至连我们这远离是非之地的小街上的路灯都是彻夜通明。现在，刚擦黑，路灯已经在那里闪着晶莹的光，天空好象在飘着雨丝，但也可能是雾。从伊丽莎白桥方向过来的一辆空的军用卡车从门口疾驰而过，顶上紧紧地绷着一块白床单，床单上是一个红十字。

“盖扎卡，”夏伊妮从大门里探出头来，“该回家了，别冻着。”

夜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使人感到压抑。布达佩斯电台的波段沉默着。我们来回拨着收音机，诚如老先生所言，对我们说来马达加斯加和加里福尼亚比大弯路要近得多了。蒙特卡洛传来一个甜腻腻的女声在唱一支小曲，米兰

电台在播送歌剧片断，慕尼黑电台是一个男声朗诵……再往前拨，不知什么地方的电台大喝一声："弄清谁在敲门再开！"

又是老先生和梅达夫人来访。

"您说只有两天的粮食。这里是一点土豆，一两个罐头，还有……您们不见怪吧？"

"可是，太太……"我母亲感动不已。

"啊，小小一点心意。亲爱的，互相帮助。在我们国家缺衣少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她放下东西就去打电话。

我打开窗户通通风。夏伊博士站到我身旁。外面寂然无声，象死一样安静，只是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什么在炸裂的啪啪声。梅达夫人和她的女儿小梅达在通电话，好象在讨论做酸黄瓜，其间不断提醒小盖扎多加小心。

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十点以前放下武器！不再继续作战的人将得到赦免。"

夏伊博士神经质地咬着胡须问：

"您认为人们会听从吗？"他停了一会又说："情绪已经不可收拾了。我从来不认为把武器交给每个人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是连孩子也摸起枪把来了。谁也弄不清楚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变成英雄，而什么时候又变为罪人。特别是第一次大战以来这两个概念以无法解释的方式不断相互替换着。而从前，概念要比现在明确和长久。我老是有一种感觉，好象我扔一根火柴，一切都会爆炸似的。"他接着又赶

忙解释："请别误会。这些都是理论问题，只是我在夜间值班无聊之余偶尔想到的一些哲学范畴的东西。"

我们面前的这条街没有一棵树，但从多瑙河那面传过来的潮湿的空气和远处发黄的树冠使我们感到深秋已经来临。在这时刻，好象在我们周围到处是一片正在枯萎的奠祭死人的花朵，宣告着什么东西正在消逝，散发着使人想起病和死的那种霉味。收音机里一次又一次号召人们放下武器。

"你们听见了没有？"有人说了一句。正如夏伊博士所说，我家也来了个又吃又住的不速之客，"还有二十分钟。"

蔚蓝的天上有一抹淡淡的玫瑰红，既没有火光，也没有枪声，人们还在门洞里张望，他们也在看天。寂然无声，可是这样折磨人的寂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这是等待的寂静。我们好象在山脚，在等待着从山上轰然滚下的巨石把我们砸成齑粉，然后埋在它们下面；我们又好象在等待雪崩，雪堆还没有动，但在那高处，尖利的风已经裹着雪片在猛烈地摇撼着它。整个城市好象焦急地、强压着喘息等待着。什么地方一定还在射击，汽车一定还在奔驰，在街上，在屋顶下，在断垣残壁之间，生命一定依然存在，但这难堪的等待，此刻却是占领了我们的每一条神经。

电台在数着时间。

请放下武器！还有十分钟，

有一个人几乎是哀号似的说了句什么。

还有五分钟。

我们象木头似的站着。在窗下，那奇怪的喘息似乎一下子令人意想不到地放松了，激动起来了。天际的颜色也在迅速地变化着，变成这样，又变成那样。布达佩斯在等待，在颤抖。整个城市好象是无所适从似地躺着，等待着。它的一切——街道、广场、雕像、机关、学校的课桌、剧院蒙着丝绒的冰冷的座位、横跨在相互远离的两岸上的桥梁、对安全的向往、想建设的愿望似乎都惊惶不安。整个城市只是一堆没有用的房屋和洞穴，还有人。衣橱里是收拾整齐的明年的夏装，口袋里放着电车月票，工作台上放着要加工的原件，工作本上是关于今天、明天以及后天要办事情的记载。贵妇人怀中的小狗、百灵鸟、缀着粉色小花的新娘服装和面纱，穿着寿服紧闭嘴唇等待出殡的死人，橱窗里的火腿、香肠和成堆的干酪，在房顶上时明时暗的霓虹灯广告，还有在车库里或是半道上停着的电车和公共汽车，还有人，还是人。

十点钟。

周围还是那轻轻跳动，等待着死亡来临的静寂。一个死人的眼睛没有闭上，好象在看东西，但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一个人使他阖上眼皮，给他嘴上放一枚银币。①

“十点钟了。”但这不是电台说的。

“十点钟了，”我们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

① 欧洲一些国家的传说：人死后拿这块银币当作过冥河的渡金。

这是什么声音？是耳鸣？是某人在说话？还是那消逝的光阴在窗户上叩出的声音？但也许只是我们这几个人才听得到的某一个声音，从而使这沉寂更使人感到恐怖。

夏伊博士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金怀表来。这是一个双盖的老牌瑞士表。

“真的，”他有点沙哑，“十点整。”

“亲爱的，”夏伊妮打个寒战说，“真的该睡了。”我关上了窗户。

“到清早我们会知道得更多些。”老先生说，“一夜平安！”

“一夜平安！”

我们以昨晚同样的方式互相道别后，老先生挽着他夫人的胳膊上楼去了。

*　　　　*　　　　*

次日上午很平静——灰色的、铅样的、无精打采的平静。楼门打开了，人们出现了，就象任何一个早晨当生活开始的时候一样。轻手轻脚，慢条斯理，如果去上班，电车也不会挤。夜间那使人痛苦的时刻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那边——

我的狗撒野似地向前冲去，嗅来嗅去，用爪子这里搔搔那里抓抓，停下，又向前冲去。路上布满了碎玻璃片、断电线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它舒畅极了，这从未见过的场面使

它撒起欢来。在巴兹玛尼·彼得[①]像下它嗅了嗅一个插着紫菀花的新坟,然后朝凌乱的霓虹灯管吠了几声,接着又钻进了被扔得互相架住的椅子堆中间。现在迎着它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它冲到墙边,轻声哼哼着等着我。一辆坦克隆隆地从科苏特街开过来,广场顿时一片空旷。坦克蹒跚地转了个身,履带抖动了几下又大声呼啸地向来的方向开去。在阿斯托里亚旅馆附近,四辆坦克截断了交通,它们后面是拥挤的人群。远处传来稀疏的枪声。在瓦砾堆上浓浓的烟尘遮住了拉科齐街。我奔向我的狗。在几乎被打成碎片的报亭面前,它惊惶地向我小步跑来,在人行道的边缘躺着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少年,身上披一件绿色粗呢大衣(手里还握着枪)。当年的巴诺尼亚旅馆面前,一个士兵脸朝下倒在地上,身边没有武器,另一个是身穿大褂臂上戴着白底红十字袖章的年轻人,他的发型有点象菲力浦[②],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个姑娘。他们周围是一地玩具小鸟、塑料做的心形装饰品和玩具上的石膏车轮,原来这家商店橱窗被砸,这些小玩意儿是从那里掉出来的。

我们往回走。赛麦尔威斯街两旁的树擎着高高的天空,夜雨和子弹使人行道布满了枯黄和微红的落叶,在这里秋意分外萧瑟。

夏伊博士挽着夫人的手,站在厚厚的落叶上向我

---

① 十七世纪匈牙利政治家。

② 法国电影明星。

问好。

"您知道司法部在什么方向？"

"不清楚。"

"显然应该在国会大厦附近。对，我想是在那方向。"

"您找司法部做什么？"

"我写了一份申请书。"当然，我看着他手中的纸想，早晨向我借打字机就是写这个。"我认为此刻要求提高养老金效果会好得多。"

"您认为可能找到什么人吗？"

"噢，国家机关按规定任何时候都有人值班办公。"

我看着他们拐进小弯路，别的人也纷纷走动起来。突然，四辆坦克排成一列开动了。孩子、妇女坐在坦克上面，把仓促做成的科苏特国徽①都快遮住了。夏伊博士和他的夫人跨过瓦砾、碎砖和玻璃片，绕过冒着烟的房梁，小心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一会儿周围又是一片空荡荡的。一辆敞篷空卡车运走了士兵的尸体，那个穿绿呢大衣的少年还在那里躺着。

下午我见到了这位前部长。

"嗯，"他显然听了关于成立新党和新政府的消息了。"我的事没有办成。"

"我想这样的时候不会有人值班办公。"

① 当时起事者们所用的国徽。科苏特是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我们只走到波特马尼茨基街，后来听到了一阵枪声，看到人们在奔跑。我们想还是不往前走的好。那附近有个公共厕所，就是被叫做绿电车的那种，"他莞尔一笑，"我们在那里躲了一会。没法到司法部去。"

"也许您过早地……"

"'早'这个概念，"他提高点嗓门说，"不很准确。不管怎么说，我要把申请书付邮寄去。我的腿已经不太灵便了，没有交通工具感到很吃力。"

"即使邮政总局开着门，我也认为……"

他意味深长地指了指收音机，告诉我刚才听到的消息接着说：

"既然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等待事态的发展。此外……"他加重语气。我想，当年在法学家集会上，在天主教教友团契里或是在上议院发表演说时他大概就是这个神态。"不妨设想由此可以避免民族毁灭的威胁。如果说，毁灭和死亡是有其价值的话，那么已经算是达到了。此外，为了不仅只是房屋遭到破坏，人们遭到死亡，而是要恐怖有其目的，那么这目的也达到了。"他隐隐一笑，然后说："我再也不怕了。"

他们兴致高得多了。梅达夫人先是拿来几幅女红给我母亲看。母亲几十年来不停地勾窗帘，结桌布，一见到或者自己想到什么好花样，便象哲学家悟到新道理一样立刻记下来。无怪上午梅达夫人送来几本花样时她兴高采烈了。

老先生把我拉到一旁："如果我有一个请求，您不会见怪吧？"

"请说吧。"

"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您能叫我一下吗？"

"当然不成问题。"

"非常感谢。我不是等孩子们的电话。要是他们的话，叫梅达就行了。"

*　　　　*　　　　*

现在，时过境迁，很难准确说出在那似乎乱糟糟的日子里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点象发间歇性的高烧，时而在眼前出现冒着金星的重影的图像，时而则是退烧后的使人感到压抑的精疲力尽。屋前悬挂着的旗子没精打采地低垂着，旗下面是烦躁不安的气氛。在这些日子里，唯一不变的因素是夏伊博士。他下来过好几次，问有没有他的电话。可是谁也没有找过他。

"奇怪。"他思索着。

"也许您可以主动打个电话过去。"

"不，"他挺挺胸，系上钮扣。"我不能这样做。"

后来，在十月三十日，电话来了。

"夏伊先生电话。"

楼上，他们朝院子的那间小屋，象寄售商店的仓库。高级的旧家具挤在一起，几乎走不过人去。盛脏衣服的篮子里堆满了绒兔子、鸭子和匹诺曹木偶。旁边靠着一幅大油

画，上面是英国贵妇人装束的当年的梅达夫人。我进去时，此人正在电炉上煮黄豆汤，老先生在削土豆。

"谁？"他霍地站起来，忙着解围裙。

"对方没有说名字。"

夫妇俩——我觉得是带着凯旋的神情——相对微笑一下。夏伊博士抓着话筒定了定神，然后再开口：

"我是退休司法部长、上议院议员、财务署总裁夏伊博士。"梅达夫人无限崇敬、海样深情地注视着这位纤弱、庄严的老先生，但是当得知对方是谁时，她似乎顿时萎缩了。"怎么？给我派车来？库尔兹曼同事，算了吧。我太老了，我……好吧，无所谓。那就来车吧。"

梅达夫人精神上好象完全垮了，"是木料场打来的？"事实上是明知故问，无非只是希望寄托于"万一是自己搞错了"而已。

"把我选进工人委员会了。"老先生转身向我，"如果再有电话，您还是会叫我的，是吗？"

上午果然有车来接他了。这是一辆大卡车，车上插面红白绿三色国旗，上面原来的国徽被挖掉了。车上已经坐着八个人，一个其貌不扬、黑头发、稍微发胖的妇女从上面伸手使劲把他拉上去。

"努一把力，大人。"这个妇女说，"您在大风大浪的年头都过来了，这小小的旅行想来不会使你散架子的。"

我在下面也努力把他往上托，最后老先生跨过车帮上了车。他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地、然而却是以当年高级官员

的派头把这个妇女向我介绍了一下：

“这位是齐奈尔妮同志。”

“哎哟，大人，”齐奈尔妮笑着说，“可不能这样称呼了。”说着从上面伸出手来：“我的名字叫伊露什。”

卡车把他们带走了。夏伊博士在颠簸的车上狼狈地扶着车帮。风从国旗的窟窿里钻过来，旗子的一角不时贴在他脸上，他还得腾出一只手拂开国旗。旁边站着的是兴高采烈的齐奈尔妮。

晚上他们邀请我去打桥牌。我不精于此道，只是兴之所至也能对付几局，但老先生夫妇二人却是此中老手。第四家人是他们的外孙小盖扎。是个懒洋洋的脸上长着粉刺的年轻人，牌风极坏，好象一个赌棍。

“如果您也能帮我考虑一下，我将深为感谢，”夏伊博士在他夫人计算着分数的时候对我说：“工人委员会今天的会议使我相当不安。我弄不清楚自己做得对不对。真的，我甚至有时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行动了。也许您会告诉我：这是一种迎接未来的战栗，是一个对外交稍有涉猎的国家官员的乐观情绪，还是那种普遍地被叫做人道主义的表现？我深感问题日增，对于许多概念的理解不很有把握。”

他说，在那里首先碰到的是人事档案问题。人们你看我的，我看你的，其情绪与其说就是出于后怕，还不如说是感到可笑。已届更年期的齐奈尔妮担任人事主任，几乎是恶作剧似的把档案发给了大家。老先生当然急于想看到自己的那个口袋。其中赫然出现了这样的评语：“出身没落阶

级，抵触情绪严重。参加政治学习时发言空洞，重复报章言论，就事论事，不敢接触原则问题。对于周围及住所中对其称呼‘大人’深感满意。此人在任何工作中均不堪使用，曾多次拟调动其工作未果，显系因两次科苏特奖金获得者之夏伊·卡兹梅尔博士插手所致。”如此这般。

老先生温和地、甚至带点孩子气地微笑着。

“我的工资是六百三十福林。”对老先生来说人事档案只意味着这些，他思索着说：“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第二项议程中：我们要研究应该把哪些有问题的人打发走。说具体名字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您谁也不认识。我们有几个人感到在那样的情绪中没法和大多数人讨论一些反面意见。后来我感到自己似乎成了个针织女工[1]。我当然用不着向您解释这些所谓针织女工在法国大革命中是些什么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流氓无产者，她们在断头台下挤来挤去看热闹，给刽子手喝彩。而现在，好象流氓无产者这个概念突然带有了贵族的气味。这我搞不明白，我不想要这顶桂冠。”他接下去说：“我们那里有个党支部书记，叫做丘尔卡，木工出身，是个好人。我对他没有意见。说得确切些是他从来没有理过我，见面也不打招呼。我认为，在过去的那样岁月里，这样做对我算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讨论到他了，我鼓起勇气说了几句好话，结果别人叫我是斯大林分子。我孤注一掷地说，我认为大家都是这垮了台的制度

---

① 原文是法语。

的牺牲品……。我，斯大林分子。"他漂亮的小胡子翘了翘，和善地笑起来："这多么可笑。当然就争论起来了，对此我实在毫无兴趣。表决结果是开除丘尔卡。开完会已经是黄昏了，丘尔卡在木料场上等通知，我把决定告诉了他，把手伸过去，这行动使他非常反感。应该说，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因为我感到这是基本的礼貌。现在请您告诉我：我这样做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仔细想一想，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在自己的晚年做这样的事总不免感到耻辱，那么似乎我就应该采取相反的做法才对。那么——"他的声音带点苦涩，"到底该怎么办？"

他的外孙小盖扎代替我回答了，但说的却不是我的想法：

"老年痴呆症。"

年轻人的看法使老先生兴致索然，又打了一局牌，但老先生始终一言不发，我看还是告别的好。

"还有一个问题。"他握着我的手说，"您能不能设想，一个小国，在这举国动乱的时候，能否单方面解除和一个大国的联盟？我是从法律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可惜我不太懂法律。"

"噢，当然，您不研究法律。"他看着我，目光有些茫茫然，接着叹了口气，"如果还是有人打电话找我，您会叫我的，对吗？"

*　　　*　　　*

亡灵节那天[1]我在天黑以后才回家。先是乘卡车到洛库什医院，然后步行。从共和国广场方向不断传来爆炸声和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一路景象使人触目惊心。街旁房屋上悬挂着中间挖了洞的国旗和花圈。一个报贩在喊叫着使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招徕顾客。平日繁华的拉科齐大街一片黑暗，只从住户的窗口射出昏黄的烛光。无数的烛光使人宛如置身在公墓之中，每一扇窗户就象是一座坟墓。几天前躺过死人的人行道上也燃着惨淡的蜡烛。有的地方蜡烛刚刚燃尽，正冒着一缕青烟。这街头奠祭使我也似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无限凄凉和孤寂。

在躺过绿呢大衣的少年的地方也点着一支摇曳不定的蜡烛。在那里我遇见了夏伊博士夫妇，他们手挽着手，老先生在喘气，显然已经走了不少路。梅达夫人站在他旁边一如支撑着行将凋谢的花朵的架子。

"您离开家有好久了吧？"老先生问。

"下午走的。"

"那么中午以前没有人打电话来，否则您是会叫我的。"

"那自然。"

"您想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吗？您在这里遇到我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您如果乐于告诉我的话……"

---

① 十一月二日。

烛光在他脚边熄灭了。

“谁也不认识我了。”他突然辛酸地说，“谁也不认识我了。”

“您怎么这样想？”

“事实如此。”他半天不说话。“似乎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

* * *

他们走了整整一天。先是到司法部。在那里的传达室等了好久，后来下来一个年轻人，说不需要他们来效劳。年轻人后来叫过一个办事员，给老先生的皮包里装了点土豆和苤蓝。但是夏伊博士坚持说这里他有事可做，正在这时候吵吵嚷嚷地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年司法部的办事员，叫多利瑙伊，此人前几天刚获释放。老先生站在多利瑙伊面前，多利瑙伊当然认出来了。握了一下手，这握手既是问好，也是告别。多利瑙伊继续大步往前赶路，大衣下摆象翅膀一样地飞掠而过。夏伊博士耳边飘过来多利瑙伊对同伴的一句话：“这老家伙以为我认识他。”老先生只好拎着土豆和苤蓝走了。

他们接着去了一个复活了的保守色彩的天主教党党部。老先生当年是这个党的理论家之一，此刻他深信自己应该向党提供思想和经验。他深悔在司法部里没有摆脱十二年来在他身上所养成的奴颜婢膝，因此一到党部便振作精神，几乎是以某种盛气凌人的气概通报了自己的姓

名：

"我是夏伊博士。"他对秘书说。

"夏……？"

"夏伊·謚扎，原司法部长，请通报主席。"

"老先生，"年轻的秘书不无怀疑地打量着，"主席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拟订政治纲领。明天电台会广播的。"

"我要和他亲自谈话。"

秘书进去找主席了。刚才坚定和不由分说的态度使老先生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他精神十足地昂首站着，等着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等主席飞跑出来和他拥抱。此刻他似乎已经听见了主席的声音："大人，您总算来了。我们正在四处找您呢。多么需要您珍贵的经验哪！谁能比您把我们的宗旨概括得更透彻啊！……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如果请您屈就担任名誉主席，恐怕是再适当不过的了。……"

可是出来的还是那个秘书，他抱歉地说：

"主席实在太忙了。他说，不许我们放陌生人进去。"

"不许放谁进去？"

"这是主席的原话。"

老夫妻俩又找了几个党。当然，只找保守的、认识事物发展必然规律的、深谙匈牙利因地理条件派生出来的政治特点的党。几天以前他曾经发挥过："保守观点既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又富有巨大的灵活性。"可是没有一个党对他表示兴趣，除了大门以外没有多跨一个门槛，手中的土豆和苤蓝

显得越来越重了。

此刻他刚从一个老同事家出来（他不想说出这人的名字），这人和夏伊博士同龄，也快年届八旬了，过去也当过部长，住在拉科齐大街上的一条小巷里。在困难的年月互相见过几面，一起喝过咖啡，打过桥牌，讨论过问题。这位前部长保养得很好，挺着肚子，使人想起了巴契考的良种猪。几年来他坐在屋里静静地进行抵制，靠子女从美国寄来的东西过活。

在这里夏伊博士见到了一伙老先生，大家高兴地欢迎他们来到。“博物馆的陈列品齐备了。”其中一位自我解嘲地打趣着。在屋的都是前部长、国务秘书或是州长。拉成一圈坐在扶手椅里。一个个脸色红润，下巴松弛，一共是十位曾经相当显赫的老先生。他们很快得出一致结论：为了全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应该立即着手组织政府。政府名单已经拟好，在座的都是内阁成员。

“诸位，”夏伊博士捧着茶杯庄严地说，“如蒙不弃，敝人愿效犬马之劳。”

“那太好了。”某人说。

但从讲话的口气以及在座人们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其热情远远不如他刚到达互相拥抱的那一刻的情景。但夏伊博士没有动摇，他认为：这片刻的沉默只是说明大家在考虑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上才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才干。

“也许，”夏伊博士考虑片刻，淡然一笑，“如果由我来主持农业信贷……这似乎还是个空缺……”

"好象是个好主意,"文化部长喃喃地说。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终于工业部长开口了:

"盖扎,这里好象有点误会,大家都欢迎您,可是职务不大好安排。对于一个老同事说这话我感到有些为难。可是,不是吗,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您的行动多少有些白璧微瑕。对,对,小小的污点,亲爱的朋友。"

"我,污点?"老先生惊呆了。

"是啊,您不够慎重,您在那可诅咒的制度里承担职务了。尽管那不是高官厚禄,可是,不妨说,这是一种投降。"

"我不得不这样。"夏伊博士发抖了,

"对,为了餬口。可是怎样向那些,我不妨说,向那些作出牺牲的,比如说坐过牢的人们进行解释呢?也许……"

夏伊博士勃然大怒了:

"在一个木料场当了十一年夜间看守!"

仓促组成的内阁的成员们不好意思地看着自己杯中的茶,夏伊博士的视线逐一从他们的脸上扫过:都和他一样老,也都和他一样地多余。这位大腹便便的工业部长靠儿子养活,甚至在泥泞中也只穿着锃亮的皮鞋的司法部长靠老婆给人家洗衣服糊口……

"我们会力尽绵薄的。"穿着晨衣的总理送他出来,在前厅说,"您哥哥我们将会从轻发落,他为那个制度效劳本来是不可宽恕的,但他是个专家,我们可以用他。"总理愉快地挤挤眼睛,"我们会从轻发落的,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提高

您的养老金，我已经记下来了。”

……我们又走回到自己偏僻的小街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盏路灯，这里的窗口也亮着蜡烛，挖了窟窿的旗子也是死气沉沉地耷拉着。

“他们一定是听到盖扎在工人委员会里的表现了，所以才这样做。”梅达夫人说，“可那难道是罪过吗？”

“不会的，他们哪能知道这些！？”

“您信不信，到处都是密探？”

老先生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我老想，当我站在受压迫的人一边时是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因为觉得反正不可能比现在的处境更糟了，反而勇敢起来？”他用那总象是在发问的蓝眼珠看看我：“别见怪，今晚不请您去打桥牌了。我感到很疲劳，明天还要起早，要到城堡山上去谒见红衣主教，想请他为我一个推敲已久的计划祝福。我想组织一个基于民族和宗教利益的信贷机构。现在既然把集体农庄解散了，那么这样的机构会有很大前途。我会把这机构办得很好的。”

*　　　　*　　　　*

回家时母亲告诉我，在当年的《协会》杂志上看到了老先生的照片，果然是他，是四十五岁时的夏伊博士。仪表堂堂的脸上蓄着英国式的小胡子，眼神清澈，照片的说明是“法学家舞会主要赞助人夏伊博士”。照片旁边是一篇报导

那天舞会的通讯。舞会的目的是奥古斯塔公爵夫人为幼女玛格多瑙进入社交界与社会名流见面。夏伊博士代表参加这重大活动的人们向贵客致意，并把与会的名流介绍给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夏伊博士夫人穿着长可着地的猩红色绸晚礼服、金色束发带和金色高跟鞋。公爵夫人和与会的贵妇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由玛格多瑙小姐和青年法学家协会主席斯坦尼茨·伊凡跳第一个舞。

“没有人打电话找夏伊他们吗？”

“连影子也没有。”母亲继续勾她的花边。“他们在等谁的电话？”

“现在我有点怀疑他在等什么电话了，”我把他的一番遭遇说了一遍。“不过我想不会有人来找。”

当然，与过去的十天一样，第十一天也没有人来找他。晚上，当红衣主教在电台发表讲话[1]以后，老先生夫妇二人都下楼来了，带来一杯咖啡粉，说希望和我们一起冲一杯咖啡喝。老先生精神肃穆，但更多的是沉默，下意识地搅拌着咖啡。梅达夫人有时谈些家常，有时则说些编织技术，最后我转身问夏伊博士：“怎么样，成功了吗？”

“什么成功？”

“那农业信贷机构，就是您说过的。”

“我去谒见过主教大人了，”老先生说，“到城堡山上去

---

[1] 指明曾蒂红衣主教十一月三日在布达佩斯电台的讲话，号召恢复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统治。

很困难。那许多坦克……我不喜欢它们。等主教接见的人很多，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个代表团谈话。”

“他知道您要求见吗？”

“我把名片递进去了。”

“后来呢？”

“他派人出来说，”老先生面上抽搐了一下，“别拿小事打扰他。何况……”他手中的咖啡抖了一下，梅达夫人当即叫他喝干了，“主教大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

此后老先生再也没有等任何人的电话。

*　　　　*　　　　*

当电车重新开动的时候，夏伊博士又到安焦尔福尔德的木料场上班去了。他觉得在家百无聊赖，心神不定，而且食物也吃完了。他听说那里正在分肉和鸭子。那几天阴雨连绵，挖了窟窿的旗子湿淋淋地显得特别狼狈不堪。木料场里的人摇来晃去，老先生判断不出来是不是在进行罢工。一般说来大家友善地和他招呼，叫他去排队领东西。办公室象成了肉铺，两个人在切肉，管理委员会主席掌秤。

夏伊博士耐心地排队等候。生产科长正在把一块里脊用报纸包起来。

“我想要这块，行吗？”老先生指着包好的这块里脊。

科长用手掂了掂问：“是不是太多了？”

“那我要一半。”

但他还是把整块要走了。后来在木料场走了一圈，知

道齐奈尔妮跑到加拿大去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人们说，看来要到圣诞节，生活才会正常起来，现在还不行。

他回家的时候，在电车上遇到了丘尔卡。

"博士先生，"两人被挤得紧紧地挨在一起，丘尔卡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应该给您安排点什么事。"

"您说什么？"

"我想您可以到办公室做点事。"

"嗯，我倒是觉得在木料场比较自在。我是个夜猫子，对，夜猫子。"

好儿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大门口见到他。

"您是新教教徒吗？"

"不，我是天主教徒。"我奇怪他怎么问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那就不必费口舌解释了。我们那里，如果出殡，就先念一段《圣经》，唱一段赞美诗，点上香给死人熏一熏，当钉完棺材盖，神甫就说一声'阿门'。"他看着我，带着一点伤感，"然后把棺材抬到坟地，墓穴下面是两块石板，把棺材用绳吊下去，再点香熏一熏，神甫再念一段《圣经》，当人们在棺材上铲土以前，神甫还要说一句——这是给那人最后的一句'阿门'。"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您懂得我的意思。"

"不很懂。"

"因为给有些人的第二声'阿门'晚了，这种情况不多，但是有。"他微笑起来，"譬如我就是这样。这第二声'阿门'我等了十二年。但现在终于听到了。"

他向我点点头缓缓地、疲乏地，但却是安详地进了大门。

柴鹏飞 译

# 人生的幸福

罗瑙伊·久尔吉

几分钟前他就放下了工作，空荡荡的办公室仍然灯火通明，只有他一个人还没走。在红色的草编地毯上，在已经拉下了活动顶板的办公桌中间踽踽踱步，沉思着：需要买点什么？今晚是否能在一家商店把需要的东西一次都买齐？在办公室的另一头，他站住了，从半开着的窗户前出神地看着街上。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春天。汽车沿着公路缓缓向山下驶去，车灯的光束扫过山坡，划破黑暗，照亮了湿润了的、春意盎然的树丛。轻柔的绵绵细雨无声地洒向大地。基什·帕尔伸了伸懒腰，深深地吸了一口充满泥土清香、温湿宜人、似乎带有粘性的空气。

他年约四十、五十岁之间，中等偏矮身材，两鬓开始斑白，向两边梳开的淡黄色头发已经稀疏起来，显得有点脏似的。一副毫无特征的圆脸，带着那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所常有的犹豫和疲乏的神情；一对善良、温顺、清澈的蓝眼睛老是流露出某种惊惶和不安。如果有谁稍加留意一下基什·帕尔——其实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做过——就会马上发现，

他既不美也不丑，既不使人喜欢，也不招人讨厌，完全是一个不引人注目、毫无特色的极其普通的普通人模样。只有比较细致的眼睛——比如医生的眼睛——才会稍微用多一点时间观察一下这张脸，那也只是为了研究一下它为什么如此出奇地松弛。基什·帕尔的脸好象是被硝酸钾溶液浸泡胀大，即将碎裂的粘土假面具。这是心脏病人的脸。

基什·帕尔就象伏案办公时手中的钢笔有时会忽然停住一样，在街上，或商店的柜台前拎着提包，耐心地排队等着买东西的时候偶尔也会蓦然抬起头来，仿佛有人叫他，而他要寻找招呼他的声源似的。实际上，他很清楚，这声音是从他的左侧胸部肋骨下的心脏发出的。"有点心律不齐。"每当这时候，他心里总这么说。这话正是当年战争中，他被重新应征入伍检查身体后，军医断定他不适宜服役时说的话。医生的话使他心安理得地不服兵役。他甚至为能知道"心律不齐"，准确地说出所患病的医学用语而颇感自豪。基什·帕尔有个同事，本来是出纳员，后来当了干部，有五个孩子。有一次，在办公室犯病了，基什·帕尔才知道这人的心脏一直有毛病，是心绞痛。"不要紧，我是过来的人了。"这人说。从此，一向沉默寡言、腼腆胆怯的基什·帕尔就和这位同事亲密起来，愿意和他谈天了。有一次，甚至把从来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过的心律不齐的毛病也对他说了。

"您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同事劝基什道，"可不能把这病当成儿戏。"

但是，基什·帕尔对此连听都不想听。光是"做心电图"

这个名词就使他害怕，不亚于好象有人威胁要解雇他似的。偶尔当他失眠的时候，这种被解雇的惊恐确实也出现过。但实际上，这都是庸人自扰，因为他忠于职守，从不迟到，一丝不苟地工作，人们都肯定这一点。

他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吸了口气又吐出去。对着打开的玻璃窗偷偷看着自己蓝色的工作服里面穿着的一件已经磨损了的、裁剪拙劣的旧西装。因为最近几个月瘦了，所以衣服显得相当宽大松懈。暗红色条纹衬衣的领子也很肥大。用了多年，已经脱线发毛，胡乱结成一团的领带，宛如一条与其说是棕色，还不如说是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带子。穿旧了的裤子膝盖处鼓鼓囊囊，皱皱巴巴，裤脚由于磨损多次，重新搭过边，已变得很短，连脚脖子都遮不住了。工作服尽管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家的，出于爱惜，还是戴了个黑粗布袖套。

他仍然站在窗户前，看了一下表，六点半过了，可是必须值班到七点。他什么也不想，只是本能地数着自己呼吸的次数。这时，电话铃响了。

他拿起电话，机械地报着机关的名称和电话号码。电话里传出轻微的嗤嗤的笑声。

"您是基什同志吗？您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我是莎瓦伊妮……您等等，我一会儿就下来……"

金发寡妇莎瓦伊妮是个会计，在半层楼办公。她丈夫在战争中失踪，但是她一直等着，深信他在某一天会来按家里的门铃。也许正是她对丈夫的矢志不移的等待，使人感

到她是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她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话，对每个人都好言相待，而所有的人也都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和喜怒哀乐告诉她：

“玛尔吉特卡，您瞧，我的孩子考了全优！”

“玛尔吉特卡，我妻子生了，昨天深夜三点生了个男孩！”

或者：

“哎呀，我的玛尔吉特卡，真糟糕，我的账上又少了九十六福林！”于是，莎瓦伊妮下午四点半下班后，不回家，也没有陪同已经追了她半年的同事霍姆利克，也不和从克里斯蒂瑙分理处多次打电话邀请她做客，并在她命名日时送来一束鲜花的马纽基一块到多瑙河上的玛尔基特岛散步，喝咖啡，或者看电影，而是匆匆忙忙跑到财务科帮助因甲状腺肿脖子有些肥大、有个风流丈夫的沙波妮检查核对账目。九十六福林微乎其微，照例又是沙波妮搞错了。“我的玛尔吉特，我该怎样感谢你才好呢！”莎瓦伊妮向后掠了掠金发，看着用手帕擦着哭红了眼睛的沙波妮，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她为别人的高兴而高兴。

基什·帕尔背朝窗户，注视着通向半层楼楼梯的弹簧门，心里感到有点紧张。在女人面前，他总是很拘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好。她绞尽脑汁想说几句使人解颐的妙语，但从来没有成功过。此时，他又陷入了窘态，心乱如麻：他的儿子贝拉又不会解物理题了（他仿佛看见儿子弯腰坐在摆着书本的小桌子旁，呆若木鸡，手心出

汗，面无表情地盯着绿色灯罩)。但愿七点钟以前雨能停下来，他的鞋底已经太薄，再下雨，恐怕就要湿透了；如果这时他妻子萝日卡突然来办公室找他(她还从来没这样做过)，发现他和莎瓦伊妮在一起，那怎么办？如果不是偶然低头，看见了黑布套袖，天知道他还会遐想到哪儿去。基什·帕尔立即脱下袖套，慌忙跑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把袖套塞到一堆牛皮纸旁边。

他刚刚直起腰来，弹簧门响了，莎瓦伊妮走了进来。

莎瓦伊妮也穿着蓝色工作服，只是颜色比男人穿的嫩一些，不是用平纹布，而是用府绸做的。工作服的下面隐约露出细条纹衬衣的折边，脖子挂着项链。她手中拿着暖瓶，走上草编红地毯，在办公桌前停住了，向对面站着的基什·帕尔说：

"把您的茶杯拿来，咖啡还热着呢！"

基什·帕尔慌张地翻着抽屉，最后终于找到了裹在毛巾里的那只花玻璃杯。幸好挺干净，因为中午才洗过，上面还残留着几滴水珠呢！莎瓦伊妮拧开暖瓶盖，给基什·帕尔倒上咖啡，然后在暖瓶盖里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喏，喝点咖啡吧！"说着，把包着四块方糖的擦嘴纸摊到办公桌上，"请吧，您喜欢甜的吗？我放一块都嫌多。"

基什·帕尔诚惶诚恐，结结巴巴地向莎瓦伊妮道谢，还闪过一个念头，到底该不该喝这杯咖啡？他慌慌张张地拉着工作服的袖口，因为刚才找茶杯时，工作服的袖子往上缩，露出了西服袖子。可是正是基什缩臂膀和抓衣袖的动

作引起了莎瓦伊妮的注意，她把暖瓶盖放下。

“您让我看看，”莎瓦伊妮抓住基什·帕尔的手腕，抬起他的手，一边看一边用妇女所特有的讲究实际的口气说，“有穗了，但没关系，很好收拾，只要往上窝一点，再缝上几针就行了。”说着，还示范了一下应该怎样做。“就这样，很简单，您妻子五分钟就能给您收拾好。”

基什·帕尔完全不知所措了。一方面是因为磨损的衣袖上挂了这许多象枯萎的须根似的穗，使他非常难堪，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突如其来对他说来是如此陌生的女性的温存使他发窘，特别是莎瓦伊妮的音调举止是那么亲切自然，仿佛发现他衣袖上的毛病是世界上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似的。基什·帕尔干咳几声，清了清嗓子，竭力想摆脱窘态。

“嗯，这没什么，回头我会把它弄好的！”

“您？”莎瓦伊妮微笑地问，“这可不是男人干的活。”

基什·帕尔猛然一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连袜子都是我自己补！”基什几乎身不由己地高声说着，感到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左手痉挛地几乎以全身力量满把抓住盛着热咖啡的杯子，一脸委顿而又无可奈何地神情，用水汪汪的浅蓝色眼睛里充满着茫然若失的目光看着莎瓦伊妮。

莎瓦伊妮惊讶之余甚至忘了把视线从这张光秃秃的脸上移开。现在她所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背景、放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光秃秃的脸。起初，甚至还不是在这脸上，而是仿佛在某一个地方，在那些松弛的线条之中，在贴着骨头上的

软绵绵的肉层下面，在不可捉摸的远处，象一片水波似地颤动了一下，好象打噎使人做了一个怪脸，肩膀被微微抬了一下，只剩青筋的脖子上喉结也随之上下扭动了一次。莎瓦伊妮纵然为人机敏，见多识广，但是这情景还是在瞬息之间使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她本能地感到：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水波涨到基什·帕尔脸上，使他失声哭出来。莎瓦伊妮此时与其说是急中生智，还不如说是用下意识的动作，顺手抓过一把椅子，推到基什·帕尔面前。

基什颓然坐下。莎瓦伊妮为了解除基什的羞愧之感和慌乱的心情，随便地背靠着办公桌，轻松地呷了口咖啡，装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开门见山地问道：

"您真会补袜子吗?"

基什·帕尔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带着胆怯的希望抬起头来，偷偷地瞥了莎瓦伊妮一眼，紧接着眼睛便顽固地盯在咖啡上了。

"我会。"基什·帕尔带着几分自嘲的声调说，"正规的补法，不是象一般男人那样的把窟窿揪起来缝。"

"一个男人确实没有比代替妻子补袜子更能证明他坚贞不渝的爱情了。但是，这种活烦人，还不如洗衣服哩！"莎瓦伊妮略停顿了一下，问道："您什么时候成家的?"

她的声调中没有任何挑拨的味道，基什·帕尔沉思起来，默默地计算着：

"十七……十七年前的秋天……"

他渐渐平静下来，莎瓦伊妮的善意和体谅使他感到一

股暖流在心头扩大，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当别人本来满可以对他卑视奚落的时候，居然善意地替他开脱了过去。

“十七年，”莎瓦伊妮叹息道，“可是，我只和丈夫生活了三年，实际上还不到三年……”说着，眸子里充满了忧郁，但是她很快摆脱了对往事的回忆，“您一定是先有爱情后结婚的。”她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可仍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口气和语调与基什·帕尔谈话。也许，基什会把她的话当成嘲讽。其实，她根本没有这么想，恰恰相反，这时基什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疑虑了。他沉默寡言，别人对他也毫无兴趣，谁也不想了解他。所以多年来，也许是有生以来，他都没有谈过自己，更没有和别人说过自己的心里话。现在，他内心好象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动起来了，而且开始汹涌澎湃，促使他开口。他再也不能，也不想阻挡这内心的潮流了。

无论什么样的谈话他都很不习惯，他拙于言词，往往只会说个“是”或“不”就算回答了人家的问题。这时，他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些隐隐约约、既温柔又细腻的东西。他搜索枯肠，挣扎着，想使说的和想的一致起来。

“爱情？”基什·帕尔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看着办公室远处棕绿色漆布地毯上满是尘土的脚印。“爱情”这两个字依然使他象中学生那样感到羞涩不安。“不，我想，这样说不准确。我们之间的不是人们通常说的爱情，而是某种别的什么。您知道，亲爱的夫人，”这时，不知道怎么搞的，嘴里突

然冒出一个陈旧而愚蠢的称呼，“爱情是多种多样的……”他突然煞住了，因为他感到说走了题，已经偏离了刚才在慌乱中涌上心头的想法。他用求援的眼神看着莎瓦伊妮，笨拙地挥了挥手，嘟嘟囔囔地说：“我怎么可以用这些蠢话来耽误您的工夫呢！”

莎瓦伊妮微笑着说：“您没耽误我工夫，而且怎么能说是蠢话呢？”

基什·帕尔停了会，振作一下精神，但是看得出来，他仍然有些犹豫不决。最后，讲话的欲望终于重新主宰了他……到底讲什么呢？他也弄不准，只是感到一种冲动：想讲，他再不能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下去了。

“您知道，在我上大学时……”往事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为了让别人了解他，让别人准确地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恨不得一口气把一切都讲清楚。但是他停住了，他吃惊地发现，这个想法是多么不现实，可现在，他不能再放弃这个机会了。基什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是个穷学生，靠教书养活自己……我学的是师范，我们这些穷孩子大部分都想当个老师，因为学师范花费不很多，将来可以找个和我们相适应的混碗饭吃的工作……我父母无力接济我，当时他们住在乡下老家。父亲是手艺人，当木工师傅，但是他喝酒过度，手艺就差了。我每次暑假回去，都看到他的手越发抖得厉害了……”

基什低头回忆往事。眼前出现一个偏僻荒凉的乡村小车站：三条铁轨，旁边懒洋洋地停着两三辆卡车，沉闷单调

的刺槐簇拥着一座铁锈色的两层办公楼。两眼浮肿，患有肺病的站长站在门口。一个脸色憔悴的黄发姑娘在楼上中间那个摆满了洋绣球花的窗口向外探着头。她叫萝日卡，后来就是基什·帕尔的妻子。

“打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比她更不幸的人了。当时，她胳膊肘支着下巴颏，凭窗注视我下来的那节破旧车厢，忧郁的眸子里流露着恨不得插翅远飞的目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理解一个人那时的心情。我只要一看那个窗口，我就怎么也摆脱不了把她从这里带走的念头。那年头，要找个地方当老师已经越来越难。大学的最后一年是实习，但干了半截我就放弃了，因为有个远房亲戚（后来他去世了）答应设法把我安排到这里。就这样，我们在这里依靠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微薄工资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末，您是爱她的……”

“我想使她幸福。”基什轻轻地说。

“实现了吗？”

这既是问题，也是判断。基什没有回答。

后来他说：

“七点了，马上就要打钟了。”

近处教堂顶上的钟发出了洪亮的响声。声浪从半开着的窗户口冲进办公室。基什·帕尔站起来，开始收拾皮包，找出一张纸条，上面是出自女人之手的歪歪扭扭的字，交待的任务如下：“一公斤面粉、二公斤土豆、十五公分核桃仁、二公分发酵粉……”

莎瓦伊妮从办公桌旁边站起来，踮起脚尖，象是在作体操似的。

"嗯，我走了。基什同志，再见。"

莎瓦伊妮握了握这男人柔软、湿冷的手，——他似乎忘了及时抽回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愉快。

*　　　　*　　　　*

基什·帕尔终于到家了。在大门口他又把那张纸条拿出来：面粉、土豆、核桃仁、发酵粉……全都买齐了。满网兜的东西压得左肩有点倾斜。捆菜的细绳已经松开，白萝卜快要从网兜里掉出来了。"幸好我发现了。"基什一边想一边设法把萝卜塞回去。这是一段上坡路，被雨淋得湿漉漉的树木散发出淡淡的幽香。雨已经停息了，从缓缓移动的低垂的云层中忽然露出一颗星星。"走吧！"基什在心中说了一句，把刚才稍事休息时放在地上的网兜往上拎了拎。突然，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接着便停住了。

基什颓然靠在墙上。这时，一种异乎寻常的奇怪感觉出现了：仿佛世界正在离他而去。

他闭上了眼睛，一切都消失了。只是远处传来的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才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

他感到胸口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推了一下，接着又急促地动了几下。血重新在血管里流动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一辆电车带着巨大的声响，风驰电掣般地在路口驶下坡。"这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心律不齐罢了，"基什心里说。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笑，抬起头看着夜空，找到了刚才那个孤寂而惨淡的星星。不一会，它被乌云吞噬了。

他爬到三层楼已感到精疲力竭，站在楼道里自己家门口，稍微休息了一下。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遗憾，没有随身带面小镜子，否则，他会照照镜子，观察一下自己的脸，看看怎么样？他摘下帽子，把额头认真擦了两三次。

进家后到了前厅。食物香味混着樟脑气味扑鼻而来，前厅照例是那样昏暗，紧闭的里屋门下缝隙里是一条熟悉的淡黄色光带。要是从前的话，如果妻子放下毛线活，出来迎接，他会很高兴的——他莫名其妙，自己这会儿为什么会这么想——可是，妻子从未迎接过他，所以基什·帕尔也没有对此抱什么幻想。他把买来的东西放到各自的地方：核桃仁、发酵粉放进食品橱，面粉、土豆放进贮藏室。放好后，脱下大衣走进里屋。一切都象往常那样：装着黄色绸灯罩的落地灯下，妻子坐在天鹅绒扶手椅上织毛活，屋子的另一角，儿子胳臂肘支在书本狼藉的桌子上，呆呆地望着前面。

妻子象往常一样只是抬起头，无精打采地把脸庞转向丈夫。这个女人已经开始发胖，皮肤白皙，肌肉松弛，红黑透黄的头发，微绿带蓝的眼睛，鼓鼓的嘴唇周围有不少皱纹。落地灯下除了扶手椅和一张放着几个备用钩针和几团毛线的小圆桌外，没有别的家具，基什即使想坐到她身边也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远处，在这间相当大的屋子中央橡木桌子四周放着五把老式的尖顶靠背包皮椅子，第六把儿子

正在用着。基什认真地把嘴唇在妻子冰凉的脸庞上碰一下，觉得自己已经疲惫得连到桌边的这五六步路也走不动了。终于他坐到了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半个身子背着已是半大小伙子的儿子。儿子嘟嘟囔囔说了声"您好"后，又继续发楞。基什·帕尔把手放在怀里默然坐着，看着妻子手中闪着淡淡亮光的钩针。不一会儿，他觉得已不堪忍受这被人遗忘的状态，终于胆怯地开口了：

"我已经把土豆放到贮藏室的篮子里了。"

妻子继续织她的毛活，接着突然抬起总是带着抱怨神情的微绿带蓝的眼睛看着丈夫：

"黄油也买回来了吗？"

"条子上没有写。"丈夫辩白道。

女人噘了噘嘴：

"这种事总该想到的。"

说罢女人又低头织毛活。

"是的，我应该想到买黄油。"基什羞愧地萎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心里感到内疚。每次看见妻子的嘴边显出对他的轻蔑不满的表情时，他总是想，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因为自己粗枝大叶？是因为两口子本来就不合适？还是因为他，一个手艺人的儿子高攀了站长的女儿呢？他理不出头绪，从来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追昔抚今，不管他做什么，也不管他怎样努力，总是得不到他妻子的欢心。

基什·帕尔坐在椅子上，好象被钉在耻辱柱上一样。一种不可名状的羞愧使他感到特别压抑、紧张、害怕，有如在

很久以前的少年时代，每当母亲外出找父亲，把他一个人长时间孤零零地留在空荡荡的屋里所感到的一样。此时痛感孑然一身，心灰意冷的基什突然感到心灵深处颤栗起来。

他站起来，走到儿子身边。男孩抬头看了父亲一眼，显出既渴望帮助，又非常忠顺的表情，对此基什总是抱着不信任的疑惑态度。儿子重重地把椅子往自己身下拉了拉，操着失去了童音的粗嗓子撒野似地嚷了一声：

"我不会做！"

缺乏教养的喊叫声使基什很反感，但是和别人接近的强烈愿望促使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儿子身边。

"什么不会？……"

小家伙把课本推到父亲面前，指着上面的例题。父亲读道："电线被固定在两根等高立柱顶端的钢缆上，柱子间的距离……求拉力是多大……"

基什对物理很精通，数学物理是自己在大学的专业。尽管大学的知识在脑子里还剩下不少，但此刻读了一遍之后居然弄不清问题的含义。他瞧着不耐烦地摆弄着铅笔的孩子。儿子的脸已经被春天的阳光晒黑了，满面的粉刺被抠破后留下了点点疤痕，头发的颜色黄里透红，和母亲的一样，灰色长裤两个膝盖处各缝着一块浅灰色的补丁，指甲被啃得短短的，非常毛糙。

此刻，在与儿子相隔一臂之远的地方，他心里闷闷地思忖着，自己对孩子了解得简直太少了。似乎谈不上对儿子的爱，只有疏远和隔膜，随着孩子的成长，这种隔膜更加深

了。从根本上说来，基什·帕尔怕儿子，怕他的粗鲁和凶狠。

“您当父亲的，要教育孩子！”一次儿子误了吃饭，萝日卡这么对他说。晚上十点左右儿子突然回家了，满面灰尘，两手冻得发紫。基什到前厅站到儿子面前想进行盘问，甚至训斥一番，但是儿子却玩世不恭地嘟囔了一句：

“我有事！”

儿子比父亲几乎高小半个头，基什只好踮起脚来，才能对视儿子的眼睛。男孩误认为要打他，两眼露出凶相，似乎要拚，基什不禁后退了两步，再也不敢问他干什么去了。

此时，男孩感到父母正在看他，神经质地打了个寒战。基什把视线从儿子身上移开，又低下头看那道题：“电线被固定在两根等高立柱……”

“给我一张纸，”基什对儿子说，开始埋头解题，但是仍然能听到妻子站起来，叹了口气，摆好餐具，去厨房准备晚饭去了。

晚饭是冷肉、土豆色拉，是中午的剩饭。妻子沉默地坐在桌子头上，无精打采地小口小口地吃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面包。父亲暗暗地注视着儿子的动作和惴惴不安的眼神，想起了叼着一块肉的狗，左右环顾，生怕从口中夺掉。基什的心一下子软下来，对儿子的怜悯和疼爱促使他决心把这个题做出来，给儿子解释清楚，免得明天老师如果提问时丢脸。基什·帕尔感到从某一个深沉的地方涌

上来一股强大的暖流，淹没了心房，直到喉头，而且流遍了全身，好象现在一切都充满了夏天里亲切而温热的阳光。

然而，他仍然还有力量镇静地把刀叉放下。他笑了笑想说什么，但是已经说不出来了……慢慢从椅子上瘫倒下来。

基什的头扑通一声碰到地板，瞬息间其余两人都呆了。接着儿子倏地跳起来，把椅子踢得老远，扑上去跪在身边摇动着父亲：

“爸爸！”孩子喊着。

他小心翼翼地把两臂伸到父亲肩膀和腰的下面，以超人的力量抱起这个身不由己的身体，放到床上。当他直起腰时，发现母亲正站在他背后。

“您为什么不帮忙？”孩子愤懑地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问母亲。

女人扭绞着两只手：

“天哪，怎么做这种事……”说着向儿子喊道，“你站在这干什么？你不知道应该请医生去吗？”

一刻多钟后，医生来了，作出了死亡的诊断。

*　　　*　　　*

过了一会儿，女人收拾完饭桌，进厨房去洗餐具。儿子一个人坐在床边，守着父亲的尸体，抓住父亲的手，观察着。父亲的手渐渐变僵冷了。儿子坐着，倒向父亲，把自己的脸贴到父亲手上。家里一片寂静，只有隔墙传来隐隐约约的

声音。孩子想和父亲说点什么，但又不敢打破这寂静。他一想起以后再也不能和父亲一块谈话，再也不能把自己心里曾经想说的话告诉父亲，就禁不住想哭，甚至闪出了一个怪念头：此时，他如果把心里话倾吐出来的话，瞑目的父亲一定还能听到。父亲还没有完全离去，还在这里，就在屋里的某个地方隐藏着。孩子惊恐地想着，也许父亲恰恰在这时飘然而去，不禁泪珠夺眶而出，滴到父亲渐渐冷却的手上。他赶快擦去，听着母亲是不是来了。可是他只听到了餐具的碰撞声，就安下心来了。男孩振作起精神，压低声音，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象和一个耳背的人谈话似地说道：

“爸爸，我从来是爱你的！”

男孩说完后，感到顿时宽慰，压在心头的重石落了地。他抽咽起来，象个小孩子似地哭了一阵。接着猛然跳起，擦掉脸上的眼泪，转身对着门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一会儿，母亲走进来，颓然坐到一把椅子上，双手放在怀里沉默着，两肩比平时更下垂得厉害。过了一刻钟，又过了一刻钟，时钟指到十点半，母亲开口道：

“孩子，你睡觉去，我来守夜！”

男孩一惊，看了看母亲，懒散地耸了耸肩膀。

“夜安！”

男孩转过身，向隔壁房间走去。这时，背后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怎么不和父亲告别?”

儿子转过头来怒目而视,激动而倔强。然后,一个跨步走出屋子,随后砰的一声拉上了门。到了卧室,和衣卧倒在已经铺好的、还散发着父亲体臭的床上。为了不愿让隔壁屋子听到,用枕头角捂着嘴伤心地哭起来。

母亲仍然坐在原地,数着壁钟的敲击声,十一点,十二点,一点。这样那样的想法不时涌上脑海:以后他们怎么办?靠什么过日子?她自己怎么生活?生活已变得捉摸不定,不可想象。她似乎应该站起来,拉开抽屉看看丈夫是否留下什么遗书、信件或诀别之言?但是,她不敢站起来,眼前除了她正坐着的那把椅子外,一切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了。

屋里越来越冷,女人打起寒战来,她荒诞地觉得丈夫肯定也会冷。为了不要惊醒儿子,她踮起脚尖,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抽出一条毛毯,仔细地给丈夫盖上。这时她想起来:好多次,她在睡梦中感到丈夫在给她盖被子,而她呢,却从来没起来给丈夫盖过。

夜越来越深了,零零星星的往事浮现在眼前:车站上,基什从火车上下来。在车站小楼上,她期待着刚下车的基什能抬头注视她的那个窗口。记忆又把她带到好多年以后,她隔着窗口看见丈夫拎着满满的提包从商店出来。有一年圣诞节,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丈夫送给他一个非常精巧的金镯子,至今仍然戴着,但她那时并没有象丈夫所等待的那样高兴。

女人的目光转向长眠的丈夫，把毯子弄得十分平整。自己究竟爱丈夫吗？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她所想到的是：丈夫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他了。但是她还是不能感受到这点，因为丈夫就在这里，就在她前面的床上躺着。可是一想到上午尸体就要运走，就顿时感到一阵昏眩。她伸手摸摸丈夫的头发，证明他确实还在。

这个动作似乎使她找到了答案，这是一种含义模糊、不可言传、不着边际的答案。

女人打了个嗝，又看着尸体。

丈夫看上去很美，她从来还没有看到他是这么美。她男人是个卑微的小人物，有时她甚至因男人个子比她矮，块头比她小，如此微不足道而感到耻辱。回想起长着罗圈腿、走路十分难看的丈夫，摇晃着上街采购东西，还学会了补袜子，总之，丈夫的一切确实令人生厌，她有时打心眼儿里鄙视他。但是，现在她面前的丈夫是美的，他为了她以及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她都由衷地感激他。

天蒙蒙亮了。起初，窗户象个靛蓝色的四角形，继而由浓变淡，由深变浅，最后呈现出灰濛濛的颜色。女人感到非常疲倦。家庭生活的往事不断涌现在脑海，丈夫也越来越变得美。仿佛死者温柔谦和的脸上闪烁光泽，使过去的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清晨来了。女人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晨曦泻进室内，山坡上的园林里传来黄莺的啭鸣。朝阳的光辉抹过嫩枝绿叶，一切都沉浸在晨光熹微中。

女人走到长眠的丈夫跟前，低下头亲吻着他的额头。但是，基什·帕尔已经感觉不到了。

安　利译

# 骤　雨

多博齐·伊姆雷

当保托两口子走进办公室时，米什凯伊放下手头的工作，用胳膊肘把报表推到办公桌边上。米什凯伊老是听到人们提起保托·伊什特万的名字，他早就想亲眼看看保托究竟是何许人。

现在，保托就在面前了。此人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与其说他是中等身材，还不如说他身材匀称更合适些。他神态沉着，腰身笔直；衬衣袖子卷起，裸露出黝黑结实的胳膊，自然向里略微弯曲，象两根刨光的核桃树干。"他的手不象农民的。"米什凯伊深为诧异，但毫无嫉妒之意地想道，"这双手多么小巧，比我的要小……"米什凯伊继续观察，打量着站在办公室中间的保托。此人鬓角已经斑白，看来有五十多了。前额中央有一条发红的垄，象是鼻梁越过眉间在那里崛起，从而使人感到他表情冷峻，脸色严厉，但是他两眼却热情有神。线条柔和的嘴和嘴上的一撮浓密柔软的八字胡，表明他是个开朗的人。

"白天好！"保托问好的语气中好象在说：我来了。

他放松了一下肩膀，虽然动作幅度很小，但是米什凯伊

却注意到了。装卸工人往往这样，每当他们屈背弯腰象一张绷紧的弓似的长时间背着麻袋，一旦把重物扔下，就会做一下这样的动作。

合作社主任两只手撑着桌面，向前倾着身子，鼓起嘴，容光焕发地等着保托往下说。因为他从保托的声音和动作中既没感到，也没有发觉，保托不再继续说了。主任没有想到，沉默寡言、精力饱满的保托实际上已经用双脚迈进合作社办公室这个行动把一切都说明白了。此刻，合作社主任象个刚致完词的证婚人，正以非常愉快的心情等新娘说“愿意”一样来等待保托的话。米什凯伊从侧面窥视着来者，想起了主任平时一谈论保托就流露出的那种钦佩和赞许的神情。

“头脑多么敏捷的庄稼人！”“如果和我们一块干，整个合作社都会在他的带动下飞跃前进！”“真是一个管马和喂牛的能手！”“他一个人抵得上十万福林贷款，而且不需要偿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合作社主任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哎……什么风把你刮来的？”主任终于先开口了，笑容满面地问，好象他甚至搞不清楚，保托为什么来办公室。这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主任早就等着这一天。当他一个人索然独坐冥想，脑海中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保托跨进办公室的场面，每当那时心中总是充满了美滋滋的感觉。而现在保托就在面前了，主任想好好地享受一下这个胜利的喜悦。

"请给我一张纸！"保托说。

"噢，请坐，这可是大事！娶老婆都无法相比。那只不过是和青年时代的单身生活告别，而现在呢？是和一切听天由命的生活告别，和忙乱无计划告别，和分散的小生产告别，和许多令人烦恼、头疼的事告别……"

保托微笑了，但这个仿佛是从浓密的胡子深处泛到嘴边的微笑一掠而过。这淡淡的似乎多少带着自负的微笑使主任想要说的话也随着咽下去了，只是有些扫兴地望着保托。等了你几年，到这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你总得说几句动听的话吧！合作社主任一向喜欢豪言壮语，据某些嘴上不很积德的人说，每天上床以后也要向妻子宣讲不少道理和自己的体会，因此当他最后意识到自己不但是位主任，同时还是个男人的时候，妻子早已听得精疲力尽，沉沉入睡了。

"那末，好吧！"主任扫兴地嘟哝道，说着从办公桌的抽屉里翻找出一张空白入社申请书，如果你这么不爱说使人振奋的话，那么就签个名吧……。但这间屋子是裴多菲合作社的办公室，不是哑巴聚集的地方。

他想到这里，精神也就爽快一些，并把一杆尾部被咬得发秃、墨渍斑斑的蘸水钢笔递给保托。

米什凯伊感到自己也微笑了。他喜欢这个庄稼人。这样面对面地在一起使他觉得，保托本人比从人们称赞褒扬中给自己造成的印象更实在，更具有吸引力。不是吗，他们刚一见面，米什凯伊就自然地、友好地朝保托微笑，而没有

倒向主任一边。米什凯伊喜欢保托的稳重和胸有成竹的神态，特别喜欢他刚才的微笑。这微笑不仅是对别人的，同时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使人看到：这个精明强干的农民具有细腻的、辛辣的讽刺能力。是的，这样的男子汉干什么心中都是有数的……

保托抓住笔，毫不犹豫，郑重其事地在申请书上很快签了名。在此同时，主任又拿出一张入社申请书，向保托妮举起说：

“喂，玛丽莎，你想好了吗？”

米什凯伊只是在好久以后，在好几天，也许还是好几星期以后才惊讶于自己直到保托签名时他都没有发现保托的妻子。原因可能是：保托即使在沉默、冷静的状态中也表现出热情充沛的形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其次，保托的妻子站在保托后面确实也不容易看到；再说，米什凯伊没有在意——对于一个渐入晚年的农民的无非也是老态毕露的妻子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何况不论在很久以前的少年时代，还是现在他从事农业工作的过程中，他都很清楚，农村妇女总是形影不离地尾随着丈夫。只有在别人不反对的时候，她们才有主意；只有在问到她们时，她们才搭腔。

这时，保托妮呆呆地望着主任。

“我？……我？”女人迷惑不解地问道。

她向前挪动了一小步，两手拳曲紧紧抓住针织外衣的口袋，呆头呆脑地在办公室看来看去，仿佛刚从睡梦中惊醒。她对屋里的这两个人，米什凯伊和主任的兴趣并不比屋

里别的东西更有兴趣——如墨渍点点的桌子、弯腿椅子和天花板中间那个满是尘土、点不亮的吊灯。

主任笑了。

"当然是你。"主任边说边狡黠地眨着眼左右寻视，"这里只有一个玛丽莎，也许有几个，只是我没有看到罢了。"

米什凯伊对保托的兴趣有多大，对他的老婆的反感就有多深。但是，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保托的妻子不仅不老，而且简直是个很有风姿的少妇，比她男人至少小二十岁。就米什凯伊来说，保托妮如此年轻甚至是她的缺点，他感到，身体这么健壮丰满，充满青春活力，情欲显然很旺盛的少妇给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当妻子，这本身就是招惹是非、图谋不轨的根源。

米什凯伊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打量着站在办公室里的这个女人。此刻虽然呆头呆脑、羞涩难堪，有如一块木头，但他总似乎感到这女人在要求些什么，似乎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热望和希冀，充满了对某一种东西贪婪无餍的渴求。他几乎感到，整个办公室都洋溢着成熟女性的饥渴，仿佛刚才还烟味刺鼻，昏暗的办公室骤然充满了闪烁的红光和撩人的气息。保托妮丰腴而窈窕的体态紧紧地吸引着米什凯伊的目光，有如蜜引诱着苍蝇一样。他力图把视线移到别的方向，但是失败了。女人丰满的前胸随着呼吸一起一伏，把针织外衣弄得胀鼓鼓的；诱人的白皙的脖子没有一点皱纹。如果脸上，特别是嘴上没有那么僵硬和近乎粗暴的死板的气氛，如果棕色眼睛不那么冷漠、迟钝的话，

她的脸蛋本来是美丽的。“她的男人浑身是头脑，而她只不过是一堆肉。”米什凯伊心里想，“她的男人为了生活而活着，而她只是为自己的肉体而活着……”当米什凯伊反复把这一对夫妇的身材、特征、声音和动作深入比较时，越觉得男的可亲可爱，女的可憎可厌。米什凯伊想，这一对夫妇晚上上床后，保托一定舒展地躺在床上，聪明的眼睛在幽暗中仍然炯炯有神地思考着地里的事情，而他老婆，这个欲火难忍的婆娘用自己滚烫的躯体，有力的大腿紧紧贴到丈夫身边，不让他安宁。保托不禁怒不可遏，单身男子平静的血液也随之激荡起来了。一种想立即粗暴地对付这个饥渴着什么的女人的愿望猛然袭来，他咬了咬牙。

“喏，难道你的嘴被封住了吗？”合作社主任鼓励女人说话。

保托妮耸了一下肩膀。

“我当家的已经签了字，这就够了。”

“你当家的已经办了入社手续。现在我问的是你！难道你不想入社吗？”

“我说了，我丈夫……他已经签了字。”

“你要明白，现在说的是你！你究竟怎么打算，入社还是照旧单干？”

女人把手从针织外衣的口袋里拿出，笨拙地垂在身体两侧，不知如何是好。脸上那股死板的气氛消失了，僵硬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惊骇，迟钝的眼神中一刹那间流露出某种惊惶和紧张。

“是说我……打算什么？”女人困惑地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好象担心在和她开玩笑。

“喏，玛丽莎，”主任张开手掌，胳膊前伸，象神甫给虔诚的教徒祝福似的，“我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妇女，可是你也别摆出这副受气样子来。”

米什凯伊这时开始感到，这个女人其实什么样子也摆不出来。她就是这个样子：刚才看到她身体健壮，举止笨拙是实际情况，而现在尴尬困窘，受惊不安也是她的真实形象，是形如其人。

保托小声说：

“在家里我忘了跟你说……你也应该签字……”

“我？”

主任煞有介意地插嘴道：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这个裴多菲生产合作社妇女和男人一样，一个顶一个人！喏，你别盯着我呀，好象我吃了你的面包。想必你也知道，妇女被叫做‘闭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合作社主任把这犹如牲畜拉磨盘似的老一套话，差不多和一百个农妇说过了，就象结婚登记所的主任在仪式中说的那几句一样，千篇一律，平淡无奇，可是对保托妮说来却无异是一个庄严的声明。

保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轻描淡写地说：

“是的，世界变了。”他微笑着，“你签字吧！”

就象刚才一样，这也是一个转瞬即逝，淡淡的似乎多少

带着自负的微笑。但米什凯伊现在并不想和他一起微笑。他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女人，使他不胜惊讶的是：一个具有许多恼人特点的女人怎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呢。她从脚踝到脖根仿佛蒙上了一层透明的细纱，强健的躯体透着秀气，肉欲上的渴望也已如轻烟逸去，四肢奇怪地突然离位，头脑开始主宰一切。脸上充满着错综复杂的表情：困惑、紧张、希望交替出现。这场由里及表的争斗排除，驱散了面部的冷漠和呆板。

“那……那让我写什么？”保托的女人问。

“喏，就写在这里，”主任说着，把申请书推到她面前，“写在下面，你看，有好多虚点的地方。”

“但是，如果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我签哪个名字？”

保托摇着头，好象因为妻子无知而在自我解嘲。

“你总知道你的名字吧！”保托好象给不会做练习的孩子提示一样，开导地说，“咱们别再拖时间了，我们还有事，人家也有事。”

“好……那我就写保托·伊什特万妮，但是……我婚前的名字也可以写在旁边吗？”

“那当然，两个名字都可以写。”主任同意地说。

虽然米什凯伊不十分清楚，但是他多少感到，在这一瞬间有个什么原因，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某种空虚之感，这女人认为有必要把婚前的名字也写上去。如同一棵树，当把它移植到新的地方，会担心自己的根能不能适应一样，也

许保托妮也担心自己生活的根……

保托妮胳膊肘平放在桌子上，认真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保托·伊什特万妮：科奇什·玛丽亚[1]。写完后，她凝视着签了名的表，面部变得开朗、生动，流露出人们只有欣赏着罕见的旖旎美景时才特有的那种心旷神怡。这时，主任把表拿走了，否则女人也许还会继续看下去。主任用吸墨纸吸完表上的墨迹后，象在牛厩里习惯地抚摸多产的奶牛一样，用肥胖的手抚弄着这张纸。

"今天晚上管委会开会，"主任向保托挤眉弄眼，高兴地说，"对这两张申请书我们还要说声'阿门'[2]。然后，我们要告诉你，伊什特万，今后你干什么？反正你知道，人民不会轻易把工作委托给任何人的……。现在，我们裴多菲农业合作社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接受，这你很清楚。"

保托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的面部表情已经作出了回答："是的，我知道。"他和主任，以及米什凯伊握手告别后向门外走去，他妻子压根儿没想伸手。她仍旧在沉思着什么，当她跟在丈夫后面还没走到门口时，米什凯伊发现她面部表情又开始变得冷淡、僵硬起来。

主任满意地搓着双手。

"喏，伙计，保托是一块大肥肉，"主任对米什凯伊咂着嘴说，"裴多菲农业社渴望他入社已经有五个年头了，现在

---

①　玛丽莎是玛丽亚的昵称。

②　基督教祈祷的结束语，意即"但愿如此"。

可算把他吸收进来了！十八霍尔特土地[1]、三匹马、两头奶牛、一辆大车、一辆小车，外加割草机和细筛子。还有什么呢？反正还有其它许多东西！特别是锦上添花，来了一个呱呱叫的副主任……上帝创造保托就是为了让他当发号施令的长官。以后你看吧，保托今后肯定会靠他的好脑子，而不是靠大喊大叫来指挥大伙干的！

主任兴高采烈地从抽屉里拿出雪茄烟抽起来，不一会儿办公室充满了烟臭味。

"米什凯伊老弟，你听着，"主任嘴里喷着呛人的烟雾，高兴地继续说，"保托，这个庄稼汉，在这块土地二十年来干的活就是连地主都佩服。有一次，地主在保托的地上说：'比什塔[2]，你真行！我经营得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是，你的庄稼比我的更好，你是怎么管理的？'你知道保托是怎么回答的？当然你不知道。保托那时说，'土地对您说来是产业，对我说来却是面包。'这就是保托说的话，不是吗？保托说话很少，但他不说则已，一说总是言必有物，妙不可言。比如有一次……"

烟雾刺激着米什凯伊的眼睛。他没有理睬主任，前去打开窗户，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办公室前已经绽出了绿油油嫩芽的栗树。"春天来了，"米什凯伊心里说，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偷偷袭来，"可是我还象一只野狗那样地生活着，

---

[1] 一霍尔特等于〇.五七公顷。

[2] 保托的名字伊斯特万的昵称。

真见鬼！”

他站在窗口回过头，脱口而出：

“主任同志，你说，这个保托……经常打老婆吗？”

主任惊讶地盯着他：

“哪里的话？保托不是那种人，他谁都没有欺负过，至少我不知道。”主任使劲吸了口雪茄，缭绕的蓝灰色烟气把他的头完全吞没了。“当然，屋里的事别人谁也看不到。从前这里有个叫帕基奇的敲钟人。他是个连二都不会数的十足的废物，遇到神甫的狗都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但是，这个帕基奇打老婆却不亚于任何头脑正常的男人。有一次，打得老婆鼻青脸肿，一个星期都不能出门。老弟，你看，屋里的事人们是永远不会弄清楚的。”

……米什凯伊第三天陪同保托走遍了整个农业社。新任副主任不愧是才智出众的领导，但同时又是个有意思的伙伴。以前，保托经常经过合作社的土地，他想看多少次就能看多少次。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装腔作势，摆出新来乍到，对社里的事都要过问一遍的架势。一路上保托话很少，就是开口，也只是就耕地、播种或某种牲畜恰如其分地说一两句。米什凯伊暗暗佩服这个没有上过学的农民能够很准确地运用概念和修饰词。他咬文嚼字言简意赅，表达能力很强。他对着一片已经打算补种的稀稀拉拉的首蓿地只说：“象破衣服。”米什凯伊也认为，就这几个字就够了。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别人也许要说十句。而保托深思熟虑后只说了一句；最后一个字提高了嗓门，以表示说完。更多的场

合干脆什么都不说。在牲口圈里观看牛和牛犊时，他只是和米什凯伊交换眼色，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会儿投来亲切满意的目光，一会儿眼神严厉。保托言必有中，一次都没说错。这使非常熟悉农业社每一头耕牛情况的米什凯伊完全心服口服了。

走出牛圈来到打谷场。在离麦草垛很远的场院边，保托点了支烟，闷头沉思，好象正总结着刚才看到的一切。过了会儿，他视线转向农艺师问道：

"您有什么看法？"

他们还没有象熟人之间那样称呼"你"。确实，他们刚刚认识，还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熟悉、热乎起来。

米什凯伊却在想别的。自从他们一起出来，米什凯伊就一直注意观察着这个精明的庄稼汉，有一个问题象个挥之不去的小黄蜂一样，总在头脑里盘旋：对农业社的树木、草地、牲畜和土地了如指掌的这个庄稼人，究竟对自己的妻子了解得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至少溜到嘴边十次，但是每次都咽回去了。现在照例如此，他想："保托一定会以为，我对他妻子感兴趣，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想到这里，他脸红了。

米什凯伊不知不觉地模仿起寡言少语的保托。他对保托的问题也给以简单的回答。

"我到这里已经一年半了，还需要一年半，到那时候裴多非农业社就不是由小块土地拼凑起来的大块土地……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农场了。"

保托走到地边，稍稍过了一会儿才转过头回答道：

“不够。”

“为什么？”

“这点时间要实行正常的轮作制也办不到。”

保托的不同意见使米什凯伊感到沮丧。他觉得，这是保托第一次匆忙下结论。

“到秋天，我们要安排全社四分之三的土地搞轮作，”米什凯伊赶上副主任，迅速地解释着，“其实轮作制并不等于全部工作，它重要，但不是全部。基建规模、机械化、土壤改良、生产支出……，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

米什凯伊只差没有说，他对现代化农业更内行些。但是，保托却代替他说出了这个意思。保托侧过头来看着米什凯伊，眼睛里又露出那种揶揄的微笑。他好象接过米什凯伊没有说完的话茬说：“当然，我只不过是个农民。”

“我也是！你以为我父亲有一千霍尔特土地吗？他连一霍尔特都没有……他是雇农。我和他一样也是个雇农。”

保托点点头，小声地说：

“噢，是雇农。”

“嗯，当然……”

“我知道这点，我做了努力！我拿过锄头、镰刀……”米什凯伊突然感到自己几乎是气势汹汹地在争论，顿时不好意思起来。他挥了挥手，“唉，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往事了……。我从农业学院毕业五年来，至今已经换了三

个单位。但愿现在算是安家落户了。”

“有孩子吗？”

“没有。”

“结婚了吗？”

米什凯伊不太愿意地回答道：

“没有……当我打定主意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米什凯伊感到恼火的是，不是他询问保托，而是保托问他。烦恼沮丧的米什凯伊回忆起多次结婚的打算，模糊的记忆中浮现出几个姑娘的面孔，幽会、谈心、冲动，一次又一次的事故……。米什凯伊每次回忆都觉得，“事故”这个词最能确切、恰当地说明自己的恋爱史。他二十岁上给地主当车夫时，曾经真心实意，痴心地爱过一个机灵、调皮的金发农家姑娘，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为了她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当爱情慢慢发展向考虑结婚的时候，他被应征入伍。当他退役回来，姑娘已经出嫁了……。这本来是件司空见惯的恋爱挫折，但却成了米什凯伊后来在这方面所有不幸的根源。每次他结识女友时，总是情不自禁，痛苦地回忆起已经永远消失了的美好的青年时代，把那时曾热恋过的那个活泼开朗的农村姑娘作为衡量所有女孩子的标准。于是，每一次都以“事故”宣告结束，而没有成为恋爱……就这样，年复一年，他在所有结识的女人身上寻找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姑娘的幻影。光阴荏苒，现在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目前，他的最大不幸也

许并不是仍然形影相吊，孑然一身，而是一种占有欲代替了他青年时代丰富多采的憧憬和幻想。

米什凯伊开始仇恨起保托来了，他居然占有着一个有这么美好形体的女人。

“那也不好。”保托撇了撇嘴。

“什么不好？”

“就是如果男人不结婚的话。”

“那么，什么是那个‘也’？还有什么不好？”

保托耸耸肩膀，放慢步子，沉思着绕过田边的枯草丛。

“我有妻子，”保托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但是，一个孩子都没有……”

“没有？为什么没有？”

保托没有回答。此刻，保托看起来显得比在办公室登记入社那天苍老和萎靡得多。但米什凯伊并不同情他，“谁让他这个老东西娶个妙龄少女呢？……”米什凯伊脑子里清楚地出现了保托他那身体健壮、充满着生命力的妻子，仿佛现在就站在路边：两手插在针织外衣口袋里，隆起的两个乳房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米什凯伊觉得血涌上了自己的脸。每当想起这个女人，他心中总是感到一股燥热；特别是那天在办公室时，保托妮线条分明、表情呆板的脸瞬间曾闪现出希望光彩的情景更使他的欲望超过现在百倍。

“不，”米什凯伊想，他担心自己会脱口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有孩子，这不是她的过错……。上帝把她造成懂爱情，有母性的女人，她生十个孩子都没有问题。”

进村时，保托伸出手来：

"祝您一切顺利，"保托说，"午饭后我到办公室看看。"

"您需要我也去吗？"

"也许……让您工作更好些。您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

米什凯伊松开副主任的手说：

"我们今后还有机会更好地相互了解，您是个有意思的人，还有……您妻子也是个有意思的妇女。"

他最后一句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不知怎的从嘴里滑出来了。但他马上懊悔了，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刚才还是和蔼可亲的保托突然变得冷淡和疑惑起来。

"是因为年轻吗？"保托语气尖刻，带着敌意地问。

米什凯伊脸红了。

"我并没有说年轻！"米什凯伊大声地回答，好象在喊叫，"她多大年纪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说有意思！"

保托不作声了。闷着头，眼睛眯成一条缝，板着脸，前额中间那条垄也不那么红了。

"她身上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保托嘟嘟哝哝地说完，连看都没有再看农艺师一眼，就回家了。

"我一定要从你那把她弄到手，"米什凯伊痴呆地注视着保托离去的背影，幸灾乐祸地、狠狠地暗暗发誓，"哪怕痛快一晚上，我也要弄到手！"

……一个星期过去了。米什凯伊跟踪着保托的妻子，从一块地跑到另一块地，故意在她的作业队干活的地方找点需要检查的工作。但是，由于妇女们吃午饭时也互相依

假着聚集在田边，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机会和保托妮单独待上哪怕一分钟。米什凯伊虽然东奔西跑，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向她倾吐爱情，反而被迫就萝卜、间苗和锄玉米地的意义给妇女们上了几次专业课。一面讲一面恼怒得大姆指差一点把手掌捅个窟窿。但是他发现，保托妮象花朵一样地开放了。象是一只离开了笼子的鸟，和在一起的女社员开始戏闹，开玩笑，使人不安的死板的表情正从脸上消失。米什凯伊常常偷偷地、惊奇地注视着保托妮，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的眼神竟然变得如此活跃，整个面部表情变得生动丰富，被压抑了很久的健谈性格正在展示出来。总之，友好自然的询问、兴致勃勃地谈吐等特点已经代替了曾经主宰着她的郁闷寡言和冷漠死板。“她和大家在一起感到很愉快，”米什凯伊想，“你看，比她更年轻的人也叫她玛丽莎。对这种称呼显然她也觉得很满意……”另外，玛丽莎干农田活真是一把好手。她不知疲倦，干起活来又快又好，女伙伴拚命赶才能赶上。当跟在后面的妇女气喘吁吁地喊，玛丽莎，还是你有两下子时，她就充满了孩子般天真的自豪；容光焕发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胜利的微笑，好象人们的称赞是她最大的称心乐事。

一次，米什凯伊快作完并非出于本意的如何锄土豆的讲话时，农业社主任突然光临，他对讲授的东西点头表示赞赏，此外还讲了几个例子，从而延长了米什凯伊上的这堂课。接着，主任挽着农艺师的胳膊向村里边走边乐滋滋地说道：

“怎么样，老弟，我难道没有说过，我们就是拣到一袋金子，比起保托两口子也算不了什么。你知道，这样的庄稼人，就是不和他说，不用作动员，他也会干活的，这就是他的本色……。支持雇农的后代，那没问题，我自己也给地主干过活，唉，见鬼去吧，不说这些！可是，老弟，对于我们这些自己人有时也需要给点厉害看看，甚至要用‘快点干活呀，你快睡着了！’的话催促一下，而保托夫妇，他们是不会慢条斯理地行动的……。你注意到玛丽莎了吗？她简直是一架蒸汽机，一马当先，带着所有的妇女干活。喏，老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米什凯伊耸耸肩膀，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她呢？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老弟，你说的不是真话！如果别人也象她这样干，整个土豆地早就收完了……老弟，你照直说，你不是因为某种原因喜欢这个人吧？”

“谁？”

“就是这个女人，还有这个男人，保托家两口子。”

“不见得。”

“老弟，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他们入了社我也感到很高兴！”

“那就好，看法一致。因为如果在最优秀的人之间意见不一致，那就糟糕了。老弟，你是我们最优秀的人物，这点我在谁面前都是直言不讳的。在会上我也总这么说，这你

也听到了。但是，你知道，保托也是我们最优秀的人物，这你也不会否认的。这就好象我和我的连襟一起到我岳父家去，老人家对我们两个人都说，'你是我最好的女婿'一样……"

如饥似渴的米什凯伊身不由己地甚至每天晚上在玛丽莎往奶厂送奶的路上，暗藏着偷看她。在朦胧的夜色中，米什凯伊象一条公狗，嗅找玛丽莎的气味。他诅咒着、慌张地躲开来往的社员和其他认识的人。可往往是，即使路上没出来个讨厌鬼，玛丽莎却总有个女邻居陪伴着。

但是，有一次，天赐良机，他们终于邂逅相遇，而且是单独在一起。

一个星期五，中午刚过。暴雨挟带着雷电席卷了整个田野。妇女们在滂沱的骤雨中惊慌地四散窜跑，有的人淋得象落汤鸡，拚命往家跑，脚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有的人躲到田边的桑树下。玛丽莎也向通往村子的大路跑去。但雨势有增无已，就象从低垂的云层中倾泻出来的一样。她跑进一座早已弃置不用的有榨葡萄藤的小破房子里。当米什凯伊跟着跑到小房子时，浑身上下也湿透了，骂声不绝地脱下衣服拧水，装着好象只有他一个人似的。

一个角落里传出玛丽莎的声音。

"同志，您别生气……一场小雨并没什么害处。"

米什凯伊转头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问道：

"谁在这里？"

"我，玛丽莎，就是保托妮。"

"喏，你看，我们竟挤到一块来了。"

"是，是的……"

米什凯伊迈过已经倒塌的炉灶被烟熏黑了的碎砖，喜出望外地发现，破烂的房顶周围到处漏雨，只有北面角落还有一块干地。玛丽莎就躲在这里。如果米什凯伊挨着她也缩到这个角落，她肯定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的。这时，米什凯伊开始懊悔自己为什么要在装模作样上费工夫。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追上来的，如果雨一停，就会前功尽弃。他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你好！"米什凯伊说着伸出手来。

玛丽莎笑了。

"哟，我浑身都湿透了！"

"我也是……"

女人确实全身都湿淋淋的，裙子象房檐似的往下滴着水。薄薄的衬衣紧紧粘在身上，乳头清晰可见，宛如裸体一般。米什凯伊咬着牙，十指象爪子一样紧紧地蜷曲着。

"我很久以前，"米什凯伊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人的乳房，嘶哑地说，"就想和您谈谈。"

"和我？"

"是和您……我不能再把想和您说的话憋在心里了，就是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也在所不惜。"

"怎么是很久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没有很久呀！"

"如果一个人心焦如焚，一天，哪怕是一小时也是很长的时间。玛丽莎……我这样称呼您，您不会生气吗？当

然，您自己无能为力，您和一个犹如木石、毫无感情的老家伙……这对您不合适……”

“我冷，”女人打着冷战说，“外衣如果您不穿，能借给我吗？”

米什凯伊悻悻地把外衣扔过去。这件可恨的外衣剥夺了他正在看的美好的东西。为了这个美好的东西，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衣服作为代价都心甘情愿。

玛丽莎用外衣紧紧地裹住了自己。她发现，米什凯伊正在以巴不得她赤身裸体的贪婪的眼神，看着自己。但她脸上毫无惊恐，也没有流露出反感和责备的神情，倒是使人感到她有一种惆怅和忧伤。

“您为什么想和我谈话？”女人平心静气地问，把前额的湿发向后掠了掠。

她严肃、冷静地注视着米什凯伊，等着回答。米什凯伊咽了口唾沫，不知说什么好。几天来，他字斟句酌、再三推敲着自己的表白。而今天，漫天的骤雨，残破的小屋，这小说一般的环境对于他向保托妮倾诉衷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米什凯伊此时却说不出来，热情冷却了，消失了。娓娓动听的连珠妙语能很快征服一个天真、惊愕的女人。但是，眼前的这个玛丽莎，既不惊诧，也不天真……。必须想另外一套话，要不同凡响，既不能那么露骨，也不能显得急不可待。

“您连我是谁，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女人说，“您要找我干什么？”

米什凯伊身上在一刹那间心中涌起一个强烈的欲望，想不由分说，狠狠地把女人湿淋淋的躯体拉过来搂抱。但是，转瞬间他又觉得这想法荒诞可笑：不错，抱住她，象个笨拙的小伙子那样紧紧搂抱……那么，以后怎么样呢？难道他等待的，为之憔悴的就是这样把一个没有灵魂的，大口袋似的躯体搂在怀里，既没有温柔的抚爱，又没有冲动的颤栗吗？

女人缓慢地摇摇头，仿佛怀着痛苦、惊异和忧伤的心情责备着根本不是由于她的过错产生的某种不良和不美的事物。

“难道您要的就是这个，我的肉体？”女人平静地问，拉开刚才米什凯伊借给她的外衣，露出淋湿了的胸部。

“是的，是的。”米什凯伊的欲望咚咚地叩击着心扉，但是他嘴边却响亮地回答道，“不是，不是！”

扑通一声，棚顶上掉下来一堆腐烂的芦苇，不远的地方，闪电划破天空。

“您不会要求别的什么，”女人说着，又把外衣紧裹在身上，“我知道……许多人从前想，现在仍然想得到我。这我很清楚。那么您，要我的什么呢？我的肉体，我的大腿，我的……。但是，我是怎么想的，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您并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您听我说。”

“人们从来不要求我听人家说些什么。他们只是告诉我，他们需要什么？”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不幸福，不愉快。您不要否认，您和您丈夫生活得不美满，您男人也许还要打您……。我想，您曾想过要离开这个家。我同情您。是的，当您象个呆板的女仆跟着您男人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打心眼里同情您，但这不过是人之常情，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可是，您的皮肤，您的脖子，您的身材，总之您的一切使人们决不会只是对您同情、怜悯，而只会不由自主地想追求，想得到。——那么，对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米什凯伊激动、气恼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他也觉得，自己对这个女人也是先怜悯后追求的。

保托妮什么也没有说。米什凯伊呆望了她片刻，然后转过身去凝视着忽而倾泻如注、忽而稀稀疏疏的雨帘。

“我象一条狗似地住在这个可恨的村子里，”米什凯伊望着外面随风扫来扫去的雨点，“我一个亲人都没有，没有孩子，连只麻雀都没有。我已经四十岁了，有文凭，工资也不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家。当我很久以前虽然是个穷孩子时，至少母亲还给我说些贴心话……”

米什凯伊不知不觉地沉湎到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中去了。他讲呀讲，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这样对任何人讲过，他是如何从一个傻乎乎的小长工变成了孤独的男子汉。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讲起二十年来一直想在别人身上找到那个活泼开朗的金发少女的影子。讲起战争，讲起土改后的斗争——难道他不是疯了吗？——有一次，他看上了一个不错的姑娘，但由于买了一匹马，弄得不名一文。后来，他上

学去了，开始时头脑迟钝，苦不堪言，手中的钢笔好似有千斤重，在才智敏捷的同学面前自惭形秽……。雨慢慢小了。山丘的葡萄园上空，云块象破碎的布似地散成了细条，但他还在讲，还在回忆，还在倾诉；仿佛暴雨把头脑中积存了多年的东西一股脑冲刷了出来，漂浮在倾泻下来的水面上。

米什凯伊停止说话了，但没有转过头去。

"雨就要停了，"他对着雾气氤氲的旷野仰仰头说，"您马上就可以走了……以后您向大家大喊大叫地说吧，就说在许多蠢货之后又出现一个蠢货……。这已经无损于我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了。"

此时此刻，米什凯伊确实也是这样想的。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当他饱经沧桑，在老年将临的时刻，以无限的隐痛，笨拙地、孤独地向一个人，但也许只是向滂沱大雨陈述了自己的心声。

角落里窸窸窣窣作响，传来女人的说话声：

"可是，人们都说您是个好人。"

"我？好人？为什么？"

"我不知道……社员都这么说，说您心眼好，正派。"

"唉，这是另一码事！我热爱这里的土地、田野……。我总是没完没了地说，总是告诉大家，说不应该这样，而应该那样……如此而已 这并不是心眼好。这只不过是……鬼晓得是什么东西……"

"可是您瞧，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对别人说不应该这样，而应该那样做。"

米什凯伊在门口转过身，看着女人的面颊，神态和刚才一样，一无变化。

“我的父亲也是个雇农，”女人继续说，“从前在这个村给地主干活。我曾是个漂亮的姑娘，被保托看中了。他娶了我。您不要以为我的男人坏，不，他不是坏人。我不知道，您根据什么认为，他是个粗暴的人，特别是以为他会打我……。不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就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我。”

米什凯伊觉得疲乏不堪，心中空虚。他一切都掏出来了，就连几天来折磨人的使他心烦意乱的那个欲望也和盘托出了。这欲望他本来认为可以成为昔日那些“事故”的爆发式的继续。但尽管如此，他心里仍然有点肮脏的东西在蠢蠢欲动。

“您给您丈夫辩解吧！”米什凯伊苦涩地说，“回头您会发现您丈夫也是个好人。”

他把视线转向女人，他觉得，他们之间距离是那么遥远，就好象这个巴掌大点的榨房已经变成一个宽大无比的大厦。

女人摇摇头说：

“不是好人。他既不好，也不坏。不管怎么样，他反正没有用拳头折磨过我……。但是，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要求什么。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是不是需要他。至于如果他需要我，那我就得满足他。如果他早起，我也要早起。如果他熬夜，我也熬夜。如

果他买回来东西，他就给我看看，可从来都没有事先对我说过他想买东西。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我有吃的，有舒适的住宅，有漂亮的衣服，应有尽有，但就是没有生活，因为不是我在活着，而是他在我心中活着；因为想事情的是他而不是我。如果我喜欢什么东西的话，我也不能说，就连干活的围裙都是他给我选购的，因为他无所不会，而我却是一无所能。因为是他要了我，而不是我要了他……。这点您不会知道，也不能理解。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和蔼可亲，却又象赏赐恩典似的给您东西，使您恨不得啐他一口……。我的东西就都是别人给的，而不是自己挑的；我得到的是恩赐而不是收获。我还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称得上是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的。其实我丈夫一点也不吃亏，我一个人顶三个人干活，为的是不愿意象欠他债似的……"

"那末，您想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吗？"

女人否定地摇了摇头说：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想离开我的丈夫。"

米什凯伊惊愕地盯住她说：

"离开？那么……为了谁？"

"谁都不为。我没有人……我迄今为止只不过是保托妮。如果我不是保托妮，我就谁也不是。"

"这只不过是说说罢了……"

"不，您可能不理解。但确实如此。人们所以对我以礼相待，我之所以有衣穿，应有尽有，就是因为我是保托妮，我只不过是我丈夫身上的一块肉，一旦离开他，就活不成，就

不再存在……。如果他打我，也许还好些，这样至少能因为反抗、痛苦和愤怒而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天我们在办公室时，我之所以问结婚前的名字是否也可以写上，因为从前我不叫保托妮，与保托毫不相干，那时是一个有自己名字的人……现在总算用不到别人来给我什么了，不再需要别人代替我思考了。现在人们叫我玛丽莎，我就是玛丽莎。我要把这十五年的女仆岁月从我的生活中一笔勾销。”

榨房里闷热起来，女人脱下外衣还给米什凯伊。此时，米什凯伊如果又象刚才那样凝视着她，她也不在乎了。但是，米什凯伊没有这样做。既没有盯她的乳房，也没有看她的脖子，只是注视着她的脸。

“请您别生气！”女人继续说，“我不生您的气。您讲了您的生平，我也讲了……因为我的丈夫也是只需要我的肉体。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身上唯一感兴趣的东西，至于其它方面，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连想都没打算想。但是，现在我的生活开始有了希望。我看到妇女和其他人一样：如果手巧，就是手巧的人；如果勤劳，就是勤劳的人；如果发明了什么，那就是聪明的人……。如果既不会干活，又不想干活，那才真只是个躯壳，是一堆肉。”

米什凯伊想抽烟，但装在被雨淋湿了的外衣口袋里的纸烟都湿了，他想挑一支干一点的，可是找不到，于是他把整个一盒烟扔到角落里。

他把视线转向因穿着湿衣服又开始发抖的女人身上。

“如果需要，您就把我的外衣穿上吧！”米什凯伊微笑着

说,“您穿上,我不会觉得可惜的。”

女人也微笑了。

“谢谢您,”说罢,她把米什凯伊的外衣披在肩上,“我已经说过,我不生气……”

这时,女人眼神里的兴奋、和解代替了忧虑和抑郁。米什凯伊感到闷热,出了一身汗。他思绪万千:想到自己,想到保托一家,还想起这个奇特的妇女。她居然能把自己的人格压抑沉沦十五个年头之久,但是她不能,也不想把这渴望重见天日的人性永远埋葬。可是,当他重新说话的时候说的却是别的。

“喏,如果,如果我爱您,”米什凯伊抱着新的希望,看着女人说,“如果我爱您,把您看成您想成为的那种人,把您看成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低三下四的人,也就是说,看成玛丽莎呢?”

女人走出榨房。风儿驱散了空中浓重的水气。泥泞的土地艰难地呼吸着。米什凯伊也钻出小房子,走到女人旁边期待着她的回答。这时,合作社主任卷着裤腿,绕过一个又一个水洼,顺着田间小路慢慢走近他们。

“见鬼了!”米什凯伊说,“在这里看见我们,天晓得他会怎么想?”

保托妮耸耸肩膀。

“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他并没有向这里走,而是往草地方向去。”

她把外衣递过来,这次算是彻底还给了米什凯伊。

"太阳一晒，衣服马上就会干，"女人解释道，"到了家就好象没有淋湿过似的。"

"您还什么都没有回答呢？"米什凯伊拦住她说。

女人低下头，从侧面向上看着米什凯伊。

"生活的路是漫长的。"女人说完后离开了米什凯伊。她走到路边，回过头来，露出年轻姑娘特有的微笑。

米什凯伊久久地呆立在榨房前。女人的身影宛如远处淡淡的雾气飘然消失在绿色的玉米地中，但是米什凯伊仍然怅惘地伫立着，身体重心由一条腿挪到另一条腿，嘴里咬着一根空心草，算是代替抽烟。

"我等着。"米什凯伊大声地对小房子前忧伤的小树丛说，"我等着，以后再也不会让她走掉了。"

米什凯伊吹起口哨，迈步走向草地，追赶主任去了。

安　利译

# 沃诺·伊格纳茨

费耶什·安德烈

从春天起，驻守在意大利前线的士兵们就凝视着浮云，哼着小曲，担心会被打死。他们身处异国他乡，每到深夜便倍加思亲，想念妻子温暖的拥抱。

“您瞧，准尉先生，”夏天的一个夜晚，沃诺·伊格纳茨喊道，“那个绿眼睛的女人又在招呼我啦！”

战壕里的光头的步兵们兴奋起来了。

“你疯啦，伊格纳茨？”准尉笑着说，“你的老婆在哪儿？”

“她正坐在白杨树梢上呢！”沃诺·伊格纳茨答道，“她已经向我眨了好几天眼睛了。”

说着，他举起手，指向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这时一颗流弹打穿了他的手腕。

野战医院的院子里乐声抑扬，修女们向他微笑，一个上校把一枚奖章别到他胸前。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了。

“多亏这颗有眼力的子弹，”沃诺指着这只残废了的手对熟人说，“愿上帝保佑这些好心的意大利人！”

于是他在全国社会保险署当了办事员。

他把文件送来送去，干完后就在那个棕色的条凳上闲

坐一会儿，然后给欧洛约什·伊琳端去一杯插着一根麦秆的可可和几个新鲜的小弯形面包。女秘书吃的时候，他们就聊天，不是谈考绍，就是谈北部山区。[1] 沃诺喜欢这个姑娘文雅娴静的谈吐、干净的外套、削得尖尖的铅笔和带在纤细的手指上的小巧的红宝石戒指。沃诺每天准十二点去敲代尔·迈迪科·安道尔的门。这时候，代尔·迈迪科总把脚搁在一把椅子上。

“伊格纳茨，你为什么不结婚？你的一只手虽然有毛病，但你的差使不错嘛！”

“以后会解决的，顾问先生。”沃诺总这样回答，然后用软天鹅绒布认真地给代尔·迈迪科·安道尔擦皮鞋。

十月的一个下午，欧洛约什·伊琳买到一些仙人掌。沃诺·伊格纳茨用麻袋把蓝色釉花盆给她送去。

女秘书在她布达的简陋住所里请沃诺坐下，拿出烧酒款待。她又谈起考绍和房边小广场古老的栗子树。

“您还记得您的家乡吗？”姑娘问道。

沃诺当然记得。他父亲铁匠铺前面有条小河，还有他母亲当年在里面缝麻袋的纳吉舒拉尼糖厂。但是他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谈战争、谈野战医院和他如何受奖。

“单身不好，”姑娘叹息道，“孤单单一个人总不是回事……”

---

① 考绍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北部山区今亦属捷克斯洛伐克。二次大战前这两地都属匈牙利。

沃诺·伊格纳茨挺了挺宽大的胸脯说："我是为了女人受伤的……，多美呀，绿色的眼睛，和小姐您一样。"

姑娘收起酒瓶，微笑着站起来，平淡地说："我父亲在考绍当过法官。在北部山区大家都知道有个切尔格·欧洛约什·日格蒙德。"

沃诺·伊格纳茨默默地跟着走出来，看着女秘书一扭一扭的臀部。女秘书的一条腿是瘸的。

他给了门房一个本戈[1]小费。

浓重的雾霭笼罩着多瑙河，吞噬了岸边的树木。沃诺·伊格纳茨站在铁索桥上，凝视着河水。秋雨淅沥淅沥地拍打着他肩上的麻袋。

星期日沃诺买了一把木勺[2]，上面刻着一颗闪着金色光泽的心。后来，他无聊地在鲍罗什广场闲逛了很久，柔和的阳光洒在广场上，不时听到一群大手大脚的姑娘粗野放肆的笑声。黄昏时分，他回家去了。

一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象要下雪。沃诺在棕色条凳上翻着《新时期》杂志，上面登了一篇奇怪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大贵族小姐乔奇·泰克洛骑马在铁路旁看见一个光脊梁的铁路工人，就爱上了他，因为这个工人犹如一尊古代铜雕像那样。但后来，这个工人穿得整整齐齐地去拜访她，小姐却给了他十个本戈，很伤感地把他打发走了。

"他穿的会是什么样的衣服呢？"沃诺·伊格纳茨费劲

---

[1] 匈牙利解放前的币名。

[2] 匈牙利家庭中用木勺做菜。

地思索着。

他不敢问代尔·迈迪科·安道尔这个问题。每当他用软天鹅绒布擦去他的顶头上司皮鞋的灰尘后，总是翻来复去地说："女人们可真奇怪，顾问先生……"

说完后，他总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艰辛的岁月来了。布达佩斯，这个好议论的热闹的城市显得萧条而沉闷。街上经常阒然无声，杳无一人。轰炸机时而带着令人惊恐的轰隆声在空中盘旋。

"斯摩棱斯克是我们的了。"代尔·迈迪科·安道尔说。

沃诺·伊格纳茨高兴起来。他照例用那只扭曲的手发送文件，满意地工作着。警报一响，他就躲进掩蔽部。

有一天，欧洛约什·伊琳说，"考绍陷落了。"

沃诺痛苦地看到她绿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圣诞节时，颓丧的市民在幽暗的烛光下默然祈祷。沉寂的城市在颤栗。枪弹、炮弹和炸弹仿佛要把它撕碎。

一切都完结了。

五月，国会大厦顶上红旗迎风飘扬。

全国社会保险署改为工会社会保险中心。顾问先生变成了勤杂工。沃诺·伊格纳茨依然当他的办事员，还是形影相吊的老光棍。

每个星期日上午，作完弥撒后，代尔·迈迪科·安道尔总是请沃诺喝上一盅酒。这天，他们来到"堡垒酒馆"。

"欧洲沉睡了，"代尔·迈迪科说，"匈牙利被遗忘了。"

"顾问先生，应该有信心，"沃诺·伊格纳茨说，"要相信

上帝，总有一天会来拯救我们的。”

沃诺收购了代尔·迈迪科的皮鞋和好多件绸衬衫，后来代尔·迈迪科把怀表也卖给他了，钱分三批付清。最后，沃诺用了一百一十福林把代尔·迈迪科嵌着家徽的、古色古香的、精致漂亮的烟盒也买了。又过了一些天，顾问先生去世了。欧洛约什·伊琳没有去送葬，因为那天她正好要过党组织生活。

“欧洲沉睡了，匈牙利被遗忘了。”沃诺沮丧地说。

沃诺五十岁生日时给自己买了一套浅色的漂亮粗呢西服。他穿上新装想炫耀一番。到了列宁弯路，突然下起倾盆大雨，他惊慌地跑进一家小吃店。

在拥挤的小店里，他茫然若失地东张西望。店堂窗前坐着一个瘦削的妇女。沃诺走向前去，请她让点地方，坐下后要了杯白兰地。在近处打了个闪电，店堂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后来又充满了嘈杂声。那个瘦女人不断地在浅蓝色的衬衫上划着十字。沃诺同样划起十字来，表示他也是教徒。此后，沃诺从银色的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抽起来。

他们开始闲聊起来，先谈了几句这瓢泼大雨和被淋湿了的衣服。

“尊敬的夫人，您住得很远吗？”沃诺友好地问道，然后很有礼貌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打扰您了，我叫沃诺·伊格纳茨。”

“您莫非是佩奇市的那个沃诺家族的人吗？”女人惊异地问。这女人长着和蔼可亲的瓜子脸。

"不是，我是纳吉舒拉尼人。"

女人的视线移到那个古色古香的烟盒上，看见了上面嵌着的家徽。

"我叫薇拉格·泰克洛。"女人友好地微笑着说，"您们以前也许是地主吧？"

沃诺两眼闪起光来，小小的闪光，象大头针那么大。

"一千五百霍尔特。"沃诺慢腾腾地说道，从嘴唇上揪下一条烟丝，"又黑又肥的土地……"

"现在呢？"

"当办事员。"

薇拉格·泰克洛挨了一下他的手。

"恰基·比久[1]也是办事员……索拉迪·布比[2]在织毛衣，……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沃诺·伊格纳茨仰视着绘有华丽图案的天花板说：

"上帝会来帮助的。要相信这点，为此祈祷吧！……"

他要了两杯白兰地。

薇拉格·泰克洛温柔而认真地说，她是从来不沾酒的。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她后来话就多起来了，深情地回忆了曾经非常爱她的肖罗尔·安盖利卡，还谈起一个圣芳济会的神甫，此人长一双随时准备造孽的眼睛。薇拉格说，她自己独身一人，但生活十分严肃正派。

沃诺谈起北部山区的森林，叙说了和他的朋友代尔·迈

[1][2] 都是匈牙利解放前的大贵族。

迪科·安道尔一块打猎的事。有一次，代尔·迈迪科打到一只熊，而他猎获了一只野猪。

爱情好象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不声不响地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只有几个熟人参加。

他们的婚后生活也是安安静静的。薇拉格·泰克洛每天很早就起来，糊纸口袋。沃诺·伊格纳茨则照旧分发文件，或在那条棕色的条凳上闲坐待命。他瞧不起欧洛约什·伊琳，但却是非常有礼貌的，以对党小组长所应有的尊敬向她问好。下班后，他把一麻袋已经糊好的纸口袋送到手工业合作社，回来后就打扫卫生，精心地收拾着自己的带有法国式阳台、家具齐备的新居。

两口子相亲相爱。晚上，早早就睡了。

星期日恰基·比久，一个爱吃肥肉的老教士，以及索拉迪·布比和热情的马泰尔·泰蕾齐娅过来串门。

喝过一杯李子烧酒后，马泰尔·泰蕾齐娅就嘻嘻哈哈地说起特别爱说的那件事：当俄国部队逼近的时候，修道院答应，谁害怕，谁就可以穿世俗衣服。

“所有女的都穿上了摩登衣服，”她兴致勃勃地说，“圣母马利亚，你们都没法想象绸衫子裹在她们身上有多紧！”

索拉迪·布比因弄不到毛线而闷闷不乐。老教士吃东西发出刺耳的响声，恰基·比久没好气地看着他。

沃诺讲起自己当年在纳吉舒拉尼的花园。那里有一条

清澈的小溪从许多百年古树下流过。撒满月光的溪边站着一个神秘的绿眼睛的女人。为了她，沃诺和别人决斗，手腕被打穿了。

“有一次打赌，我口不离瓶一口气喝了一瓶家酿啤酒。”沃诺夸耀地说，“我的朋友，代尔·迈迪科·安道尔只有认输付了钱。”

“伊格纳茨老兄，”恰基插嘴道，“匈牙利贵族是不喝啤酒的。”

“欧洲沉睡了，匈牙利被遗忘了。”沃诺挥了挥手说。

大家都尊敬这个在历史面前毫不屈服、从不折腰、性格倔强、快乐的北部山区的贵族。

薇拉格·泰克洛对他的爱恋与日俱增，简直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十月二十三日①，沃诺从合作社回家的路上，在卡尔文广场看见学生们高举旗帜，唱着歌曲。他手拿空背包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间，唱着歌走遍了全城。在裴多菲雕像前，听到激昂的朗诵。在贝姆雕像前，他用沙哑的声音高呼：“打倒格罗②！”

在国会大厦前，沃诺遇到了欧洛约什·伊琳。她在游行队伍中高喊口号，要求归还考绍。

沃诺如醉如狂地回到家里。薇拉格·泰克洛把别在他

---

① 这里是指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事件前夕。

② 当时任匈牙利党的总书记。

钮扣上的飘带取了下来。

“我真为你担心，伊格纳茨，”薇拉格说，“你太激动了，容易鲁莽行事……”

薇拉格·泰克洛用三千福林买来鸭子、猪油、香肠和糖。

沃诺·伊格纳茨拿回家数以千计的传单，慷慨激昂地读着。

“别太激动了，亲爱的，你总得吃点东西吧！”薇拉格央求着。

索拉迪也劝沃诺冷静些。恰基·比久绷着脸，紧张地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老教士祈祷上帝保佑。马泰尔·泰蕾齐娅惊魂未定地让大家看她被子弹打穿了的帽子。

大家一起收听勒文斯泰因公爵的呼吁书。恰基关上收音机，在屋里长时间地来回踱步。薇拉克·泰克洛在厨房的碗柜旁祈祷。沃诺微笑地看着妻子。

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着。

十一月三日恰基穿着深灰色的风雨衣，表情严肃地进来了，他吻了吻薇拉格·泰克洛的手。

“我带来了礼物，真多，连衣服口袋都装不下了。”他看着薇拉格说。

他又转向沃诺·伊格纳茨，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我的法律顾问福泽考什·鲍拉日博士可以帮助解决你的地产问题。纳粹老兄，带着你的地产证书找博士去吧！”

恰基说到这里笑了，把一只脚放到瓷壁炉炉门漂亮的拉手上，皮鞋上布满了细细的尘土。

沃诺·伊格纳茨面色苍白地看着恰基。

薇拉格·泰克洛给每个人倒了茶后说，她看见人们出于误会，打死了一个经济警察。恰基掏出小本子指给大家看。上面写着三个人的名字，然后看看大家的眼睛，说他本子里还有好几个，接着便谈起奥托·哈布斯堡① 来。

黄昏时，恰基伸出细长的手和大家一一握别。

他的手象铁灯柱那样冰冷。

沃诺·伊格纳茨坐到瓷壁炉旁，呆呆地注视着渐渐暗下来的住房。薇拉格·泰克洛从盥洗间走出来，睡眼惺忪地谈起已经入党的约布考·伊丽莎白。

"婊子，婊子！"沃诺双拳紧攥，捂着脸咳嗽着。

"她毕竟是你的表姐……"妻子说。

"和每个伪善者都要算账！"

但是他还是坐在床边做了晚祷。

铺在窗下的地毯消失在昏暗中，沃诺仿佛失去了剩下的仅有的一块土地。

于是，他脱去带着绸带的晨衣，躺下了。

夜凉如水，乌云遮住了群星。薇拉格·泰克洛在梦乡中微笑。沃诺·伊格纳茨凝视着她的瓜子脸。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倾听着什么。

---

① 曾统治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

突然，一阵枪声把他从床上惊起，他急忙跑去把窗户打开。[1]

“开枪了！”在凌晨的寒风中，他看来看去，“耶稣，我的仁慈的上帝！”

薇拉格·泰克洛惊惶地跑来，给他披上温暖的衣服，她搂着不断咳嗽的丈夫，安慰着他，把他带到壁炉前。

“亲爱的，亲爱的，你安静点……”薇拉格哭着乞求道。

沃诺·伊格纳茨拍打着膝盖，狂笑起来。

妻子用柔软、温暖的手抚摸着丈夫秋霜似的白发。

安 利译

(1) 十一月四日苏联出兵。

# 上等人的假期

高朗博什·拉约什

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前奔驰着。我坐在寒气袭人的车厢里，听着老朋友、区委书记鲍洛格·伊斯特万讲述自己的一段经历：

当时我妻子还在布达佩斯，病得很重。医生建议她去疗养。这休养所离我家乡很近。可是玛格蒂不愿意离开我们，因为治疗这种疾病的时间很长。

"你们也跟我一起去吧！"她提议。

早就有一些人向我建议，到地方上去干几年。但是我不太想离开首都。最后，我和玛格蒂商定，跟她一起下去度度假，顺便到处去走走看看，说不定因此引起兴趣决定留在下面了。

七月十二日清晨，我们乘上了国际快车。火车里十分拥挤，我们站了将近三百公里的路程后，才找到了座位。车厢内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偏偏不巧的是转车时又误了车次。

我们只好再等三小时乘下一班次的火车。在这么长的

时间里干什么好呢？一大堆行李、还有一个因为天气炎热和疲劳而烦躁不安的孩子。玛格蒂倒是耐心地照顾着孩子，只要求我去看看车站的餐厅里有没有什么熟的食品。

可是，当我一走进车站餐厅，就碰到了他们围坐在两张拚起来的桌子旁。奥拉赫·卡尔曼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捷劳巴尔·伊姆雷是区农业部长，西克萨伊·米哈依是区委宣传书记。除此以外，那儿还坐着这个城市的警察局长，不过他在一旁始终一言不发。

这几个人在喝着瓶装葡萄酒。奥拉赫·卡尔曼高声招呼着向我走来。我们俩是小时候的同学，除了这个警察局长以外，其他人也都见过面。

他们又拉过来一张桌子，把我全家也都安置到餐厅里来了。两个服务员围着我们转。拿走了订菜单，送来了饭菜。他们的动作机械而有节奏，迅速而又和谐，就象用键钮操纵的一样。我们又要了一瓶葡萄酒，但是没有喝多少，因为是掺了不少苏打水喝的。我们打开窗户，但是穿堂风一点也没有减少酷暑的炎热。

卡尔曼他们来车站是送朋友出国的。当我进车站餐厅时，他们正在喝饯行时剩下的酒。在欢声笑语中，三个小时很快地就过去了。当我们要搭乘的火车进站时，这几个人一起帮着我们搬行李。临走卡尔曼问道：

“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这儿看看？”

我想，这些人大概在猜测，上面要把我调到这儿来。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只想呆在母亲那儿，什么地方也不

去。经常跑休养所就行了。宁愿躺着晒太阳，也不出去乱走。不过我没有立即拒绝奥拉赫·卡尔曼。我瞥了一眼我的妻子，看她有什么意见。没想到玛格蒂却已经和卡尔曼在讨论在哪一天合适了。

"星期四可以吧？"

"行！"玛格蒂说，"星期四早上，你们在广告柱子这儿碰头。"

"好啊！"卡尔曼高兴地喊道，"六点钟左右我们派一辆咖啡色的胜利牌小卧车在这儿等候。"

我觉察到，我的妻子希望我能留在这儿，所以她向卡尔曼建议在这儿安排一天的活动。对她的态度我回以微笑，并一边抚摸着她的胳膊。玛格蒂总是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确实，从外表上也看不出她有什么毛病。我们只是在有一天早晨发现她俯身在洗脸池里咳血时，才知道她身体不适。

星期四天气还是那样。早上，太阳刚一露面就热浪扑人。当我从早班工人的列车上下来时，老远就看见一辆咖啡色的胜利牌小卧车停在广告柱子下面。我走到汽车旁边时，司机正在看报。

"我是第一个吗？"我问道。

"才不呢，同志们困劲过去了。"司机回答道。

我买了几份报纸看。当我浏览完了第一份报纸时，卡尔曼他们也回来了。他们舔着嘴唇啧啧作声，还在回味着杏子酒。他们惋惜地说我错过了一次多么好的享受机会。

“我们走吧？”我问道。

“路上我还有件工作要检查一下，然后一整天都没事了。”卡尔曼说道。

我们三个人坐在后面，西克萨伊·米哈依坐在司机的旁边。捷劳巴尔借了司机的报纸在看，卡尔曼则信手翻着我的报纸。我们这几个人块头都不小，人人身体健康，朝气蓬勃，正处在男子汉的黄金时代；只有司机的脖子和脸起了皱纹，西克萨伊·米哈依已经稍稍有点儿秃顶。

“咳！刚果这个地方需要派个强手去。真见鬼，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

西克萨伊·米哈依回过头来。

“什么无奇不有！无非就是这么回事。难道不是这样吗？到处都是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此而已。”

公路上的尘土飞扬。我们脱下了上衣，感到又闷又热。卡尔曼汗流浃背，他肚子上的肥肉随着车子的震动而抖动着。我和卡尔曼是同村的人。他们家的田地不比我们家多。上学时，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关系。那时我的朋友中城里人比较多。例如发电厂锅炉工的儿子。这个捷劳巴尔·依姆雷的爸爸也在发电厂工作。西克萨伊·米哈依的爸爸在山区的石矿上班。

现在我们全坐在车上。路边树木带着发蔫的叶子在我们身旁迅速掠过。我们走的这条路坎坷不平，很糟糕。

“这条路已经在修建了，请忍耐一下。秋天就能完工了。”卡尔曼说道。

我们来到了筑路工人的工段。车在离发出强烈臭味和热气的沥青炉稍远些的地方停下来。卡尔曼下了车，把车门打开。工人们光着膀子在干活。一些年轻人只穿着一条裤衩。有一个工人伸着四肢躺在刚修好的水泥路上，准备日光浴。当车在他旁边停下来时，才懒洋洋地爬起来。

“我们正准备吃早饭。”他说。

这时，我也下了车。工段长等人走到卡尔曼身旁。卡尔曼逐一和每个人握了握手，然后拍了拍工段长的肩膀说：

“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还不错。”

“那好，干吧！可别出什么岔子。”

“没错，哪能出什么岔子？！”

卡尔曼还搂了搂几个工人。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句常用的话，叫做“打成一片”。

“星期五晚上，派几个人到我那儿去，带些材料来，把篱笆修一修。星期六就给他们放假。行吗？”卡尔曼问工段长。

工段长脸上毫无表情。

“好吧！”他答道。

我们回到汽车里，我注视着卡尔曼。

“这些人很不错。”卡尔曼得意地说，“当然，要稍微拉拉他们，这样就不会出什么事了。我想，他们一定把我当作自己的朋友，就是这样，很对。”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工段长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突然，天变阴了。开始，我以为是前面葡萄山的影子。后来我才明白：不是山的缘故，而是天上有一大片乌云。

"要下雨了。"捷劳巴尔说。

"暴雨！"西克萨伊·米哈依说。

司机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我们摇下了所有的玻璃窗，想吹吹风。可是酷热有增无减。当汽车沿着河岸开上一条桥的时候，卡尔曼说：

"我们在这个镇子里先吃些什么，然后去找养老院的管理员。我已经派人告诉他了，我们要到这儿来。他那儿有好酒。"

当到达这个镇的中心广场时，暴雨劈头盖脸地下来了。我们缩着脖子躲进对面的肉店里。司机没有跟我们一起来，他留在车子里。

从肉店里向外眺望：浩荡的水流把山上的泥土冲到路上。浅浅的蓄水池已经不够用了。瓢泼大雨遮住了这座高耸的山。呼啸的风使雨势显得更为凶猛，树木不住地摇晃着、呻吟着，动物似乎从这雨的世界中消失了。在山坡上一个葡萄榨房前停放着的一辆汽车，被密密层层的雨冲刷着，滔滔不绝的水流把它推到蓄水池的栏杆上，撞坏了车门。但这声音也被席卷大地的风雨声所淹没了。

"你不饿吗？"奥拉赫·卡尔曼问道。

"怎么不饿呢！"我说道。

肉店共有两个房间。我们走到里面的一间，经理给我们拿来了香肠和一盘面包。

捷劳巴尔问道：

“有辣椒或者西红柿吗？”

“马上拿来。”经理说。

他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广场，向在对面门洞里躲雨的小贩那儿买了些西红柿和辣椒。

我们一边吃着他买回来的东西，一边看着水珠从他湿透了的衣服上不断地往下滴。我的心中不免产生一种抱歉之感，但看来他却毫不介意。

香肠很合我的胃口。在国营商店里我还从来没有尝到过这么好吃的香肠。合作社的代销店里也没有这么好的。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宣传书记西克萨伊·米哈依甚至在这么可口的香肠面前也还是那么冷冷淡淡。

当我们饱餐了一顿后，暴雨也慢慢地停了，稀稀拉拉地飘着雨点，风也停止了，路上和河岸上堆积着高高的、光滑的从山上冲下来的泥块。

“我们可以走了吗？”西克萨伊问道。

我们的汽车停放在广场上有遮盖的地方。走到店门口时，我突然想起来，刚才谁也没有付钱。我转身走到商店经理旁边，他的衣服还在滴水。

“我们差一点忘了付钱。”我说。

“不要客气。”

“我们应该付多少钱？”

经理大方地微笑着说：

“您说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会接受同志们的钱呢？！”他

就是这么说的。

我呆呆地站着，有点不知所措。最后，我挤出一句话：

“那为什么？”

“我请客，算是对同志们的一点意思。”

卡尔曼他们已经向我招手，要我赶快过去。我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似乎是感谢的话，向经理点点头，穿过了马路。

山上冲下来的泥土，堆得高高的，遍地皆是。土块很硬实，踩在上面连脚印都没有留下。

转眼就到了养老院。老人们在凉台上坐着，漫不经心地看着还在不停地从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听着排水沟哗哗流水声。卡尔曼走到坐在最外面的老人身边问道：“管理员到哪儿去了？”

“他忙着要去什么地方。只告诉我，他有急事，如果有人找他，就这么转告。”

“他老婆也走了？”

“她也走了。”

我们站了一会儿。卡尔曼在想着什么事。

“现在我们怎么办？假如今天开头就这么不顺利，那下边还会有什么意思呢？”捷劳巴尔说。

卡尔曼说：“我确实告诉他了，说我们要来。”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走的呢！”西克萨伊说。

卡尔曼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他竟然会这么做？！”

“上次他和我讲话时显得非常傲慢。那时他给我的印

象就不好。”

我怔怔地站在他们中间，感到自己比他们笨，好象是晚出生了十年、一百年似的。

“这儿不是有家大酒馆吗？我曾在那儿喝过很不错的葡萄酒。喝一两杯满可以消化刚才吃的早饭了。干吗要去打扰人家？”我说。

卡尔曼瞪着眼睛看看我：

“你是傻瓜不是？！”

“我们去托洛茨格吧。国营酒窖的经理十一点钟在那儿等我们。”捷劳巴尔说。

大家坐进了小车，点了支香烟。可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孤单。几个人都渴了。刚才一共吃了两公斤香肠。一渴，连香烟的味道也差得多。轿车在路上行驶，透过车窗，我看见长长的运输车队迎面开来，上面载满了工人。汽车旁边的横幅上写着：政府工作组。在另一段路上，一些工人往车上装了滑下来的泥块。然后再把它运回山上。

“他们的行动可真迅速。回去后要表扬这些工人。”捷劳巴尔说。

我瞧了瞧他。

“这，我全都看到了，他们在恢复这个葡萄酒产区。可是，天公不作美，拖了他们的后腿。”我说。

西克萨伊转过身看了看我说道：

“这个产酒区难道被破坏了？！全是新闻记者在胡诌。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记者，都他妈的见鬼去吧！真的，有时我觉

得，政府部门里一些人在这些记者面前卑躬屈节。我们这些在地方上、在基层单位里的人是不在乎的，虽然我也在上面待过。我们本来应该一开始就把这些乡下人全塞到合作社里去的，否则今天工作组就不会来了。见他们的鬼去吧！”

这时，我看见司机脸上的皱纹在抽动。

“托洛茨卡马上就到了。”

公路旁边的一条小径把我们带到了酒窖门口。这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的酒窖。式样粗犷、高大，是座城堡式的建筑物。它有几扇狭窄的门和射击口。由于风雨的侵蚀和光阴的流逝，这些门全剥落成为黑色了。司机把车停在外面，我们走进这座建筑物，敲了一下经理办公室的门。

两个姑娘接待了我们，她们是在这儿实习的大学生。

“经理同志十二点回来。但是他关照过，让我们俩来接待同志们。”她们说。

桌子上铺着尼龙台布，上面放着几个杯子和两把酒壶，里面是空的。

那个棕发姑娘长着一对黑黝黝的眼睛，挺着高耸的胸脯，拿着两把酒壶走了。另外一个留在这儿。她是一个金发姑娘，显得比较冷淡，有些拘谨，羞答答地不时眨着眼睛。我们又点了支烟抽了起来。不一会儿，棕发姑娘就回来了。金发姑娘立即把酒斟到杯子里。这酒色好，味醇，确实不错。卡尔曼他们毫不客气，没几分钟，两把酒壶就见底了。棕发姑娘又去拿酒，好让我们能喝个痛快。卡尔曼拍拍我

的肩膀说：

“喏，怎么样？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吧？”

看来，他们是知道有人打算调我到这儿来工作的。那好吧，既来之，则安之，看看究竟怎么样。

迄今为止，我心里还没有形成任何看法。

当经理回来时，我们已经在喝第六壶酒了。这种酒壶一次就能装一升。酒味很浓。经理是一个黄头发、高个儿的年轻人。五年前，大学毕业后来到了这里。他的父亲是在本村教堂前的广场上被德国人枪杀的。当时德国人在离他很近的地方连开了三枪，但是他父亲却仍然没有倒下。刑警队长只好亲自走到他的身边，朝太阳穴开了一枪，才算把他打死。谁也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要在逃跑的最后一分钟把沙卡伊·拉斯洛的父亲打死。

捷劳巴尔对年轻的经理沙卡伊挤了挤眼睛说：

“这儿不错啊，还有小姑娘们呢，我的老弟！”

“不行，在工作单位里哪能胡来？！”

“你把她们带到地窖里，谁看得见？”

“我不干这种事。”

“喔唷唷……”

“我连瞧都没有瞧过她们一眼。”沙卡伊说。

卡尔曼狂笑了起来。

“那么你是个傻瓜。”

这时，经理转身对我说：“我们这个酒窖里的酒全是出口的。请你下去看看。”

我们走到下面的地窖里，这儿非常阴凉、舒适。

“请看。”沙卡伊说，“这五桶酒是运到奥地利去的；下面几桶是出口到英国去的；那些是运往法国去的；这些是运往埃塞俄比亚去的，对面的那些酒是运到罗马尼亚去的，你信吗？”

“当然相信。”我说。

“这些都是上等好酒。”经理说。

这时，卡尔曼在一旁大声建议我们在地窖的前厅坐下来，因为那儿非常凉快。

“你们尽管在那儿待着。”沙卡伊说。

卡尔曼走到他跟前说：

“储藏室里还有三小坛酒。”

“我一会儿就让人拿来。”经理说。

“建筑用的木材已经搞到手了吗？”

“还没呢。”

“好吧，我去催他们。”

“不需要专门派车了，有便搭车捎来就可以了。”沙卡伊说道。然后又指给我看别的酒桶。

“喝掉的酒怎样作价？”我问。

“这无所谓。做的时候提高一点出酒率就行了，小事一桩。”

他对其中的一个姑娘说：

“去拿一壶凉水来！”

卡尔曼他们又笑了。

“你想喝水？”

“我想掺水喝。”沙卡伊说。

“你疯了！”

捷劳巴尔也摇晃着脑袋问道：

“喝完了不头疼吗？”

“我老得喝酒，不掺水，受不了。我宁可头痛。”

我们在那儿坐到四点钟时，托洛茨卡乡的乡长兼合作社主任来了。他叫奥巴菲·阿培尔，是艾尔代伊的奥巴菲家族的直系后裔①。

卡尔曼又问我：

“嗨，你已经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吗？”

我决定跟着他们走完全部旅程。突然我感到恶心，想呕吐。于是走到外面的空地上，以为这样会好一些。不料适得其反，因为实际上室外的温度比地窖里要高二十度左右。外面热极了，好象根本没有落过一滴雨似的，更看不出还下过一阵暴风雨。天空上一丝云彩也看不见，烈日烤炙着大地。

这时我发现，司机抬头看着我，接着又低下头看他的报纸。我又回到了地窖下面。正好西克萨伊·米哈依在提议说，这些浓酒已经喝得差不多，该换一个地方了。

“对，对！”捷劳巴尔随声附和道。

---

① 艾尔代伊即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曾属于匈牙利。奥巴菲是那里的一个大家族。

我们这些人都站了起来。除了沙卡伊外，我们全又都挤进车里，然后就启程出发了，再找个什么地方喝一些淡酒。西克萨伊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座私人小别墅前。里面住着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没有孩子。

我们坐在这座别墅的凉台上。没多久，男主人就把酸味淡酒和香肠，还有腊肉和面包送上桌来。当他还没有回来时，西克萨伊·米哈依就带着这个人的棕色头发的漂亮老婆走进房间里面去了。当这个男主人拿着许多东西回到我们身边时，西克萨伊和这个女人还没有出来。男主人的表情始终如一，毫无变化，似乎还可以说，看上去情绪很好。他斜眼看看房门，里面静悄悄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个男人老是劝我们吃。后来，他自己也以主人的身分和我们一起吃了起来。

“您难道没有看见您妻子不在这里？”我问道。

“噢，”这男人说，“是西克萨伊同志帮了我们的大忙。当这儿进行生产关系大改组时，多亏了他我们才没有加入生产合作社。我们家有三霍尔特的葡萄园。我们的葡萄园在全国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但我们总算没有入社，这多不容易啊！您看，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站起来离开桌子走到凉台的前侧，信手摘了一个还是青的桃子啃起来，又往口袋里装了几个，然后又走回到桌边。

这时，西克萨伊才带着这儿的女主人从房间里走出来。

“可以走了。”他说。

奥巴菲·阿培尔问：

“可是去哪儿？”

“去达姆，到富农那儿去。”卡尔曼说。

“对。”捷劳巴尔·伊姆雷说，“去富农那儿。”

当然，我们又是什么钱也没有付，因为不需要付。我感到，跟着这个小集体行动，自己的感官也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坐进汽车。我口咬着酸涩、半熟的桃子心里在想：这次旅行是不是为我专门安排的，我会很快地得出深刻的结论来吗？

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飞驶着。

达姆离这儿不远，我们很快就看到了高岭土原料厂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白色浓烟。穿过主要的街道，车停在位于村子边路旁一侧的一所大宅前。宽阔厚实的大门里面果树成荫，还有一大片葡萄园。

一个又瘦又黑的妇女从厨房里探头往外张望，脸上干瘪的皮肤紧皱在一起，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我们这伙人。

“我们来了。”捷劳巴尔·伊姆雷说。

这个女人用手往另一个门指了一下，示意我们从那儿进去。一个头发灰白，但还相当强壮的男人正在牲口棚里起粪，不怎么理会我们这些客人。

“拿一些淡酒来！”捷劳巴尔对女人说，“马上拿一坛来。”

这女人没有陪我们进屋，西克萨伊在前面领路，后面是卡尔曼。他们象到自己的家一样随便。我们来到了临街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摆满了笨重的、雕花的家具。地板上每一块地方都铺上了厚厚的波斯地毯。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一架钢琴，在它的两侧放置着老式扶手椅和沙发。整个房间显得整洁、舒适，家具光洁鉴人。有一个姑娘蜷缩在长沙发的角落里，在看什么书。当她看见我们进来时，就站立起来伸伸懒腰，活象一只猫。

"我还不认识你呢？"她对我说道。

我没有回答，仍旧啃着我的桃子。

"我和这些人都已经睡过好多次了。"姑娘说道，"要陪你睡一觉吗？"

我看了卡尔曼一眼。他们在捧腹大笑。女孩子也笑了，并向这群人挤眉弄眼。我转身走到院子里。夜幕已经降临。这个院子里也有桃树。我摘了几个桃子，然后信步走到马厩，来到男主人的身边。他正在喂两头乳牛和几匹马，同时在做挤奶的准备工作。我指着乳牛问：

"奶多吗？"

"多。"他答道。

"这牛奶是送到市场上去卖的吗？"

"对。"

"你们还没有参加合作社？"

"参加了。"

"那家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牲口？"

“这些牲口秋天也要进合作社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找到烟，然后递给老头让他抽。他没有接。

“你们生产组只是在秋天才集中起来？”我问。

“是秋天。”

“您种了很多葡萄吧？”

“很多。”

“多少？”

“十五霍尔特。”

“雇人吗？”

他开始挤奶了，再也没有回答什么。我又继续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但他不予置理，只管挤他的奶，好象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无奈我只好走回房间。这时，他们已经把地毯都卷了起来。捷劳巴尔搂着那个姑娘在跳舞。卡尔曼坐在钢琴旁边，敲打着琴键。干瘪脸的妇女拿来了酒，默默地给每个人端吃的。不时地请人喝酒。当每个人都侍候到了后，就退到门边，问：

“同志们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西克萨伊哼了一声。

“如有什么事，我就在厨房里。”

我走到卡尔曼身边。

“这些人真奇怪。”我说道。

卡尔曼挤了挤眼睛，笑了。

“是富农嘛！我已经说了，不是吗？”

“他们已经参加合作社了。”

“原来，要不是我们的这个捷劳巴尔，这老头在拉科西时代起码得蹲上一两年监狱。捷劳巴尔显了一下神通，从此，他们就感恩不尽了。”

“这点我可看不出来。”

“这种报恩是需要挤出来的，我的老伙计。”

我吞下了好几个桃子。

“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吗？”

“不是他们的。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医生。从来也不回家，好象连在上帝面前都不打算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个姑娘叫佩尔尼斯·贝尔塔。咱们村里也有她家的一座庄园，你不知道吗？”

我看着姑娘。

“这个富农当年是她家的差役。”卡尔曼说，“当姑娘的父母去世后只剩下她一个人时，他们把她收留了。这姑娘除了男人，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性欲强烈。”这姑娘比我们要年轻几岁。记得我九岁时，曾给他们家打过短工，割薄荷草。一星期只拿三个本戈。那时候，这女孩离我们老远，由两个侍女照看着。她们不断地给她换新服装，雇工们连靠近她都不允许。

贝尔塔走过来，按着我的肩。

“怎么样？”

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她的嘴角边已经出现了早衰的、深深的皱纹，但姿色未减，看上去仍然很有丰韵。

“刚才我问你什么来着？”

我兴趣索然，只是不知道，还将去哪儿。我问卡尔曼：

“什么时候回家？”

“还早着呢！”卡尔曼说。

奥巴菲·阿培尔把贝尔塔请去跳舞。房间里尘土飞扬。卡尔曼在弹钢琴，其他人给他伴唱。

约莫半夜时分，他们还在大声喧哗。干瘪脸的老太太进来说：

“对不起，我的家可不是酒店。”

“喏，那又怎么样？！”西克萨伊道。

“我只是提醒一下，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我的家毕竟不是酒店。”妇人说完扭头就走了。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我又一次问卡尔曼。

他没有理我。他沉醉于自己的钢琴演奏当中。其他人围聚在他的身边，又是喝酒，又是唱歌。我离开屋子走到汽车里。司机躺在前座上睡觉。我就在后座上躺了下来。大约是四点钟光景，我被他们弄醒了。此时天空呈鱼肚白色，已是黎明时分。他们又大声地喊醒了司机，问我们：“见过奥巴菲·阿培尔大叔没有？他已经无影无踪了。”他们非常认真地、一口咬定他走失了，要我们一起去寻找。我们在阁楼上、院子里、井里都寻了一遍。可别是醉后出事了吧？！后来我突然想起了佩尔尼斯·贝尔塔。

“姑娘也失踪了吗？”我问。

“我们俩已经满足了她的要求。这会儿早就睡着了。”

卡尔曼满意地微笑着说。

七点钟左右，我们在达姆村政府大楼门前找到了奥巴菲·阿培尔。他被一群孩子围着，正在寻找自己的帽子。他哭着说道：

“帽子原来是在我头上的。孩子们，你们告诉我，该到哪儿去找它？”

小孩们嘻嘻哈哈地在笑他。

我们把他拉进小车，大家一起出发，准备把这位托洛茨卡依人送回家去。在半路上，我们又遇见了一个小的造酒作坊。

“我们进这儿去。”卡尔曼说。

“不行！”托洛茨卡依合作社主任说，“我要请你们吃午饭。”

“那么，车先送你走，去准备午饭。我们留在这儿。待会儿小车再回来接我们。”

这时，我想，我虽然是客人，在这时候说几句恐怕有好处，于是就喊道：

“难道你们不认为该回家了吗？”

“你怕什么？”卡尔曼说，“我们早晚会回家的。就说车坏了，这样不就行了吗。这，谁都会相信。你急着要上哪儿去？”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多尔格伊酿酒工厂。工厂领导派了一个女工来招待我们。她和那个富农的老妇女一样：有一张干瘪的脸，斟酒时也一声不吭。我没有喝，况且我也不

喜欢烈性酒。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卡尔曼他们昨天一整天、一通宵喝了那么多酒后，怎么现在还能灌下去这么多。于是我问：

“真奇怪，你们怎么还能喝得下去?!”

“你真是不识货。”捷劳巴尔说，“这才是真正的酒，我的老伙计！”

午饭前，总算到了托洛茨卡。在合作社大院后边一个背阴的地方，一个老农民正在大锅里煮牛肉。他往牛肉里浇了许多红葡萄酒。我在他身边站了很久。我的胃神经不断地抽搐，一时不知道干什么好。

“这是您的拿手菜吧？”我问。

“嗨，”老头说，“四十年前，我就已经给贵族老爷们做这个红葡萄酒烧牛肉了。”

他边说边笑着。

我想，只要是老爷，他大概都给做这拿手菜吧。不错，这老头记得多清楚啊！突然，我真想喝得酩酊大醉地倒在地上，让恐惧和战栗控制着我，就象一头被送往屠宰场的小牛一样，我真想象条狗似的尖吠几声。

“这锅为什么要安放在这样隐蔽的地方？”我问老头。

“必须如此。”他轻轻地说，“这样可以不让人闻到这股沁人的香味了。因为……否则他们就会嚷嚷起来。嗨哟哟！有一次，村里有人写揭发信到什么地方告来着，可是到头来怎么样？他们把信又转回来了。西克萨伊等同志就下来检查。只有疯狗才会去咬主人的腿肚子，对吗？嗨……”

我想，那条狗也可能会发一次疯。

我离开老头时，发现身后站着卡尔曼，在听我们的谈话。他突然对我笑了一笑说：

“喏，怎么样，一切都还满意吗？”

我们吃着小牛肉，喝着酒。

晚上九点钟我们回到了昨天挨暴雨淋的那个村子。车停靠在专门做鱼的饭店前面。我带着讽刺的口吻问他们：

“我们还进这里去吗？”

“现在正是安安静静地喝些啤酒的时候。”卡尔曼说，“然后咱们就结束这次旅行。你的胃难道不需要来点啤酒吗？”

“可能会需要。”我说。

“你不懂得享受生活，亲爱的老弟！”卡尔曼说，“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和真正的生活完全隔绝了。只是在布达佩斯谨小慎微地搞些空头宣传。你们那样的日子能叫做生活吗？你看看我们！”

我们走进饭店要喝啤酒。一个年轻的服务员说：“啤酒没有了。”

“叫你们的领导来！”西克萨伊说。

饭店领导马上就来了。当他看见我们这群人时，连忙点头打招呼。

“有啤酒吗？”西克萨伊问。

“有。”店领导说。

“我们想喝点。”

“当然可以。”

顾客们开始注意起我们。饭店领导走到饭店乐队前说：

“营业时间结束。”

其中有一个顾客大胆地问：

“什么，什么！到十一点才关呢。”

“上级检查工作。”店领导解释说，“突击检查。对不起，请在十分钟内离开。”

这时，我实在按捺不住，高声地问：

“检查人员在哪里？”

店领导睁大着眼睛看着我，张口结舌重复着：

“在哪儿？”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卡尔曼他们也愣愣地站着。我走到人群前说：

“没有什么检查，大家尽管坐着。啤酒也还有。”

我又看了一下饭店的领导人。

“有啤酒吗？”

“有。”他说。

我走回到卡尔曼他们身边。

“你抽风了？！”西克萨伊说。

“请坐下喝啤酒。”我说。

他们呆呆地而又顺从地坐了下来。喝完一升啤酒后，再也没有兴趣坐下去了。

汽车里也是鸦雀无声，安静得出奇。

走过一半路程后，卡尔曼开口了。

“你怎么啦？”他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我真不理解你。不顾自己利益的人是傻子。在这儿，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攒下半个月的工资。你想拒绝这样的好事吗？我们都是头头，不是吗？除了权，谁对别的东西感兴趣？”

我没有搭理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汽车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个地送回家。分手时，西克萨伊连“再见”都没和我说一声。捷劳巴尔显得还没有这样生硬。最后只剩下我和卡尔曼两个人。他住在小树林那边的别墅区里。连对车内的气味我都感到厌恶。我摇下来玻璃窗。当车停下来的时候，我对卡尔曼说：

“你的住宅真漂亮！”

“是的。”他答道，“现在只剩下捷劳巴尔·伊姆雷还没有住宅。不过他很快也会有的。已经有眉目了。也许你愿意把准备给他的先让给你？”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

“脑子清醒点！”

的确，我也是一个国家干部。但我想，我怎么能和这些人沆瀣一气呢。究竟怎么样生活才能不让人们朝你翻白眼呢？

卡尔曼弯着腰对司机说：

“你把我的朋友送回家去。”

司机没吭声，拐了一个弯把车开走了。我一个人坐在车内。司机沉默了半天，开口道：

“我的上帝，我已经一个晚上和两个白天没有吃过热饭，没有喝过水，也没有睡过觉。早上六点我还得去上班。”

我下了汽车，剩下的路还是步行舒服些。一共才八公里路，没关系。

当我回到家时，天还没有大亮。我在外面过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向玛格蒂说好呢？如果我一开头就告诉她准备留在这里工作，也许可以避免一场吵架。但吵不吵架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此时我的脑子里没有别的，只有两个字：“天哪！”

火车被风雪阻挡住了。一次又一次挣扎着的机车头震动着整列火车。我们默默地望着车外的景色。寒风卷走了雪堆顶上的雪花，把它们吹得远远的，远远的。我俯身窗边问鲍洛格·伊斯特万：

“这些人现在在哪儿？”

他看着我，很久没说话。当机车又平稳下来后，他说：

“每一个人都在，都在某一个地方。”

曹巍清 译

# 住在半层楼的人家

高尔戈齐·伊丽莎白

半夜，男朋友走了，薇罗尼卡往身上裹了条毯子，"总算可以睡一觉了。"突然一阵敲门声，她头昏脑胀，连生气也没有力气，缓缓地移步到房门口，打开一条缝。在永不断人、吵吵嚷嚷的走廊里，紧挨着她的门口，挺挺地站着博格纳尔家的小扬奇，两只手紧紧地贴着大腿。门缝里透出来的灯光照着他柔软而杂乱的黄发，孩子温顺的眼睛期待地张望着，然而立即不好意思地垂下长长的睫毛，结结巴巴地说：

"妈妈问，薇罗尼卡阿姨能借我们两百福林吗？四号还。"

薇罗尼卡木然望着孩子，试图弄清今天是几号，到月底还有几天；还有：博格纳尔家是不是还欠她钱，也许已经还了一部分，或者居然全部还清了？……可是她终于发现，在此刻想弄清这些远非她脑力所及。"天哪！"她投降似地叹了口气，昏昏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塞到不敢抬头的孩子手里，然后顺手拧上钥匙，切断了喃喃的感谢声，重新扑到床上。

"连五点钟还不到，这群东西，还是星期天呢……"她睡

着了。

又是一阵敲门声，头倒是不昏了，可是她实在怒不可遏。

“谁？”她厉声问。

“是我，小扬奇。”传来银铃般的童音。

“什么事？”

“妈妈让我给薇罗尼卡阿姨送一杯咖啡。”

“真见鬼，”薇罗尼卡想，“我一猜就不是还我一百福林来的。”看看表，八点一刻，她平静下来了。

她打开一条门缝，咖啡的清香扑鼻而来。孩子郑重其事地捧着小小的咖啡杯，长长的睫毛还是低垂着。

“是妈妈叫我给薇罗尼卡阿姨送来的。”这个九岁的小男孩稍微抬起了眼皮，脸红了。

“谢谢你妈妈。”

孩子转身走向走廊深处，薇罗尼卡在后面叫住了他。这条走廊和昨天一样，和去年一样，也和五年前并无二致，它永远使人想起修马路时破土的钻机和霍尔多巴吉平原上驰骋的马群。

“小扬奇，你给我去买一趟报纸好吗？”

孩子轻松地笑了。

“要三种？”

“对，就是常买的那三种。”薇罗尼卡除了报钱以外还多给了两个福林。

把喝干的咖啡杯放到桌上，一天便开始了。点上一支

烟，为了抵消走廊里涌进来的喧闹声，她打开了收音机，然后推开窗。从电影院沥青房顶上轻轻袭来的温热空气以及远处市廛的嗡嗡声显示着盛暑即将来临。入夜，即使再热，她也不敢开了窗睡，因为蟑螂会缘着水檐爬进屋里，而且人也可以从电影院的房顶上溜进来。屋子没有铁栏杆，百叶窗已坏得没法再修了，尽管邻居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多次自告奋勇要帮她修理，但她没有同意。在住到这里以来的五年里薇罗尼卡努力想把这间四乘五米的屋子布置得有点家庭气氛。一口三开门的大衣柜和一块布帘子把脸盆、两个水桶、小电炉、毛巾和扫帚这类东西挡了起来。剩下的地方摆上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既是卧室又是会客室。床后面是一张低级壁毯，墙上安着一个工艺美术品锻铁书架。科马迪·巴拉日送的一块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抄来的）刺绣桌布装饰着床头柜。如果这间小屋处于与世隔绝的灯塔里，她在其中倒也是得其所哉，可是象现在这样被嵌在多子女的宾德尔家和不断更换妻子的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家以及喧闹的走廊和电影院的沥青房顶之中，则宛如陷进一只由噪音组成的捕兽笼子里了。

薇罗尼卡披上一件家里穿的旧衣服，在电炉上做一点洗脸水，提起两只空水桶沿走廊向公共盥洗室走去。

根据守门人哈奈什大爷的说法（不管这话是否可靠，但派出所对他所提供的情况历来是重视的），这个半层楼在解放前是房地产经纪人的一个办事处，到了五十年代初，房地产交易被禁止了，于是这些锁得不严、没有加封的办公室慢

慢地被一些无房的人占用了。房间相当大,还铺着地板,可是距此仅有一臂之遥矗立着的有三层楼那么高的防火墙以及锅炉房终年不绝的缭绕烟尘使这些屋子永远处于昏暗状态。走廊也是地板的,尽头是两扇弹簧门,把它和嵌着紫色瓷砖、空气流通的楼梯隔开了。沿着走廊是十二扇白色的——准确地说,是当年漆成白色的门。门上装着磨沙玻璃,里面各是四乘五米的屋子。住在这里的人家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睡觉、做饭、洗脸、洗衣服、晾干、洗澡、写作业、玩耍、吵架、喝酒、打牌、听收音机、繁殖后代、接待客人、干私活、生病以及教育孩子或进行自杀。房间是用薄薄的纤维板隔开(或者不如说联起来的)一有风吹草动,声音不但如实透过这其薄如纸的"墙",甚至有如洋琴的音箱,在这所有的半层住户们的房间里反而加大了音响效果。每当某人长叹一声,隔壁的门帘免不了总要颤动几下。

薇罗尼卡属于在这四乘五米的笼子里生活的第二代住户。一九五六年外逃的浪潮中,她的一个同学趁机占据了这间屋子。这个同学在结婚后住到一个两间一套的单元房子里,便把这间屋子转让给了她。在当了十三次房客以后,有这一间屋子无疑是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可以不再俯仰由这人,而是可以任自己安排生活和以自己的方式排遣寂寞了。

住在这半层楼的人们得到房子都非正道,无怪每隔半年就收到区里的通知,限他们在八天之内迁出住所,否则届时将强制执行。每逢这时,那些从未上过贵族学校学过"妇

道要则”的年轻妈妈们就带上全套子女——从婴儿到小学生，就象残废军人佩上奖章和支着拐杖一样，在区政府房管局门口闹出耀武扬威，集市场、当铺、殡仪馆和示威游行效果形成大群的人声鼎沸的场面，以致房管局神经衰弱的女局长（不但这半层房屋属她管辖，她治下还有许多临时建筑、商店用房、储煤仓库以及只要人离开半小时老鼠就会出来咬婴儿的很难给予肯定名称的住人的地方，因此得上这个病就在所难免）被迫只好嚎啕大哭躲进男厕所（因为那里妇女们不能去），于是房屋居住许可自动延长半年。

就这所建筑物本身来说，本来倒是相当高级的——楼梯宽阔平坦，两旁是漂亮的瓷砖，梯级的凹处还留着一两根早已生锈的当年别地毯的插棍，门洞一边钉着一块搪瓷牌子，上面书有“仆役差佚只准在后门出入”的字样。这块牌子二十五年来一直安然无恙地留在那里，好象并没有使任何人不舒服。

走廊两边十二扇安着磨沙玻璃的门，大多是虽设而不常开。弄不清楚本来是什么颜色的地板在往来奔跑的孩子们脚下大声抗议着。薇罗尼卡有时想算算这里的孩子是房间数的几点几倍，可是当她弄清楚时某一间屋里又会传来哇哇的哭声，报导着儿童队伍的扩大。每当薇罗尼卡提着两只水桶到盥洗室去，孩子们总是一见就向这位穿蓝衣服的阿姨大声问好，然后安静地靠边一站。他们知道，这个和气的阿姨的口袋里总有一小袋止咳糖。米科维尼·绍尼斯洛现在是单身（薇罗尼卡认识他的第四房妻子），可是他的

门里经常传出多声部鼾声。对他来说，每个酒店都是令人发指地过早结束营业。家徒四壁的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常常和他的酒友和来历不明的女人在这里通宵狂饮。他们先是含糊不清地哼着民歌，之后是打架，最后则是全部被酒精征服倒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不停地重复着这个程序。对米科维尼来说，世界上不存在丑女人，也没有坏酒。一贯以忠于职守著称的守门人哈奈什大爷过去在这时候就会去敲敲门，请他们遵守政府关于入夜禁止喧闹的规定，但是里面的醉汉们便会把他硬拉进去，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后来，这位瘦弱的老头作了胃切除手术，他也就听从老伴，不再去干涉了。有时候间或从楼上下来一位男的，请他们安静点，米科维尼就会慢慢地搔着毛茸茸的胸口，瞪着对方的脸大着舌头说：

“就算，就算给你放……放映电影晚场，政府顾问大人！”

薇罗尼卡迁来的时候，五大三粗的米科维尼自告奋勇，又是抬大柜，又是主动要修理百叶窗，在墙上掏窟窿安放架子。他嘴里叼着钉子拍着胸脯说：

“我对几个妻子都说过了，薇罗尼卡，您也听听：如果我死了，不要埋掉我，而是要把我倒挂起来，在嘴里塞条灯芯，我就会象长明灯一样一直烧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不知怎的，他浑身散发着的酒味给人一种感觉，仿佛他确实能做到这一点似的。

对面的屋子开着门，科卡尔达什·露易莎把桃红的裙

子卷到齐腰，跪着在刷地板，右手往来疾动，象是在切白菜丝。在屋里某个隐蔽的地方传出来斯特劳斯《莎乐美》里的咏叹调。这位双层下巴的胖女人、三个孩子的母亲，挤着嗓子跟唱片里的女高音一起唱，可是到了高音C附近时力不从心，突然象云雀中弹似地一下子掉了下来。科卡尔达什·露易莎——赫林考·拉约什妮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去年圣诞节弄了个来历不明的电唱机。薇罗尼卡之所以认为它"来历不明"，是从赫林考的大发雷霆并把这电唱机连同盒子一起从屋里扔出来这点推测出来的。但是负责修理所有住在这半层楼各户的电视机、收音机和一切电气设备的宾德尔·尤若夫甚至还在当天就给她修理好了。露易莎只有一张唱片，是一个沙嗓子的女人唱自己怎么失恋，又是怎么不能忘情的一支歌。这张唱片从早放到晚，从星期一放到星期天。薇罗尼卡在几个星期以后不堪忍受，决定处决这个女歌手，她从自己的唱片堆里挑出一张蒲奇尼的《蝴蝶夫人》咏叹调，换来了那颗破碎的心，然后用鞋跟把它踩成碎片。可是"好曲不过三遍唱"，蝴蝶夫人由于无休止地咏叹也慢慢地使人憎恶了，更何况是两部咏叹。因为科卡尔达什·露易莎总掐着嗓子一起唱。就这样，露易莎的唱片多了起来，而薇罗尼卡的就慢慢地少了下去。现在《莎乐美》也已经放了三个星期，又到了该换一张的时候了。

塔尔考·埃莱梅尔家的生活也以星期日最为生动活泼。节日的饭菜在一个火眼的炉子上卜落卜落地冒着泡，洗衣盆里浸着床单被里，绳上搭着刚洗完的尿布，姥姥在敲

核桃。那位一家之长只能在这一米半宽的走廊里割据一席之地做自己的活，这里至少没有尿布往他头上滴水。

“您好，”薇罗尼卡回答了塔尔考的问好，“您又在做什么新玩意儿了？”她漫不经心地看着塔尔考的球形锤子、管形钳子、钢锯、手钻和枣红色的铜板以及漂亮的小铆钉。锅炉匠塔尔考的工具在铜板上加工发出的时而尖厉时而粗重的声音，宛如一首被说成是代表时代潮流的现代音乐作品。

塔尔考抬起头来骄傲地回答：

“做结婚用的水果盘。”

凯尔泰什妮在一把椅子上拍打着孩子的那条几乎已经分崩离析的毯子，她装得象是根本没有看见薇罗尼卡一样。两年以来她对薇罗尼卡就是这个待遇。薇罗尼卡两年前曾经去过一次外地，回来后发觉屋子有点变样，仔细一看，什么东西都不在原地了。大柜虽然没有动，但是里面的羊毛头巾没有了，电唱机和唱片也不翼而飞。台灯、收音机、塔尔考送的红铜烟灰缸，单位上发的奖品——细瓷花瓶以及祖母的老式木框镜子都一一销声匿迹。除了收音机，其他东西都被凯尔泰什妮装点了自己的屋子。至于收音机，因为她只有一间屋子，用不着两个，便把它处理了。后来警察局在当铺里发现后查到了她。薇罗尼卡可怜她家的三个孩子，在审讯的过程中坚持说不可能是撬锁行窃，只怪自己忘了锁门。凯尔泰什妮被判三个月徒刑，缓期执行。从此以后对薇罗尼卡就是现在这个态度。

走廊底是第十三家住户——欧尔纳特·本尼迪克副教授的岳母阿纳斯塔季娅老奶奶。这里的四十多个居民都叫她"菠萝奶奶"①。老人家住的是一间不透风的屋子（它早先本是一口保险柜），成天需要开着门。屋子三米见方，门、墙、房顶以及地面都是铁的。老太太整天在保险柜门口坐在一把雕花扶手椅里，用一只波斯小凳搁着脚。薇罗尼卡还从来也没有见过一张比这位老人更为洁净的脸。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缓缓起伏的一头银发，配上干净得无懈可击的黑衣服，总是引起人们的敬意。随着岁月的消逝，老人越来越显得瘦弱，但是浅蓝色清澈的眼睛依然传递着生命的信息。象一个刚受过第一次祝福的孩子那样，戒指也被捏得很细，免得从手指上滑下来。保险柜里整天点着用一根铁丝吊着的灯泡，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屋里除了一张镂刻得很精致的床以外，还有一只三条腿的脸盆架，以及一个带镜子和几个小抽屉的梳妆台。

"菠萝奶奶，"薇罗尼卡把水桶藏在背后有礼貌地向老人问好："您好吗？"

"早上好，亲爱的！就是太吵闹。还有点憋气。"老人精神恍惚地回答。

"还没来修窗户？"

"上面说什么也不许我碰，因为这里反正早晚要改成办公室。"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说的。"薇罗尼卡在这里

① 阿纳斯塔季娅和阿纳纳斯（菠萝）的音接近。

住了五年，可是一直并不明白这老太太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对老太太来说，这个半层楼无疑是她一生中的最低点了，然而对薇罗尼卡来说却是升了一级，是向自己有房子靠近了一步。自己的房子!？科马迪·巴拉日为这事跑了好儿个月，自己还缴纳了好几万福林的统建储蓄金。科马迪在建筑公司工作，通过他能缴上这笔钱作为有朝一日弄到房子的第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是一年、一年半过去了。再过五年是不是有希望？没关系，那一天总是会来到的！每当一念及此，甚至那三个其脏无比的马桶和那唯一的水管也似乎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说起水管，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现象：不流、半堵或者流了关不上。水管周围永远是一汪水，就象露天牲口饮水槽一样。于是楼下那电影院的顶棚常常因为积水过多而塌在观众头顶上，不免是急救车、消防队蜂拥而来，数人受伤……当然，重大事故的调查中免不了有医生，医生也总要到这半层楼调查一番。调查报告中也从来少不了有这么一句："该半层楼不宜住人。"

薇罗尼卡回到自己的屋子，新鲜空气代替了原来盘踞着的白菜、尿布、葱和烧酒的混合气味和卷宗的带有神秘气氛的旧纸气，可是喧闹声依旧。收音机里的贝多芬音乐作品被穿越薄薄的墙壁传过来的隔壁宾德尔夫妇星期日例行口角弄得面目全非。宾德尔·尤若夫和他的妻子艾尔薇拉平日见面不多，因为这位电视机修理匠平日下班后干私活总要到后半夜才能回家，夫妻两口的家庭生活便归结到只有星期天，于是谈话的时间没有了，只剩下吵架的工夫。至

于吵架的主要内容和用语，薇罗尼卡大体上也是熟悉的：“……不错，你就是这路货，和你妈一样。你们兄弟姐妹四人，爸爸倒有八个……你们家在马尔科街[1]有专用房间……”“你老实交待，他是谁生的？是你哪一个姘头的孩子？……”“你弟弟现在还拘留着呢……”“你这里来来往往的人比西火车站的乘客还多。”这时，四个孩子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往往会以某种形式打破父母忘我的境界，但紧接着便会突然尖声哭喊起来。这时薇罗尼卡便猜：打他了？拧他了？烫他了？……

另一个隔壁，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家过夜的酒友在咳嗽、清嗓子、在打嗝、恶心、打咽、咒骂，有的人在呕吐后发着轻松的叹息。突然传来玻璃落地的声音，原来一个最热心的客人想到下面脏得举世无双的“宪法酒店”再去买一些酒而撞在门框上了。至于这家酒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来除了帝国主义派到社会主义饮食业的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薇罗尼卡扫完地，收拾一下屋子以后脱了上衣，在盆里洗脸。有人在敲门，难道科马迪·巴拉日这么早就来了？他本来说上午要到奶奶那里送孩子。当然，科马迪经常信口开河，甚至不妨说他常爱撒一点谎。倒不是那种后果严重的弥天大谎，而是那种日常琐事中的瞎说。薇罗尼卡实在弄不懂他编这种小谎话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能得到什么？薇

① 布达佩斯的监狱所在地。

罗尼卡赶紧裹上一条大毛巾，把门打开一道缝。巴拉日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下的走廊里站在薇罗尼卡的门口，而她也不愿在邻居面前公开这个关系。

在走廊的吵闹声和混浊的气味中站着一位年逾耳顺的人，是被米科维尼·绍尼斯洛统称之为“政府顾问大人”的楼上住户中的一个。刮得发青的脸上散发着香水、牙膏和烟丝的气味，挂着甜腻腻的微笑。

“小姐，您好，您的电话。”

薇罗尼卡也回以微笑：

“我就去。”然后轻轻地把微笑关在门外了。

她穿上一件薄绒衣，走到二层。这地方她来过不止一次了，在那三大间一套单元的起居室里老先生和电话在等着她。屋里陈设着她祖母那一代流行过的高级宽大沙发，靠背和扶手都是黄缎子，墙上是金色雕花框子的油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银盘子上放着几只玻璃砖酒瓶和杯子，瓶里是琥珀色的酒。老先生穿着蓝色绸睡衣，外面罩着驼色便袍，趿着精致的皮拖鞋，两只脚交叉着斜倚在沙发里。“我们祖父一辈比我们善于享受多了，”薇罗尼卡想。老先生细巧的嘴上含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打量着正在打电话的薇罗尼卡。

“小宝贝，你好吗？”

“我很好，阿姨，亲你。”薇罗尼卡向主人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表示这个电话短不了。老先生点点头，指了指身边的沙发，但是薇罗尼卡没有坐下。

“漂亮的心肝，你真的什么都好吗？你的头发做得好吗？”

“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工夫照镜子。阿姨，你吃饭了吗？”

“我在吃，心肝。只有有钱人才能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我是一面给你打电话，一面洗澡或者扫地，还要擦桌子，煮咖啡，把洗过的衣服收起来，还要打鸡蛋，给贝拉补裤子，给我的老爸爸写信，还要做学习匈牙利哥特式建筑史的笔记……”

“就是说你在吃饭。”薇罗尼卡打断她的话。

“小鸽子，你吃过了吗？”

“饱了。喝了一杯咖啡，还有一肚子烦恼。”

“烦恼？不管怎么说，你不饿。你愿意到我们家来吃午饭吗，小泥鳅？”

“今天？……今天不行，因为……”

“我买了一公斤排骨，两袋冷冻豆，做了一锅好汤，汤里还兑了一罐猪肝酱，可是贝拉不爱吃。凡是隔一顿的东西他都不爱吃，可是光是我一个人就得吃到下星期，东西就会发霉。他的胃一点毛病也没有，可就是不吃。我要是有他那样好的胃、那样好的胆和腿就谢天谢地了。本来嘛，男人都穿长裤子，腿长得再好看，象芭蕾舞演员也没有用。他说，他在农村干了二十五年，罐头食品吃腻了，现在哪怕是在橱窗里看见罐头，也会嘴里起泡。亲爱的，这样的过敏症我可从来也没听说过。我还买了两块里脊，这你爱吃，对

吗？还有牛奶和干酪，还特意给你买了两瓶‘拉德贝格’牌矿泉水，我自己只要‘克巴尼奥’牌的就行了。当然，‘克巴尼奥’我是非喝不可的，因为喝它可以防止发胖。夏季衣服我都拿出来了，那套乳白色的西服也拿出来了，就是施瓦茨妮卖给我的。你认识吗？就是那个七十六岁的老板娘，真奇怪，她一颗牙也没掉。儿子比她小二十岁，可是已经发生了十二年乱伦关系。这件西服系不上扣子，两个都靠退休金过日子的人哪有钱做新衣服！贝拉买了面包，却又忘了小苏打。嗯，奶油我也买了，还有青豆，拎到家胳膊都快断了。贝拉算过了：从市场到家，上的坡有六层楼房那么高。上帝啊，他象水牛一样壮，可就是不爱买东西，宁可吃面包和干酪。他不但不爱买东西，连门也懒得出。如果只是街上有厕所的话，我想他宁可憋着。哟！咖啡潽了……”片刻之后，“你等一等，小可怜见的，我把咖啡给贝拉送去，这就是他的早点、午饭、点心和晚餐了。”

老先生吸着雪茄，柔软的脸上露着善意和满足的笑容，把报纸放在怀里看着薇罗尼卡。

“您知道，”薇罗尼卡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的阿姨患失眠症已经二十五年了，所以一清早总免不了有许多抱怨的话……”

“不必介意，小姐，我很高兴为您效点劳。”老先生微笑着，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烟盒请薇罗尼卡吸烟，然后给她点上火。“听您刚才说还没有用早点，我可否请你喝一杯科涅克酒？”

"谢谢，不了，我只是在晚上喝……嗯，我在听着哩。"

"亲爱的，出了点事故，啤酒瓶在冰箱里炸了，贝拉正在发脾气。再见，你几点钟来？"

"阿姨，我今天不去了，因为要和巴拉日一起吃午饭。下午我给你打电话。问贝拉叔叔好。"薇罗尼卡赶紧放下听筒。

她向老先生笑了笑，对打扰了他半天表示歉意。老先生送到门口，看得出来，如果薇罗尼卡伸出手来的话，他是十分乐于吻一下的。

几年前当他第一次踱下楼梯来到这半层楼请薇罗尼卡接电话的时候，曾经开门见山地建议把自己的一间屋子让给薇罗尼卡。说他自己丧偶多年，早已成年的儿子在蒙特利尔[1]，自己的退休金相当可观，甚至还暗示，作为一个男人，能力也还过得去。房租当然不需要，相反，他的妻子还留下不少皮大衣、绸衣裙，还有花边……。薇罗尼卡认识几个外地来布达佩斯的女大学生，为了房子，和老头结了婚。但是这位住二楼的老先生没有提正式结婚。薇罗尼卡倒是欣赏她过去一位同学说的话："我在米什科尔茨教书的时候住在卫生间里。"

打完电话回去，宾德尔的妻子艾尔薇拉紧贴她的门上站着。这位漂亮的金发少妇好象还不到二十岁，隔壁的四个孩子就是她的。

---

① 加拿大的城市名。

“你有空吗？”

薇罗尼卡手里捏着钥匙——即使到水管提水，她也锁门。

“怎么说呢，艾尔薇拉……”可是少妇已经一闪进了屋子并在中央垂手站住了。在半层楼住户中薇罗尼卡是给谁也不让座的。即使这样，也还是不断来打扰她，占她的便宜，揩她的油，就好象蝗虫啃庄稼似的。要是客气点，还得了吗？

“我怀孕了。”少妇抱怨说。

（谁知道是哪个相好的……？）

“格拉贝尔说，他可以给我打掉，可是有点危险，因为已经有三个月了。”

“我不帮她这个忙。”薇罗尼卡恼怒地想。她都记不清艾尔薇拉已经欠了她多少钱。艾尔薇拉会说，她男人会还的，他会修电视机、冰箱和吸尘器，会安插座，会修电刮胡刀，还会修吹风机和电唱机，录音机也会修，甚至空调机也没问题。可是薇罗尼卡没有这些设备。

“你能借我三百福林吗，薇罗尼卡？”纤弱的少妇低声问，她准备立即掉眼泪了。

“你为什么不向你丈夫要，艾尔薇拉？”

“他不给，”宾德尔妮愤愤地说。“他说不是他干的。他说，他总是注意的。其实他从来也不注意。他说，如果他不……，他第二天就干不了活。他说他要的是妻子，不是床单。”

薇罗尼卡满脸绯红，激怒得感到体温在上升。

"艾尔薇拉，我搬来的时候你们的小萝莎刚半岁，那时她老是哭。我问，孩子要多大才会除了哭还能干别的？你说，慢慢地就到那一天了。从那以后你为了做流产借了我五次钱，结果还是生了三个。告诉你，是四个，还是五个孩子在隔壁哭，我是无所谓的，反正一样都是闹。你生吧，生一托儿所我也不在乎。"

艾尔薇拉没有生气，也不吃惊，哭的打算也已经烟消云散，她显得异常镇静，象是参加一场谈判。

"这一次我真的还你，薇罗尼卡！我弟弟说了，下星期他给我钱，他最近要有一笔收入。"

"艾尔薇拉，那你下星期去动手术！"

"你借二百福林也不行吗？"在沉默了一会以后，艾尔薇拉试探地说。

"月底了，艾尔薇拉，我没有钱。"薇罗尼卡结束了谈话，抓起一份报纸来看。艾尔薇拉没有表示怨怼就出去了。

但是在薇罗尼卡心中却引起一阵轻轻的内疚。"如果我给她二百福林……她会不会为了那不足的二百福林去当妓女，到宪法酒店去拉客人？"科马迪·巴拉日就在楼梯上被拉过一次……科卡尔达什·露易莎的丈夫在外地安装煤气，每逢星期六就象疯子一样冲回家来，好象也有点事出有因。"这个露易莎，给她喝一杯咖啡就肯陪人睡一觉。"艾尔薇拉是这么说的，同时自我标榜说："请你相信，我从来也没有在一百福林以下和人家躺过。"每当此时薇罗尼卡不知道

是掉泪好还是发笑好。"别这样，"薇罗尼卡无可奈何地说，"一个女人总该有点身价。"

"她今年二十岁，也许是二十一，"薇罗尼卡怜悯地想，"生了四个孩子，人工流产做过九次，说不定还要多些。一到三十岁恐怕就全毁了。"薇罗尼卡自己现在是三十岁，在首都生活已经十二年，换了十三个地方，都是当房客，住私人出租的房子。交了几个男朋友，头一个是大学同一年级的学生，两人象未婚夫妻似地过了三年，后来男的突然不告而别，娶了盖勒特旅馆的一个女招待。从此以后的朋友都是曾经结过婚的。她有时甚至觉得布达佩斯的男人生下来就是结过婚似的。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虽然学图书馆管理和工科或农科学生一样也得过五年清苦的大学生生活，可是就业后工资要低得多。尽管这样，她还是从嘴上、衣服上、甚至不惜牺牲健康省下了两万福林，托巴拉日投在住房统建储蓄金中(如果他真替她存进去的话!)为的是也许有朝一日自己能有一套房子——直接从国家那里租的房子!那里没有这样的磨沙玻璃门，而是里面安了保险链的，上面有警眼、有信箱、有电铃。对于这样的房子薇罗尼卡甚至连想象都有点想不具体，只是在心灵的深处，在凌驾于一切欲望之上的地方有一个恍惚的东西，这东西对她说来意味着自由和幸福。

尽管自己诸事不顺，可是……如果把住在这半层楼的人家逐一排过去，自己毕竟还能给感到屈辱的小扬奇手心里放上几个福林，可以对科卡尔达什·露易莎的风流韵事

发表一点感想，有兴致和欧尔纳特·本尼迪克的岳母在保险柜里挨一会憋，还可以充当艾尔薇拉的保护人出钱给她刮子宫，至于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呢，典型的行尸走肉，更是不值一提了……可见，自己似乎还不是那么倒楣。也许自己可以象一颗子弹头长在肉体里一样心安理得地在这群人中间生活着，可是她做不到。在这里她总感到象有无数只有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的小虫子在皮肤上爬着，需要不停地去搔。

科马迪·巴拉日一如他本人素来习惯的，然而却又是薇罗尼卡所无法习惯的——赴约迟到了。可是他一来到，却又是那样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有如他自己本身就是一束奉献给薇罗尼卡的鲜花。他穿着一身蓝地迎光变色的上衣，雪白的衬衫配上浆得挺挺的袖口，宽宽的红领带上缀着一支金别针。他有本事能一到哪里就把人弄得心慌意乱，一切都象会冒起泡来。他从来不空手来见薇罗尼卡——一副耳环或者一块小地毯（说不定是从自己家里拿来的，而他的妻子却会因此迁怒于清洁女工），一月份的温室西红柿、奥地利吊袜带、英国臭虫药、全欧汽车路线图、绝缘带、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或者两只细瓷茶盅。…… 巴拉日真是变化无穷。今天带来的是克鲁迪·久拉[1]的第一版《金矿》。他喜气洋洋地挥着书：

“你看，小天使，”在两个吻的间息中他压低了嗓子说，

---

① 克鲁迪·久拉（1878—1933），匈牙利作家。

“为了这本书我腿都快跑断了。你不是喜欢孤本书吗？中央古籍店里的肖尔泰斯说：‘布达佩斯只有三个行家——梅里乌斯、瓦什科和科马迪……’小天使，别穿这身蓝的，回头别人以为咱们是兄妹俩，穿这件红的好吗？和我衣服的颜色配得上，或者穿那套西服配上白衬衫也行……”他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衣柜里翻来翻去，还打开抽屉看看。

薇罗尼卡高兴地把孤本书拿到手里，打开一看，不免狐疑起来，扉页上可以看出细心擦拭过的痕迹。她又翻到第十七页。看来科马迪不知道，图书馆的书在第十七页上都打有印记。

“罗日①，这是图书馆的。”她忧郁地举着书。

巴拉日漂亮的脸蛋一下子严肃起来，他竖起细细的眉毛：

“哎，别是上了这个肖尔泰斯的当了……不，也许是图书馆里处理出来的。你知道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图书馆淘汰了多少旧书吗，小天使？其损失是数以百万计，岂止百万，数以千万福林计！……当年我们村里有个庄园，里面有个了不起的法学图书书库，有五百年的历史了，甚至还有韦尔伯齐的《三章法》②。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庄园里的仆人利用双方部队的对峙，在一个星期里把所有搬得动的东西都拿走了，这个图书馆也就毁了……”

---

① 巴拉日的昵称。

② 匈牙利第一部成文的法律。

薇罗尼卡开始穿衣服，巴拉日心满意足地坐在床边，点起一支美国烟，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他叙述的场面和事情，甚至连超现实主义的电影也大为逊色。每当他兴致勃勃地从一件事情跳跃到另一件的时候薇罗尼卡往往抱住头，就象摩托车上的乘客碰到急转弯似的。现在巴拉日正在绘声绘色地叙述他的儿子（如果他的话可信，这孩子现在是五岁）在动物园看长颈鹿的那一段事。孩子的爸（就是巴拉日）给孩子唱了个歌，叫做“在撒哈拉大沙漠有只长颈鹿，它正在难过地哭，因为它的好朋友小斑马，身上有条带子不见啦……”孩子真的去找了——是哪匹斑马身上缺了一条带子，丢哪里了，……不过孩子也挺喜欢看大象和食蚁兽。他说，食蚁兽他不考虑，但可以给孩子买只大土拨鼠。因为土拨鼠不臭，不挑食，也好玩。不过说不定最后还是会给孩子买只食蚁兽的。……他的战友巴拉巴什在动物园管理局……

薇罗尼卡想起了什么：

“不是说你们到奶奶那里去了？”

巴拉日一愣，但立即恢复了镇静。

“奶奶也到动物园去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她特别爱看袋鼠。”

“就是瘫痪了十年的那个？”

“不，是另外一个。”巴拉日随口说。

“是去年在马尔科塔博德格死去的那个？”

“不是，是……”

"巴拉日，你家有几个奶奶？三个？四个？也许是为了讲话方便，需要几个就有几个？"

这位男士走向薇罗尼卡，宽宏大量地吻了吻她的头颈，"干吗这么不饶人哪，小天使？嘻嘻真好闻，什么牌的香水？康奈尔？……当然，太吵闹，你没有睡好。"他指了指走廊，"科卡尔达什·露易莎一直在放你的那张唱片，该换一张新的了，对吗？……"接着他又就匈牙利住房情况发表了一通感想，又说克巴尼奥啤酒厂的地窖如何如何，还说某地方为了缓和房子紧张状况博物馆里住进了不少人家，又说要是坐在罗马时期的墓碑前凯尔特人的尸骨上给孩子喂奶，那大概是很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对吗，小天使？"

但是"小天使"愠怒地躲开他。

"别总是信口胡诌行不行？"

"可是我们究竟和谁一起到动物园去玩，这有什么要紧呢？"

"并不要紧。可也正因为不要紧，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连这种事也要编。说些别的好吗？"

巴拉日象是受到侮辱似地沉默了，撇着嘴。他很爱撇嘴，而且撇得出奇地好看。薇罗尼卡对着镜子搽口红，片刻的安静使她产生一种快感。

"下面的影院在上演《威尼斯惨案》，可能不错，买票的人排着队。咱们去看吗？"

"要排队？……"巴拉日撇撇嘴，"我明天去弄票。我有个同学在电影发行公司，叫曼德雷尼。……"

巴拉日只要一提起人，不是叔叔便是侄子，不是亲戚便是朋友，要不就是同学、战友、球友、牌友，再不济至少在一个俱乐部打过一局网球。总之他在首都生活了似乎不是十五年，而是一百五十年，他熟人的圈子就象和平阵营那样宽广。当年他带着三件衬衫和一张核桃馅饼到布达佩斯上工业大学——“打那以后没尝过那么好吃的核桃馅饼”——很快和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结了婚，住在市中心女方的家里，自己后来在建筑行业工作。至于大学毕业了没有，这点薇罗尼卡始终没有弄清楚过。关于他这个人，薇罗尼卡知道得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只是：巴拉日的父亲是泥水匠，以及记得他们两人在某个外地城市上过同一所中学。科马迪·巴拉日比薇罗尼卡高三个年级，那时她十五岁，对巴拉日单相思。可是“美男子科马迪”(当时大家都这么叫他）却俨然作为一个成年男子在女体育教员和校医的太太那里献殷勤。有一次学校舞会，也不知道是出于换口味还是恩赐，但也许是为了刺激某一个人，巴拉日还请她跳了一次舞。十四年以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博物院路上遇见了。为什么双方都这么动情呢？就是因为那唯一的一次跳舞吗？……科马迪也记得那次跳舞，可是记反了。好象是他被薇罗尼卡——这位骄傲的拉茨盖弗的姑娘弄得神魂颠倒，但是人家不理他，所以只好去找校医的太太了。被弄糊涂了的薇罗尼卡因此对过去的事也有点怀疑起来，于是她心中关于科马迪的一切时而怀着美妙的幻想，时而感到光怪陆离，但总是那么缥缈游离而不可捉摸。唯一可以肯定

的只是：他们相爱着……相爱着吗？科马迪是有妇之夫，虽然他已经多次提出离婚（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但薇罗尼卡并不为之兴奋欢跃，甚至不妨说她并没有兴趣为了自己有个家庭而去拆散另一个，特别是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家庭（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虽然薇罗尼卡已经把自己的存款给了他存到住房统建储蓄中去了。“你知道，小天使，在建筑行业我是很有办法的。技术方面当然不在话下，特别是相当有几个领导人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必要的时候可以抛几件他们的丑闻。”

薇罗尼卡无时不在盼望着心目中的那座楼终于在她眼前岿然屹立，她就可以搬进去了——宁可一个人，而不是和科马迪一起，虽然这点连对她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他们一星期见两三次面，可是她没法在电话里找到科马迪，因为他老是换地方，但这位公子哥儿却每天给图书馆打电话向薇罗尼卡输诚。这对于薇罗尼卡倒很方便，能知道这位只会冒烟的人物依然存在也就够了。但是薇罗尼卡无论如何也没法想象有朝一日得到住房以后，她躺在一张床上看书，同时科马迪居然会静静地在另一张床上呆着。这个男人如果不说话，他可能会做什么？如果他不显耀自己，不陈述设想，不吹牛，不谦虚，不描绘，不讨好，不开会——也就是：如果他不用说话向别人证明他的存在，那他可能做什么？

外面有人敲门，声音相当大，显然已经敲了一会儿，巴拉日打开门。

“薇罗尼卡在家吗？”

“请进，夫人！”他靠边一站。

进来的是象只木桶似的科卡尔达什·露易莎，既圆又软，一身桃红的衣服在身上乱颤。“给她喝一杯咖啡就肯陪人睡一觉”，这是艾尔薇拉根据自己的标准给露易莎定的价钱，这实在是再冤枉不过的了。露易莎是免费陪人睡觉的，但是基于爱情。如果男的再能给她一杯咖啡，她就会给他唱赞歌。爱情对于露易莎来说有如臭虫和这半层楼一样是两位一体的。甜蜜和失望迅速地互相交替着，因为男人们不能忍受八十公斤的软肉堆无休止的喁喁情话，最后还是不得不慌张逃跑。每当此时，须臾不能离开爱情的露易莎就唱起悲凉的歌，因为露易莎热爱艺术。当年有一位音乐教员曾经夸过她的嗓子，从此以后露易莎听独唱唱片，吊嗓子，读诗，写诗。并且偷偷地——只向薇罗尼卡、凯尔塔什妮、塔尔考·艾莱梅尔的老婆、欧尔纳特、本尼迪克的岳母，向看门人的老伴以及“宪法酒店”的跑堂、卢森堡街自由市场的老婆子们，向送煤的、送冰的，当然还有历届情人们透露过她一生最大的抱负——在电线厂文化宫（因为当姑娘时她曾在那里当过缠线工）举行一次独唱—朗诵晚会，表演匈牙利民歌、外国抒情歌曲和自己的诗作。但是现在她手里捏着的却是几张药方，象是办丧事人家的妇女捏着黑手绢，并且用低八度的调门说话：

“薇罗尼卡，你能借我二十福林吗？孩子们病了，大夫刚来过，可是我没钱买药。”

“他们得了什么病？”薇罗尼卡问，记得早晨三个孩子都

是好好的，在走廊里冲来冲去，最小的那个还差一点把她撞个跟头。

"哎呀，什么病都有，你知道天气忽冷忽热，空气污染，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咳嗽。"

"反正我要上药房，药方给我吧。"薇罗尼卡劈手把药方从这女人的手里抽了出来。露易莎吃惊地、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声音也有点变了：

"可是……急症……"

"现在这时候只有西火车站的大药房开门，我马上就回来。"说着把喃喃着的女人轻轻推出了门。

"让我来看看……"薇罗尼卡看了一眼处方，"去年的。"处方背面是几句押韵的话。她把这几张揉皱了的纸扔在桌上，"走吧……"

她锁门的时候从对面玻璃门后面传来科卡尔达什·露易莎男人带着酒意的激动的声音：

"如果你和我睡觉，我就给你钱看电影；如果你和我睡觉，我就给你钱买粮食；如果你和我睡觉，晚上我就带你到文化馆跳舞；如果你和我睡觉……"

"可怜的露易莎，"薇罗尼卡沿着空气新鲜、嵌着瓷砖的楼梯赶上巴拉日，"哪一个男的她都喜欢，就是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真弄不明白。"

大教堂响起钟声，正午了。他们拐进了最近的一家饭店。十二点和两点之间在布达佩斯要找地方吃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赶，他们也只找到了最后的一个桌子。在

人头攒动的饭店的一个角落里，薇罗尼卡看到了博格纳尔一家，正在用她的那张一百福林钞票付账，全家向薇罗尼卡微笑致意，唯有小扬奇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巴拉日滔滔不绝地说着话，薇罗尼卡兴致索然地把菜盆里的肉拨来拨去。这肉既生又老，既硬又韧，还发着一丝淡淡的臭气。当然，如果拿出比这更坏些的来，也并不会使人吃惊。土豆带着一股农药味，面包是硬的，啤酒是温的。后来巴拉日发现皮夹忘在家里了，于是薇罗尼卡掏钱付了账。“明天还你，小天使！”“当然，他不会给。”薇罗尼卡愠怒地想，“真还不如到阿姨那里吃饭去。”

艾尔代伊·贝拉是薇罗尼卡一个很远的亲戚。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每逢星期天，不是中午便是傍晚常到他们家作不速之客，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可总是吃得饱饱的。老夫妇很喜欢她，慢慢地也就把她当作了家里人。后来两个人都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感到无聊和互相讨厌，于是每星期的午饭上薇罗尼卡便担任了调停的角色，去他们家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小了。星期天中午独自一个人一面看报一面吃饭固然是无聊的，可是在尤莉亚阿姨家吃饭却是疲劳的。

巴拉日走了，说是要到奶奶那里接儿子，（是不是去年在马尔科塔博德格死了的那个奶奶？）薇罗尼卡独自回去做每周一次的扫除，接着还要洗衣服和熨衣服（她听说监狱里也是这个制度）。当她刚走上嵌着瓷砖但却很少打扫的楼梯时遇见了欧尔纳特·本尼迪克和他的夫人，以及这个家庭中无疑是最中看的第三个成员——一条齐胸高的丹麦

种狗。欧尔纳特副教授是头发花白、衣著入时的绅士，就是被米科维尼·绍尼斯洛一概称之为“政府顾问大人”之流的人物，戴着灰色细皮手套，托着一包点心。他的妻子染着红头发，细长的腿，身上穿着白色皮甲克，戴着红帽子、红手套，带一种超凡入圣的仪态牵着狗。他们雍容华贵地在宽阔的楼梯上默然缓行，甫一转入充满特殊气味的半层楼时，欧尔纳特夫人立即从手提包里抽出沾着香水的绣名字手帕掩住鼻子，而副教授则以男子的深沉长叹了口气：“可怜的妈妈！”他们放轻脚步，向走廊底走去。但是由于大部分门都开着——不管是因为缺乏空气还是出于好奇——他们的来到其效果绝不亚于一个军乐队的入场式。欧尔纳特·本尼迪克的岳母仍然坐在保险柜门口，女儿吻了她的脸，女婿也吻了她干瘪的手背。副教授以果断的动作把老太太瘦弱的身子往上一夹，连椅子、小凳子一起推进了保险柜，然后带上门。

薇罗尼卡出神地想：小小的铁柜子怎么能容下这许多人？会不会憋死？哪来的空气？他们不是那种有多少地方就吸多少空气的人。

薇罗尼卡还没有换上家里穿的衣服，外边就有人敲门了。显然，有人一直在注意着她什么时候回来。

是科卡尔达什·露易莎。

“薇罗尼卡，药买回来了吗？”来者假正经地问。

“露易莎，药方过期了，人家不肯给药。”说着把那几张揉皱了的、背面写着诗的纸塞到露易莎手里。酒鬼赫林考·

拉约什的妻子没有专门用于创作的本子或者象样一点的纸。

胖女人如释重负，精神随之焕发起来。

“我去买他们会给的，他们认识我。薇罗尼卡，你借我二十福林就够了。”

“露易莎，我没有钱，月底了。不过这里有四个福林，你可以去买一片阿斯匹灵……或者一张电影票。”

科卡尔达什·露易莎脸红了，牛头不对马面地象是解释道：

“真没法和这种人过日子。成天价醉醺醺的，脾气又大。我只要出去，他就跟着，当着别人发酒疯……我哪里也没地方躲。”

“那你就上电影院去，”薇罗尼卡挥挥手，“但是别买咱们水管底下的座位，那里的天花板好久没有塌了，快到日子了……”

拖地板、擦桌椅、洗单子、熨衣服……都是令人生厌的家务事。薇罗尼卡正想下决心拖到下星期情绪好点的时候再干，住得最近的朋友谢斯塔克·琳达来了。她结婚后的名字叫做托特·巴尔妮，住在邻街，也是一个半层楼里。此人几乎每天来找薇罗尼卡，因为从来见不着，所以总是在门缝中留下一张、两张、三张甚至可能四张字条。可是星期天薇罗尼卡就无法避而不见了。而此刻薇罗尼卡几乎是盼望她来。琳达有时是中午十一点三刻带着儿子露面，两人往往都是一脸饿相，尤其是那九岁的孩子。薇罗尼卡乐于在

一家小饭铺请这母子俩吃一顿，（自己在大学生年代不也是这样到其实还并不十分熟的尤莉亚阿姨家去的吗？）孩子恨不得按照菜单逐个吃下去（他母亲又何尝不是！）鱼汤、猪排、生菜，外加三片面包，接着每人再是两盘奶酪拌面条。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吃得并不尽兴，但毕竟还是合乎礼节地放下了刀叉。如果薇罗尼卡皮包里多少还剩点钱的话，那么饭后少不了还会被他们鼓动到食品店转一圈，吃几块巧克力、夹心糖，或是来一杯冰淇淋外加可口可乐，再或是别的什么。如果不等到吃完晚饭才走，薇罗尼卡就谢天谢地了。

“我不打搅你吗？”琳达破门而入，然后在薇罗尼卡脸上“啪！啪！”两个响吻，同时拚命想从对方的眼神中搜索、分析是不是真的不讨厌她的光临。尽管这个女人浑身都是问号，但她还是深信自己到处都受到欢迎。琳达有个尖尖的脸、窄窄的上身，越往下越宽，象个锐角三角形。一身穿戴则更突出了她似乎本身就是个不协调的代表作：红黄方格相间的厚裙子，是两年前拿薇罗尼卡用薄了的熨衣毛毯改的，用褪色剂处理过的红布（斜纹？卡其？……）衬衫，是手缝的。琳达走到哪里，就响到那里，倒不是因为她太重，压得地板出声，实际上她是小个子，只由于那块木头鞋后跟在捣乱，鞋面布已经不知道补过多少次了，好象解放以来就穿的这双鞋。

薇罗尼卡几乎是欢迎琳达来到，因为总算有了借口来躲避一场疲劳和烦恼。她关上象是不断在清嗓子的收音

机，指了指一把直背椅子请琳达坐下。可是琳达挑了写字台旁边的扶手椅，她知道，在这间屋里这把椅子最舒服。她把一只粗布大提包顺手放在跟前，包里是一星期以来的搜集品，其中包括从工作单位里拿来的白报纸、复写纸、信封、用过一半的记事本和咖啡渣。

“你好吗？”琳达问，灰色的眼珠和在长满雀斑的脸上显得特别突出的鼻子在屋里飞速打量着——从上次来过以后薇罗尼卡屋里增加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被换下来了？

薇罗尼卡咕噜了几声，她知道，说什么对琳达都一样，譬如有一次她说：“老兄，那头头这事干得可不算漂亮。”这位客人同样也是点头表示认可。和琳达不能聊天，没法谈心，交换不了看法，更不要说辩论问题了，甚至连搬弄是非都不行。对琳达说来，世界上只存在一件事，那就是抱怨。抱怨之于她，有如哭之于婴儿，刺人之于荨麻。琳达的抱怨滔滔不绝，汹涌澎湃，而且还可以不断重复。使琳达烦恼的不是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那么多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她受了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而是周围的人使她不高兴。在薇罗尼卡听来，琳达受了迫害狂的包围，因为全国——岂止全国，应该说是全欧洲，加起来也不可能比琳达一个人在不断更换的工作单位（她在工会系统的图书馆）以及在医院里、在食品店里、在电车上、在孩子的学校里、在广场上和在街上遇到的笨蛋、坏人、恶人、凶煞神、两面派、土皇帝、假圣人、阴谋家、密探、害群之马、流氓、恶棍、幸灾乐祸者、十恶不赦者、无聊之极的家伙、榆木脑袋、门外汉、小气鬼、下流

坯、嫉妒者、中伤家、撒谎者、骗子手、小偷、寄生虫、马屁精、野心家以及“但求多得一分钱，休管他人话短长”的自私家伙那么多。现在从琳达嘴里倾泻而出的事件中所有参与陷害的人薇罗尼卡一个也不认识。琳达的叙述总是既曲折又多变、既复杂又互相穿插，但到后来往往是似曾相识。因此每当琳达说到：“上次我说过”，“就是那个酒鬼”或是“你知道，就是我本来工作过的那地方”时，她的注意力就开小差了。

薇罗尼卡是在大学实习期间和琳达认识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年纪比自己大得多的女人惠然以友情相待，而她则一半出于怯懦，一半出于同情，回报了这个情谊。在整个过程中薇罗尼卡只有一次被这个女人哓哓不休的牢骚激怒了，她冲着琳达喊：“你为什么这样自命不凡，觉得好象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为了惹你不痛快。既然连上帝也放不过你，那你就干脆别可惜这条倒楣的命！”琳达瞪着眼，张着嘴，吃惊地听着，“可不是，”她说，好象得到了启示，回去就吞了四十片安眠药。晚上十点钟，薇罗尼卡突然感到不安，跑到了书店店堂兼这个女人的宿舍里去。按了半天门铃没人开门，薇罗尼卡找了派出所，总算没让琳达一命呜呼。

薇罗尼卡把熨好的衬衫挂进衣柜，觉得手腕疼了，就说她来煮一杯咖啡。

“毛病就出在……”琳达象是在分析问题，一面从薇罗尼卡的烟盒里拿了一支烟点上（据说她好几个月以前就戒了，可是看来似乎只戒了自己的），“毛病就出在五六年我重

新入了党，这一来就上下都不吃香了。上面认为我反正已经是党员，就不必争取了；同时下面又因为我是党员而怕我，只要我在场，他们连笑话也不讲一句，为的是怕我打小报告。…… 从这个观点来看，拉科西时代[1]固然是很可怕的，因为那时候人们不是参加党，而是逃到党里求生存，党员各自怀着鬼胎，可是只发表同一种观点。而现在，情况就更糟了，如果还可能更糟的话。人家不明白，我一月拿两千二百福林，还当党员做什么。"

薇罗尼卡过去曾经听说过，一九五六年事件以后，在审理工人委员会一案中，托特·巴尔妮是主要证人，根据她的证词，托特工程师（即她腹中孩子的父亲）也被判一年半徒刑。刑满释放后从此就和琳达一刀两断，连孩子也不要了。

至于这个说法确实到何种程度，或者也许只是某些人的恶意捏造，薇罗尼卡从来也没敢问过她。

薇罗尼卡把咖啡倒在两个杯子里，在床边坐下，有点不耐烦地问：

"那么你为什么不退党？"

琳达慢慢地品着这杯芳香扑鼻的浓咖啡，在家里她只是用别人的咖啡渣煮。

"不行，"琳达说，"谁想退，没等说他们就先开除你。被开除的党员比在党内的人情况更糟。"

---

(1) 拉科西·马加什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任匈牙利党总书记。

这个满腹怨气的女人，脸上既惊惶又凶恨，薇罗尼卡不由得想起，自从托特工程师被投下狱以来琳达还没有和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孤独象是一条永远摆脱不了的锁链紧紧地拴着她，而锁链的叮当声又把别人吓得远远地避开了。爱情，甚至哪怕是不公开的男女的柔情恐怕也会使这个女人的目光变得温和一些，脸上也会有一丝血色，使得她的腰身、手臂和手腕的动作有点弹性，使她的外表多少有些风姿，灵魂多一分光亮，从而使整个人稍微随和些，比较地能够理解别人。但是琳达象一块干土，象发不起酵的死面团。

"听说你得奖金了?"琳达转身向薇罗尼卡，单刀直入地问。

"谁告诉你的?"薇罗尼卡不快地反问，已经在暗暗向二百福林告别了。

"我在比热拉同志那里看到了名单。"琳达以行家的口气答复。

薇罗尼卡不知道谁是比热拉，也不明白这个比热拉为什么要给琳达看名单，或者是不是真的给她看了?也许是琳达以别的手段看到的?

这个女人没有任何过渡——也许她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就抱怨起来：山尼踢球一个月坏一双鞋，一年就十二双，孩子长得太快，衣服不是磨破就是穿不下，每月都要买衬衫和裤子。可怜的孩子打生下来到现在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幸好现在提倡玩世不恭，流行穿破衣服，把要来的衣服给他改一改也将就了。你知道他一天吃多少吗?他一个

人能顶一队养路工。星期六上午买了半公斤香肠，准备下星期吃，可是今天早晨连绳子也找不到了，原来香肠是用绳子吊着的，山尼在暗中看不清楚，把它也一起吃掉了。你知道给他念书要花多少钱吗？说起来挺好听，什么义务教育，可是书呢？练习本呢？图画纸呢？还有书包、点心、卫生用品、铅笔、钢笔、水彩笔、水彩画颜料、图画板、尺子、运动鞋、运动衫、运动裤、白短袜、校服、电光纸、小剪刀、小锯、卷笔刀、胶水、玻璃胶纸、课外读物、博物馆门票、游泳裤、游泳池门票、电影票、冰鞋、溜冰场门票、象形玩具还有郊游……数不尽花钱的地方。单身妇女得不到任何特殊照顾，无论工作单位还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无论家务劳动还是党的工作，人家对你都和对有个一米八高、八十公斤重、一月挣五千福林的丈夫的妇女同样要求……

薇罗尼卡越听越反感；她认为，任何一个女人，只要不是傻子，都会清楚：生孩子既不是为了社会，也不是为了丈夫，首先而且最终是为了自己。话到了嘴边：告诉我，琳达，山尼的爸爸是你送进监狱的吗？但是她终于没有敢问。

薇罗尼卡讨厌，甚至可以说憎恨眼前坐着的这个女人，可是她心中同时又浮起了一种怜悯感。自己毕竟比她年轻，也没有孩子的牵累，有人爱……无论如何，自己是有希望的。她问："那么多少钱可以帮助你一下？"

"二百福林。"琳达不假思索，就好象一个多星期以来就已经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了。薇罗尼卡请她站起来，好腾出地方来让自己开抽屉。琳达没有再坐下，懒洋洋地把钞票

塞进提包，两只乌鸦眼在书架上扫来扫去。

"你有没有上星期的旧报纸？一星期没看报了。"

薇罗尼卡本来想问："你为什么不在图书馆看？"可是终于没有问，深知这堆报纸此去也就到了废品收购站，然后变成零钱回到琳达手中。顷刻，报纸扫进了琳达的提包，到她走后薇罗尼卡发现小扬奇买的当天的报纸也被席卷走了。薇罗尼卡不高兴地从书架上取下《科学史》，侧身倒在床上看起来。这部书内容精彩，就象一本冒险小说似的，可是纸实在太糟，往往连第三页的字也能透过来。薇罗尼卡用一张白纸衬在后面，但是背面一页的干扰还是解决不了。几年以来薇罗尼卡一直把它当作催眠剂，因为它能最有效地使眼睛发痠。当她几乎要睡着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惊心动魄的噪音，紧张的喊叫和快速的奔跑声从走廊袭来。从一大堆混乱的声浪中似乎可以听得到阿纳斯塔季娅奶奶的名字。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虽然不寻常的事在这个半层楼里早已是司空见惯了的。是科卡尔达什·露易莎被她的丈夫打伤了？是艾尔薇拉要自杀跳窗了（她家窗口离电影院屋顶共三十公分）？是被凯尔泰什妮锁在屋里的孩子玩火烧着了房子，还是米科维尼·绍尼斯洛的客人们互相以短兵相见了？也许是要么出不来，要么关不上的水管把走廊淹了，然后又顺着嵌瓷砖的楼墙流到街上去了？……可是阿纳斯塔季娅奶奶？她能做什么？如果不是成天坐在保险柜门口的话，恐怕谁也不知道她活着。

薇罗尼卡把门打开一道缝。半层楼住户中永远处于交

战状态的几个妇女——科卡尔达什·露易莎、艾尔薇拉.凯尔泰什妮、塔尔考·埃莱梅尔的妻子和岳母现在互相和解了，围成一个圈在紧张地互相通报：菠萝奶奶用刀片割断了动脉，地段医院的大夫正在给她包扎手腕，看门的哈奈什大爷已经去联系救护车了……

"她的闺女在哪里？欧尔纳特·本尼迪克副教授呢？"

"他们早走了。连十分钟也没待满。他们本来说不定还会待一会儿，可是那条狗在保险柜里受不了。"

"是谁发现菠萝奶奶？……"

从噪音中可以听得出来，每个人都是首先发现的。是她们看见了保险柜里有异常现象，是她们看见了血从门缝里流了出来，是她们听到了这位老婆婆临死的呻吟……

那次屋里失窃事件后薇罗尼卡到派出所报案，值勤的警察问她怀疑谁？其实她对半层楼住户中的每个人都怀疑，连守门的哈奈什大爷也不例外，不过她没有说。有一次她遗失了钥匙，问哈奈什附近哪里有配钥匙的？哈奈什大爷摆摆手，"何必麻烦！"说着从地下室拿出足有小学生们玩的铁环那么大的两圈钥匙，看了看锁眼，就从脖子上套着的五百六十九把钥匙中很有把握地抓出一把开了门。在这半层楼里，每个男人都是能工巧匠，都是多面手，谁都有可能干这事。几天以后，她接到通知到派出所，一个和气的警察少校准确地说出了她的每个（哪怕只来过一次的）男女朋友、熟人、同事以及乡下亲戚的情况，问她，这些人中间谁有可能作案？对于哈奈什大爷和邻居们如此详尽地观察着并

且记住了她所有来客的年龄、容貌、发色和服饰她实在深感钦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菠萝奶奶象一只病海豹在浮冰上死去那样悄悄离开了人间那才真正是怪事呢。

塔尔考·埃莱梅尔的岳母(她住在菠萝奶奶隔壁，拥有第一手材料)对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自杀了。上一次，薇罗尼卡，您那时还没搬来，她吃了一大把安眠药，可是没被吸收，灌肠出来的时候药片还是整的，有的连咖啡色的糖衣还没掉。菠萝奶奶已经老得连新陈代谢也停止了。那么她靠什么维持生命？有时她接连几天只喝她女儿带来的暖瓶里的柠檬汁。她女儿，就是那个长腿女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管这种女人叫妖精。她的那条象小牛那么大的狗太厉害，早晚会咬死个把孩子。

整个半层楼对菠萝奶奶的同情发展成为愤怒。大家知道她女儿在许沃什沃尔吉高级住宅区有所小洋房，除卧室和饭厅外夫妻两人各有一间工作室。狗住着的一小间铺着地毯，狗吃的是鹅肝。大概地段医院的大夫为了菠萝奶奶的事曾经找过他们，事情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把他们的居住情况了解来了。据他们说，因为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没法在同一间屋里工作，所以老太太就没法安排和他们一起住了。

“应该告他们!”塔尔考·埃莱梅尔的岳母愤愤地说。他们五口人住的地方比那间保险柜大不了多少。

“告他们？应该吊死他们!”艾尔薇拉加了码。她每天早晨把四个孩子锁在屋里，自己到处闲逛，到傍晚才回家。

孩子在屋里饿得大哭大叫，往往是薇罗尼卡从门缝里给他们塞几块巧克力救急。

“老来无味!”科卡尔达什·露易莎无限感慨，并且告诉邻居们，她当年还创作过一首小诗，说的就是隔壁那座楼里地下室住户中发生的事。事情的原委是：那家父母清早上班去了，奶奶在家看五个月的小孙子。上午，和其他日子一样，奶奶出去采购，等她回来时，孩子被老鼠咬死了。区政府在惊惶和良心发现之余当即在新建住宅区给这家拨了两间一套的单元房子。夫妻两人搬进了新居，奶奶还是留在地下室。

瘦弱的看门人领着急救站的两个彪形大汉在走廊里迅步走过，几分钟以后菠萝奶奶被放在担架上抬了出来，身上严实地盖着黑大衣，手腕上包扎着的纱布在黑呢子上显得格外刺眼，几乎是透明的眼皮紧闭着。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跟着胖胖的不修边幅的地段医院医生，脸上一副厌烦的神气，显得和死亡事件极不谐调。最后一个是哈奈什大爷，背着手握着钥匙，使队伍增加了十公分的长度。保险柜已经锁好，钥匙由他细心保存起来了，就象当年掌玺大臣在国王加冕以后把皇冠、锦袍、权杖和金苹果收起来一样。

妇女们有礼貌地退进各自开着的门里让出一条道。塔尔考·埃莱梅尔的岳母在身上画个十字，念念有词地哼了两句赞美诗。但是接着她们忽然又从门里一跃而出把医生从队伍里拉了出来，把他围在狭窄的走廊里了。

“大夫，她真的死了?”

"她流了很多血吗?"

"她死得很痛苦吗?"

"她的刀片是哪里弄来的?"

"菠萝奶奶吗?"医生抬起厚厚的眼皮四周看了看,他知道自己是溜不掉的,"谁说她死了?血管是割断了,但是一滴血也没流。她好象早就没有血了。"

"那么她干吗闭着眼?"

"因为她不好意思。"

由于未能出现惊人事件而引起了一秒钟的失望,但整个半层楼毕竟还是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喜欢阿纳斯塔季娅奶奶,因为她善良,也因为她是一个和自己所生活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代表。那是一个有节制、讲礼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的头发是修饰得很好的,手上戴着细巧的戒指,衣服镶着精致的蝉翼似的花边,纤细的脚搁在蒙着獭皮的波斯小凳上。菠萝奶奶是从那个世界来到她们这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间来的。但正是由于菠萝奶奶从那个世界来到了这里,那么似乎也能发生相反的事情——她们有朝一日进入到那比这里干净得多的世界去。

"她说什么也不肯到医院去,其实那里对她有好处——有热的汤喝,洗个澡,也有人照顾她。菠萝奶奶需要这些……但是回来以后又怎么办?下一次还能用什么东西自杀呢?没有煤气,没法跳窗,因为没有窗。摸电门?……"

艾尔薇拉建议让她的丈夫把保险柜里的电线修好,修得结结实实的,就连米科维尼·绍尼斯洛用斧子也砍

不断。

于是展开了一场咒骂菠萝奶奶的女儿、女婿和那条狗的竞赛。不久，科卡尔达什·露易莎突然想到了向医生给她的孩子要药，而其他人也同时想起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病，因为在地段医院要看上病，起码得等上两个小时。医生无奈，掏出处方本来，妇女们请他坐下，但是医生为了早点离开这个充斥各种气味的走廊，宁可把处方本按在墙上，站着开了三十几张药方。薇罗尼卡虽然不好意思，但也参加了这个行列，不过也正因为不好意思，一直等到最后才开口。

这个胖得发松的老单身汉只和薇罗尼卡一个人握手告别，厚厚的嘴唇上浮着没有把握的微笑：

“本来想请您去喝杯咖啡，可是我正好值班。”

有一次害流行性感冒，薇罗尼卡第一次到这位医生那里就诊时，医生一面量着她的脉搏，一面深怀同情地说：

“在这群人中间，生活对您说来恐怕不很容易。”

“大夫，您知道他们有多脏吗？”薇罗尼卡咒骂着这半层楼。

“知道，”医生绝望地叹口气，“就是叫他们用灰锰氧洗一洗西红柿也做不到。可是……毕竟不都那么说……人是制造垃圾的动物吗？”

“真是不能再脏了……可是您知道他们多能吵架吗？您知道他们有多闹吗？他们从来想不到还有别人。给他们一所大别墅也无济于事。”

"人是善于学习的动物。"医生安慰她，"先学会了两脚走路，又学会了用两只上肢做工具，还会用不同的声音表达感觉和思想，那么总有一天会学会怎样住房子的，——如果有地方住的话。"

薇罗尼卡关上门，独自在屋里再一次考虑是不是嫁给这位医生。他大概会有两三间一套的房子，还有个既强壮却又愚笨的打扫女工。这女工可能是旧社会宪兵的老婆，早晨给他买来新鲜的面包，给他煮好茶，下午为他做好晚饭，放在冰箱里保存好。然后给他打扫、浆洗、缝扣子。说不定还和这位医生发生肉体关系……。没关系，打扫女工还是要的……。医生已经作过明确的暗示，问题在于薇罗尼卡肯不肯下决心。但是一想到那厚厚的肉、密密的汗毛和臭猫的气味……还是继续在这半层楼吧！

天色渐渐暗了，半层楼的生活开始进入高潮。人们就象在干酪里的一窝蛀虫一样挤来挤去。水管、水桶、门、每一块地板、收音机的每一个波段都进入了运行的高峰，其中还夹杂着楼下电影院和街上传来的声音。

邻室传来低音喇叭似的重浊的男低音，这是艾尔薇拉的弟弟，就是那位拳击运动员，今晚大概要以圣诞老人[①]的姿态出现了。果然，当他喝完第二杯酒时，艾尔薇拉来敲门了，双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

"什么事，艾尔薇拉？"薇罗尼卡疲倦地问。（天哪，我总

---

① 欧洲风俗，圣诞时给孩子们送礼的白须红袍老人。

算住进了半层楼，但什么时候可以再上去一点呢？要是这个科马迪·巴拉日别那么不可靠那该多好啊！）

艾尔薇拉从围裙口袋里抽出手来，拳里攥着一只金戒指和一条细细的金项链。

“我跟我弟弟说了。他说我可以把这东西给你换三百福林。是不是，我没有骗你？”

薇罗尼卡没有伸手去接这闪烁发光的首饰。从隔墙传过来的夫妻吵架中薇罗尼卡明白，艾尔薇拉的弟弟靠撬锁来弥补从体育组织里领来的工资之不足，因此他们在马尔科街有专用房间。薇罗尼卡对于他们的东西视之有如蛇蝎。

“有海关税单吗？”薇罗尼卡问。

“海关税单？”艾尔薇拉不解地问，“干什么用？”

“这些都是外国货，没有海关税单我不敢要。”

“明天我向我弟弟要税单。”

“艾尔薇拉，你把这给大夫吧。只要他肯收，就会给你做手术。”

艾尔薇拉无精打采地摆了摆手：

“他不会给我做的，因为钱不是给大夫，而是缴在医院的收款处。那里只收现款。”

薇罗尼卡象是受刑似的听着。

“艾尔薇拉，你说，你总共欠了我多少钱？”

“薇罗尼卡，我丈夫会还你的，”这位少妇热烈地作出诺言，“他什么都会。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电动刮

胡刀、电冰箱、咖啡豆捣碎机、电烤箱、石英灯、电风扇……他都会修。”

“但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艾尔薇拉……”

这女人把首饰又塞回口袋里，垂头丧气地连手也没再伸出来。

“你连一百福林也不借给我吗？”她惶惶不安地问。

薇罗尼卡无可奈何地退到写字台边上，拿出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

“不过我希望这次你真的还我……你明天把这些东西送到当铺去，可能会值五百福林。”

“我也想到了，”这女人扫兴地说，“可是我弟弟不愿意。”

当艾尔薇拉谢过这一百福林转身出屋时，从她那因得钱而兴高采烈的轻浮动作中，薇罗尼卡感到明天当铺还不开门她就会去排队等候的。但很可能，警察局明天中午就会追查这些东西的来历……凯尔泰什妮偷了薇罗尼卡的东西就是这样败露的。那么警告她一下？但是薇罗尼卡脑子里出现了刚被讹走的一百福林和另外三次被骗走的三百福林以及这整整的可怕的一天，还有那历来的可怕的星期天！只有连续两天的节假日才比星期日更可怕。薇罗尼卡此刻几乎是期望艾尔薇拉出问题，如果把这整个半层楼的住户都关进监狱去才好呢！

有人敲门。万万没有想到，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的警察，脸红得象蒸熟的紫菜头，汗沿着帽带

往下流。警察前面是站得挺挺的小扬奇，长长的睫毛指向地板。

“晚上好！”警察敬了个礼，“您认识这孩子吗？”

“认识。”薇罗尼卡惊讶地说，“这是博格纳尔·扬奇。他们家就住在这半层楼上，就是那间屋。”

“家里没有人。”警察无可奈何地说，显然他束手无策。可惜条令禁止，否则此刻他一定要搔后脑勺了。薇罗尼卡感觉到，各户的门都轻轻地打开了一道缝，人们在欣赏这个场面。

“请进来吧！”她说。

警察向里面看了看，有点惶惑地进了屋。看得出来，他还是个新手，还不会享受因他出现而造成恐慌的那种乐趣。当然，对于这半层楼，也许只有地震才能引起恐慌了。什么天花板塌在观众脑袋上、起火、失窃、斗殴之类的事以及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通宵达旦的酗酒和一个下级警官的出现在这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一如这家门里涌出来的臭虫味或另一家门里流出的臭虫药味一样为人们所熟悉。小警察在数不清的束缚中——肩章、帽带、腰带、橡皮棍、皮套中的手枪——象是一匹带上笼头的马一样地流着汗。尽管薇罗尼卡再三催促，他还是不肯坐下来。“谢谢，我还有任务。”薇罗尼卡想起有个熟人的男朋友也是警察，在执勤的时候有时偷偷溜到她那里去，也从来不敢松一松腰带。他说，没法子，腰带一松纪律也就松了。

“这孩子今晚和其他四个孩子爬到民族银行的地下室

企图作案。当然，碰上了警报装置，被抓住了。”

眼睫毛下垂的小扬奇交待道：

“是山尼想出来的，就是琳达阿姨的孩子。”

“就是刚去过的那一家？”警察脸上多了一分阴影，“我本来以为做父母的会难过，会把孩子打一顿。可是这位？……哎，多能干的孩子，对吗，中尉？他是个好孩子，想帮助他可怜的妈妈……这家莫非也是这样？”警察不无忧虑地打听小扬奇父母的情况，其实他不是警官，只是个普通的民警罢了。

“扬奇，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我不知道，”孩子嗫嚅着，“他们把我打发回来了。”

“他们还有钱剩下？”薇罗尼卡追问。

“薇罗尼卡阿姨的钱还剩下四十福林。”

“他们大概还在某个地方玩呢，”薇罗尼卡对民警说，“今天是星期天。”

“是啊，星期天。”民警松了一口气，“我可以把孩子留在这里吗？以后我们会传讯他父母的。”

警察想敬个礼告别，但是薇罗尼卡和他握了握手。

“中尉，最好别判他们罚金。因为您看，他们实在没有钱。”

她关上门，抚摸着一直呆呆地站着的孩子的头发。

“坐下，小扬奇！你们为什么要爬到民族银行去？”

孩子感激地抬起头。

“薇罗尼卡阿姨，那银行地下室有一根铁栏杆弯了。山

尼有一根铁棍，天黑了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去撬铁栏杆，每天一点点。今晚上这窟窿已经可以钻得过去了。他先进去，后来我们也进去了。里面很黑，但是他带了手电筒。正当我们找到保险柜的时候，就是菠萝奶奶住的那种，警察来了。”

“你们想干什么？”

“偷钱。”孩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要钱做什么？”

“给妈妈。”

“为什么呢？”

“让她别老是借钱。”

薇罗尼卡咬着下嘴唇转过身去。妈妈没钱买吃的，爸爸没钱买喝的，家庭争吵的鞭子最后落到孩子身上：“去，向薇罗尼卡阿姨（向教母、向守门的伯伯、向菠萝奶奶、向塔尔考叔叔……）借一百福林，（借一勺油、借一棵葱、借一把盐、借几根火柴、借两个土豆……）到四号就还。”星期天肉铺、蔬菜店关门，家里仅有的三十福林还得花两天。今天就借一百福林来吃一顿喝一顿吧！

琳达以儿子的能干为荣，因为他居然爬到民族银行里去了。你看，他刚九岁呢！……但是五年以后怎么样？到那时孩子大了，为了解馋、为了喝酒、也说不定为了女朋友，就会把母亲的衣服、打字机、书拿去卖了。十年以后呢？小伙子就会仔细地考虑进行一场偷窃，尽管可能逃过两次，但说不定在第三次作案时被抓住了，一判就是两年。……到那

时，你做母亲的……？

那么这个小扬奇？这个爱害羞的、不敢抬头的无辜的孩子，他的命运又会怎样？

薇罗尼卡心烦意乱——自己又怎么样？凭什么来考虑与自己根本无关的事？但是这半层楼里没有救世主，人们便把她看成大户，向她借钱，从她这里找安慰，也许甚至指望她给解决房子问题吧？可是自己的问题怎么办？

自己固然已经上升到半层楼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升到二层去？她出神地想。

警察出现在半层楼住户中，没有引起恐慌而促进了团结。有人走遍了附近的酒店，找到了博格纳尔夫妇，告诉他们孩子被警察押回来了。年轻的母亲喘着气，比手划脚地似乎想说明什么，一把拉走了孩子，顺手一记耳光，同时传来了对薇罗尼卡的谴责和孩子的哭泣声。

薇罗尼卡打开窗子，想在蟑螂大批到达之前放进一点新鲜空气。在电影院涂着沥青的屋顶上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在端详着星空，薇罗尼卡打开窗子，被理解为对他的邀请，于是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他又醉了。

"薇罗尼卡，"他哼哼着说，"请到我那里聊聊，我还有一点酒。"

"您的朋友们呢？"薇罗尼卡深深吸一口已经凉下来的空气。

"都走了。这叫什么世道！"绍尼斯洛沉痛地说，"说什么明天是星期一，他们要上班。什么鬼话！我父亲，愿上帝

保佑他在天之灵，每天定量五升，从来不在乎星期几。”

“您最好把我的百叶窗修一修，行吗？”

“噢，没问题。薇罗尼卡，给您修那绝没问题。现在吗？”

“最好是明天。修好了，那些流氓就不会老朝我屋里张望了。”

“您是在说我吗？”绍尼斯洛吃惊地问。

“绍尼斯洛，您不生气吗？我明天真的要上班去。”说着把窗关上了。

米科维尼·绍尼斯洛唤了几声薇罗尼卡，看看没有反应，就嘟嘟囔囔地走向原来的地方，沥青的屋顶在他站不稳的脚下吱吱地发出呻吟。一声轰鸣，绍尼斯洛带着他沉重的身体从窗口掉进了自己的屋子，就在那里迎接了第二天早晨。

半层楼终于慢慢安静了，象是一所古老的大院，人们关在自己的屋里。在这时分，住在这样的半层楼就远比租私人的房子当房客好得多了。薇罗尼卡脑中闪过作为房客的景象，自己好象是放在房东外屋的土豆。房东总是忘记把浴室的门打开，而厨房在冬天又能把墨水也冻上……她满意地笑了笑，悠闲地打点着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和实物，擦擦皮鞋，铺好床，把作为安眠药的《科学史》放在床头柜上，书旁是干净的烟灰缸、香烟和火柴，手表上好弦，打开床头灯，钻进毯子，舒舒服服地翻个身，正想伸手去拿那两公斤重的《科学史》，突然一阵惊恐袭来——“貘”还没回家。这是一

个九十公斤的离婚妇女，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也许叫克拉拉——姑且叫克拉拉吧，反正她是当之无愧的[1]——她正在攒钱准备买房子，光靠工资不够，只好用出卖肉体来补上。她每天都算帐，就好象孩子们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计算日子一样，算算还需要陪人睡几觉就够买房子的钱了。她总是后半夜——不一定是几点钟，但一定是后半夜回来。往往当薇罗尼卡的神经随着钻机破土时的轰鸣声逐渐平息而安定下来，脑子慢慢地受到象前来解放自己的狱卒一样的轻梦控制的时候，这女人就象一只貘似的在走廊口出现，然后以与貘相称的惊天动地的气势通过走廊（她足有十公分高的鞋根是铁的），于是薇罗尼卡睡意顿消，汗湿了毯子，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薇罗尼卡猛然坐起，披上衣服去敲哈奈什大爷的门。害胃病的守门人穿着条纹的睡衣趿着拖鞋，半闭着眼睛给她拧开沉重的门锁，既不惊讶，也不多嘴。在这半层楼的住户中间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如果薇罗尼卡牵一条鳄鱼或是骑着骆驼从楼梯上下来，这位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会吃惊的。

大概还来得及在"宪法酒店"关门以前到那里喝三杯酒，然后在空旷的广场上，在那往往能引起她童年回忆的气味中，在似乎飘着野草、百合花和新割蔬菜的清香中看着这扇大门，等"貘"按门铃的时候，她也随着回家。"家"？……

---

[1] 匈牙利小说中的胖女人往往叫克拉拉。

其实对人说来，有一块自己的天地、有一颗爱自己的心、有一套房子的地方才能叫做家。

在酒店前面停着一辆带白条的蓝色警车，前面是一辆大而无当的囚车，旁边站着几个警察。酒店门两边又各有一个警察，检查从里面出来的惊恐的酒客。薇罗尼卡从他们中间挤进去，想找个熟悉的服务员，这时有人拍拍她的肩膀。

“您的身份证！”

薇罗尼卡机械地把手伸进提包，可是突然停住了。这时不是大脑，而是本能作出了决定：如果把她抓进警察局，那又怎么样？审问，然后由一个警察押送回家，检查，核对她是不是确实住在这里。到那时她可以请警察喝一杯咖啡，然后请他看看这半层楼的实际情况。地段医院的医生已经报告多次了，说这里不宜居住。如果她这样做，对于这里的住户们是不是起些好作用？反正比现在更坏是不可能的了。

薇罗尼卡一惊，她发现面前站着的正好是那个积极的小警察。

“我没有带，”她说。

“您住哪里？”

“哪里也不住。”

“什么意思？”

“没地方住。”

“这就是说，你是没住处的人。”

“是这样。”

小警察抓住她的肩膀领到囚车后面，打开车门，推着她爬上了相当高的、用铁板焊成的车梯。

“进去！”

于是薇罗尼卡跨进了妓女、小偷、流氓、拦路行劫者、无业游民、流窜作案者、劳改潜逃犯、斗殴行凶者、酗酒者、流浪儿童、暗娼介绍者、被悬赏追捕者、乞丐、私卖烧酒者、撬锁犯、自杀未遂者和其他不宜在布达佩斯居住者们的行列。

**柴鹏飞 译**

# 家庭生活

约凯伊·安娜

“今天的电视节目里，黑人出来了两次。”比斯塔兴奋地喊叫着，“今天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他们在跳舞，另一次是别人在揍他们……”

“安静点儿！”他母亲喊道，同时把那个小的孩子拖进了浴室。

科瓦奇·阿隆张了一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每当他特别疲劳的时候，总感到自己的话根本不起作用，至多是作用很小。何况一到夜幕降临，当壁灯射出紫罗兰色的光亮时，他反正要后悔自己的话的。今天，在部里过得很不愉快。一方面天气炎热，而且布窗帘又坏了；另一方面维利大叔跟他过不去。可是又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

“喂……”儿子突然推了他一下，“喂，……今晚让不让我们看故事片？”

“今天不行。明天早晨要上学，知道吗？”他懒洋洋地回答。

“才不是呢！”比斯塔喊道，一边爬来爬去，“你知道吗？明天是下午上课……能让我们看故事片《兵临边境》吗？”

浴室里传出了尖叫声。阿隆从沙发上蹦起来，走到浴室门口说：

"你们在干什么？"

"没什么。"门缝里传出了伊尔玛粗声粗气的声音。"肥皂沫进到她眼睛里去了。"

"让我们看电影吗？"比斯塔扯着父亲的衣襟问道。

"爸爸……爸爸……"克里斯蒂在浴室里尖声地喊着，"已经开始了吗？"

"头别老动……我怎么给你擦脖子？安静点！要不，我揍你！"伊尔玛喊。

"不是只给十八岁以上的大人看的电影么！是打仗的片子。"小男孩用拳头捶打着沙发靠背。

维利大叔一定有原因，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提过意见。两个星期前的一次业务会上还赞扬过自己的工作呢。当时维利说："只要我们有一批象科瓦奇同志这样杰出的专家时……"诸如此类。可现在又说自己的调查不够认真，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而且说到底，这位绍贝尔·维尔莫什[1]究竟是何许人呢？

"既然现在不打仗，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兵？"手脚不停的比斯塔高声问。

克里斯蒂闯了进来。头发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伊尔玛拿着毛巾在后面追。

---

① 维尔莫什即维利。

“克里斯蒂，过来！湿了头发不许看电视！”

“一点也不湿！我的拖鞋到哪儿去了？”

“比斯塔，帮你妹妹找拖鞋！别爬，用笤帚扒出来就行了！”

“在沙发下面……爸爸，你站起来，我拿不出来！”

“为什么到处乱扔东西？”阿隆大声责问道，其实并没有发火。

“真可怕，别这么懒……”伊尔玛委屈地说，“你总是对什么都有意见。没事也找碴儿。”

“警察干吗要打这些人？”比斯塔揪着父亲的领带问。

“他们打谁了？”克里斯蒂问道。

“不知道……我是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

“哟！妈妈，你瞧，我连这个都没有看到。都怪你给我剪指甲。干吗偏要剪指甲呢？”

“你们给我安静点！最好都去睡觉。”

突然，两个孩子象合唱似地喊起来：“我们——是——下——午——上课。”

绍贝尔凭什么说我的调查不认真。我们马上就把会计撤职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们母亲认为好就行。”

“你别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难道他们不也是你的孩子？”

伊尔玛比以往凶得多了。阿隆暗地思忖：“今天白天也许发生什么事了。”

"干吗这么着急?"

"我没有着急。"伊尔玛说着，一边把皱起来的地毯拉平。"只是太累了。我也有权利感到累吧?"看到阿隆没有回答，她又郑重其事地补充了一句:"今天又是我一个人洗的衣服!"

"波莉斯没有来?"

"不,来了。她喝完咖啡后就宣布今天没法干活，因为她的手指发炎了。"

"我的手指也要发炎了,你剪得那么……"克里斯蒂嚷嚷着,仔细地检查自己的手指。

"难道那些警察不可怜他们吗?"儿子问道。

"你是不是傻瓜?警察可怜谁?"母亲反问道。

"那些坐在地上不愿走的人……"

"那么,如果波莉斯的手指真的发炎了，也是可以理解的。"阿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那个绍贝尔为何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呢?

"当然,别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唯独我没法理解。你知道吗?我在单位里,每星期二工作最重。"

"那么把电视关了,你早些睡吧……"

"你只有这么点本事:把电视关了!我喜欢看，你知道吗?看了电视,我才能安定得下来。"

"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只要安静和安慰。"

阿隆叹了口气。回想起了十年前的恋爱生活:郊游、暴

风雨、伊尔玛的那双大眼睛，还有那絮絮细语："我最讨厌安静和一成不变。我愿自己象团火一样地燃烧。"

他注视着伊尔玛。

伊尔玛已经坐下了，腿伸得老远，眼睛盯着电视机的荧光屏，悠闲得好象在游泳池边晒日光浴一样。墙上的壁灯也关掉了。克里斯蒂坐在地毯上，比斯塔在地上滑来滑去。是啊！每个人或早或晚总是会希望得到安静的，但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绍贝尔·维尔莫什这种人，真……

"我真讨厌这老一套节目……爸爸，你说，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关进监狱？"

"因为他们是坏人，是吧，爸爸！"克里斯蒂带点优越感插嘴说道。

"我的好儿子，以后我讲给你听，好不好？暂时你先记住：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就行了。"

"那么，在监狱里管犯人的是好人吗？"

"你真是个笨蛋！等你长大了，一切都会明白的。"伊尔玛一本正经地说。

比斯塔不吭声了，闷声闷气地坐到克里斯蒂旁边。可是他没有看电视，两只手不停地玩着衬衫的扣子。

"波莉斯还说，我洗一次衣服，戒指也掉不下来。你想一想，多气人。"

"那你为什么不把她轰走?!她既然这么放肆，为什么还要付工钱给她？"

"为什么？因为有人总比没有人强。我没有象斯泰菲

那样好福气。她的丈夫是个医生，还帮着干家务活，掸地毯。人家也没有因此感到不好意思。”

“你的这些榜样人物……尽是些不学无术的废物。”

“好……侮辱人是你的一贯伎俩。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从出版社回来之前，你把家里的一切都给我拾掇好。我想，你的戒指也不会从手指上掉下来的。”

“不会掉下来……”阿隆笑了起来，但马上又沉默了。

伊尔玛跳起来说：

“你笑吧！你以为我已经忘掉婚后第二个星期，你就去变卖结婚戒指的事了吗？”

“我没有卖掉。当时还不是为了带你去跳舞，我才把它送进当铺的。”

“谁说让你带我去跳舞了？你把当票卖了，和卖戒指还不是一会事?!”

“你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当票让我弄丢了？”

“电影开始了……开始了！”比斯塔喊了起来。“多好啊！”

阿隆走到厨房去热咖啡。伊尔玛紧跟着走进去。

“没有一个晚上安安静静，从头至尾看完节目的。这就这么难吗？”

“我喝杯咖啡总可以吧！”

“谁说不让你喝了？”伊尔玛气得发抖了。她的头发贴着头顶，早就该去理发馆了。粗布罩裙的带子松松地拦在腰上。乳房有点下垂，绿色的眼睛里混进了一丝灰意，嘴唇似

乎被染上了一层薄薄的棕色。但是即使这样，伊尔玛看上去还是很漂亮——阿隆判断着自己的妻子。三四天前去娘家作客时，她穿着毛衣，带上绿松石的项链，再配上一双蛇皮皮鞋，风韵犹存，很多人都回头打量她。可见问题不在这里。

“你不知道，我累了？一整天匆匆忙忙的，象个疯子一样。快下班时，我才拿到排字清样。没法推给别人。今天又是那个笨蛋索约姆排字，第一百十二页上尽是错。”

“你以为，我整天是在挂满彩灯的花园里参加晚会？你们那儿的工作节奏能和我的相比吗？我已经说过上百次了。我的工作是一般人干不了的。”

“说来说去总是只有你……”妻子粗声粗气说道，“总是只有你……”

“而你呢？你除了自己以外还关心谁？”阿隆说着拿起小匙搅咖啡。他实在不想争论，只想倒在床上睡觉。要象牲口一样干活，连一丝安宁都享受不到。

“我现在什么声音都不想听……”

“那你可以躲到橡皮房子①里去，以后我和孩子们也会到那里去的。”伊尔玛说着，委屈地哭了起来。煤气管有一些漏气，发出臭鸡蛋的气味。阿隆打开了厨房的窗子，伊尔玛一步跳到他跟前，又把窗子关上了。

“干什么，谁在找碴儿？又不是你吗？”

① 关疯子的地方。

阿隆感到自己的怒气越来越膨胀了。

“我？不是你先数落孩子们的？”

“什么？嗨，我说什么了?!”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活象古代战役中进行殊死搏斗的武士。伊尔玛的眼睛紧盯着桌子上的黑色咖啡杯。“这是整套餐具中的一个。这疯子可能把杯子扔过来。”阿隆的心里却祈祷着安静的来临，哪怕这疯女人昏厥过去也行。“这个缺德的暴君，以前你还吻过我的屁股呢。”女人想道。“当一个女人离开‘温柔’两个字时，完全是混蛋一个。”阿隆咬牙切齿地在肚子里破口大骂。

他们两人虽然不出声，但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短时间的僵持过去了，阿隆搂着伊尔玛的肩说：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你知道，我也是。”伊尔玛叹息了一声，抚摸着阿隆的耳朵。他们喜欢休战。在这时刻，互相拥抱一下往往是很够味的。“现在只靠两个字维持着我们相互的关系——撒谎。”阿隆想道，“我们两个谁也不会向对方缴械的。”

“电影已经开始了。”阿隆说着话，把手伸向伊尔玛的胸部。伊尔玛娇嗔地咬着她男人的手。

“就在这儿？”阿隆问。此刻他已经把绍贝尔忘得一干二净了。

“嘘！”女人表示同意，马上熄灭了灯。

“把煤气点着，好让我看清你……”男人要求着。伊尔玛呐呐地发出几个声音表示不同意，还是暗一些的好。他

们俩互相拉扯了一阵，很快就合拍了。

房间里传来了克里斯蒂的喊叫声。来得正是时候，两人正好借此结束。夫妻俩跑进房间，看到比斯塔把床单扔到克里斯蒂身上，然后把她裹起来。他得意地喊道：

“核桃在这儿咕咚咚响，花生也在这儿……”

克里斯蒂的眼睛被他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害怕得哭起来。伊尔玛走过来，打了比斯塔一记耳光。

“你不心疼自己小妹妹，你是个畜生吗？”

比斯塔莫名其妙地摸着自己的脸颊，然后他也喊起来：

“我是跟她闹着玩的，玩也不行吗？”

“你们是怎么看电视的？”阿隆也冲着克里斯蒂高喊，“一会儿我把东西都砸了，看你们还闹不闹？”

孩子们安静下来了。他们坐在地毯上老老实实地看着电视。

伊尔玛也坐了下来。阿隆松了一口气，蜷缩在沙发角落里，希望别人把他忘却了。如果把今天关于绍贝尔的事告诉伊尔玛，她不外是挖苦或是同情，但这二者他都讨厌。退一步说，挂冠而去，离开这个部，也未尝不可。自己政治上清清白白，虽说不在党内，却也没有退过党，这是好的方面。说到底，如果自己的工作得不到赏识，那么干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把他的一部分工作分配给那个胡萨尔干，已经是第二回了……这种人纯粹是个混饭吃的小市民，平庸的小会计。正派的人往往总是受到排挤的。

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电视。画面里一个少校——在

什么战役里——在发布命令。士兵们立正，双手紧紧地贴着大腿，满脸是尊敬和绝对服从的表情。少校以长辈的优越感敬了个礼，士兵们迅速而又机械地散开了。少校神气活现地立正，接着是他的特写镜头，清楚地显示出他那勇敢的眼睛、坚毅的鼻子、闪闪发光的肩章。

比斯塔说：

"这些人也是奴隶吗？"

伊尔玛厌烦地说道：

"你又在乱讲些什么，没有看见他们穿着军服吗？"

比斯塔看了看他母亲，张着嘴，一分钟后又闭上了。

克里斯蒂说：

"我秋天上学以后，不会象你这样念的……"

"在说什么，你这个小混蛋！"比斯塔的脸都气歪了，用拳头捶打克里斯蒂的头。

阿隆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都是畜生……你讲，你是不是畜生？畜生！畜生！怎么样，是不是？"一面说，一面拳打脚踢。

克里斯蒂高兴得拍着手笑了，脸上露出了两个小酒窝。

"这个妖精真漂亮。"伊尔玛边想边把比斯塔从他父亲身边拉到另一个房间里。

"干吗发那么大的火？他们毕竟还是孩子。"

"我发火？！我的责任是教育他们。"

"这，难道不也是我的责任？你从来也不管他们，就会揍孩子。"

“丢脸的是，总是我比你要管得多。克里斯蒂的袜子已经穿了六天了。”阿隆高声地喊道。实际上，他也知道只应该说两天。一种言过其实的要求，促使他大声嚷嚷。

“是谁要孩子了？是你，还是我?!我早就说过了，但是你就是要孩子。那么，现在，请吧，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伊尔玛激动地尖声喊着：

“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喜欢了?!”她放声大哭起来，紧紧抱住克里斯蒂。可是小女孩却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来，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光屏：那儿正好在杀一个什么人。比斯塔又在门口出现了。伊尔玛奔到他跟前，扑在孩子身上：

“我们现在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妈妈多么可怜！你都看见了吧，小儿子。多可怜的妈妈！到妈妈这边来……”

比斯塔安静地待了一会儿，在妈妈的怀里找到一个空隙，他从那里伸出手来，拍拍妈妈的背说：“妈——妈……”

“嗯，我的小儿子，……”

“妈妈，我想要一顶船长戴的帽子。”伊尔玛的哭声戛然而止，推开了儿子，把脸转向墙壁。

阿隆深深地陷在沙发床的角落里。

电话铃响了。伊尔玛没有动弹，男人只好磨磨蹭蹭地爬起来。

“你妈妈找你……”他懒洋洋地说道。伊尔玛走到前厅去听电话，很快就回来了。

“她找你干吗？”男人阴阳怪气地问道。

“心跳过速，老毛病又复发了。我要去一次！可是，我这个样子……算了，让她自己服药吧！”

她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再也不看电影了，把额头顶在窗上。这玻璃窗一个月只擦一次，上面有好多模糊的、小饼一样的油渍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她要哭，就哭吧！最好别在这儿。不哭也够烦的了。”男人想。

士兵们在泥泞的土里艰难地往前走着。满脸是坚毅不拔的表情。真是部再糟不过的影片了。阿隆想，“我能找谁去诉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呢？”

他在脑子里把熟人排了排队，结果反而更加泄气了。当年，还是大学生时代，有一次在学校里发牢骚时，发现同学们在背后讥笑他，尽管大家否认，但他还是发誓：以后再也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心事。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有雄心壮志，要成为一个人物。可是，要成为一个人物，谈何容易，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倒不是为了钱，而是要别人觉得自己是个不可缺少的人……说到底，每天早晨踏进办公室还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吗。他们不是平白无故地发给他这些奖状的。但问题是，如果你老是出类拔萃，就会引人们的嫉妒。

“你也会犯错误的，我的阿隆卡！你也不是圣人……这次可是出了个双料差错！”

喔，多傲慢！沙莉还为这老头说话。“你瞧，他对我倒是不错。”她边说边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他让我带孩子去疗养。”

她需要二百福林，因为她有颗假牙的牙冠松了。“都是你给撞出来的。”她娇滴滴地说。意思就是说，有这二百福林就算了却他们间的这桩公案。女人嘛，就是这样！好在他没有对沙莉抱什么幻想。“我需要她。”阿隆在沉思中耸了耸肩。“就好象我讨厌老是在一个地方，用同一个杯子喝咖啡一样……对沙莉不用很费劲，老和伊尔玛在一起，有个沙莉捶捶胃口，倒也不失为赏心乐事。”

伊尔玛回来了。合着手，把手指关节捏得格格作响，脸上又湿又脏。我的上帝，暴风雨要来临了。看来今天是怎么也逃不过去的。

“请你出来一下，一分钟就行。不用害怕，我不发脾气了，只想再和你商量一下。”

阿隆真想逃之夭夭，但又怕伊尔玛打孩子，乱摔东西。

“你又要干什么？”阿隆厌恶地问道，“你下决心不让人安静一会儿？”

“请你理解我。难道你不明白，我只是……”

她扯着嗓子，带着哭调喊道。

“都是些什么东西！”阿隆咆哮着，跳了起来，“只想着自己，谁都只关心自己。”

比斯塔叫道：

“爸爸闪开点！我看不见电视了。”

阿隆颓然倒在沙发里，能躲到哪里去？该怎么办？身

上只有一张二十福林的钞票，去哪里也不成，何况明天早晨这场面还会继续下去。

“这样也好。”女人突然停止了吵闹。她的声音里几乎充满着得意和挑衅。她抬起了头，高傲地噘着嘴唇说：“明天这里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对我来说，你一钱不值，完全是一个大〇蛋，懂吗？等于零。以牙还牙，我要给自己找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一定会找到的。”说着委屈地坐在椅子上梳起头发来。

“找去吧，尽管找去吧！”阿隆蔑视地说。

“叫我找！”伊尔玛又高声地叫起来，狠狠地把梳子扔到地上。“我就找！”

“他们是要开枪打死这人吗？”克里斯蒂紧张地喊道，摇着父亲的胳臂。

阿隆没搭理她。

电视上的田野里有一个士兵在走，有一群人从森林的深处向他开枪，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其他人都在什么地方？”比斯塔问。

“不在这儿，你难道没有看见？”克里斯蒂带着教训的口气说。

电视上的士兵继续走着，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子弹的呼啸声，也没有卧倒，只是往前走着，小心翼翼地不让靴子埋在深深的积雪中。当他中弹后，还是不停地拔着靴子，弯着腰，只见得到衣服，不久——一个艺术手法——人就消失在鹅毛大雪中了。

这时，荧光屏上出现了两个清楚而明亮的字：剧终。

伊尔玛关上了电视。片刻的安宁给阿隆带来了无限的恬静之感。温柔而又舒服的黑暗代替了满怀恶意的、银蓝的荧光。可是，随即乳白色吊灯亮了。伊尔玛把拚命抵抗的孩子拖进隔壁的卧室里。

"爸爸！叫爸爸来，我不睡。"比斯塔在屋里喊得越来越响了。伊尔玛把他扔到床上，转身就出来了。

"对不起……你的儿子有话跟你说。"她讥讽地说。

阿隆叹了一口气，不进去也不行。这孩子比他妈妈还闹，不进去，他是不会安静的。克里斯蒂躺到枕头上就睡着了。比斯塔却裹着被子在床上等他的爸爸。

伊尔玛走到厨房里，用温毛巾按摩心脏。"让他来找我，必要的话，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早上。"她暗自下了决心。

"你也别想过好这夜。你这个坏蛋！"她心里骂着，一边开始挑选明天晚饭吃的大米。

"这是怎么回事？"比斯塔在卧室里问爸爸，"为什么人们爱杀人？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事情你还不懂，我的儿子！"阿隆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孩子说，"人们本来不喜欢这样做，可是又必须这样做，因为坏人太多。"

"因此，我们要杀印第安人？"

"我们是指谁？你、我，还是你母亲？别胡说八道。我们还没有看见过印第安人呢！"

"但是人们尽互相不喜欢……那些人和这些人……我

们或者是……也就是说，这样做也很不好，是吗？”

“别去管这些事，我的儿子。”阿隆叹息道。孩子成熟得太早，想得太多，这对他不合适。他的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应该和他说些有用的，说些既动听而又真实的，说些能让孩子安定下来的话。

“主要的是我们要相亲相爱，要高高兴兴地生活，要牢牢地记住这些话。”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深沉，把自己也感动了。

“我们？”孩子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们，就是妈妈、你、克里斯蒂和我。全家……”他用手模糊地划了一个圈子。

比斯塔看着他，诧异地什么也没有说。他拨弄着父亲手上突出的青筋，然后躺下来转到一边，眼睛睁得老大老大。

阿隆关了电灯，手按着额头在房内踱了一会儿。屋内不太暗，路灯的灯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射到房间的墙上，随着窗外的风，时窄时宽，看上去象金色的栅栏一样。

“管他什么事，睡一觉再说吧！”阿隆呐呐地说。他记得三十年前，他父亲上床时就是这样说的。

曹慧清 译

# 重　　任

拜尔陶·布尔丘

从早上七点开始，他就站在镜子面前刮胡子。可是，很不顺手。不但头疼，胆囊也每隔四分钟就抽搐一次。剃刀在他颤抖的手里很不听使唤。脸上已有好几处被刮破了。他感到一切都身不由己，不禁悲从中来。当胆痛发作时，他一动也不能动，站在镜子前面呆视着自己。只见镜子里映出一个五十多岁陌生的男子，正烦躁不安地在看着自己。这张在操场上被晒成棕红色的脸庞现在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色泽，而是令人奇怪地发着暗青的颜色。细细的血丝把眼球分割成好几块。他记得，每当自己因为胆痛停止饮酒，几星期后眼球上的血丝就自然地消失，只是眼白已无可挽回地变黄了。然而最不习惯的却是没有胡子。胡子是在一九六〇年，当他想回部队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时候刮掉的。从那时起，他就老是感到自己和原来的他不一样了。博尔达奇·伊斯特万现在是工会的一个副科长，每天应付几份报告，承上启下；有时候还可以拧拧女打字员的大腿。他和原来的博尔达奇·伊斯特万大不一样了。原来的博尔达奇·伊斯特万是个上尉。在夏季军训时，有力的口令声，能把森林里的老

鹰吓得从窝里飞出来。

镜子里还是这张脸。当胆痛缓和的时候，他就伸手到自来水龙头前，摸摸啤酒瓶。已经用冷水淋了半个多小时了。瓶子可真凉啊！嗓子直发干，该喝了！但是他又想：得先把胡子刮完，才可以打开啤酒瓶，因为很可能越刮到后来手抖得越厉害。于是，他又拿起剃刀刮了起来。房间的收音机里马特·彼得在演唱《落叶枯黄》，不知怎的，胃也开始疼了。他放下剃刀走进房间，把这又老又破的蹩脚收音机拧轻了一点，然后又回到了盥洗室。食堂卖饭票的玛札特别崇拜马特·彼得，而且也喜欢听《落叶枯黄》这首歌。可是，博尔达奇对这位玛札甜腻的感情却感到是个沉重的负担。他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定了定神，发了个狠，坚决地拿起了剃刀。这会儿，他的动作很利索。“嚓嚓嚓嚓……”一会儿左颊上的胡子全没有了，光滑干净，象被镰刀割过的草地一样。只是在耳朵那里出了点小问题，剃刀碰了下耳垂，流血了。本来，耳朵上的汗毛已经刮掉了，可是往下放剃刀时手又抖了起来。其实，只是刀尖蹭了一下耳垂，伤口也只有一二毫米长，但暗红色的鲜血不断地在往外流。右边脸颊上和耳朵周围还没有动呢，可现在他不敢再刮了。他凝视着鲜血，不明白，自己的血怎么会这么黑，这么浓。便不由得惊慌起来，害怕自己的血在某一天早晨会不知不觉地凝滞不动了，血液不再循环了，那自己就一命呜呼了。“应该去找大夫看看。”他想，但是这却比死更令人望而生畏。

突然他又把手伸到水龙头前摸了摸啤酒瓶。啤酒已经和水的温度差不多，已经达到顶点，不可能再冷了，该喝了吧。他把啤酒瓶从水中拿出来，但是稍一动，就发现自己右脸颊上还满是肥皂泡沫。"博尔达奇，遵守纪律！我们是军人，还是磨刀匠?!"破嗓子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他狠狠地看了一下镜子，重新把啤酒瓶放回到水龙头底下，拿起剃刀一使劲，又把脸刮破了。他发着狠，对此全然不顾，大声地叫道："来吧，那不勒斯[①]镰刀！越过脸颊，割吧！"刀光闪闪，可是顿然又惶惶然地慢了下来。没有出什么问题。现在，刮脸刀慢慢地移动着，发出吵吵的响声。对往事的回忆给他增添了力量。手已经不颤抖了。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刮完了脸。其间，他好象看到了小沙什跳到桌子上高声喊着："我有那不勒斯镰刀。谁也不许动，小心我给你一刀！"小沙什当年是反间谍上士，曾经被派到西方去抓一个霍尔蒂分子。他在那不勒斯买了一把很大的刀子，锋利的刀刃足有三十四厘米长。刀把非常别致。一年夏天，部队在佩奇进行训练。某天晚上，全团的士兵被邀请去参加附近沙卡茨村的收割舞会。这引起了当地小伙子们的不满。半夜时分，在酒馆厨房屋顶的烟筒和拉科西·马加什肖像之间爆炸了一个做苏打水的压力瓶。这时小沙什拿着他在那不勒斯买的"镰刀"跳上桌子。接着，不知道是谁关了电灯，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全武行。

---

① 意大利的地名。

博尔达奇洗干净脸上的肥皂沫，然后敏捷地在水龙头下拿起了啤酒瓶，在洗脸盆边敲开了瓶盖。盆边的这块地方搪瓷早已脱落。瓶盖的牙边在铁皮上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小沟。他贪婪地喝着啤酒。这一天早上，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还是个人，活着。他大口大口地咽下啤酒。清凉和苦涩的味道滋润了嗓子，使他的肠胃恢复了功能。“还是活着的好。”他想道。又喝了一口，只剩下半瓶啤酒了。当他发现这一点时，一阵忧伤的情绪涌过心头。他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脸上有六处伤口在流血。他把啤酒瓶放回到洗脸池的中央，然后走回房间。找到了卷烟纸，在每一个伤口上轻轻地、仔细地按了按。这时，收音机正开始演奏《马赛曲》。他出去抓起啤酒瓶奔回房间，把收音机的声音放大，注意地听着这曲子，然后等了一会儿，却什么事也没发生。播音员无精打采的声音在重复着当天的重要新闻，这些新闻从早上到现在已经重复了好多次了。博尔达奇感到有些失望。原来他还以为只是在马特·彼得和希茨·尤迪两位歌星的节目之间才穿插播《马赛曲》。后来他又想，也许在播送《马赛曲》以前已经说过点什么，只是自己在盥洗室里没能听见罢了。最后他失望地环视了一下房间。只见他的父母亲杰尼斯·安娜和博尔达奇·伊格纳茨从一个已经支离破碎的雕花镜框里瞪着他。他妈妈是一个从奥尔弗尔德[①]地区来的纺织女工；他爸爸是一个老工人，在布达佩斯郊区一个浇铸

---

① 在匈牙利东北部的大平原地区。

工厂的灰暗的清砂车间里度过了疲劳的一生。这张照片是在一个星期天拍的。消逝了的岁月使照片褪色、发黄，染上很多斑点。在父母亲照片的左侧，在床头的上方，挂着他自己的一张相片：留着小胡子的博尔达奇上尉，充满信心，英姿潇洒。旁边有一张宽幅的夏天风景画，背景是一排帐篷，帐篷前站着一些军官。法尔卡什·米哈依[1]正在和博尔达奇上尉握手。在柜子的那头也挂了一张类似的风景照片。这是在一个广场里拍摄的。广场附近有一棵橡树，但照片里只能看到它的几根低垂的树枝。在这幅照片里有许多军官。普什卡什·费伦茨[2]也穿着少校制服站在他们的中间。大约在二十年前，博尔达奇弄到了"老弟"花哨的签名，把它也挂在这张照片的下面。除上述几张照片外，挨着衣柜还有一张画。这是一张剪报，上面是著名好莱坞电影明星安妮塔·爱克贝尔格，她骑在一匹灰色骏马背上微笑着。博尔达奇的目光从头至尾把这些照片扫视了一遍，最后停留在放满脏杯子和空瓶子的桌子上。在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中间只有三件东西多少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副用旧袜带箍起来的、玩得边上发黑的匈牙利扑克牌，一把玳瑁梳子和一张精致的请帖。

他咕嘟咕嘟地喝着啤酒，眼睛看着桌子。扑克牌没有使他产生兴趣，梳子也没有引起什么愉快，反而产生一些反

---

① 五十年代初匈牙利国防部长。

② 匈著名足球运动员，授少校军衔。当时球迷都呼其为"老弟"。

感，想起了卖饭票的玛札闯入他生活的一段往事：通常，他和有些人一样，每月二十日左右从玛札那儿借一百福林。按惯例在下月一日以后还给她一百二十福林。实际上玛札借给他的钱全是工作人员的伙食费，而不是她自己的钱。因为大多数职工都在月初缴付一个月的饭费。而食堂则是一星期结算一次。这样，玛札每次只要上交一个星期的饭票钱，而把剩余的钱转手借出去。博尔达奇已经记不清楚，这个玛札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到他这儿来的。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可是却老是没完没了似的。因为玛札从来也不想回家，即使走了，也总是把什么东西遗忘在这儿，这样她第二天就可以回来拿东西。这是一个巧妙的把戏。白天，在机关里她从来也不告诉博尔达奇自己在他那里忘了什么。只是客气地、象小姑娘似地向他微笑。可是，晚上她却突然翩然而至，好象只是在最后半小时才发现自己的吊袜带，或是梳子、围巾、发卡、粉盒也许内衣裤遗忘在博尔达奇的房间里了。玛札巧妙地把这些东西遗忘在这儿，以致博尔达奇从来不能及时发现她的诡计。等他看见她的东西时，往往已经是第二天晚上，而这时玛札已经在按门铃了。

博尔达奇瞟了梳子一眼，脸上掠过一抹狐疑。现在还只是早上，却已经发现了梳子。事情发生得似乎太早了。但是，当他看到梳子和桌面上棕灰色的窟窿浑然一体，有如在脏杯子和烟灰碟中消失了的一样，便放下心来。卖饭票的玛札不知道，博尔达奇今天请了一天假，能有这么长的时间在房间里闲荡，消磨时光。要是象平时一样，博尔达奇总是匆

匆忙忙地刮一下脸，在盥洗室用水猛冲一下就到工会上班去了，根本无暇顾及桌子和其他东西。只是到了晚上，当他无精打采地要去洗杯子时，才会发现这把玳瑁梳子。

在扑克牌、梳子和烟灰缸的旁边还放着一张请帖。它的洁白颜色与其他东西显得极不协调。请帖上的书法说明了他的身价。博尔达奇在工会常常收到请帖，但往往总是顺手把它们扔到废纸篓里。两天前，他收到这张请帖时，也是习惯地连其他请帖顺手推到桌子边上，只是在午饭后才发现了它。当时他正在抽烟，思索着星期天去看拳击比赛，还是去克巴尼奥打地滚球。这时，突然"军官授衔仪式"这几个字跳进他的眼帘。他捡起了请帖，读了起来。好象触电似的，双手颤抖着，香烟也落到了地上。一九五七年他与军队的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从那时起，只有唯一的一次是被召到后备军司令部去更换军人证件。

一种捉摸不定、使人不安的希望在心头浮现：莫非要把他召回部队去？也许某某人想起了他；也许是国防部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某某人调到部里后想起了一些当年从生产第一线去当兵的老战友。这些人不是农民，便是安焦尔弗尔德[1]的棒小伙子。

博尔达奇在桌旁再也坐不住了。他走到楼下小卖部喝了半杯桃子酒，一面喝，一面出神地想：到底为什么要邀请我去参加"军官授衔仪式"呢？肯定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军

① 在布达佩斯郊区。

队里事无巨细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在这个典礼上将会有人走到我的面前，此人也许是总政治部的一名老军官。他的身分至少也得是个少校或是中校。他将会跟我说："您是博尔达奇同志吗？……"嗯，会来找我的……

当他回到房间，科长正在等他，催他作统计报表。此刻他一看到这份请帖，就好象看到了自己如何默默地拿起它递给科长。科长看了一下，然后带着疑惑的目光看着它。

"我明天请一天假。"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接着是科长的声音："为了这件事还要动用假期？你去吧，事情完了后去办公楼看看就行了……"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摇头，请女秘书给他办理请一天假的手续。

他喝完了剩下的啤酒，然后把瓶子放回桌子上。他的动作依然跟军人一样有力而准确。瓶子碰在桌子上，发出"啪"的声音，差一点碎了。他走到盥洗室里，洗了把脸，然后到镜子前去梳头。镜子里还是那个陌生而浮肿的脸庞，使他恶感倍增。当年坚毅沉着棕色的脸上还有一撮发亮的小胡子。如今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他非常后悔，那时真不该把胡子剃掉了……缺少了胡子整个脸就破了相。顿时感到疲乏，真想睡个觉。

最近五年来，博尔达奇在早上总是感到很疲惫。刮脸，梳洗，穿衣……使他总有精疲力尽之感。因此，每当到了该去上班的时候，他总是有一种感觉：好象一天过完了，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好象不是去工会大楼，而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起码是象到某一个露天花园饭店喝几杯啤酒解

解乏似的。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工作着，只是在某个命名日或者什么较大的节日前，科里拉来整箱整箱啤酒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在工会工作倒也相当不错。

上午十点，他骄傲、激动地站立在广场观礼席上。军乐声响了，喇叭在太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他的周围站着军队的代表、警官、工人纠察队员和许多便衣的客人。有几个妇女在擦眼泪。博尔达奇斜睨了她们一眼，想着：这些人大概是将要被授衔的军官们的父母。他以相当好的心情聆听着口令声，当戴白手套、手持武器的士兵出现在广场上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觉。他笔直地站着，聆听着国防部长的讲话。当一个一个高级军官从他身边走过时，肃然之感油然而生。年轻军官的仪仗队在越过观礼席时，他的心似乎跳到喉咙口，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了。只是在好几天以后，他才明白，是仪仗队指挥官手中的那把刀激发了他的这种激情。这刀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记得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①英雄广场的阅兵式上，他也是手执指挥刀走在他所指挥的队伍最前列。就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的手指似乎仍能感到当年紧紧地戴在他手上的柔软的白手套和由于紧紧握刀而产生的微微痉挛之感。无疑，这快感将会伴随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就这样站在观礼席上。当军官授衔典礼结束时，他

---

① 匈牙利解放日。

不知道干什么好。身边的军官们都遇到了老战友。他们边聊天，边朝着某一个方向走去。父母、兄弟、未婚妻们慢慢地形成了一伙伙在互相交谈。旁观的群众中有很多人也纷纷走到观礼的地方来了，观礼席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他感到继续在那儿站下去有些可笑了，于是就无目的地、惆怅地挪动着脚步。这时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博尔达奇同志，别这么急着走！”

他转过身子，看见一个稍稍发胖的军官站在自己的面前。这个人叫雷迪·盖扎，是当年部队里的政治委员。那时只是个大尉，现在已经是中校了。“如果当年不是那样，那我现在是什么军衔？……什么军衔？”博尔达奇的脑子里掠过了这一想法。他伸出了手，由于紧张，手指有些颤抖。

“祝贺您有这么优秀的儿子。出类拔萃的人才，学校里的优等生。”雷迪说着同时把一个表情沉着、棕色脸膛的中尉和一个奇怪而瘦小、显得相当老的妇女请到自己的面前。

博尔达奇的脸抽搐了一下。他看了看雷迪，然后又打量了一下这个妇女。这妇人含着骄傲的微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

“比斯塔① ……”

博尔达奇莫名其妙地凝视着这个老气横秋的妇女。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瓦什·爱泰尔吗？他蓦地记起来：二十二年来，上个月才停止从他的工资里扣除孩子的赡养费。他

① 伊斯特万的昵称。

以为是人们忘了扣这笔钱，于是便花掉了，接着也就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可现在，这突然出现的场面，使他相当难堪，可是两天来激励着自己的那颗希望之星却又不肯倏然熄灭，于是当着雷迪的面强打精神，强颜作笑地说：

“你们好吗？爱泰尔。”

“谢谢，比斯塔，还凑合。”

这时，年轻的中尉向前跨了跨，立正敬礼：

“小博尔达奇中尉向您问好！”

“稍息！”博尔达奇说完拍了拍中尉的胳膊，没有碰他的肩。

雷迪中校又说话了：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博尔达奇同志，现在您们大家都应该下来喝杯啤酒，吃点东西高兴高兴。”

“我知道。”博尔达奇说着举起手准备敬礼，突然想起自己只是个平民百姓，手不由自主地便落了下来。

小博尔达奇建议去“蓝色多瑙河”餐厅，因为那里最近，而且他昨天已经和未婚妻约好了，授衔仪式结束后在那儿见面。

多瑙河上清风徐来，餐厅凉台上的桌布轻轻地飘拂着。博尔达奇要了三升啤酒，三份煎猪肝。幸好，服务员立即把啤酒拿来了，他马上就埋头到酒杯里喝了起来。

“多好的啤酒！只有桶装啤酒才值得喝。”博尔达奇说道。他一边喝一边计算着：他只有一百福林，如果一份猪肝二十福林，那末三份就要六十福林，再加上啤酒……剩下的

钱够不够付三升啤酒的钱？

“这儿的啤酒一直是不错的，还有肝，都是第一流的。”中尉说。

“风景也很美。”瓦什·爱泰尔插话。

“木桶里的啤酒才是真正的啤酒。品得出来，这是木桶啤酒。”博尔达奇说着，又喝了一口。这时，他忽然想起来，在一次足球赛后，为了怕同伴们敲竹杠，他偷偷地把五十福林塞进了表袋。这是什么时候？是去年吗？也许是在M-TK队大出其丑的那次比赛？他偷偷将食指伸到表袋里。那儿果然有张五十福林的钞票，他松了一口气。“我可以要二升啤酒。”他想，“回头看情况办，也许他们回家去了，或是……”

“琦拉也喜欢喝桶装啤酒，别的她都不喝。最多也只能喝一杯啤酒。”

“谁是琦拉？”博尔达奇问。

“一会儿你就会认识的，是个很好的姑娘……”

“那么，让我们为今天大喜的日子喝上一杯！”博尔达奇说着拿起酒杯，大家也跟着喝啤酒。博尔达奇看了一下多瑙河。只见一只老式的轮船静悄悄地往下游驶去。甲板上大约有十个到十五个人在散步，晒太阳。有一个男人坐在离栏杆很近的帆布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只啤酒瓶。博尔达奇这时真希望自己也能坐在船上。他羡慕地看着这艘船和在甲板上闲眺着的人们。他想：这些人晚上可以到莫哈奇。他们在那儿将吃些什么呢？鱼汤和奶渣拌面条，还是其他

什么……

“我本来以为，您今天会穿军服来的。”

“啊？”

年轻的中尉重复了一遍：

“我本来以为，您今天会穿军服来的。”

“我……？为什么？”

“这个，我想，您既然要来……”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博尔达奇开始解释，但是他没有能说下去，因为中尉已经插话了：

“妈妈说，您负有特别使命……但是现在，这么多年以后，您回来了，我想……”

“从哪儿回来了？”

“从哪儿……我没有问过。”

博尔达奇仔细地端详着中尉，感到很象自己：黑头发、棕色的皮肤。有时当他想起这件事时，总把这孩子想象成一个金头发、瘦骨嶙峋的孩子。费歇尔上尉也是金头发，小个儿。那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费歇尔经常到厨房里去鬼混。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转业的。”

中尉大吃一惊：

“妈妈总是说，您负有重任，在远方……”

瓦什·爱泰尔说：

“我生活的目标就是教育我的孩子当一个军官。当一个象你这样的军官。比斯塔，我老早就……我感到，没有比

当军官更好的事了。当一个军官，那才真是了不起，如果一个人当上军官……”

博尔达奇惊讶地呆视着瓦什·爱泰尔，在她的脸上寻找当年所熟悉的东西。他几乎记不起她的脸庞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他们在路上相遇的话，肯定是认不出来的。爱泰尔也许只有四十八岁，但看上去却已年逾半百了。长年累月的劳累，使她变得既瘦又小。他凝视着她。忽然脑子里浮现出当年政治委员的办公室。政治委员雷迪坐在桌子的后面，抽着雪茄。他抽的是琼戈尔牌。当时部队正好在外面进行夏季训练。博尔达奇奉命从作业的地方前来，但不知道自己回来干什么，只是在办公室站着，等着。雷迪从桌后站起来，抽着烟来回踱着。最后说：

“喏！说吧……”

博尔达奇莫名其妙地站在办公室的中间。

“汇报吧……”雷迪重复了一次。

他已经记不得当时自己说话的声音，但清楚地记得自己说的话：

“博尔达奇上尉到……报告，我不知道要谈什么。”

“瓦什·爱泰尔。”

“瓦什·爱泰尔？报告，我不懂……”

“瓦什·爱泰尔在我们的厨房里工作。她是个洗刷女工。现在怀孕了。我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责任。”

“报告……”

“娶她做妻子。匈牙利人民军里的一个共产党员军官，

对吗……是不是……”

“大尉同志，可是为何偏偏要我娶她？”

“瓦什·爱泰尔说的，你是孩子的父亲。”

“我？”

“婚礼订于七月十一日十时举行，在佩奇市政府大楼。自己带证婚人。我说完了。”

“明白了，七月十一日十时举行婚礼。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上尉。”

餐厅服务员把盘子放在桌上，还有面包、盐和辣椒。博尔达奇伸出手指示意，还要三公升啤酒。煎猪肝发着诱人的香味，博尔达奇用叉子往嘴里送了一块。他嘴里嚼着猪肝，眼睛却看着爱泰尔。关于这个女人的情况，他当时其实一无所知，甚至连她是城里人还是农村来的都不清楚。她到底现在住在哪儿？是在布达佩斯，还是仍旧在佩奇？她现在在干什么事？她能干些什么呢？

他拿一片面包蘸了一下炸肝汁，然后向爱泰尔说：

“爸爸还活着吗？”

“什么爸爸？”

“那个……你的爸爸……我记得……”

“我小时候爸爸就死了。”

“我忘了……对，是在科瓦奇泰莱普……”

“科瓦奇泰莱普，比斯塔？”

“你妈妈不是住在科瓦奇泰莱普吗？”

“不是……我妈妈也早就去世了。她原来住在莫纳尔

镇。我也是从那儿搬到多瑙河西部那边去的。”

“啊哈，莫纳尔镇，是在奥尔弗尔德平原……”

爱泰尔高兴了：

“是的，在奥尔弗尔德平原……这些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

博尔达奇咽下了一大块蘸了汁的猪肝，发现爱泰尔不在吃，而是带着一种迎合，并且稚气的目光看着他。他还记得这个目光，但是在哪儿？在什么地方她也是这样看过我的？

“吃吧，爱泰尔！肝都凉了……”他说。

“今天这个日子使我高兴极了。比斯塔，我兴奋得都吃不下去。我的小比斯塔也成了军官。军官……这多光荣啊！而且今天我们又聚在一起吃饭，一起喝啤酒……”

“你吃吧，爱泰尔……”

“琦拉该来了。”中尉说道，一面不安地看着外面的街上。

博尔达奇正准备叉着面包去蘸酱汁时，突然把叉子和面包又放下来了。

“你也不吃了，比斯塔？”

“我吃，只是在等啤酒。”

他已经回忆起来了。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在市政府大楼的走廊里，她也是这样看着他的。这算是什么婚礼啊……七月十日那天，他和两个证人大汗淋淋飞奔到了佩奇市。两个证人是霍尔瓦特上尉和维多绍上士。他们三个人

是掐着时间出发的，一分不差地赶到市政府大楼。他们把马系在花坛边的栏杆上，然后走上楼去。这时正好是十点整。瓦什·爱泰尔焦急地站在昏暗的走廊里。当他们到达时，她满怀希望，微笑着走到他们三个人的跟前。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说话的声音：

“喏！爱泰尔，睡得好吗？”

“很好。”

“那么，我们就登记吧！”

没顾得上说别的话，门打开了，把他们全请了进去。结婚仪式结束后，他们走到走廊，摘下了自己的帽子，不说话，也不道谢，默默地走下了楼梯。瓦什·爱泰尔在后面追着。

“比斯塔！……”她央求似地喊了一声。

博尔达奇想起来了：在楼梯拐角处，他回头往上看了这姑娘一眼。从下往上可以看到她的肚子已微微隆起。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是用今天这样迎合而又稚气的目光看着自己，活象一个挨了打的牲畜一样。但是，博尔达奇没有停步。他们的靴子单调无情地敲打着阶梯。他只是执行命令，如此而已。谁也没有跟他商量过：要不要孩子？想不想娶瓦什·爱泰尔？再说，他深信，孩子不是他的。他只是得到了一个命令，执行了任务。那时候是不会有博尔达奇·伊斯特万胆敢不予执行的命令的。他是个军人，军令如山嘛！他们在市政府大楼前跨上了马鞍，策马走出了看热闹的孩子群。他们没有交谈，彼此之间也没有互瞧一眼。一直骑到切尔库特酒店门口，才下了马。把马牵到牲口棚里，这样

路上来往的行人就看不见他们的马了。他们坐下来，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清晨。施瓦本[1]酒馆老板有巴利奇葡萄酒，这使他们感到很高兴。那时候，全国各地只酿玉米酒和苹果酒，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过问，国内拿葡萄去做什么了。

这位施瓦本老板给他们烤咸肉吃，还往肉里打鸡蛋。到第二天早晨，这个菜他们一共尝了六遍。他们又一直喝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这时候饭店的院子来了个扫厕所的，这是个很古怪的老头，身上发出强烈的厕所味。老头把工具在酒店院墙一靠，然后把大背袋里的蜗牛全倒在院子里，用一条鞭子耐心地把它们向牲口棚里赶去。

"这是我的羊群。"他自言自语地说，"回圈里和大伙儿一起。"

老头的行为惹得他们哄堂大笑。可是奇怪的是，在啪啪的鞭子声中蜗牛果然从院子里爬到了牲口棚里。他们走去一看，发现牲口棚里足有上千个蜗牛在蠕动。

"老头，这些东西在这儿会死掉的。"他们对老头说。

"不。"这个扫厕所的老人摇着脑袋说，"我每隔一天把它们放牧一次。"

他们三个人离开老头又进店堂里喝酒去了。

"这老头是个疯子。"他们跟老板说。

"这人不疯。养蜗牛比扫厕所更赚钱。他把蜗牛卖给

---

① 祖先是德国人的匈牙利人。

法国人。"

他们想了一会儿。后来霍尔瓦特上尉在厕所里讲：他认为这老头是个间谍，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上士也是这么认为，他说：

"这老头总是鬼鬼祟祟的，应该给他点厉害看看。"他们商定：回头要注意老头的行动。可是后来他们没法注意老头，因为三个人全都醉了。过一会儿，当老头走进店堂时，他们招呼他坐到身边来。请他喝酒，吃猪油面包夹洋葱。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老头对他们说。

"是因为这些蜗牛的缘故？"

"不是，是因为今天是五月九日。"

"这是什么日子？"他们问老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这一天宣告结束的。我每年都庆贺这个日子。"

"是吗？……"

"我就是在这一天从集中营中放出来的。"

"您是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因为我的信仰才被捕的。因为我认为拿撒勒[1]是圣地。"

这时候，上士想起了今天不是五月九日，而是七月十一日。他们告诉了老板。老板耸了耸肩说：

"别管他！他认为是五月九日，就算五月九日。主要的

① 在巴勒斯坦，传为耶稣的故乡。

是，他喝酒总是付现钱，不赊账。”

他们三个人走到院子里，商量怎么对付这个老头，但没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只好又回到店里继续喝酒。后来，从山上下来几个农民，在店里赊账喝酒。这些农民单独坐在一起。看得出来，这施瓦本老板不喜欢这些赊账的人。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打发其中一个农民去弄燕麦喂马。这农民一会儿就拿来了。就在这时，他们发现那个老头已经在牲口棚里睡着了。他们担心他会偷马，可是他们自己也已经醉醺醺的，一转身就什么都忘了。

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走到他们的桌边。中尉介绍道：

“这是琦拉，我的未婚妻，是小学老师……我们之间纯粹是学究式恋爱。”

姑娘微笑着坐了下来。看上去瓦什·爱泰尔早就认识她了。这时候啤酒也已经送来了。博尔达奇给姑娘要了一个酒杯。当他们喝啤酒时，服务员把用过的盘子全撤走了。一片寂静，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什么意思：学究式恋爱？”博尔达奇问道。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

“不是现在授你军官衔了吗？”

“是的，但是我们都将要取得小学教师的证书。”

博尔达奇皱起眉头没有吭声。但是他感到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所听到过最荒诞不过的事了。一个军人象一个女教师一样去教小孩读书？这算什么军人？！他想：“要不就当个军人，要不就只当个小学教师……”

“哟，能认识您，我很高兴。”姑娘轻声轻气地说，“比久[1]说了您的很多故事。”

博尔达奇又是一惊：

“说我？瞎说些什么？”

“他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老是在猜您是什么样子。现在一看，果然与众不同。”

“怎么个不同？”

“您比我想象的更那个……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姑娘，您看，我多么高兴，咱们能在一起碰头。可是，实际情况却是……”

“不要紧，您不说也不碍事……我也只是随便说说。只是因为比久说了那么多关于您的事，以致一见您，我就忍不住要问。您这样穿着便衣出来不感到很别扭吗？”

“是，有点别扭。穿着便衣，我觉得很不舒服。”

姑娘、年轻的中尉和瓦什·爱泰尔都以崇敬的目光看着博尔达奇。阳光洒满大地，啤酒也喝光了。多瑙河上的船只穿梭似地来来往往。一些船驶往北方的维塞格拉德，另一些船却开往南方。

将近黄昏时分，博尔达奇一人懒洋洋地坐在房间里喝白酒。酒只剩半瓶了，酒杯旁边放着一盆酸黄瓜。他咬几口黄瓜喝一口酒。百无聊赖，只是吃黄瓜，喝白酒。当卖饭票的玛札按门铃时，黄昏已经到来了。他让玛札进了房间，

---

[1] 也是伊斯特万的昵称。

自己仍坐回桌边。喝酒吃黄瓜。

“哎哟，博尔达奇！我把玳瑁梳子忘在这儿了……你没有看见吗？”

“没有。”

“肯定是忘在这里的。哟，就在这桌子上。这还是我外祖母的梳子呢！外祖母他们曾在塞克萨德开过店。这个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吧？”

“已经说过了。”

“经营杂货。”

“嗯……”

“你在听我说话吗？我外祖父还有一个葡萄园。那里生产很好的葡萄酒。”卖饭票的玛札边说边坐在一把椅子上。

“你的梳子在那儿。”

这个已经微微发胖的金发姑娘拿起了梳子，看着博尔达奇说：

“你已经醉得发傻了。今天遇到什么事了？”

“今天我的儿子被授衔当军官了。”

“你至于那么不痛快吗？……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大儿子……”玛札说道，然后拿起酒瓶在一个昨天用过的脏杯子里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咦，这是葡萄烧酒，哪儿弄来的？”

“从房屋管理员那儿。”

“真好喝。”玛札说着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喝完后就

解裙子。这时候博尔达奇说话了：

“别脱了！”

“我留在你这儿。”

“你好好回家去！”

“你不爱我了，博尔达奇？”

“你好好回家，带上梳子。”

“我看，你已经麻木不仁了。儿子当了军官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吗？”

博尔达奇站起来，默默地把姑娘推出门外，把门锁好。当他重新坐回桌子旁边吃酸黄瓜时，发现那把玳瑁梳子又出现在桌子上。他的脑袋动了一下，似乎在摇头，接着又伸手去拿杯子喝了一口酒。

曹慧清 译

# 二十小时

山陶·费伦茨

## 一

七点钟

主妇端来了鸡蛋、鲜黄瓜、洋葱和切好的面包。

“别客气……肚里有了东西，回头酒也要好喝些。”

“您看，”主人说，“妇女知道，男人们喜欢什么。……”

主妇把盘子放在桌上：

“他自己也老爱坐在这树下，回头您该以为我们只有这几条板凳和一张桌子了……请快吃，热的好！”

“再喝一杯……”男的一面说，一面斟酒。这是一种度数很高的李子烧酒，至少有三年了。他举起杯子：“祝您健康！”

“上帝保佑您！”我向主妇举举杯。

这是我喜欢的那种早晨。空气里荡漾着薄雾，阳光象是透过窗纱射到地面上来似的。草上和树叶上的露珠还没有散尽，在原野上闪着晶莹的光芒。芳草离离，惠风和畅。远处隐约传来各种声音，到处洋溢着生机。

“祝您健康！”主妇微微点一点头，看着我们动手剥鸡

蛋。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而后慢慢低下头去。轻轻地说：

"别客气……"她理了理围裙，悄悄地回身走进屋去。

"她想儿子了。"主人说。说罢把叉子放在我面前。"请吧，随便吃些。"

"谢谢。您还记得是谁告诉您，说那个瓦尔加在某地方当警察？"

"天知道！是有人这么说。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都有可能……您知道，反正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到村里来过！当时把他送进了医院，大夫也跟了去，他一直没有醒过来，血流得很厉害……。后来算是治好了，不过再也没有回到村里来。您会发现，要是您在村里碰到什么人，只要是姓瓦尔加的，您一问，这人便会说，他和那个瓦尔加不是一家。人家怕和他们沾上边丢人……瓦尔加把家搬走了。他的父亲和一个兄弟还在这里住着。"

主人削了一条黄瓜放在我面前。

"可是我不信他能当警察。即使别人不敢，但那个主任——那个尤什卡也不会放过他。就是他钻到地下，尤什卡也会从那里把他拉出来，剥掉他的号衣……"

"您这么肯定？"

"就象说咱们现在坐在这里喝酒那样肯定。"

我们默默地吃了一阵。

"您知道……"停了一会儿，他说，"就这样，现在有两个人，一步也不迈进村子里来。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一个就是

瓦尔加。其实他俩互相什么关系也没有，天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好象已经有六年了。……”

他笑了笑，是庄稼人遇到痛苦时无可奈何的那种苦笑。一面笑，一面摇头：

“真是天晓得！这算什么世道！……嗯，喝吧！”说着把黄瓜劈成两半。

“您儿子有几年没来家里了？”

“好久，好久了……就在我和尤什卡，就是和主任的那件事以后。他憋着等尤什卡，就象一只狼一样到处找机会。但是那一阵尤什卡没在家，外出了，两个星期没回来。我儿子没等着。后来他对我说，‘爹！您听我的，一星期以后我来接您们。您们收拾收拾，跟我走，咱们再也不回来了。家里的东西，不管是家具还是小猪，什么也不留下……您再也不在这里干活了。’那时我的胳膊还打着石膏，我不吭声，只是听他说。‘您明白了吗，爹？’他说，‘我说的您全明白吗？一星期以后我来接您们，离开这里，头也别回一下。’”

“他准备把您们接到哪里去？”

“到他们那里去。他说，他会安排好的。他住的地方还不错，是那年秋天工厂给的宿舍……他说把我们接到他们那里去。我没说话，只是听他说。一个星期以后他果然来了，两辆卡车、一群人，连拉猪的笼子也带上了。爹，收拾吧。谢谢你，孩子，你想着我们，这不错。可是我说，你多余来，因为我们一步也不想离开！您要是看见当时的情况就好

了。他开始是细声细气，后来就扯着嗓子喊。差不多要出事了。他娘，只是伤心地哭着，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听谁的好。就这样，过了好半天。后来我儿子说：‘那么您听着，爹！为了一口面包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那算什么人哪？这和吃剩泔水的狗有什么两样？您说，那算什么人哪？’我听着没出声。他说：‘只有听天由命，真是白活一辈子！’我看着他，没出声。他上了车说：‘这地方我是再也不回来了。您自作自受，我也没办法……’”

他用叉子挑起一块面包。

“他从此以后没有再来，我也没有去。”

“连看望也没去一次？”

“没有！孩子的脾气我知道，是我教大的，去了也不会让我进门。”

握叉子的手停住了。

“难道谁都走？那时我就告诉他：上帝安排我在这里。我是在这里生的，我能到哪里去？就留在这里！过去的事过去了，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留在这里！难道每个人都卷铺盖不成？”

树丛里走过来一条狗。这是一条神气的大白狗，有小牛那么大。它探头到桌下闻了闻，原地转了一个圈，在主人脚旁躺下了。不一会儿它伸出前爪搔搔主人的膝盖，然后顺着裤管慢慢往下搔。

“去，去！”主人说，“它也缠着我，……您看，要是到城里去的话，在我儿子家，拿它怎么办？还是现在这样好……去，

去，你这老东西！"

我把餐刀放下，在杯子里倒满酒。

"吃饱了吗？"他看着我问。

"很饱了！后来您儿子一直没有和尤什卡见过面吗？"

"没有，感谢上帝，没有见过。……不过这个尤什卡到我这里来过一次，坐着马车，在车上喊我出去，那时我胳膊还打着石膏，尤什卡说，'听着，安陶尔，你儿子来找我，我看见他三次……'哎，我想，这尤什卡是从来不说谎的，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那会儿我在家，看见他来，我从屋里出厨房门走开了。另一次为了躲避他，我从院子后面绕了回家……'我知道，尤什卡说的是真话。我也知道，如果尤什卡真动起手来，那我的儿子也吃不消。因为尤什卡的力气实在大，谁也不是对手。'安陶尔，就告诉你这句话。'说完，告诉赶车的，'走吧！'就这样。他躲着我儿子，这叫做手下留情，宁可自己避开。其实他身上还有手枪，不管他想怎么干，自己反正吃不了亏……那几年就是这个样子。"

"您老伴有时去看望儿子吗？"

"去，她当然去。可是您知道……要是和尤什卡碰上了，她就扭过头去。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尤什卡路过这里，进来了，不一会我老伴也割猪草回来了，朝屋里走来。尤什卡跟她招呼，而这个安娜只是盯着地，连眼皮也不朝尤什卡抬一下。尤什卡说，'安娜，你不和我讲和吗？'她一直走，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你看，'尤什卡说，'全村只有两个妇女这样看我，一个是你的老伴，另一个是瓦尔加的妻子。两个

人的神气一模一样。’”

他停了一会，斟满酒。

“有时我也想，我的妻子和瓦尔加的妻子都不理尤什卡，可是她们俩也谁都不理谁，用同样的眼神看对方。其实我的妻子和瓦尔加的幽莉都是一起长大的，都是一起做过雇农，从小就住在一起。可是后来到这个地步！尤什卡、我和瓦尔加，还有那个被瓦尔加打死的科奇什·本雅明，我们四个也都曾经在同一家庄园一起做长工，受一样的苦，遭一样的罪。可是后来怎样？我的这条胳膊现在不灵了，不象那件事以前那样了。是这个尤什卡干的。而本尼①——科奇什·本雅明却又是被瓦尔加杀的。就是被和我们一起当长工、一起分一块面包头、一起熬苦日子的瓦尔加杀的。可这个尤什卡又把瓦尔加由从小长大的村子里赶走了。我的儿子连着几天要找尤什卡拚命，可也就是这个尤什卡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抱他，他的头一句话就是尤什卡教会的，因为他刚一下地走路，就老是跟着尤什卡……这是什么世道？您说，这是什么世道？”

“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他举起杯子。“这是什么世道？难道我儿子没有道理？他有道理；而且道理很足！当他跟着汽车走的时候满眼都是泪水。他走了，不让我见他了！我要是每人那里都走一走，把各人的道理一条一条地理清，把事情都

① 本雅明的昵称。

弄明白，说给您听，那恐怕连腿也要跑断了。怎么办？还不如就这么坐着自己从头到尾再想一遍——可是我什么也不说。”

他拿出烟丝口袋，卷了一支烟。

“您今天早晨去找尤什卡吗？”他点上火，吹出一口烟。

“要去，您最好也跟我一起去，去看看新机器……”

“我看见过了。昨天还在巴波什卡的时候就看到了。但是尤什卡不同意把机器放在那里，因为那边的坡太陡。您什么时候去找伯爵？”

“明天……”

“他也和机器一样有趣。”

“对……”我站了起来，“谢谢您的老伴，我吃了好几个鸡蛋。”

他也站起来。我们从后门走上通向地边的小路，狗摇着尾巴跟在后面，一直跟到沟旁，然后站住了。和别的好狗一样，到自己家地块的边上为止，多一步也不走。

## 二

八点钟

农场的这块地离公路比较远。我先是通过一片果树林，之后是一座在坡地上的葡萄园，最后穿过一块大约有三十霍尔特施过化肥的玉米地。等我终于走出这块地的时候已是遍体生津了。幸而地边就是公路。

在离开我出来的地方不远，一棵大桑树底下停着一辆摩托车，车旁站着两个人。高个子的上衣搭在车把上。衬衫的袖子一直卷到肘弯，两手沾满了油，帽子推在头顶上。另一个站在他旁边，吸着烟，稍微矮一点。秃了的前额光可鉴人，开始有点发胖。他先向我伸出手来。

“我刚才就说，毛病是在喷油器上，根本问题在于这个该死的、无原则的无产阶级自由主义。您说，如果早几年，会发生这种问题吗？”

那一位在摩托车旁边蹲下来，用肘把裤腿向上撩了撩，头也不抬，冷冷地问了一句：

“您的朋友已经赶到五光十色的首都吃大枣去了吧？”

这一位掏出手帕擦擦后脑勺：

“要是没有这个卡达尔[①]式的无产阶级自由主义，我们早已走远了。不用说，在我们专政的光辉年代里，党委会的摩托车是绝不敢斗胆出毛病的……”

“您们从哪里来？”我问。

“从红色曙光生产合作社，”修摩托车的说，“那里其实比深夜还黑暗。您去过那里？”

“去过。”

“认识那里的主任吗？”

“认识。”

“如果他那样做可以不受惩罚，或者以为别人发现不了

---

① 一九五六年底起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

他在干什么，那您可以杀我的头。”

“这还算不了什么……”另一个说，一面请我抽烟。“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他家里窝藏着九百公斤炸药，是他生日那天肯尼迪在信封里寄来的，准备时机一到炸毁整个人民共和国。请看，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后果。”

修摩托车的没有理他，一面从帆布包里把工具一件一件拿出来，一面说：

“他打心眼里仇恨共产党，合作社对他说来就象驼背身上的那块肉一样。……”

“但是全村都选他当主任，”另一位吹出一缕烟。“不过他确实也摸透了庄稼的脾气，而且实在也做了不少事。”

“他几乎每走一步就撒一个谎。把家里的一半人都塞进了领导班子，这一个是什么长，那一个是什么委员，这还不够，而且还要我把他女儿弄到进修班去，准备将来当会计。说来也惭愧，我居然还和他称兄道弟，并且主任长，主任短的。奇怪的是上帝没有打雷把我殛死！”

“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另一位叹息着。“不过这倒是全区[1]唯一不欠债的合作社，秋天大概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三十三福林。”

“只要我没弄清楚这成绩他是怎么搞出来的，”修摩托车的说，“我就让他在这个州[2]里也待不住。您的朋友已经回到五光十色的首都去了吗？”

---

⑴ 州以下的行政建制，级别相当于我国的县。

⑵ 级别上相当于我国的省。

“昨天早晨就走了……”

“如果您见到他，请转告他别忘了吃香蕉，真是见鬼。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怎样处理这几台拖拉机。趁它们还没坏，得赶紧分下去。真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王宫[1]打扮好了没有？这钱是可以买一万台拖拉机！那里将来就有天蓝色的大殿、紫红色的后殿、墙上方格图案的前厅和雕花的尖塔，还有那什么玩艺儿，绿色的茅房！可是我想从银行支两千福林，昨天差不多把腿也要跑断了。三十个人三个月来连一个费列[2]都没见到，总得分一点给他们吧？事实上除了他们，谁也不干活，成天挺着肚子晒太阳……你看，这就是新路线，自由主义……”

有点发胖的那位看了我一眼：

“没办法，不从他们中间抓几个出来整一整，什么事也搞不成。……”

“就得象你说的那样！要是我去，二十四小时就能整顿出秩序来。”

“你眼下最好还是在摩托车里整顿出个秩序来，别的事放一放！您对这里的情况有什么高见？”他看了我一眼。

“您们在尤什卡那里看到新的施肥机了吗？”

“运到了？”

“运到了。鲍洛格·安陶尔刚才说的，尤什卡把它转送

---

① 指位于布达山上的故王宫。

② 匈辅币，一百费列折合一福林。

到高尼奥去了。……”

“谁告诉您的?”修理摩托车的抬起头来问。

“鲍洛格·安陶尔……”

“住村边的那个?”

“就是他!”

“您去过他那里?”

“去过……”

“嗯, 不错! 您们聊得很痛快吧?”

“随便聊聊。时间长了,认识的人也多了。”

“是这样!”他说,瞥了我一眼,“是这样。有些人即使不直接认识, 至少是见羽识鸟, 观友知人, 多少可以知道一些。”

他直起身来,拿一块旧布擦着手:

“说一句良心话……您愿意跟那个人说话吗?”

另一个笑了起来:

“您去过伯爵那里了没有?”

“明天去……”

“以后有空请把您们怎么谈的和我说说!我有机会也得去看一次。这位伯爵我至少有十五年没有看见他了。波豪蒂同志,咱们不去看他一次吗?”

“不!”修摩托的说。“他不归天,我不会去看他!”

他用旧布擦着手慢慢地转向了我们这边,迎着太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眼圈周围都是皱纹, 一脸疲乏的神情,嘴角的线条也给人以苦恼的感觉。

“我可以给您说些上次谈话的内容……”

他向我们走过来几步，擦着手：

“要是把我从这里调走，”他看了看发胖的那位，重复着，“要是把我调走，派个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人取得了比我大的成绩，然后他说：请看，我取得了成绩。当然，这位同志说得有道理。但是我说，他的成绩中难道没有我的这十五年吗？如果没有我的这十五年，这位同志阁下能做出什么不同于我的成绩来吗？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他能做出什么成绩来？他能一个人缔造出和平——那个妙不可言、听了使人震耳欲聋的和平吗？家家户户、村村寨寨，到处都是和平……听了真叫人冒火！”

“我早就说过了，”发胖的这位说，“没法在这可恨的环境中生活，到处都是无原则的自由主义，人们怎能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地在其中生活？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处在危机之中了。……”

修摩托车的人收起工具，穿上衣服：

“请替我吻这位伯爵的手，致以亲切的问候，就象给每个热爱和平事业的公民问候一样……”

他蹬着了发动机，戴上防风镜：

“您要是碰上鲍洛格·安陶尔的话，请转告他，我对他的行动深为感动，并且感到荣幸。同时还衷心感谢他，虽然他不和我们在一起，但至少没有反对我们①……我真不知

① 拉科西时有一句政治口号叫做“谁不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反对我们”。卡达尔执政后提“谁不反对我们，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道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要怎样感谢他才好。不管怎么说，他可以向咱们的全民国家申请奖励……”

另一位在后面的座位上坐稳：

“有空请到多热生产合作社去看看，我想知道您对那里的农艺师有什么印象！”

摩托车开动了，驾驶的回过头来说：

“我向您提个有意思的问题：褒作品，贬作家，这是怎么回事?!”

“别忘了去多热！”胖的那位高声说，“转告尤什卡：我问他好，希望他给农场物色到一个全天候的好农艺师，还祝他星期天赢一局牌……”

前面有片沼泽地，路绕了个大弯，但走小道到村里却可以近一半。我跨过小沟，越过刚割掉庄稼的田块朝着教堂方向走去，踏上了小学老师的那块长得不好的玉米地。

## 三

九点钟

“给我一包科苏特牌香烟和一盒火柴。”

卖酒的咧嘴笑着说：

“好……您从哪里来?”

“最好挑包软的！”

“没错，最软的……刚才萨波同志从区里路过，汽车坏了，搭了波豪蒂同志的摩托车，您没见到他们吗?”

“碰见了。”

卖酒的从柜台上欠过身来：

“那个波豪蒂同志，”他压低声音说，“脸色很不好。说不定有什么病。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老禁不住要看他，直到现在还是放不下心来。……”

他似乎等我附和他，半张着嘴等着。

“果真脸色不太好。”我说，“您有零钱找我吗？”

他从柜上拿了一盒火柴，转过身来，又咧着嘴笑道：

“不管愿意不愿意，人总免不了要生病，谁也不例外……嘿，嘿?!”

在柜台的尽头，离开我们相当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老农。很老了，约莫有七十五六岁，但身子结实，精神矍铄，手里拿着一条鞭子，面前放着一杯苏打葡萄酒。讲话声若洪钟，清晰有力。

“您这位同志是从布达佩斯到这里农场来的吧？”

他仍在原地站着，两肘支在柜台上。褐色的脸膛上布满深深的、倔强的皱纹，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

“对，是这位同志……”卖酒的迎合地说。

“咱们没见过面。”老人说，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我，最后，眼光停在我脸上。

“是没有见过面。”我说。

老人缓缓地举起杯子，在手里转来转去，呒了几口。

“我只是随便问问……”说着把杯子放回柜台上，捋着胡须，又打量起我来，眼光缓缓地、仔细地在我脸上转来

转去。

卖酒的干咳着，用抹布在柜上擦来擦去对老人说：

“那儿匹马在太阳底下晒着可有点不太好，对吗，山多尔大叔？可别让汽车或什么东西惊了。”

老人没有理他。

“在布达佩斯有几个熟人倒不错，”他说，“总有机会用得着他们的……”

他眼光突然一闪：“是不是？”

我从口袋里把刚才买的科苏特牌香烟拿出来，启开封口，向卖酒的说：

“来一杯苏打葡萄酒！”

“您知道他们都有公事，”卖酒的说，“都很忙，就进来喝那么一杯。”他看着老人，“不多费时间，一口两口，就是一杯。喝完就走，光是喝酒……”

老人一口把剩下的酒喝掉。

“再来一杯！”老人说，眼光随着卖酒的拿走杯子去量酒。

“今天恐怕会很热。”

“会很热。热，对马也不好，就那么在大太阳底下待着……”卖酒的说。

“要是有几个熟人在布达佩斯，实在不错，总是用得着的。”老人说。“再给一盒火柴。”当卖酒的把酒送来时他添了一句。

我掏出火柴递过去：

"您请!"

"邦迪也拿来了········"老人顺手从卖酒的手里接过火柴。点上烟,一脚把火踩灭了,然后转过身,又仔细打量着我:

"当一九一九年我们起义①,那会儿没有一个帮手······敌人是很多的,地主是敌人,我们自己人里面也有,什么样的敌人都有。穷人想掌权,敌人就多。到后来真掌起权来了,可是要想掌住它,困难挺大······越掌权,困难就越大,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从前是这样,以后也这样。"

"嘿,嘿,"卖酒的擦着桌子,"您知道,山多尔大叔挺爱发表议论。"

老人继续说:

"您先生知道,事物还有一个规律,就是穷人最大的敌人是穷人自己。想不再过穷日子,可就是弄不清应该怎么干,往往是自己害自己,比别人害他更厉害。······就象疯狗一样地咬自己,就象一只蠢猪一样地咬自己的猪仔。只要有机会,他就害自己,或者害另外一个自己人。一点不错,只要办得到,它就害自己,或者害另外一个。可是伯爵和那些老爷们却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自己人,让谁也别出问题,他们好象老狗保护小狗似的,别人死六个他们不在乎,但是自己的亲人得好好护着。有的即使不是他们自己的亲人,但是给他们卖过力气,那么他们也会帮这个人,就和给自己

---

① 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办事一样认真……即使这人办错了一点事，也看看是和他们一起的还是反对他的，是自己人总是一帮到底。他们学了历史的，要不这样，他们的天下坐不牢靠。也就是说他们懂得规律……”

老人掏出钱，放在柜台上：

“他们有脑子，学会了……邦迪，钱在这里！”

我举起杯子问：

“您是瓦尔加·山多尔的父亲，是吗？”

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对，”他看着我说，“我是他的父亲。”

他收起找回的钱，看着卖酒的：

“应该把伯爵请回来，最好一切照旧，咱们只配那样。咱们习惯了旧的那一套，怎样生，就那样死……咱们不配变个样子活！”

“山多尔大叔爱开玩笑……”卖酒的笑着说，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老人。

老人把杯子推到柜台当中，把手碰了碰帽檐：

“好吧……祝你们运气好！”说着向门口走去。

我只是现在才看到，原来他跛得很厉害，左脚几乎只是拖着，每走一步肩膀深深地一陷。

“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来就这样……”卖酒的在背后指着他告诉我。“苏维埃一失败，他就被抓走了。一年以后才放回来。腿给打断了，他的弟弟干脆就没有回来。他弟弟也参加了苏维埃，大概被杀掉了，谁也不知道他弟弟的下

落，死在哪里也弄不清楚。”

卖酒的靠近我说：

“请告诉主任，我给他留了几瓶基尼齐牌啤酒，星期六以前恐怕不会再来货了，即使来，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卖酒的指着门口说：

“老头儿恨主任，连他的名字也从来不提。……”

卖酒的跟着我一直到门口：

“别忘了啤酒的事……”

老人正好拿起鞭子，一手抓起缰绳向马吆喝起来。挺挺地坐在大车头上，从远处看去好象还不到五十岁。

## 四

十点钟

“再来一杯？”

“好。”

“要不，来一杯啤酒？”

“不，喝混了不好……”

“那就只好请您跟我下酒窖里去了，反正您早晚要去的。我不是每个客人都请下酒窖，您因为懂得品酒，对您优待。”

他站起来，掐灭了烟。

“请把那个包递给我！”他指指我坐的沙发旁边。那是一只常见的医生出诊用的包，崭新，就象屋里的陈设一样。

"什么时候弄到房子的?"

"去年。……整个房子里只有酒窖才有一点价值。您在布达佩斯常去哪儿?"

"哪儿都去……"

"总有个比较,哪儿去得勤? 阿斯托里亚饭店? 多瑙旅馆? 岛上大旅社? 和平饭店?……"

"白牛旅馆,黑烟囱饭店。不过一过半夜,俱乐部饭店也不错……"

"那里醉鬼太多,不是吐脏别人衣服,便是打架。不过有点热闹事也不错,对吗? 可是您得承认,盖勒特饭店比它强?"

"比它强!"

"哒里,嘀里……那里的娘们可真不错! 一个个都象下凡的仙女,……请跟我来,带上烟卷!"

穿过小屋子,到了前厅,然后到了门口。

"钥匙……"他竖起眉毛,在包里摸来摸去,吹着口哨。"找到了! 请,我的好朋友,请把包挂在衣架上,右边的那个钩子。你不想梳梳头吗?"

"不,这样很好。"

"那么,请!"

他打开门,我们沿着水泥台阶拾级而下。迎面扑过来一阵舒服的凉气,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却又一时不可名状的芳香。

"这儿盏壁灯怎么样?"

“很好！”

“您闻到了吗？”他吸了一口气。

“不错。”

“我已经有半年不透风了，窗户紧闭，氧气断绝……您真的常到俱乐部饭店去吗？”

“也去。”

“白牛？”

“嗯哼！”

“可是盖勒特最好？”

“对！”

酒窖不超过四平方米。顶上是暗暗的红灯，窗户果然都紧闭着，还遮着布帘子。

“您说，是不是没有想到会下窖来？”

“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您花了多少钱？”

“小意思！都是些破破烂烂的。这个柜台是从一个酒店老板那里买来的，下面用木板箱垫了垫，每把椅子花了二十福林修理……四个桌子二百福林，外加镜子，酒柜是书架改装的，别的摆设是归了西天的姑母的，谁是这个王国的主人，啊？”

“您！”

“请等一等……”

他又打开了三盏灯，一盏在酒柜上面，两盏是墙上的。

“你喝葡萄酒？”

"好!"

"杜松子酒?"

"不,喝葡萄酒。……"

"您真常去白牛旅馆?"

"去过……"

"请听一段……"

他打开录音机,传出了皮亚夫的歌声。

"怎么样?"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两肘支在柜台上,给我斟上酒。

"还可以,是吗?"

"您到这里多久了?"

"三年了。"

他把脸埋在手掌中:

"漫长的、漫长的三整年。在这里我怎么也习惯不了。为了能习惯在这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明白,如果不这样,我自己就完了,因为实际上回不去。可是我是在那里长大的,在那里上小学、中学,上大学,我的父母在那里。……我在这里不习惯!"

"祝您健康!"

"凡是人能尝试的,我都试了。事业心、读书,再读书……没效果。录音机、电唱机、杂志、拚命工作,为的是别想起自己个人的事……可是实在不成,一点效果也没有,您真的不想喝杜松子酒吗?"

“不，谢谢！”

“一共花了两千福林。喝一杯马提尼酒？”

“谢谢，不想喝……嗯，那次科奇什·本雅明出事是您去的吗？”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当时把您请到科奇什·本雅明那里去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他看了我一眼，把酒从面前推开了：

“不，您老兄另请高明！”

“您记不起来了？”

“您另请高明！”他重复了一遍。

他走到录音机旁边，把磁带倒回去。

“这位皮亚夫多大年纪？”

“四五十岁。……是不是请您去抢救的？”

“你要是想听个好的，那么莫失良机！”

他按了按开关，皮亚夫又唱了起来。

“下次我到布达佩斯去，一定把这机器带上，或者再买个新的，到‘罂粟花’① 录一点新的。半夜两点钟，那里正是好时光，录回来到这酒窖里听。怎么样？”他高声问，因为整个地下室充斥着录音机里的歌声。“我每逢下来喝酒，就听录音机。我把它放在镜子后面，或者柜台上！”

他走到柜台后面，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切了一个柠檬，

① 夜总会名。

往酒里挤了挤，放了一点糖，搅起来。

"您原来没想到这里有好酒窖吧？"他仰起头环顾室内。

"没想到……"

"前不久我到处找戈甘[①]的复制品，跑断半条腿也没结果。您能帮忙弄几张吗？我倒是有了几张，就可惜太小，也不是彩色的……就象我这个人一清早起来到诊所上班时的模样。"

他还是喊着说话，因为录音机依然在轰鸣。

"劳驾把声音弄低一点！"

"过几天托人弄个名牌扩音器，至少得把音量再提高一倍……"

说着，过去把录音机关了。他斜着身子靠在录音机上，一手托着腮：

"不习惯！"他轻轻地说，"习惯不了，"转过身来，"怎么也习惯不了！您说怎么办？"

"我希望您能说几句，关于瓦尔加打死那人的事……"

他摇摇头，走向柜台去取酒：

"老兄，请注意，这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您最好去问造成这件事的那些人……。我是个医生，就凭业务守则也不能说。来，再听一段！"他走回录音机那里。

他按了按开关，里面又传出歌声，他一直听完，然后看

---

① 法国画家。

了看表说：

“打烊了，请喝干！”

我们走上楼梯，他随手带上门，把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说：

“至于这个瓦尔加和那个科奇什·本雅明那件事，当时确实是我去的。但是正象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取了文凭一样，我也以同样大的毅力力求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懂吗，老兄！何必呢！？”

有人在敲大门。

“谁？”

“大夫在家吗？”是一个重浊的男子声音。

“请稍等一会儿，我就去！”

“我妻子出血很厉害，我先来请大夫，她一会儿就到诊所。”

“别慌，放心，我就去。”

他转身向我说：

“那么，再见！”说着伸出手来。

“您的酒不错，酒窖也漂亮。”

“别跟旁人透露！我不是说了，整个房子里——包括房主人——只有这酒窖有点价值？”

他打开门，迎面是一片阳光，只见农民摘下了帽子。

## 五

十一点钟

我又抬头看看，现在清楚多了。在斜射的阳光下，半开着的门板上并列着四个枪眼，斜斜地每个相隔各四、五公分，最后一个高高地在门的角上。

这位妇女坐着在削土豆。我一到，她把刀子交给了老婆婆，但还是坐着。双手放在怀里，一动也不动，默不作声，脸上毫无表情，看着眼前的土地。老婆婆的话她肯定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一眼也没朝那面看。

“过去的事过去了。”老婆婆说，“多想也没有用。日子还是得过下去，穷人的日子难过，有钱人的好过。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只要上帝让人活下去，永远就是这样！可就是没有当家的，她的日子就难过得多了。家里要是没有男的，那么女的还不如别生出来做人的好。花没有支撑就不能盛开，女人没有男的，比这还糟。谁来告诉她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事情怎么做啊！更别说什么都得一个人干了，真是没法说啊，这说不明白！一个妇女到了这步田地，什么指望也没有了。可这里还有两个没爹的孩子，不错，他们也帮着做事了，特别是老大，有出息。可是大的事，还得做妈的干。真是没法说啊。要给孩子吃饱穿暖就得费多大事！我也帮着做点，可是年纪老了，快八十了，这八十年里三十年也是守寡，跟她现在一样。我

能做到的，帮着做，帮着弄饭，也洗几件衣服，喂喂鸡，但是喂猪已经不行了，猪食勺拿不动了。从前，两年前还行，可现在不行了，什么事也做不来。离开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这死是谁也躲不开的。现在我是连树枝也折不断，只要使一点劲，胳膊就会痛起来。我帮不了她多少忙，能做的做一点，做不了，就留给她，留给这可怜见的。在庄园里，现在叫农场，尤什卡管事，给她找个事儿，养鸡。每天清早就得去，不让晚到。直到晌午才回来。给了一块自留地，回家还得到那里干活。我做针线也看不清了，这也得留给她……她日子不好过，实在是不好过！我不明白，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苦命的女儿。"

老婆婆没有看一眼女儿，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从嘴里流露出来，滔滔不绝，没有重音，也不停顿，就好象削土豆的时候就该说这么多似的。

"谁要是事先知道生下孩子来是这个命，说不定就不让她出世了。……您看她，还这么年轻，还不到四十，就看不到好日子了，只是愁眉苦脸，病病恹恹。当家的一走，她的身体也不行了，孩子小，等长大还得好几年，只能单靠她，孩子们只有妈妈一个人。他们能指望谁，还不是只有她?!还不是只有她一个人管他们?!……那一阵多好啊，日子过得真和乐。就象我的那当家的——就是她的爸一样，他也从来不打我一下，一句重话也没有，总是那么慢声细气地说，芙萝拉长，芙萝拉短。她的男人，科奇什·本雅明，就和她的爸一样。对她总是客客气气的，她做不了的事，从来不让她

干，一辈子没有打过她一下。就是死以前两天，进城卖麻袋，回来还买了双漂亮的鞋给她。东西都是本雅明买的。他从来不多说，看见该买什么，一有钱，就买回家来了……本尼就是这样的，上帝保佑他！这样的人没有了，做妻子的更难过，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只做好事情。心上这样的伤，怎么也治不好，做妻子的心头那么空虚，怎么补啊？只好等有一天去找他罢了……其实我也告诉她，事至如今，反正就只能这样了。命里注定，由不了人。做人不是赶车，而是拉车，鞭子怎么打，你就怎么拉……就这样，没法子！”

我踩灭烟头，转身向女人：

“您为什么让这些窟窿留在门上？”

她抬起头，看了她母亲一眼，又转过去看枪眼，什么也没说，只把头巾正了正。

太阳照着整扇门，阳光穿过枪眼，四个细细的光束透过空中和厨房昏暗的角落，投在地上形成四个白白的圆点。

“您为什么不补上它们呢？”

她抬头直直地看着我，两条眉毛拧在一起，中间是几条僵直的皱纹。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还是没有说话。

“其实我早跟她说了，”老婆婆说，“我跟她说，你何苦留着这些窟窿呢？有什么好处？留着在门上干吗？这么多年了。到了冬天我用破布、旧纸把它们堵上，她倒也不说什么。留着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何苦呢？可是没法跟她说。

我只要一提，她只是摇摇头说就这样好。跟她真是说不明白。就这样好？老是在门上留着，老是看见它们，有什么好的？解放前，就是挖井的那一年春天，宪兵扎死了鲍尔陶的儿子，他母亲也把他的裤子留着，就是挨刺时他穿的那条。他在小肚子上挨了一尖刀。后来人家说本来是想刺他的腿，刺瘸了教训教训他，没想到刺在小肚子上，死了。他母亲把裤子收起来了，留着。可后来就改成别的穿了，天知道改成什么了！后来那改的也穿破了，尽管本来一直说要留着这条带他儿子血迹的裤子……您看，也没留住！我看她做得对。那样老留着有什么用?！孩子！你最好快点忘了它，才是正经道，穷人要记住一句话：‘泪多命短’，因为你什么伤心事都记住，那就象担子一样越挑越重，结果不到老就把人压垮了。所以无论是什么，能忘记就忘记。要不，只是自己折磨自己。”

“这样就好！”这妇女说。

她眼睛盯着地上，神情冷淡，轻轻地说着，就好象只说给自己听似的。但是接着抬起头，看着我，好象有一道什么光在她眼睛中一闪，然后又低下头去，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就这样好，就这样好！有什么好的！”老婆婆说。“上次区里派人来，你为什么不愿意让人家修好它？你知道就在那件事情以后半年光景，区里来人叫她修好门，别让窟窿老露着。不管人家怎么命令，她就是不愿意。人家走了。后来又来人，说拿公家的钱给修，不要我们一分钱。可是我女

儿还是不愿意。不管人家怎么说，怎么劝，她就是一句话‘就这样留着’。后来又来人，说房子太旧，没法再住人了，该好好修理，人家管修。可是她还是‘就这样留着’！连上帝说，她也不会听的。我可怜的女儿还去找了学校的老师问，要是她自己不愿意，人家有没有权非来修不可？她就是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

我碰碰妇女的手：

“您为什么不同意把门修好？”

她以发涩的眼神看着跟前的地面，接着在眼中又掠过刚才的那个异样光芒，她看着我说：

“因为应该这样留着！”

门口投进一个影子，接着出现了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少年。

“您们好！”

他在门槛上站住不向里面走，而是朝四周看了看。先瞥了我一眼，又把眼光投向老婆婆。

“是大的孩子吗？”我问老婆婆，说着站了起来。

“是的，是他，我的心肝……”

少年看着母亲。她还是象刚才那样默然坐着，连眼皮也不抬起来。少年转过来看我，我向他伸出手：“个子真不小……”

这是一个高高的墩实的男孩子，棕色头发、棕色的眼珠。裸着的古铜色的上身流着汗，身上的尘土被汗冲成一条条沟。额上也是一层土。他用坚定的眼光扫了我一眼，

躲开了我伸出去的手，走到他母亲身边，站在椅子后面，斜倚着墙说：

“回头我们把机器送到合作社去。亚诺什叔叔他们上酒店去了。”他一面说话，一面不停地打量着我。

“你吃点什么吗？”老婆婆问。

“不！”少年说。

现在他看着母亲，注视着她的脸。

她还是那样坐着，两手放在怀里。少年皱着眉头，一如他母亲的神气。但总的说来，这孩子不象她，看来象他的父亲。现在他皱着眉头看我：

“您找我妈有什么事？”

他迅速地以询问的眼光看了他母亲一眼，又转向了我。

他吸着粗气，胸膛深深地起伏着。

“只是随便说话，孩子，随便说话……”老婆婆说。

“你在农场劳动吗？”我问。

“您找我妈有什么事？”他追问，紧紧地盯着我。

我看着他，心中估量他可能有多大了——十四岁？十五岁？这是一双已经干活的手，这是一副承受担子的肩膀。他的神态、他的目光、他的每一句话，总之在我眼前的这个小小的男子汉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告诉人们他已经受了劳动的洗礼。站在他母亲身后的小伙子大概凌晨四点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干了一个成年男子需要干的那么多活了。

我指了指门：

"我只想问你妈妈为什么不愿意把门修好?"

"门不修跟您这位同志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妈的家,她想怎样就怎样。谁也管不着。税我们按数交,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

老婆婆提高嗓门说:

"小本尼,不是说那件事,我们只是随便聊天,他不是官家派来的。您别见怪,"老婆婆没看我,"他只是问问你爸的事,我们聊聊……他和我们讲话很客气……什么不好的话也没说,没跟我说,也没跟你妈说。是谁告诉你说家里来了人?"

小伙子一声不响地听着,眼光在我身上不停地扫来扫去。然后离开墙到门后拿了个水舀子,深深地喝了一口水,用手背擦了擦嘴,当他用另一只手把水舀子放回去的时候看着我说:

"那么我妈已经告诉您了,门上就这么留着,就象现在这样!我现在也可以告诉您,您也可以告诉别人:是我说的'门上就应该这样留着!'"

"就这样,好孩子,就是这样,……"母亲轻轻地说,抬头看着儿子。当他回到自己跟前时,她又重复说:"就这样,好孩子,就是这样。"

我看着小伙子问:

"那么你打算留到什么时候?"

他倚着墙,看着地上,没有回答。他母亲也看着地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老婆婆叹了口气，把削了皮的土豆扔进水盆里，又拿了一个削起来。

## 六

十二点钟

“那天夜里，就是发生鲍洛格·安陶尔和我那件事的夜里，实际上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妻子对我说：‘别人家都走了，咱们也走吧。’自从头一天晚上西蒙·山多尔从区里来我们这里以后她就老说要走。西蒙现在在区的教育局，也许是文教局，或者天晓得什么局里工作。反正这个西蒙·山多尔跑来了，满脸是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我在堂屋里碰见他。我说，‘怎么啦，小猪要咬你？’‘给我一点酒，’他说，就那么一口气喝了有半升。这个人本来就能喝酒，现在就象是往肚子里灌一样，喉结象打气筒活塞一样一上一下地忙个不停。怎么回事，再给你扛一桶来还是怎么的？他只向我扬扬手，要我把电灯关了。关个屁！你要暗，到院子里不就完了，那里不是有的是暗地方。他的手拚命抖，真让人不好过。‘怎么啦，’我说，‘你坐下来讲，’于是他就叫我们走——我走，我妻子走，孩子也走。他说，他找到了地方，那里谁也找不到我们，连天老爷也不知道。‘这家伙疯了，’这时我想，又疯了一个，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说，州委书记打电话通知了，谁愿意走都可以，谁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告诉我有地方去，不过得赶

紧。书记——州委书记已经乘车跑了，连上帝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看着山多尔，他脸白得象月亮光，烟卷在他手里抖，都快拿不住了。‘嗯，山多尔，’我这么对他说，‘谢谢你，为我们跑了这许多路，可是我告诉你，你好好听着。没事情做的地方我不去！现在我哪里也不想去。你想去，自己去，我是哪里也不去！我还有话跟你说，要是你见到你们的那个书记，你给他捎句话，要走，那很容易，因为什么也不需要。可是要回来，那就难了，很难。所以最好现在先想好了，将来怎么办。你告诉他，这是我托你捎给他的话！’”

主任停住了，点了支烟。我们坐在廊下等午饭，密密的葡萄藤挡着太阳。赶马车的走了进来，在台阶前面站住了：

“这块地凉快。”

“来，喝一杯……”

“我只是来问问，下午去哪儿不？因为你要是不出去的话，我想和老婆去耪耪地。”

“去吧，我们哪儿也不去……接住杯子。”

“上帝保佑大家！”

“你们到哪里耪地？”

“就在自留地上。”

车夫放下杯子，擦了擦嘴：

“您知道谁到村里来了？”

“不知道……”

“那个基什科瓦奇……我赶着马车，把来丈量土地的那个人送上车站，正转身，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了，手里拿着箱子和雨衣……我想，不会是他。但结果还是他。他从我身边走过……天哪，果真是他，一点不错。

主任倒上酒：

“喏！那他怎么样？”

“怎么样？能怎么样？！他还向我问好，他问我带他进村行不行？去你的，我想，不用鞭子抽你就算走运气。”

“后来呢？”

“我说，‘你回来啦？’‘回来啦，’他说。站在马车旁边。‘你带不带？’他问。他站在我面前，我问他：‘你去找主任吗？’”

“后来呢？”

“你听！他说：‘亚诺什大叔，说不定我会去找他，因为我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呸，谁要你叫大叔！——‘嗯，那你走吧，’我说，‘我还要到别处去。’后来我就走了。”

“你听见没有，他要是回来了，就会到这里来。……”

“莫非我应当把他拉来？”

“少说两句！嗯！跟老婆耪地去吧！”

赶马车的举起杯子在手里捏着，好一会才举起放到唇边，但没有喝又放下了：

“我什么也弄不明白，尤什卡！……”

“你什么事不明白？……他来了，在这里，我能拿他怎么样？”

“不能拿他怎么样?”

“不错,我不能拿他怎么样!……”

赶车的不出声了,把杯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他说:

“就算我什么也没说……不过还得说一句:总有一天我们会吃这个‘我能拿他怎么样’的亏……这杯苦酒从前人家是让我们尝过一次的,现在要是再喝的话,就得兜底喝干了,一滴也不会让我们剩下的……”

“你这么认为?”

“不错,就象我说的那样……因为上一次我们搞坏了,搞得很坏。那会儿当我们站起来以后手里还攥着枪,他们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不敢出声。那时杀个把人会有人来问你干吗杀他?现在可好,这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位是那方面的专家,还不能得罪他们。这算什么?现在是人家不头痛。……”

他看着杯子,一饮而尽。

“我的脑子不够用……不够用。”

主人沉默着,赶车的把杯子放回桌子上问:

“明天什么时候套车?”

主人瞪着酒杯,点了支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喷出来,烟从桌面的这边流到那边。他看着赶车的说:

“五点吧,去看看施肥机。我把这机器从巴波希克调到农场的地边上去了。明天到那里去……还喝吗?”

“不!”

"好吧，那你走吧。"

主任看着离去的赶车人。他走下台阶，穿过院子，出了小门向农场方向走去了。

我把两杯酒都倒满。

"这个基什科瓦奇是谁？"

主任挥了挥手，举起杯子：

"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

他靠在椅子背上——这是一张很深的柳条编的扶手椅——看着外面，双手搓搓脸。因为刚才我们喝干了，他向前弯弯身子又倒上酒。

"却说这个山多尔当即就走了，到了什么庄园或者独家村，或者天晓得什么地方，很远，反正不在这个州里，好象还不是独家村，而是什么榨葡萄汁的榨房或是酒窖，天知道……那时候我妻子说……"

他停住了，又向院子看看，看着赶车的出去的地方。

我点了支烟，重重的吹出口气。从后面摇摇摆摆跑来两三只小鸡到院子里啄食，听到了一个孩子"嗨嗨"轰它们的声音后便又伸长着脖子慌张地窜回去了。

"来，再喝一杯！"主人说。

这是比较浓的葡萄酒，但味道醇正，我们对了不少苏打水喝。

"那时我妻子说，她不想留在这里，我们还是跟西蒙他们一起走算了，到他们那里去。她说，西蒙说人不要光想自

己一个人，做事要考虑怎样做对家里好些。她是担心孩子。我就听着，能拿她怎么样？她后来不说了，安静下来了。事情正好象我算到的那样，他们来了——夜里，从小门进来。……他们果然来了，正好象西蒙说的那样，西蒙那里他们也去过了。西蒙知道，所以那样替我着急。”

“说实在话，和自己人我从来没有象他们这样拿着真刀真枪地干过。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和别人干过的，而且干过不少次，但那还不都是为了他们！？从土改到推行义务教育，到合作化，和多少人干过哪！叫人们别相信巫婆，而要去找医生，叫人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叫他们念书，别想当地主，……什么事情没有做过？我容易吗？有时一吵就是一夜。还不光这些呢。但那些事和这天晚上的不一样。这天晚上一句话也没有，谁也没有吭一声，我们一声不响，他们在窗外也是一声不响，直到后来鲍洛格·安陶尔的枪把沉默打破了。

“就这样，他们来了，我听见他们在过来。我差不多每天都提防着。真有意思，有时候就好象书里写着的一样：心血来潮，觉得今天要出事。果然出事了。我先听到人声音，后来听到狗叫。狗就那么拚命叫，后来我听到它在跑，再后来它不叫了。有人在过来，它却不叫了。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害怕过，好象连上帝也不怕。可是有人来了，狗都不叫。我正想关门，想到这里手就停住了，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一条老狗，那时候已经有二十岁了，我认识的人它都认识，我相好的人它看见就摇尾巴。当它还是小狗的时候，看到那

些和我一起当长工的伙计们，它总要过去闻闻！……嗯，现在它不叫。那时我把房门关上。我正想关，手停住了。屋里是我全家，我叫他们躺在地上，小的孩子放在地上的时候她醒也没醒，连被窝一起放在地上了。另外一个也这样放在了地上。我妻子哭了，但一声也没有出。只是紧紧地搂着女儿。男孩子问：'爸爸，他们来了？'因为他老是听他妈妈这么说。我向外走，孩子看着我，眼睛越睁越大，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别怕，爸爸！怕？我不怕，就是担心屋里的他们……狗不叫了，那时我真有点怕起来。不过我说得也不那么对：因为那不是什么恐惧，实在不是恐惧，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即使看起来好象是恐惧，但并不是恐惧，它应该有别的名字，否则人们说不清楚。……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但狗不咬他们，这样当我想去关门的时候，手就停住了。"

他点支烟，把火柴梗扔得远远的，火柴越过台阶飞到了院子里，他朝厨房指了指，挥手驱散前面的烟：

"那时我站在厨房窗前。当他们到达的时候，我已经在厨房里面了。到我家来的人都是从厨房那面绕过来的，我心中说，你们认路，我也用不着走别的路。只要你们叫我，我就出去！你们想进来，我就让你们进来。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窗是开着的，平常我爱在那里坐。这窗子，夏天、秋天从来不关，现在也开着，一如往常。……我就站在那里，弹孔现在还看得见，我就站在弹孔不远的地方，靠着墙。前面是窗户，窗外他们那几个人站在月光下。那天有

点雾气，月色朦胧，但是看还是看得清楚的。

“我靠墙站着，那支双膛枪就挂在伸手可及的碗柜上。这时我在想，我这人是什么命？我的光阴和精力都花在什么地方去了？我这个没文化的农民，这个穷长工的心血都白花了。这些年的工作都白做了。我还要受多少教训呢？我还要用多少事实才能使他们相信我的话是对的，而不要再用流血流汗来吸取教训了？我到底有多少错？我到底错在哪里？

“一九四五年土改的时候很多人不敢要土地，费了多少口舌做他们的工作！挨家挨户劝说他们：别怕，地主不会再回来了，你还怕什么？这块土地应该归你，如果你不敢领，那么谁配领？你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干了半辈子，但是一点好处也没得到。地是你耕的，粮食是你打的，可是你吃的不老是麸皮和野菜吗？那你现在还怕什么？为什么不敢要本来就是你的东西？领去吧！耕吧！种吧！收吧！这样的话我得说多少遍？可是我听到的什么？——‘这样做会犯天条的！尤什卡要我们占别人的土地，你不怕上帝吗？要是老爷回来，还不是我们挨鞭子?!你这样是害我们！你为什么要折腾呢？历来就是‘老爷富、长工穷’，恐怕连上帝也不会做别的安排。地主们还是要回来的，你会看到，他们总归是要回来的。一九一九年是这样，他们杀了多少人，吊死了多少？……他们就这样说，直说到把犁把塞到他的手里才算。

“有了土地，可是没有农具。一个农民，有了土地，没有东西去种，还是等于没有。把孩子套了去拉犁吗？妇女这

样干，在这里已经不稀奇了。男的在前面拉，瘦小的妇女两手扶着犁，还用胸顶着。于是他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富裕的农民：'你们能不能帮帮犁这块地？季节到了，都快要过去了，地还荒着，一家怎么活啊？帮我们犁犁地吧，借你的犁，借你的马，借你的耙，还要借你的车。要不就活不下去了，将来哪来的面包啊！'过了一阵，找另外一家，'帮我脱脱粒，老哥，别见死不救！'就这样。人们不当长工了，有了土地，但光这样还会重新当长工。收下来的东西要去还这些欠债，不还等于当长工吗？从没有土地的长工变成另外一种长工。有了土地，还是当不了土地的主人，当不了自己的主人。谁只要稍稍想一想，就会明白结果会怎么样！有了土地，但是还是照样穷困，照样流汗，照样再当长工。可是富裕的农民不一样，他们知道自己比地多的人不利，所以他们想扩大。他们不但学地主的派头，还想有地主那样大的庄园。他们不象地主那样派人管理，他们要自己管，所以比地主还厉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地主不大计较，有的事地主根本看都不看，可是富裕农民不一样，他们一星半点的事都不放过，什么都自己过问，比地主还厉害！

"可有些人宁可这样过下去！只要不搞集体化就行，'千万别搞合作社！'他们说，'你又走得太远了！你这个人难道非要弄点新花样不成？你为什么不肯太平？什么时候你才太平？'

"记得土改的时候有一次我按着一个人的脖子，逼他去登记领土地，他不敢要。其实他真是一贫如洗，从前在地主

庄园里当猪倌。他人是不坏，父亲是一九一九年当着他的面被打死的，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从此他母亲叫他记住：凡是老爷、凡是当官的，不论他是宪兵还是村长还是领班，都别得罪。从小亲眼目睹的惨象多少年来使他胆战心惊，那个赶车夫瓦尔加·山多尔大叔就是和这人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时候一起干的，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了。他老得缩着脖子做人，要不人家会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他就是这样，多一句不说。我按着那个不肯要土地的人的脖子，逼着他去，逼着他签了字。因为否则他就不敢要。他怕老爷们还要回来，因为他有九个孩子呢。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我逼他领了土地后不到两个星期，在一个晚上有人把我打了一顿。后来我开始宣传合作化，那一阵人们又说：'你怎么老不太平？有朝一日你总要吃苦头。我没有理他们，因为我知道，不搞合作化，没有出路。他们说，'你再搞，回头又有人象文策尔的儿子那样的对付你，说不定更厉害。'原来是文策尔的儿子打的我，这我到很晚才知道。后来我跟他说：'文策尔·久尔吉，你告诉我，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不是当年我逼你父亲要的？我做得到底对不对？'他说：尤什卡大叔，您跟我说这些干吗？他一面说一面拚命眨巴着眼，不知道看哪里才好，满脸通红。'我只是随便问问，孩子，'我这么说，也没有再说别的。约莫半夜的时候我回家——那天好象是八月二十日，有娱乐活动①，文策尔·久尔吉又来找

① 八月二十日是匈牙利宪法节。

我：'跟我一起喝一口，尤什卡大叔，''好吧，'我说。人家劝我别再干了，要不又有人会象文策尔的儿子一样对付我，其实如果真都是那样就好了，哪怕今晚再挨一顿揍，到头来他们还会承认我有道理！"

他看看我，眼中闪过一道愉快的光芒，伸手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

"祝您健康！"我说。

"嗯，我就这么站在厨房墙旁。我想我这些年尽干了些什么？不错，跟文策尔的孩子后来一起高高兴兴地喝了酒，但要是挨了子弹，那以后怎么也喝不成酒了！现在是谁要朝谁开枪？这深更半夜到底是谁过来了？狗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不去取枪？我为什么只是贴着厨房的墙站着？为什么脑子里别的好象全忘了，翻来复去只是一句话：怎么到了这步田地？不是过去的雇农都入社吗？不是谁都知道，不搞集体化没有出路吗？不是现在当牛棚的屋子过去都是他们的住房吗？不是告诉他们世界朝这方向发展，要过好日子就要走上这条路吗？被保送到学校去的难道不是他们的孩子吗？难道不正好是他们反而不愿意自已的孩子上学吗？别想法让你们的孩子去当神甫、当地主了！我早告诉过你们了，你们有了土地，有多少？三霍尔特？八霍尔特？十二霍尔特？够过日子的了。够过日子吗？当然了，你拚死拚活地干，从天亮到天黑当然够过日子的了。可是你给孩子们留下什么？要是你一命归天，那么你给孩子留下

了什么？给他们安排了什么命运？让他们把你的倒楣命运再重复一遍吗？你的土地，孩子们平分，一人能分到多少土地？两霍尔特？三霍尔特？因为再多是不会有了，你就这样安排他们的命运？这点土地你自己足够了，——可是给孩子们一分，他们能做些什么？连一顿土豆都吃不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我得了什么好处？从前——当我站出来反对地主、反对官府的时候，我得了什么好处？谁给了我好处？一九四五年谁给了我好处？你们害怕地主回来，不敢要土地，是我逼你们要，那时候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你们对除了自己院子以外也愿意给别人做点事的人，为什么就那么容不得？那么你们到底要什么？就是牲口，当它渴了，也会去找水喝，可是你们对愿意为你们办一点好事的人就那么狠？有谁给你们一大盆玉米糊，你们就当他是好人，可是让你们走在头里，让你们真的富裕起来却要别人逼你们，而逼你们的人却要遭殃，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也要倒楣。你们这群人是上帝从哪里找出来的？那些好的东西你们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拖泥带水地学，就不能走在头里吗？你们到底打算干什么？

“我听见窗外有人说：他在家，哪里也没去！接着是基什科瓦奇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当时就听出来了，当然听得出来！他说：好啊，在家找着他更好！接着他叫道：‘喂，主任，请出来一下！’接着是另一个声音：‘难道是在地窖里吗，怎么那么半天？’完了就一阵哄笑。又有人说了句什么，又是

一阵笑。我这时就向窗口走去，顺手打开了电灯，这是点在外面的灯，当我走到窗口——他们都在光亮里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这群疯子？"

接着我听见了：

"啱？安陶尔大叔！"

他就开枪了！这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受苦、一起当雇工的安陶尔！

## 七

一点钟

当我走进大门的时候，主妇正好从院子的另一面过来，手里捧着泔水盆，显然是刚喂过猪。苗条的身上穿着相当旧的衣服——是那种在家做饭干活时穿的，少不了有几个补丁和几点油渍的日常衣服。一条花头巾裹着头发。她一看见我就把泔水盆在手里晃晃说：

"劳驾把玉米给我从阁楼上拿下来，回头请你喝一大杯咖啡……"

"我用什么拿？"

"楼梯边上有篮子……您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想找您谈！"

"什么事情？"

"重大的事件！看，篮子在那面，别怕累着！"

当我把玉米从阁楼上拎下来的时候，主妇已经不在院

子里了，从厨房里传出她做活的声音。

“请坐！”她说。

她把咖啡豆倒在捣碎器里磨起来。

我问：“助教先生在哪里？”

“您最好别叫他助教先生……您要是把他叫做老师，那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好！他大概在喂小鸡吧？”

“喂小鸡？！……”主妇扬起眉毛。

“您想到哪里去了？助教先生什么时候喂过一次小鸡？那是过去的事了。”

“别开玩笑了……安德烈在什么地方？”

“我一点也没开玩笑……我要是开玩笑，脸上就有两个酒窝，对不对？”

“对！”

“这不就对了？！您帮我磨一下咖啡，我就可以告诉您一点您朋友的情况。不过你到底找他干什么？”

“他大概认识一个叫基什科瓦奇·蓝扎的人，我想通过他找这个人。”

“我没听说过这人……不过他一定认识。”

“他走了好久了吗？”

“好久了！回来您把咖啡磨好后喊我一声，我去洗几个盘子。您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很可爱……”

“我想您会这么说的。”

我把磨好的咖啡倒在壶里，不久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她说：

“请您听我说，请您认真地听我说半个钟头，”她拉过一把椅子，翘起一条腿，“您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那当然，一九五八年或是一九五九年来的。”

“一九五九年春天来的……您知道我是在哪里出生的？”

“您问这干吗？”

“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知道……您生在布达佩斯。”

“看，您什么也不知道。我生在克里斯蒂纳。我出生的那间屋子也就是我奶奶生我爸爸的屋子。和我外婆生我妈妈的屋子只隔两家人家。……明白吗？”

“差不多……”

“您大概不至于怀疑我们那时不养猪，不养鸭不养鹅，吃完早饭也不用去煮泔水吧？”

我到这时才感觉到在这位活泼的农村知识妇女怄气式玩笑的里面有着一种深深的使人不安的情绪。

“您不怀疑吧？”

“您怎么了？安德烈到哪里去了？”

“在学校里，坐在办公桌旁边写论文呢！”

“写论文？”

“对！”

"那您就为这事伤心?"

她低下头。片刻又抬起头来。

"您最好和安德烈说说，让他别离开这村子，留下来吧，就象从前一样过日子，象一九五九年以来那样！留下来教书，我也教……把我们的两个孩子带大，相亲相爱地生活。存些钱买家具，买房子，看书，爱我……他还打算做什么？他又在想什么？他还不满意吗？上帝会答应吗？还想从头开始做什么事？他什么时候才长脑子呢？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牺牲的了，我什么也没有了。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熟人，离开了一起长大的朋友。放弃了文化娱乐，放弃了一切的一切，我把一切都放弃了，为的就是他们——安德烈和两个孩子！"

她两手握成拳头，垂着头。

"他又在想要什么？为什么？有了这个家，他还不满意？我煮泔水，养鸡，在泥泞里干活。那些当年的熟人恐怕都认不出我来了！但是我还是很满足的——我还能再牺牲什么呢？但是只要安德烈和我在一起，有了孩子们，我就满足了，没有他们，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可是他一天又一天，就那么钻在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堆里。我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动作里看得出来，他在那里想事情，其实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一天我对他说，'喂，安德烈你还记得咱们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到岛上去的那一次吗？''什么？……'他说，'噢，当然，当然……'他都不敢看我。当一九五九年他第二次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有一次他带我到岛上去玩，把孩

子放在家里。我们散着步，他给我买了一瓶汽水，他说，‘噢，琦拉，你跟我到农村去吗？咱们到学校教书，把两个孩子带大！你跟我去吗？’‘去！’我说。‘可是那里没有剧院，没有赛千尼图书馆①，也没有国会大厦，什么也没有。甚至还不如克里斯蒂纳。你受得了吗？’‘受得了，’我说。‘琦拉，一个人除了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以外，还有什么更幸福的呢？什么也胜不过它。党也好，政治也好，什么蠢事也好，都没有意义，真有意义的是，也就是我们为之降生的是：为孩子们工作，做个好的小学老师，有一所小小的房子，一个宁静的环境……’啊，天哪！他就这么说的……”

我一口喝干了咖啡。

“他们又想把他调到区里去？”

“对，而且他会去的。……”

“肯定？”

“肯定……您和他说说，劝他留在村里。今年他还不满三十五岁，可是已经坐了七年监狱。这还不够？他还想从头开始做什么事？一九五三年放出来那次，那时我还只是他的未婚妻，可是等得他多苦啊，每次探监日我都去，他被带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的代价就是在大学听各种各样的闲话。但我不在乎。出来后他说，从此以后，一切太平了，只有宁静和安定！一九五九年在岛上又这么来了一遍……你以为他不会再申请入党吗？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

① 匈国家图书馆，在布达佩斯。

么？生活上他还有什么不满意？他的妻子爱他，两个孩子聪明、活泼，只要一听他的声音，他们就……飞快跑去，就连那个大的也这样。我们两个人一月挣四千福林，在这个国家里能挣四千的家庭不说凤毛麟角，可也不多啊！村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在这里长大，父母都在这里。我在他身边，他要什么，不等开口，就都给他办到了。我学会了做菜，交了一些朋友……我希望的只是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可是他还在希望什么。”

“他没有说吗？”

“昨天晚上……我一直担心的那分钟终于还是到来了！他说，他念一段东西给我听，我听不听？我说，‘我听’……‘你别吃惊，你知道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吗？不知道？是统一农民阶级的形成、发展。你奇怪吗？’‘不！’我说。他沉默了片刻，问‘那你为什么不高兴？’‘你念吧！’我说。于是他就开口说起来，就象一九五五年听到的那一套：琦拉，我不能这样生活。当每一个人都在工作、发言，当每个人都在为国家的进步而努力的时候我能满足于只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吗？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他象打开闸门一样地说什么他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白白浪费大好年华。他说，国家把他这个农村孩子培养成大学毕业生花了十万福林，也许更多。要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束诸高阁，是一种罪过和不道德行为。还说他不参加政治活动活不下去……都是我熟悉的那老一套，说不定我还能说得比他更动听。”

“区里什么时候来过人？”

"上星期……区委书记来的。就在这里和他谈的，我也在。那个书记后来看我要离开，就说，别走，我想说的事跟您也有关系……其实这区政府的事我听了也不止一次了，说什么要到区里工作啦，又是什么啦，如此这般……我坐了一会儿还是走了……"

她点了支烟，她的手神经质地抖着。可以看得出来，这本来是一双纤纤素手，但现在已经留下了劳动、泔水、脏衣服、小鸡和孩子的痕迹。

"一个妻子可以为她所爱的丈夫牺牲一切，人们这么说，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对他说，'安德烈，你走吧，你写吧，写你的论文去吧，你愿意到哪里，你认为可以在哪里起作用就到那里去。到区里也行，到州里也行，到哪里都行，到能发挥你作用的任何地方都行！而我，你答应我这一回！不跟你去！我就留在这里，等你回来，不管你从哪里回来都行，不论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模样我都不在乎。'"

"他说什么？"

"他不说话，眼睛看着地上，您知道他的模样，后来就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廊下抽烟，走来走去。后来他进来了说，'我要跟你一起走，琦拉，没有你我哪里也不去——但是我要你去。琦拉，你知道我是这个区的第一任民主青年团[1]书记，我是这个区第一个中学毕业生，不管过去怎样，我不能设想另一种生活方式！''还要坐牢吗！？'我说。……天哪，我

---

[1] 共青团的前身。

们就这样互相折磨着，不知道哪一天为止……上帝啊，为什么他老不明白，为什么不碰得头破血流就不甘心呢？”

门外狗叫起来了，短促而低沉，接着从廊下传来了脚步声，厨房暗了一下，出现了一个大个子——主人回来了。

“向在座的每一位致以热情的问候！”

我站起来：

“你到哪里逛去了？”

他竖起一只手指：

“明天你就知道……”

他走向妻子：

“你好，琦拉，……做了什么好菜？”

他按住妻子的两肩，把她转到自己正面，捧住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接着向我投过来一瞥：

“唉，就这样……”说着慢慢地松开手。

“你在这里吃饭好吗？”

“谢谢你，我吃过了……你认识一个叫基什科瓦奇·盖扎的人吗？”

他转过来问：

“他怎么了？”

“我想和他说话，可是不认识他……”

“他不在村里……”

“今天到的……”

“既然刚到，那着什么急？……”

“难说，抓紧点好。”

"那就是说，他回来了……"

"对，你跟我一起去找他行吗？"

"不好办。"他摸着密密的胡茬说。

"我想到了……可是勉为其难行吗？"

"他是当年这里的小农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好象叫'解放青年协会'还是什么的负责人。"

"是叫这个。"

"我们互相有过不少摩擦，就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之间也这样。"

"但是今天去一趟总还是可以的吧！"

"后来一九五〇年我们一起进了监狱……"

"那不影响……"

"一九五七年一起到了基什塔尔却[1]……"

"真的？"

"他说：怎么回事，同志，咱们怎么老在这种地方见面？"

主妇动手摆食具了。

## 八

两点钟

我问老头："榨房[2]还离很远吗？"

---

① 一所监狱所在地。

② 制造葡萄酒的第一道工序——榨葡萄汁的地方。

“不远了，约莫还有两公里……就这样，约莫一个月以前，伊斯特万，那个新来的书记表示打算恢复我的党籍。他没有明确说，就那么露一点口风，试探试探，不知道我是什么态度……我没有开口，让他一个人说。他这个人不错，我很喜欢他。有头脑，聪明，而且文化修养特别高。跟他谈话的人都奇怪，好象他什么都懂。‘这书你是什么时候看过的，’我问。‘就那么随便看看，’他说。好象还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就听他说，我不说话，一边在想，回头我说什么……

“您为什么不把心里话告诉他呢？”

“我也想这个：为什么不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对！别说，什么也别说。这个村总算有了个明白事理、脑子清楚的书记，他不是商店经理，也不是政府官员，不是邮递员，也不是办事员，而是和别的上千的居民一样的人，是给这些人办事的。他也是个农民，有两只干活的手，是我们大伙里面的一个，谁的问题他都知道，任何人的困难他都清楚，谁也骗不了他，他也不骗别人。因为他每天都和大家在一起，都想着大家的事。那我又为什么让他扫兴呢？”

“如果您入党，会扫他的兴吗？”

“不会的。”

“那又为什么不加入呢？”

“如果我告诉他我为什么不愿意恢复党籍，这会使他不高兴的……因为他是个老实人，虽然聪明，但他不会理解我说的原因……”

我们沿着地边的小路走着，两边都是葡萄，偶尔可以见

到一两个人。

“您肯定基什科瓦奇在那里吗?”

“他不会到别处去的。从前他也老是到他这位教父那里去。他爱喝酒,教父也爱喝……两人面对面一坐,一口气能喝十二公升!连脸也不红。这地方的人象生下来就是爱喝的,在小时候大人为了让他们睡觉,就在他们嘴里塞一块酒泡的面包……”

“真是够可以的!”

“过去就是这样……可现在不同了!您要是有工夫,不妨到医生诊所去看看!要是那个孩子脚破了,或是扎了根刺,当妈妈的就把他送到大夫那里去……从前?恐怕孩子说胡话还不会送去呢!现在诊所总是坐满了人,要对付下来真不容易……”

“可惜只有一个大夫……”

“这个大夫是个好人!象这样的年轻人现在不多见了。当然例外也不少。他还是从布达佩斯来的,大城市的年轻人,可是象这里土生土长似的,对谁都很和气。不论是清早还是半夜,只要叫一声,立刻就动身,一点架子也没有,这里谁都喜欢他。给了他漂亮的住房,两间一套的,我们尽量满足他,让他高高兴兴地在这里……您将来会看到,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他已经变成这里的人了……象他这样有学问、有修养、既和气又有礼貌的年轻大夫在现在实在是不多见的!他在这里一定会很愉快,和我们一起待得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人家觉得他好,都爱他……一个人除了这些还要

什么？"

"噢，当然了。可是这条路是怎么回事，好象被咱们走完了？"

"不，现在得走小路了。……这有点象我，"他笑起来，"我走自己的路。一个人自己认为有共产主义信仰，可是却不入党。这多好玩！我可以告诉您不少滑稽的事。我不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熟悉我们这类所谓老的专业人员，也就是所谓旧知识分子？那些同事、熟人即他们所谓的'咱们'是不大相信我们会真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有些话听起来非常古怪，譬如：艾尔诺叔叔，您真的相信这个，嗯这个……昨天在这个或那个会上或者别的什么场合你自己说的那些话吗？

"对于这些，你能说些什么？无疑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人家把你看成表里不一，认为你在说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可是我能够说，我的兄弟、姐妹、亲戚以及别的许多人——其实他们都是正派人——每天在这样或那样情况下说的这类话都叫做侮辱吗？或者是我应该把他们都假定是不正派的人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因为这些人也许还相信我，觉得我还不至于那么下流，认为我在家中，在自己人的圈里不会道貌岸然，象我在别人面前一样的当伪君子。但当那些不大了解我的人在我面前这样议论，而我又不得不和他们进行辩论时，您能想象他们是什么目光吗？——您这个夜校大学生！他们会这样说。您能受得了他们竖起眉毛的那个神气样子吗？不，我告诉他们，亲爱的，我

一九三〇年就大学毕业了，那时你好象还在念中学吧？结果怎样？无非是：这家伙真是老奸巨猾，或者：此人如此装腔作势，真是官场老手。当然，因此当我这个老家伙只要干事，他们就会说我还在那里演戏。您看，生活多么复杂！顺便说一句，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使人感到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因为看来，它是年轻人的信仰，如果说年老算是应该受到排斥的原因的话。

“不过，我想说的倒不是这个。我刚才说……噢，我们已经走了多一半了，这里拐弯……我刚才说，如果说有一个人自认为信仰共产主义，而且高兴地看见他为之奋斗的思想和纲领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得人心，更明显地在取得胜利，可是对于叫他回到党里去的那位党书记却不知道说什么，这算怎么回事呢？这位书记会说，你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我们了解你，你应该是我们中间的一员，那么我对这位党书记说什么？噢，这个党的干部无论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作为一个人，都是以你住的那家的主人——尤什卡为典型的。他的父母是很穷的，他们头脑既简单又保守，满脑子迷信和偏见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念头，其中也包括宗教上的原因，对党简直是恨不得拒之于千里之外。我可以这么对他说……”

他站住了，举起手杖，就象一般拿手杖的人所习惯的那样，把手杖头向上一扬。他戴着一顶农艺师常戴的那种窄檐帽，帽上插着几根雉鸡毛。

“我担心我的话会使他大吃一惊。但后来我想，他会同

意我的看法的，至少他会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做。正象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普天之下无奇不有。可是我愿意这样说：有许多事情是始料未及。人们秉性各有不同，克莱奇梅尔[1]的性格学是很有道理的。但即使他不说，我自己本人在动物世界上也观察到了：同一种类的个体之间各自的性格秉性也是千差万别的。差别大到我们都想不到。您想，如果我如实告诉伊斯特万，他可能会怎么说？如果我说：好吧，我入党。但我打牌的时候可别来叫我开会、参加讨论，反正我哪儿也不去，不管要讨论的事有多么重要——因为我不愿意放弃牌局。那么这个伊斯特万会说什么？他一定说我是开玩笑。当然，他也只能这么说。而我又必须打下去，可是，可是……就这么回事！我不想放弃牌局，我懒得站起来，因为我喜欢打牌，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和人们挤在一起。而这几位牌友人家也不需要他们，他们心里想的只是牌，嘴里也不说别的，只是哼哼，出什么牌？——那么还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吗？——再有，如果伊斯特万打发人来通知我开会，而我恰巧在睡午觉，那怎么办？我怎么能向他解释明白：亲爱的，我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半总得眯一会儿。除了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两天没睡成以外，三十年来就是这个习惯，以后恐怕也就改不了。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大致说来，我可以算是懒猪！可那有什么办法？那年把我开除出党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怎么办？一个人真的能脱胎换骨

① 德国心理学家。

吗？说到底——对不起，这个比方不很恰当——我父亲也是个懒人，他从来也不上教堂，可是他是诚心诚意相信上帝的。”

他举起手杖，指了指：

“请向那边走……那边，就是那间小屋！那个就是您要找的基什科瓦奇，那个老的，他旁边上的那个是他的教父……”

## 九

三点钟

男子低着头，仔细地听着，接着把手掌按在桌上说：

“我懂，我怎么不懂?!……”

他站起来，把酒一饮而尽。

“教父，您就和工程师好好聊吧，我们出去随便蹓蹓……”

这位老农民仔细地打量着我：

“您找他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基什科瓦奇替我回答。“教父，您们尽管放心喝……”

当我们离开榨房，缓步来到葡萄地，前面的地势陡然下倾。他拿出烟盒，点上一支烟，把火柴梗弹到葡萄地里。他把烟叼在嘴角上，从容不迫地把烟盒和火柴放回口袋。

“面前这片葡萄地过去是我们的，或者说是我父亲的，

但当时传出消息说要搞合作化——就在一九四八年底，甚至可能还在夏天——我们就把这一片地转让给了我教父。说得准确些就是：我父亲装得好象把这块地卖给了他。这个想法原来不错，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一阵卖地的人多极了，都是富农。当然，谁都清楚是什么原因。……我那可怜的父亲反正是尽人事听天由命而已。后来，这老头食言，除了头一年以外，一直没有按照和我父亲的协议把大部分收益仍然归我们，也就是骗了我父亲，我们也拿他无可奈何。好在我父亲那时早已习惯于他的名字就是：‘闭上你的嘴’了。”

“刚才您为什么不愿在桌上和我谈？”

他摇摇头：

“何必多一个人听！当然，我当时也可以对您说：‘喝完这杯酒，然后请走开！’”

当我和他见面以来，他第一次抬头看我：

“对吗？”

“对。”我说。

他竖起烟卷，在三个手指中搓来搓去，微微眯缝着眼睛看着烟卷的火星。

“是这样……我父亲继承了十八霍尔特土地，我母亲的陪嫁是九霍尔特，这是二十七霍尔特。后来买进了二十二霍尔特，总共有四十九霍尔特。主要是雇短工，长工也有，有时是一两个，有些年头除了家里的佣人外，一共有三个长工，——两个下地，一个跟着他在园子里。他自己也劳

动，和雇工同时起床，和他们一起收工，早晨还自己喂牲口。用短工的时候，他就和短工一起干最重最累的活。他为什么要和短工在一起呢？因为他自己干，别人就只好跟他一样干，谁跟不上，明天就可以卷铺盖了。那时候，好的庄户那里，就象前一阵叫斯塔哈诺夫运动，现在叫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样，都得拚命干。实际上我父亲的名声并不好，人家不太愿意来。可是那时候穷人多，雇人的地方少，总有人到我们这里来。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你准备将来当律师。你没有别的事，只要念好书就行，要在和有钱人少爷们的竞赛中站住脚，别的就是我的事了，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备齐。’这里的习惯是有地的人家家里都留一个孩子。我们是兄弟两个，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两个都去上学！咱们俩反正是从小干这个的，咱们来替他们干！’我母亲也得象佣人一样干活。只有他们到学校里来看望我的时候，我母亲才能在火车上坐一会儿。他们都是早上到我那里，我父亲在街上看着我们从宿舍上教堂，然后再从教堂到学校。他仔细地看每一个孩子，下午给我请假出来，逐个地问哪一个是谁家的孩子，然后给我买和他们一样的大衣、围巾和皮鞋，买最阔气的少爷一样的服装。说：‘别让人家说你是臭农民！买甲克，买手表，买开司米毛衣，比谁的都不要差！’他这么说。那时候我哥哥已经上专科学校了，我父亲把他培养成了个农艺师，夏天拿了文凭回了家。但就在那年八月，从家里场院的打谷机上摔了下来，当时就死了。我父亲从

此连茬口地也不让我下。有一年寒假我得了肺炎。我父亲在我床边象个孩子似的哭着：'好儿子，要是你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做一个人最大的乐趣不就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比自己强些吗？'村里有个老教师，他的妻子德语说得很好。我父亲请了她来教我妹妹。他在我面前跟我母亲说，一个人能懂儿门外语，就顶儿个人。后来这个老太太死了，我父亲每星期从城里请人来两次教我妹妹，为的是别荒废了学习！"

他拿烟卷在我面前扬了扬：

"至于您更感兴趣的，那我就告诉您：我父亲总是和短工在地里一起吃。我母亲做的菜是很丰富的。我父亲爱吃肉，我母亲做的汤里总是有不少肉。当把饭送到地里，尽管我父亲招呼大家，可是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从盆里舀肉吃。他们可以吃土豆，吃面食，喝汤，可是谁也不许动一动肉。他从来什么也不说，可是只要谁吃了肉，第二天他便找个借口把这人打发走了。或是说人手够了，或是说对他干的活不满意。要找毛病，那当然是办得到的。这在村里当时谁都知道——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当然即使我当时了解这点，也无济于事——所以谁也不吃一块肉。而他则当着大家吃他自己的肉。他是个吝啬的人，正好象吝啬的医生、吝啬的工程师、吝啬的办事员或其他什么一样。我想，我祖父就这样攒了三霍尔特，我父亲就这样变了五十霍尔特，还把我培养成了中学生，为的是将来当律师，就好象我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后来我父亲在一九五〇年去世了，就

在圣诞节那天。愿上帝保佑他！我本人一九五〇年应该上大学，可是您现在住的那家主人作梗，其实当时谁也没有人征求他意见。为了我上大学我父亲花了不少钱，当时他自己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为了我，他是连上帝那里都肯花钱打通门路的。

“不料您的那位房东知道了。直到今天我还不清楚他是怎样，从什么人那里知道的。因为我们瞒得滴水不漏，我甚至不在村里露面，说是在城里到工厂当小工去了。我今天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大概他老是盯着我父亲，我在工厂里当小工这一说他也不相信。当然更不相信我父亲会甘心不让我上大学而不最后拚一下。我那时想办法进的是首都的工业大学。总之，他知道了，策动乡里的党委会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我们也知道了，——因为您知道，我们在里面也有熟人，——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会上讨论了什么。于是我父亲就到布达佩斯去想办法。有不少人帮他的忙，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办法找到这些关系的。总之，大学录取了我。我大概上了一个月大学，秋天您那房东亲自到工业大学去了，一天之内大学就把我撵了出来。——食堂不准吃饭，宿舍不让住，教室不许进，没有我一寸立脚之地。我回来后第三天我父亲对我说，去找主任，那时那是合作社主任，用他的话是叫做去找做主任的尤什卡，就是您住的那家主人。他一次又一次托人带话，一次一次地找主任，终于有一天这位主任说，可以让他带我去——我父亲本来就是这样要求的——时间是星期天中午十二点。我不想去，但

是他坚持要我去，我母亲则是一味哭。

“主任家那时候就住现在这所房子了，从前是庄园管家的房子。我父亲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进了屋子，您的房东走到堂屋里和我们招呼，您们好！我父亲从前是用第二人称和他说话的，因为尤什卡当年常在我家做短工[①]，可现在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位主任了。既不能叫同志，又不敢用第二人称，怎么说话呀？就那么含含糊糊地招呼了一下。‘请进来！’主任说。我在家里下定决心：一句话也不说。我既不求天，也不求人。主任问我父亲身体好吗？我母亲怎样？我父亲慢慢地还魂了，脸上开始有了血色，眼睛也亮了起来。他是非常、非常怕这次见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胆小起来的。他那时已经戴上富农帽子了，从不上街走动，只在家里待着，窗口站着警察，报上登着口号：富农是每个人的敌人，要狠狠打击！而现在他居然在这里坐着，这位主任居然问他，身体好吗？坐了一会儿，我父亲开始说他儿子的事了。就象农民通常的那样，先是递一点意思过去，继而绕来绕去，最后点破了题：是为我儿子的事来的……就象一个父亲求另一个父亲帮忙一样！……这时您的房东站了起来说，这事回头再谈，饭已经做好了，请您们吃午饭，边吃边谈……就这样。每人面前放好盆子，盆子里已经放好吃的东西——他自己盆子里都是肉，而我们的盆里却是清汤。我在这时刻才感觉到事情不太妙。我抬头

① 匈语中尊敬或表示冷淡用第三人称，对平辈或小辈以及社会地位低的用第二人称。

看看父亲——因为到此为止我一直不敢看我面前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吃什么。我默不作声，难熬地希望时间快点过去。我父亲拿起匙，低下头，但手没有动！可是接着他舀着汤，脸对着汤盆，一动也不动。他，我是了解他的，知道要出问题，只见他满脸通红，脖子也是红的。……他把汤喝光了！接着主任端着菜盘子逐个请我们自己取，先是煎土豆，我父亲拨了一点，我也拨了一点，第二个是蕃茄汁，我父亲也舀了一点……接着是鸡汤，主任拿了一块鸡，放在自己的盆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父亲：'祝您胃口好！'他说，'别客气！'我们的盆里是土豆和蕃茄汁……他把鸡肉从我们面前挪开，推到桌子边上。我看着他们。我父亲的手颤抖着，太阳穴旁边的血管不停地跳着，脖子通红……主任呢……他只顾自己吃，手里抓着鸡翅膀，也许是一块大腿。

"我站了起来，走到我父亲椅子后面：'我们走吧，爸爸！''喔，干吗这么着急，到哪里去啊？'主任问。我父亲站了起来，双手扶着椅子背，我想，他恐怕要跌倒了。'请跟我来，爸爸！'我说，握着他的胳膊，向台阶走去，因为餐桌是摆在挨着葡萄园的廊子里的。

"事情有它的前因。在这个村里分得土地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不在我父亲那里做过雇工。这是一个穷地方，地主雇了一批，但还是有限，剩下的都要到富裕的农家去试试运气，所以我父亲可以随便挑。这个主任一度也在我父亲那里干过活。他先是在地主庄园里，后来因为和管家闹翻了，就到处做短工。没有一家富裕农民喜欢他，因为都知道他

不好对付，他比别的长工有头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比别人厉害。但是他干活是个好手，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有一次，就是我现在要说的这次，他们夫妻俩都在我父亲地里干活，他们把孩子也带来了，是那个大的，后来死了，那时还只有四岁左右。那时他们很穷，穷得只能餬口，有时连餬口都很勉强。到了中午，饭送来了，大家围着坐下来吃。我父亲挑了几块肉，雇工们喝着他们的那份汤。他们知道这规矩。主任——就是这个尤什卡，和他的妻子也知道。他们舀汤就好象根本没有看见锅里有肉一样。我父亲是允许雇工们从自己的一份里分给孩子吃的，当然，说的是喝汤。他们夫妻两人就分给孩子吃。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能吃这，就很高兴了。可是过一会儿孩子开始哭起来，他要吃肉。锅就在面前，他也看见我父亲在吃肉。孩子一个劲儿地哭，怎么哄也不行。这时尤什卡的妻子站了起来，把孩子带得远点，自己也就不吃了，因为孩子一哭，谁也吃不好。她不吃，哄着孩子。大家围着锅，没有一个人出声。过了一会儿，尤什卡站起身来，走到孩子身边，把他抱起来，抱到锅子旁边，把妻子也叫了过来。尤什卡坐下来，从锅里拿出肉来喂孩子。一眼也不看我父亲，一个劲儿地舀肉出来给孩子吃，还叫妻子别坐着，吃她的饭。我刚才说过，我父亲从来不对别人说别吃肉！这一次也没有说。而尤什卡就一块接着一块地给孩子吃肉，他自己一点肉也不吃，只给孩子吃。然后站起来，把匙放好，和妻子又去锄地了。我父亲什么也没说，就是一声不响地一起锄地，直到收

工。第二天他们来上工，父亲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说不锄地了，但是事实上却是找了两个新的短工来替他们。这里有个规矩，在一家农户不用的短工，别的家也不用——这样便于控制他们。于是他们就没事可做，在家挨饿了。”

他把烟蒂弹进葡萄地里，转身面对着我：

“生活好象有个规律，就是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您不这样认为？根据这个规律，就得有债必还！我父亲欠了债，虽然我们没欠，但是我也得还。就这样循环不已，永远如此。应该说，当我从大学被撵出来的时候，我父亲的死亡已经开始了。当我们从您房东那里回来——就是那顿饭以后——我父亲得了脑溢血，圣诞节的时候就死了。他是为了我而活着，为了我而死去的。这就是他的一生。那么下面轮到谁还债了？祖债父还，父仇子报，代代相传，永无止境！我生来本是无恩无仇，但现在是身不由己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得讨还这笔债。狭路相逢勇者胜，以命相搏弱者死。……我今年三十一岁，在狱中度过了九年，来日方长，哪怕在绞索下送别此生也在所不惜。既然事至今日非个人所能左右，那么就顺天命而为之吧！”

我扔掉烟头：

“懂了……”

“这话出我之口，进君之耳，没有第三者，所以就可以轻易否认。我不想因为自己失言而再进一次监狱。这样太不值得了。这里没有儿戏，也没有温情。子以父荣，父辱子死，从古至今，历来如此。”

他双手插进口袋里：

“您还想听什么？还要了解什么细节？……”

“不……谢谢……”

“那么请便，让我和我的教父在一起，这里没有您的事……”

他站在原地，我就走了。他从高坡上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坡下树丛中的村庄。

## 十

四点钟

我们四个人坐在乡政府。乡长办公桌后面宽阔的扶手椅里坐着个魁梧的男子，一头茂密而倔强的头发，宽宽的前额，气宇轩昂。

“参加！我当然去参加考试！老实告诉你们，对我说来，天下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轻而易举，连上帝也会佩服我的。”

他向乡长笑了笑。

“你的事那就要困难些了，我没法给你提建议……不过你得小心点，别给老师送鸡去，贿赂他。因为他是区执委会委员，回头给你下不来台……”

“到那时候社会主义关系学就不起作用了。”

乡长哈哈大笑。“要是有机会我让他一把牌，说不定他会放我一马的，可是我不会同意，就让他来把我轰下台好

了！”

大个子抬头看着区委书记：

“亚诺什，告诉你……我会把事情办得很漂亮的，一点毛病也不会有。你知道，应该怎样做？”

他把头歪在一边，看着区委书记：

“你不知道，对吗？我来告诉你……需要的是：我拿着冲锋枪，放到他办公桌上，告诉他：好，同志，我来考试。请提问题吧！哪怕考我激进资本主义方面的问题也行！要是非回答不可的话，什么方面我都能对付。什么题目都行。……特别是别忘了考我历史，那门课我是最有把握的了。……我会一件一件说给他听，他会听得浑身冒汗。……”

乡长又笑起来，同时一只眼睛瞟着区委书记。

“他考你别的历史问题。”

区委书记说。

“山多尔，你糊涂了！”

“你认为这叫糊涂吗？”大个子竖起一个手指，“如果这叫做糊涂，那么糊涂的不仅是我一个。半个区，甚至半个州都糊涂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最先糊涂的还不是这个州。”

“那是谁先糊涂的？”

“如果说我们真是糊涂了的话，是那把我和别人弄糊涂的人。”

乡长一只眼睛瞟着区委书记发表感想说：

“不管怎么说，动了冲锋枪事情就难办了，马特同志。”

“难办个屁！”马特说，“对于那些热衷于标新立异的人

来说，事情才难办。他们把矛盾挑起来了，却又收不了场。难下台的是他们！在军训的时候我带冲锋枪奔袭三公里，眼皮也不眨一下……”

“嗯，可是这是两回事。……”区委书记说。

马特眯着一只眼睛看着区委书记：

“武装在好人手里就不要紧，如果到了坏人手里，不管他拿它来干什么，都不是好事。”说着他站起来，手插在裤兜里，身子靠在办公桌后面的墙上。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换了一个声调，平静而非常严肃地说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主要是这样做对谁有利，特别是将要对谁有利！我只知道……在土改的时候，没有大学文凭我这人有用！筹建党组织，没有大学文凭，我有用！组织生产合作社，推销公债，风里来雨里去，饿一顿饱一顿，吃凉饭得胃病，没有文凭我也行！可是现在，没有文凭我就没有用了！”

他挥了挥手：

“就算我跟不上形势，达不到要求；是这么说的吗？你说，是这么说，还不是这么说？”

谁也不说话。乡长看着区委书记，区委书记默默地看着马特：

“你说下去！”区委书记说。

“何必躲躲闪闪！……”马特接着说。“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而且不只是一个同志这样对我说过。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正好在今年跟不上形势，为什么不是在六〇

年组织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那时我这一点本领就够了？那时候我也没有大学文凭，难道那时候我有文凭吗？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跟得上形势了？”

他沉默地看了一阵区委书记。

“不错，时间在前进，人也在变化，和去年不同了。谁跟不上，谁就掉队。我自己是这样教人的，自己也拿这话鼓吹了整整十七年，拿这话往别人耳朵里灌。那么当然，我自己应该懂这个道理！是我一批一批组织人：‘你们学习去！’是我大叫大嚷：‘中技校还有地方，为什么不送你的孩子去。光拿他爸爸的那点本事在今天的社会里是不行了。’我也说过：‘别光满足于中技校水平，还要上夜大学，上函授大学，弄文凭！没有文凭，我们的农业就搞不好！你们要把农业抓手里！’”

他又竖起手指头来：

“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国家给助学金，政府给钱。可是钱是哪里来的？同志，钱是别人从清早到天黑干出来的！没有别人干活，你农民的孩子能拿到大学文凭吗？能做什么专家吗？为了给他们提供钱，当上大学生，我自己就不上大学，拚命工作，让别人也干，甚至让上帝也一起干，为的是庄稼有好收成，为的是有个坚强的党组织，为的是人们有觉悟，为的是合作社里一切都走上正规，让社员好好劳动，好让国家有钱，那么只好有一部分人不去念书！要把旗打起来，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为了把旗升到顶上，就得要人梯。同志，你放心站在我肩上，我支撑着，

就是上帝想作梗，我也不在乎。有人想绊我的腿，我还是稳稳地站着。同志你只顾上去，下面的事有我们！就这样，不但把旗打起来了，别的事还做了不少。……管他什么胃病哩！我什么也不管，少睡觉，不在乎！老婆只能在后半夜见到我，也不要紧。一清早我又来了，让你往上爬！为的是让你上得高点！为的是让贫农的孩子当上农艺师，当上工程师，当上经济学家，当上你想当的什么专家；或是国家想让你当的什么专家！”

乡长抬头看着区委书记：

“贝莱基同志念完农业专科学校了吗？”

“念完了。”区委书记说。

“念完了！”马特说，“他念完了，可是在区执委会里我从来也见不着他，哪里也见不着他，公路上也好，小道上也好，从来遇不上他！有时几个月谁也见不到他。一年之内半年休假，——好啊，没有白上高等院校！可是他在上农专的时候，谁替他干活了？还不是别人？我不是从管六个乡增加到八个乡，从半夜十二点回家变成后半夜两点?!”

他点支烟，把火柴扔在桌子上：

“是啊！我没有文凭！”

他低声接下去说：

“我的罪过在于一九四五年以来一心扑在把匈牙利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没有设法去搞一张文凭。我一生中一半时间是为了让别人得到文凭而努力工作，而这些人现在已经上去了，不需要我的肩膀了。因为我不但用肩膀

扛着他们，其间还给他们把楼梯也做好了，为的是让他可以上去得更快些！楼梯也有了，然后可以问我来了：哎呀，同志，你怎么没有文凭？有了文凭就可以顺着楼梯爬上去啊！同志，文凭呢？证书呢？——没有！同志，没有！我什么证书也没有，……我是个没有证书的人！”

区委书记站了起来，走向桌子，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两手撑着桌子瞪着马特说：

“现在我想听听，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

“你！”

“喔……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姓马特的什么时候有过问题？我从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问你，现在你有什么问题？”

他的眼光在马特脸上扫了一圈：

“你去过农业专科学校了没有？”

“去过了。”

“今天去的？”

“今天。……”

“谁和你谈的话？里莫齐？”

马特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啊……”区委书记问，“谁和你谈的？”

马特看着书记的脸：

“听我说，屈勒什同志！听我跟你说。”

他寻找着适当的措词。

“我跟你说，把这些事都放在一边，且不理它，别再多费口舌了，不值得谈论这类事情。……我到红十字会去当书记，我还是会努力把工作做好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里本来是一个女同志在干，现在我去干。那里也需要有人好好地干！就这么回事，多费什么口舌？你在这里完事以后就到裴多菲生产合作社去，在那里也有不少事……你问是不是里莫齐，是的，是他和我谈的。”

“他说了些什么？”

马特耸耸肩：

“什么也没说。”

他竖起眉毛，看着区委书记：

“什么也没有说。”

他离开桌子，走了几步，身子倚在墙上，眼睛看着地面：

“相当客气，非常客气……”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零七八碎的话：他很高兴，我终于自己也看到了形势的发展，理解到了时代的召唤，……他一直热情地等着我亲自看到这一点，他希望我不会让他失望！”

乡长摇摇头：

“真他妈的……”抬头看看区委书记。

“就说这一类话……”马特说。“我出来的时候他抓住我的胳膊说，‘同志，抬起头来！时代在前进，我们要和时代一起前进……你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的！’诸如此类，态度和

蔼可亲。他说：‘我希望您了解，这次给您进修的机会要看成是国家对您的信任。要努力不辜负国家的期望！就是要我感恩戴德……’”

“真是他妈的……”乡长说。

“呵呵！态度和蔼，十分客气……正当我还想问什么事的时候，他站起来了：‘对不起，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回头我的秘书会把各类注意事项告诉您的，什么书在那里买，等等……’说着把门打开。但是他在门口还是站了一会儿，尽管他事情很多。他说：‘马特同志，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时代……它在前进，谁也阻挡不住，谁要是落后了，他就得设法赶上去，’他竖起指头说，‘如果您不想彻底掉队的话。因为这样的人是有的。’于是他拍拍我的肩膀和脖子根，在我身后把门关上了。”

他耸起肩膀：

“全部谈话就是这样……后来我把一切都办完以后动身时又在街上碰见他了。我骑摩托车，他乘小卧车……”

“他跟得上形势！”乡长说。

马特又走回来，两手撑着桌子，瞪着区委书记：

“嗯，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谁有权利跟我说教训和期望？谁有权利拍着我的脖子根对我说：‘同志时代在前进，别掉队，别辜负国家的希望！？’这正常吗？我本来是烙饼的，现在回过头来吃烙饼？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是我烙的饼，在联合政府时期去找他，告诉他：‘里莫齐先生，您的步子方向迈得不对，这条

路没有前途！因为那时他每天和小农党的人鬼混，连他自己的党也多次提醒他注意了①。就是我这个只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平的农民干部前去告诉他：'我找您就是为了告诉您：您要用自己的学问去为人民服务，去为那些不是为小集团的利益，而是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工作的人服务，去为那些为实现发达的工业和现代化农业而献身的人服务！您如果愿意拿自己的学问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那就请站到我们这边来！'你猜那时候他说什么？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想问问您，您的文化程度是多高？''小学六年，'我说。他说：'那我们之间恐怕不大会互相理解！'于是站起来，很有礼貌地把我送到房门口，拍拍我的脖子根'没关系'好象原谅我穿着带泥的靴子进了他屋子似的。而现在他却居然发表起演说来谈政权，谈别人的局限性和应该怎样当内行了，讥讽别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指手划脚了。这个自命不凡的、这个自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不管给自己抹上什么颜色，早晚要搞法西斯！当年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不是他来找我要求帮忙的吗？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劳动人民，为什么找我，还不是他想逃跑，被人家从火车上揪下来了?！那时候他倒想着来找我，不去找上帝了……"

马特举起手。

"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不是别样！而现在他居然把手按在我的脖子根上说：时代在前进，别落后于形势。你得到

① 匈牙利解放后至一九四八年以前的联合政府时期，政府中小农党势力最大。

了信任，你就得卖力气。我去红十字会当书记，让他在这里乘小卧车当区执委会委员好了。因为需要专家，对不对？他当然不能缺！呵呵！别让专家不高兴，咱们都要小心点，别把专家惹恼了！马特吗？他不会不高兴的，他反正是赶不走的，怎么对待他都不要紧，打发他去看大门也行，干什么他都无所谓，他反正把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他在临死那一分钟也不会懊悔的，……是不是？这个马特他不会生气的，只要拍拍他的脖子根就行了。他不会出声的，他不会啐唾沫的，因为他看到国家需要专家，而专家们都已经紧密地和我们在一起了。是这样，对吗？如果将来一旦人民政权发生问题，那不要紧，马特会跳出来保卫的。他会拿起冲锋枪来捍卫人民政权的，因为他只会干这个。他还要保卫里莫齐。怎么会不保卫里莫齐呢？因为里莫齐和人民政权在一块！”

“说来说去，”他接着说，“亚诺什，所有这些我都不懂，大概我是太笨了，看来我的学问是太少了，中学还不行。还要多学些，大概就会容易明白那些聪明人轻而易举就弄明白的道理了。我的脑子实在不够用。你的脑子足够了，所以你的日子容易过，这些道理你都明白，对吗？”

区委书记点点头：

“对的！谁也没有我的日子容易过。你看我身边不是有两个人吗？——你和里莫齐。那么日子有什么难过呢？”

马特抬头问：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日子容易过……有什么难的？真的难吗？”

“也许……”马特说，“也许，好比说对着我的眼睛看，两个人的眼睛都不要眨一下——我的也不眨，看我的那个也不眨。比起这个，也许要容易些。”

“当然，”区委书记说，“我什么别的都不干，就只看你们两人的眼睛，自己却不能眨一下……”

“嘿嘿……”乡长笑起来。

“你笑什么？”区委书记问。

“嗯……就是，就是……其实这样做一点也不容易！”

## 十一

五点钟

乡长关上门。

“您为什么不跟着区委书记一起去？”

“晚上他还要到这里来找我。”

“现在他到科苏特生产合作社去了？”

“对！”

“那里有什么事？去参加管委会？”

“对！”

乡长回到桌子跟前坐下，伸着腿。

“真他妈的……”他摇摇头。

他解开衬衫的扣子，搔着痒，一面搔，一面哼哼：

"哼，……"他看我一眼，耸耸肩。

"政治这玩意儿不简单，对吗？"

"对！"

我坐在离开桌子比较远的一张破沙发上。

乡长说："不过区委书记的话也有道理……"

"当然是……"

"他说他处境容易……他说这并不是想说他的处境真正容易。正好相反：就说他必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就不容易。好比说一方面是里莫齐，另一方面是这位马特同志。这位这样，那位那样，而他就得驾起辕来，别让车跑上邪道。这位里莫齐倒不在他的领导之下，但书记了解他，因为有一段时间领导过他，就在这里的农场，书记非常了解他，因此他甚至还有点怕书记……就是说书记刚才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当然……"

"可是……"他看着我说。"要是仔细想一想……我倒不是想替马特同志说话或是别的什么动机，虽然他说的没有区委书记有道理，可是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

他俯身在桌上。

"事情就是这样……马特同志干工作是很积极的。在这个区里您无论在冬天还是夏天，您不管到哪里去，总会在什么地方碰上他。耕种的时候他在地里，收割的时候他在场上。不但在我们这里，哪里都有他，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

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总而言之，拚命工作，这是怎么也否定不了的。他哪有工夫学习？大家都去学习，那么谁来组织合作社？别的工作谁做？”

他放低了声音：

“您知道实际上人们有时也想，把他从区里调走是不是真是因为他没有文凭？恐怕只有天知道。……因为实际上那年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这位马特说的话是相当有点不合潮流……当然，我也不是很清楚，无非是东听一句，西听一句，至于到底怎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他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听说他对那次代表大会[①]有点不同意。看来真正的原因在这里，不在有没有文凭。……说他没有文凭，恐怕也只是为了找个理由把他抹下来……嗯……我有时候这么想。”

他举起手，看着手心继续说：

“当然，这也只是街谈巷议。至于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发展的现阶段，他是掉队了，这也是实际情况。就象区委书记说的那样，谁不学习，谁就跟不上形势发展。我也是现在才学小学六年级的功课。不容易，可是只好学，就象刚才区委书记说的那样。不过政治这玩意儿，可实在太高深了。我总觉得，每个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别太冒失，也别太落后，就象喝汤，别太烫，也别太凉，这样才最合适，不吃亏。对吗？说实在的，这位马特同志在这个乡里不太受欢迎，在

---

① 这里是指苏共二十大。

全区也不受欢迎。当年在区里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这个区里做党的工作，他和我们说话就象老板训小伙计似的。他只会发号施令，从他嘴里就听不到一句客气话。我有时候对他说：'马特同志，跟人家说话恐怕这样不太好。'他就说：'又不是过圣诞节！'他干的有些事，现在恐怕还是不说的好，他对有些人做的事，可实在太不怎么样了。……当然，这些事我也有份，那时也是没法子……当时我的肝不好，就拿这理由辞了那个书记的职务。总之，他干了不少不应该干的事，特别是作为党员不该那么干。现在上面也正式这么说了。到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因为当书记那一阵，我理解了不少东西，后来当合作社主任，也懂得了一些道理，现在是当乡长。总之，我品出来，步子要迈在路的中间，既不靠向这边，也不偏在那边，就出不了问题。"

他放声大笑：

"恐怕还要加一句：要走直路！"

他点上一支烟：

"回过头来再说这位鲍洛格·安陶尔……当人们向我报告是他向尤什卡家开枪的时候，我说：'别胡说，不可能，''可是真的是他。''不可能，'我说。因为如果说任何别的人开枪，也比说是鲍洛格开枪更能使我相信。可是，人们说，就是鲍洛格·安陶尔开的枪。"

他慢慢吹出烟，胸口顶着桌子。

"如果说他开枪打了别人，我也能相信，可是偏偏说他打了尤什卡，这我更不相信。因为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的

瓜——我是，尤什卡是，被打死的本雅明也是。他的妻子直到现在还不让补上门板上被枪弹打穿的窟窿。还有那个瓦尔加……。这位马特和屈勒什同志也都是穷苦出身，我们这些人都是穷苦出身。可是您看！真他妈的见鬼！”

他挥了挥手：

“好吧……还是谈谈您提出的问题。在一九四五年以前，这个尤什卡，就是现在当主任的，还有安陶尔都是在一起的。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一起长大的，一起在伯爵庄园当长工。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感谢上帝，现在不住人了。应该说句良心话，他们当年住的屋子后来固然是尤什卡改成牲口交配室的，可是实际情况是马特对他说的：‘尤什卡，只要这间屋还住着人，你的工作就算没有做好！’这是乡执委上说的。嗯，总之，尤什卡、安陶尔，他们是一块儿长大的。后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是抱着团。当尤什卡被从庄园里撵出来的时候，安陶尔也被一起赶出来了。他们什么事都是一起干的。可是您看，后来是安陶尔向尤什卡开了枪。连上帝也想不到的事！特别是过去一向百事有份的安陶尔，在后来几年几乎是百事不问了。

“什么叫百事不问？”

“是这个意思：一九五二年底他把党证放到党支部办公室桌上，说：‘从此以后我的名字叫做鲍洛格·安陶尔，后面不跟什么称呼！’意思就是说不用再叫‘同志’了。那时瓦尔加·山多尔，就是打死本雅明的那人，是支部书记，朝他大叫大嚷，可是安陶尔根本不理，走出了屋子。那时他们都

还住在村子里面，后来是尤什卡把他们迁到村边新屋子去了。安陶尔为什么退回党证呢？因为那时他的侄子住在他家，是个五岁模样的孩子。那年头日子不好过，一个农民一星期分不到半公斤面包，妇女们只好到沟边割荨麻，全家都得吃它。那几年实在是够困难的，可是这位马特却以为靠谈话和命令可以解决问题。大家都看到，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安陶尔有个亲弟弟在杰尔的铁路上工作。从那里给安陶尔运来了三十公斤面粉。他是从哪里弄来的这面粉只有天知道，反正是送来了，安陶尔上午拿到面粉，中午乡政府秘书、警察就到他家去了。还带上一个乡政府代表——那个不得人心的盖切·加博尔。这些人要安陶尔把面粉交出来，说这是囤积居奇。‘什么面粉？’安陶尔问。他们说：‘就是你上午拿到的面粉。’安陶尔当然不交，他说，‘只要我侄子没吃饱，谁也别想动一动这面粉。’‘你不交？’乡政府秘书问。‘不交！’安陶尔说，‘凡是我自己的东西，在我当长工的时候也没有交过，现在同样不会交。’这时这几个人说安陶尔因为囤积居奇是人民的敌人。安陶尔对乡秘书说，‘你自己才是人民的敌人！还有生你的妈妈也是！’

“您知道，这个乡秘书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在旧政权的乡政府工作，那时候这里的电影院就是他父亲开的。……这个乡秘书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可是村里都说他爱打小报告。连我都有点怕他，因为要是我说句什么这件事不太合适之类，他就真去报告！其实他们家还有两所房子呢！不

过他是个聪明人，上面提倡什么，他就鼓吹什么，所以在他面前我也只好缩着脖子。后来一九五六年他跑了。

“唉，安陶尔就这么说话，骂这电影院小东家的妈，还说了一些别的。后来这个乡秘书想进屋去拿面粉，安陶尔猛地从厨房后面抄起一把斧子说，谁要是再走一步，他就打死谁！安陶尔的妻子跑过去拉他：天哪，安陶尔，我的好安陶尔，你怎么了？她一面说，一面哭！她就这么哭。后来安陶尔也哭起来了，这么大个子男子汉哭得伤心得象一个孩子！后来医生说当时他有点神经错乱了。也可能的确是这样。后来安陶尔摔掉了斧子，头撞着墙，一面撞，一面喊：‘开枪吧，警察！你开枪吧！’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从墙边拉开，那时他已经满脸是血，因为鼻血流出来了。他跑上街上，抱着头，扯着嗓子喊：‘开枪吧，你这个共产党警察！开枪吧！’他把衬衣也撕了，指指胸口告诉警察，朝那里开枪。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了……”

“面粉被拿走了吗？”

“当然拿走了。怎么会不拿走？对那些人说来这算得了什么？面粉拿走了，在安陶尔门上贴上一张告示，说住在这里的人是‘帝国主义走狗’，也许是‘代理人’或是别的什么称呼。后来尤什卡去找他，他不让尤什卡进去。后来安陶尔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天，回来后就把党证退了。其实这里的党组织最早是他和尤什卡建立起来的，土改也是一起干的，这里的事那时候都是他们俩做的。”

“那时候谁是支部书记？”

“就是瓦尔加·山多尔！瓦尔加反而写报告说鲍洛格·安陶尔闹事，使用暴力！”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妇女。

“你好，乡长同志……”

“您好。”乡长说。

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年届五旬的妇女，腿肚子上曲张的静脉胀得高高的，发着青蓝色，鞋上布满尘土。当她走近桌子的时候稍稍偏过头来对我说：

“您好。”

“上帝保佑……”

“把你手里的纸给我，特里莎，”乡长说。说着就把纸从女人手里拿了过去，一面找笔，一面继续说：

“这就是发生在安陶尔身上的事。从此以后，他既不到乡政府，也不到党支部。只在家里坐着或者出去干活，什么别的事也不做，人多的地方从来不说一句话。”

乡长抬头看着特里莎：

“你还打针？”

“还打，”妇女说。

乡长低着头看着纸片：

“你的伯爵好吗？”

“感谢上帝，很好……”妇女说，“上星期他抱怨胃有点不舒服，后来小大夫去了，这几天什么病也没有，睡得也好。”

“他的腿呢？”

"腿还不太好……"她偏过一点身子，怯生生地朝我笑了笑，"上了年纪，不管得什么病，好得都慢……"

她显得很衰老，似乎是饱经苦难。双手布满青筋，骨节粗大，两条发肿的腿……这一切都说明她干过许多重活。但是她的笑容却象一个孩子，既胆怯，又纯洁。

"你真是个傻瓜，特里莎！"乡长说，"你还要傻多久？"

女人往后退了退，右手不好意思地下意识地抚摸着桌子边。

"噢……只要上帝允许！"她微笑着。"我的年头也不多了，日子是过得很快的。"

她看着地面，把手从桌子上缩回去。

"日子是过得很快的。"

"这样不好！特里莎。"乡长说。

"上帝怎么安排都是好的。"

她正了正头巾，吸了吸鼻子，看着乡长在写字的手。

"你儿子不回来吗？"

"不回来，"她低下头，"他说只要他爸爸活着，他就不回来，不进我的门。"

"他爸爸？"乡长抬起头，"这是爸爸吗？伯爵算什么爸爸？连老狗对崽子也比他强。"

"可总是他的骨血！"女人轻声说。

"不错，是骨血。可是当他还有一千霍尔特土地的时候，他理也没理过这个骨血。"

乡长把纸递过去：

“好吧……我不多嘴，你的日子也不算好过！去吧，把这交给莎莉，叫她盖上戳，回头她会给你钱的……”

女人很快接过纸说：

“谢谢你，盖尔盖伊……”

乡长摆摆手：

“不用谢……我倒是想听听，你早饭给他吃什么？”

女人的眼睛一亮：

“他爱吃蜂蜜，还爱喝可可……”

乡长叹了口气：

“好，赶紧走吧，说不定回头我会改变主意。”

女人拿着纸正了正头巾：

“我可以走了吗？”

“我刚说过，你走吧，要不……”

接着，他轻轻地说：

“走吧，去领你的钱吧……”

女人走了几步以后转过头来，向我也告了别：

“再见！”

“再见……”

到门口时她又回过身来：

“明天您到我们那里来吗？”

“要去的，”我说。

她看看乡长，笑了笑。推门出去，然后又关上了。

乡长看着她出去说：

“拿她怎么办？”

他站起来，一下把椅子推到桌子底下：

“蜂蜜，可可！真是混帐之极。这个女人居然死心塌地给他卖命。……”

“您批给她多少钱？”

“每季度一百五十福林，从社会福利基金里开支。我当年做长工的时候也没有特里莎现在干的那么多。锄地、洗衣服、拖地板、打扫屋子、种园子，只有天才知道什么事她不干，为的就是让她的伯爵过得好一些……”

“就听上帝安排……”

“是啊……但愿他可可喝得肚子痛。当这片土地还是伯的庄园的时候，他给我们吃什么？只是没有饿死罢了……”

“还是说说安陶尔……”

乡长摆了摆手：

“关于他没有多少好说的了……”

“您告诉我，他自己究竟怎么说，为什么开枪打尤什卡？”

“什么也没说。……”

“他总得说点什么吧？”

“什么也不说，怎么问也不说。他只是看着你不开口。现在也这样……看着前面，一声不响。”

## 十二

六点钟

炊烟袅袅地缭绕在村庄上空。最早只是一家烟囱里冒

出一缕轻烟，然后加浓起来。接着第二家，第三家，最后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庄。

妇女们蹲在灶前面，折着去年的葡萄藤添火，有的人家用砍下来的树枝，那些太长的，妇女们就在厨房门口顶着膝盖把它折断了。火开始旺起来，当第一把树枝扔进灶膛里的时候，空气里顿时弥漫着清新的槐树香。火焰在绕着树枝向上扑着，象是挣扎着要离开它，在下面引火的玉米核依然还在缓缓地燃烧着，然后慢慢地弯曲了，变得有点透明起来，看起来轻得象灰一样，而且越来越细，细得象一条带子，但它一直在燃烧着。开始是上升、然后又散开的炊烟迷雾中，混着牛蹄踢起的尘土。先是合作社的牛群，慢慢地、从容不迫地蹚过大路。后面跟着各户自留地的牛。当它们看见熟悉的院门时，便会笨拙地缓跑几步，而在那里便会站着一个孩子或是妇女，手里拿着树枝：去，去，别进来，到野外去，于是牛往往会伸伸脖子，哞地一声，掉转身子，摇摇摆摆地回到队伍里，蹭着沟边的木栅栏向前走去。

夏日特有的令人感到郁闷的沉寂过去了，此时无孔不入的声音控制了世界：井台上响起了井杆的吱嘎声，谁家院子里还在劈着柴禾，马在河边水面上打着响鼻，然后又长嘶一声，举起蹄子刨了几下，远处还传来清脆的歌声，在这边是一个姑娘唤鸡的声音：咕、咕、咕、咕，立刻，扑翕着翅膀的母鸡、小鸡，昂首阔步的公鸡逐一从篱笆脚边仓库后面、猪圈墙旁出来了。一个妇女走到栅栏边。向街上探身喊着孩子，而对面院子的另一个女人也正在这样做，于是抢着说同

样的话：又到哪里去了？……这时头一个已经回头向屋子走去，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你就别回来了……突然，她拍起巴掌来，原来家里的几只鹅笨头笨脑地、摇摇摆摆地不回它们自己的棚子去，而是分散在院子里或是在篱笆桩旁边觅着野草、嫩叶……嗨，嗨……妇女拍着巴掌。被牛群掀起的尘土还没有落尽，受惊的鸭子就扑翕着翅膀，嘎嘎地叫着在路上狂奔了，原来喷着浓烟的拖拉机正在它们后面隆隆而来，上面坐着赤膊的、浑身落满尘土的小伙子。呀！这是什么怪车，别把我们的鸭子轧死啊！后来它们终于定了神，轻松地走开了，但还是不停地抱怨着，叫唤着，发泄不满。

所有这些只是街上所见的一鳞半爪，构成了农村生活的一部分。有人也许根本没有听到这声音，但从那缓缓升起的炊烟里，他大概是可以感受到那些声音和生活的节奏的。

## 十 三

七点钟

警察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槐树上，自己在不远的一棵树桩上坐着，他旁边是主任的马车夫。

赶车的打开烟盒递给我："抽我的。"

"谢谢。"

"你也来一支，彼得……"他把烟递给警察。

“我刚扔掉。”警察说。

“抽吧，我爹在世的时候老爱说：没关系，抽烟就要它的这点毒！每当我娘说他整天叼着烟卷时，他就这么说。”

警察点上烟。他两脚半伸地坐在树桩上，双手在膝盖之间晃动着，帽子推得老高。

“如果一切顺利，他半小时以内就到。”

“没错……”赶车的说，“他准来，回头就到你眼前。”

赶车的把打火机递到我面前，笑着说：

“要是我们的那位朋友赏光，回来看看自己的村庄，我想咱们也得和他招呼，干吗不招呼？……为人得讲礼貌。”

“他一定会来的！”赶车的肯定说，“就到这里，到警察大叔的手里……”

“听说瓦尔加在什么地方当警察？”我问警察。

“没影的事！”他说，“人们爱乱说，自己也弄不清楚在说什么。”

“不过人家确实是这么说的。”赶车的说。

“你也相信？”

“上帝知道……”

“你别傻了，这是某一个什么人编出来的，你知道，有的人喜欢别人不高兴……说他当警察就象说我当了主教一样。您别信！”他转过来对我说，“至于说他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一个人连自己的老家也回不来，他舒服不了，上帝也会找他麻烦……”

“可是这一位倒是回来了，你看！”车夫说，朝山坡那边

葡萄园的方向扬扬下颌。

“这次算他来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回来就难说了。”警察说，掏出手帕，摘下帽子，擦了擦额角。

“瓦尔加没有象别人说的那么坏，”他对我说，“他的毛病就是管不住自己。”

“人倒是不坏，”赶车的接话说，“要是脖子上来根绞索，他肯定会变成好人的。”

“胡说八道。如果他该绞死，那么你等的这位该怎么样？”

“给他也应该来一根。绞索一头是这一位，另一头是那一位，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那么鲍洛格又该给什么？”

“给他也来一根。一律平等！”

“其实，那天我都准备好了。”

“那时您准备把他送走？”

“是我，或者说我也是……”

“那时一共三个人，”赶车的向我说，“他——这位警察，还有瓦尔加和舒巴·伊斯特万。现在只有警察一人在这里待着了。……后来还有尤什卡，不许他们去他那里，命令他们走开。”

“管他给谁发命令，但是他没资格给我发命令！不论是那时候，还是现在，他都不配。”

“反正他把您们打发走了，对吗？”我问。

警察竖起手指：

"不管是那时候，还是现在，他都不配给我发命令。"

他看着赶车的：

"当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没事了。"

"没事个屁……"车夫说。

"在这个村里，"警察提高声音道，"那时候什么事也没有了。至于人们说什么，不说什么，那没有关系，至于有没有事，那时候根本没有事了……"

"您是一个人回来的？"

"不，在林子里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警察，我是和他一起来的。应该说是三个人，因为我们先到区里，后来在那里遇见了瓦尔加·山多尔。那时他已经拿着冲锋枪了，我们是后来发给我们的。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回来。……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主任那里去，他说：'哪！伙计们，你们来了？'"

他耸耸肩，看看我，又看看赶车的：

"当时是什么情况，我就怎么说，一点也不掺假。主任说：'你们在林子里没挨冻吗？蘑菇吃够了吗，也许连这也没吃？你们挤在一起取暖了没有？'这时舒巴·伊斯特万说了：'要说的不是这事，要说的是：请主任告诉我们，把谁带走？''把谁带走？'他问。'对，请问，我们把谁带走？'舒巴说。主任说：'这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问我！？因为是你们管治安，而不是我。是你们宣的誓保卫这个社会，而不是我。你们应该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是谁触犯了法律？是不是这样？你们的誓言里不是有一条叫做明辨是非，坚持

真理吗？……'他就这么说下去，我觉得他好象根本不打算结束似的。瓦尔加，这个支部书记那时一言不发，就在门口站着，也没有太进屋里。其实主任开头时候是一直冲着他说的，因为那一阵子形势紧张的时候是他第一个从这里逃走的。他那时就这样，一言不发，咬着嘴唇，他历来就是那个派头，看着地面……"

车夫插嘴道：

"他从来不看人，从来不看对方的眼睛，就是东一眼，西一眼，这里那里溜一眼。……人们往往会想，这人大概郑重地抬头都不会！"

"舒巴也不出声。最后我说话了。我说：'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连圣母马利亚也改变不了事实。''那当然，'尤什卡说，'不过我想你们听听人话总比在林子里听乌鸦和猫头鹰叫要舒服些！'"

"这话说得有点道理……"赶车的说，在警察背后朝我挤挤眼。

"当然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就对他说：'如果格罗[①]同志可以到处乱跑，那我到附近树林里待待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毕竟比他走得近。而现在，我还在这里，可是格罗同志在哪里？'尤什卡说：'你是向格罗效忠，还是为人民共和国服务？'舒巴说：'那么格罗同志是向谁效忠？是向我还是向人民共和国？那个州委书记的脑子肯定是好使的吧？那时

① 拉科西时代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后被开除出党。

候他跑了，那我在这里干什么？做书记总得有大学文化，而我只有补习班水平。要是我有他那点文化，我也早就远走高飞了，谁愿意在林子里挨冻？不管怎么说，形势变了，我们又回来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位瓦尔加·山多尔就那么听着，听着，到末了他开口了，他还是老样子，谁也不看，就那么眨眨眼说：‘话说得太多了。事实就是这样，反正你那时候在家，你应该知道，该动一动谁？……’于是主任说：‘你听着，山多尔！在你们这几个人中间你的处境最容易。你要做的事只是回想一下，在这村里你动过多少人？恐怕你的脑子里都装不下。既然这样，那你最清楚！你去吧，不过你得明白，你干的那么许多烂事，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尤什卡为什么这么说？”赶车的道，“是因为这个瓦尔加·山多尔，在拉科西年代里，即使他自己的母亲说句这事有毛病，那事不怎么样，他也会把她带走的……”

“就这样。尤什卡主任说：‘那我们走吧，去找这个基什科瓦奇！’‘那别人怎么办？’瓦尔加问。‘什么别人？’主任问。‘那些到你这里来过的人！’瓦尔加说。我们互相看来看去，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他在说什么？好象他抓住了主任的辫子似的。‘别人你们最好别动。只有这个基什科瓦奇才是你们的事。不过你们找他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走了。’这个瓦尔加还是在门口站着：‘那么鲍洛格·安陶尔也走了？’他还是那样，眼睛一会儿溜到这边，一会儿溜到那边。‘你问鲍洛格·安陶尔是不是也走了？’‘是的。’这时大家都不作声。于是主任一直走到瓦尔加面前：‘你听着，

山多尔！你牢牢记住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你现在手里有枪，你现在从林子里回来了，或者说从你本来待的地方出来了。你手里有权！过去怎么样，无所谓，你见过大人物，现在你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的脑袋究竟有多大了。你去找基什科瓦奇，只要找得着就行。对于别人，你最好手下留情。至于鲍洛格·安陶尔，你更是千万不要碰！’这时瓦尔加笑了，就象他历来那样地笑，只是把嘴拉得长一点。他说，‘难道只有基什科瓦奇朝你的窗户开了枪？难道你这里不是半个村子都来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他怎么会知道的？尤什卡主任说：‘不光是基什科瓦奇，有两个人开了枪。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另一个开枪的人就是你！一点不错，宝贝，虽然开枪的是安陶尔，可是枪是你给的，是你的这伙人给他的。不怕害臊！’这一下屋里就鸦雀无声了。瓦尔加没有说话，他历来很少说话，总是笑笑，象他历来的那个样子。主任说：‘他想杀我，回头我自己和他算账！如果你把眼睛盯住安陶尔，那么到头来咱们两个没有完。这点你千万记住，永远也不要忘记！他朝我开枪，可是我吃的是你的果子。如果我该和他算账，我自己会去算的。我这一辈子没有让别人欠过账，这点你也很清楚。可是你，山多尔，你一个手指也别去碰安陶尔！’主任就这么说，我一言不发地听着，舒巴也不出声……瓦尔加却说：‘好吧，尤什卡，我明白了！’‘你明白了什么？’主任问他，‘全明白了，应该明白的事都明白了，我们两人又要从头来了。’‘从头来什么？你说清楚！’可是瓦尔加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我们做个手势——走吧！于

是打开了门。那时已经是夜里了，十二点钟光景……”

警察不说话了，两个人都抬起头来注视着寂静的树林子。在路的远处可以听到摩托车的声音了。

“就是这样！”赶车的说。

他站了起来，接着警察也站起来了。就那么站着听远处传来的摩托车声。警察紧了紧腰带，正了正帽子，对赶车的说：

“你待着别动，什么也别说！”

“虱子才待着不动，我可不！我想看看……”

“我告诉你：待着！”警察说着向大路走去了。

“反正我要好好看看他……”赶车的说道，“您也过来近一些。”他对我说。

“我这里挺好！”我说。

赶车的一直走到槐树林边，离开大路只有几步，在一棵大树下站住了。摩托车已经开了过来，我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站住！”

刹车的声音。

“关上发动机！”

顿时静下来了。

“早上好！”

“上帝保佑您，”听得出来，这是那位老人的声音。

“您们刚才都在您的酒窖里吗？”

“是的！”

“您们知不知道驾驶机动车辆不准喝酒?”

“其实刚待了一小会儿。……”

“喝酒了没有?”

“喝酒? 我们喝的那点酒小孩子也不会醉……”

“喝了,还是没有喝?”

基什科瓦奇说了:

“您别说了,教父!”

“摩托车是谁的?”

“您知道不是我的……”

“有执照吗?”

“没有,这您也清楚!”

“我清楚不清楚,这是我的事。喝酒了没有?”

老人插进来说:

“就那么一口……”

“您别说了,教父! 喝了!”

“知道不知道驾驶车辆不准喝酒?”

“知道。……别的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和我没有关系。”

“好吧,现在怎么办?”

“下车,跟着我,把车推到村里派出所! 这是规定!”

“看来您规章制度学得不错……”

“和公职人员说话请注意礼貌,至于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可以另外找时间发表。下车!”

寂静。后来警察说:

"你如果感兴趣，我可以告诉你：规章制度我学得比你所想的要好。好吧，推吧，我希望你还认得路……"

"教父，请下车吧！"

警察又在林间空地上出现了，他骑上自行车，穿过树丛上大路，向我们方向举手碰了碰帽檐。

"好，走吧！"

几步以后又听到他在说：

"记住，喝酒以后不准驾驶车辆，因为这可能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因而要受到惩处……"

声音越来越小，听不见了。

站着的车夫紧了紧裤带走向树桩，从地上捡起帽子：

"够味！也算是一件，不算大，不过也算一件乐事。我早就料到会在这里等着他的。"

## 十 四

八点钟

老人说：

"当年在村里分土地的时候，谁要求土地就去登记，尤什卡他们特别伤脑筋的事是有不少人不敢登记，因为他们害怕变天，地主老爷要是回来，谁要了土地谁就倒楣。那一天我们抽签，看谁的土地分在哪里，也就是看分到哪一块地。那天有个人把尤什卡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人说什么也不肯要土地。这家伙开会倒是来了，因为尤什卡按着

他的脖子逼他来，他不敢不来。可是一在会上念到他的名字，他动也不动。”

“他叫文策尔，对吗？”

“对，就是这个人的儿子打了尤什卡……这个……文策尔不肯到桌子边上去抽签看自己分到哪一块地。我们知道他担心什么。尤什卡再三跟他说，可是全白费！尤什卡差不多又要去按他的脖子逼他去抽签了，可是这个混帐文策尔叫唤起来了，他差不多哭着说，他的孩子太多，他们不是要地，而是需要他活着，将来老爷们回来的时候别杀他……总之，乱闹一气。”

“不过这样的人也不少……”

“可不是……可是他折腾得比十个人还厉害。就这时候我从人群里出来了，喊了一声‘安静’！连尤什卡也楞住了。那时候他眼看要发作了，因为，文策尔一闹，在场的许多人开始停住脚了，开始眼睛看地面了。就是说文策尔这家伙起了坏作用。当然，说句老实话，文策尔说的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咱们国家的革命闹了好几回，可到头来都是农民吃苦头，苦酒实在是喝够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倒过楣，可是谁都还记得那年月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恐怖即使自己没亲眼看见，听也听够了，人们说这事，就象讲故事唱歌一样，一代传一代。所以每人都知道，谁出头，到头来他就可能挨热烙铁，被杀头，或者象一九一九年以后那样被枪毙。每个农民脑子里都记住不少这种事，所以一碰到局势变动，他总得翻来复去地想，到底是躲在家里还是去

开会！

“嗯，就那样，我走到桌子边上，喊了一声‘安静’，大家都不出声了。不是我夸口，他们都知道，我轻易不爱讲话，可是只要说话，总不是空空洞洞的。我那时对文策尔说：‘你这个倒楣蛋，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好好看，好好听着。’人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走到小学老师身边，他是个老头，在委员会里写写算算，我问老师：‘老师，写点东西还有纸吗？’‘有，’老师说，‘有。’‘那好，’我说，‘那劳您驾拿一张出来，放在您面前，我说什么，就请您写什么，写完后给我，让我亲手签个名字。’这时连尤什卡也看着我，弄不清我想干什么。您知道，会上人们告诉文策尔说，尽管抽签，别害怕，如果一旦老爷们回来了，他可以说，是人家发命令叫他要土地的。到时候文策尔可以对老爷说，他没办法拒绝，因为共产党逼得他去要土地！那他就没事了。在场的许多人说这话有道理，去抽签好了，不要怕，因为是上面发命令叫他们要的。到时候不光文策尔，他们也可以这样说，既然是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领了土地，并且还种上了。我知道我们庄稼人的想法。‘那么，请这么写，’我对老师说。这老师去年死了，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这么写：我是丘科什·楚哈·安德拉斯，伯爵庄园的雇农。我除一身贫穷和六个孩子以外一无所有。现在根据自己意志，从庄园中为自己以及为六个孩子割去八霍尔特土地。我自己从小受苦直到现在，所以有权得到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永不交回。只要我不死，即使上帝也不能从我手中夺走。’

“老师就照我说的记了下来，还读了一遍给我听。我那时对这个该死的文策尔说：‘听见了没有，你这个笨蛋！’老师写好以后，我对他说，请你给我，让我来签上名字。别的我不会写，名字还是会写的。您要是有工夫，可以到这位老师的家去看看，他的老伴还在。这份东西老师把它装在玻璃框里了，挂在墙上。我说，就让它挂着，因为虽然有人不喜欢，可我说的是实话。”

他装上烟斗，在手里玩了一会儿，说：

“当宣传队来的时候我让他们到老师的老伴那里去看看，看我的名字上面写的什么。一九四九年我是那么说的，整个五十年代我也是这个态度，六十年代他们来了一群人想说服我，我也没有变。他们跟我说了七天七夜，轮着班，因为否则他们就累倒了。我打发他们到老师家去看看那张纸，然后再来和我谈。我对他们说，小时候，谁给别人东西，完了又要回去，我们把这种人叫做吉卜赛人，有句儿歌叫做‘吉卜赛人送礼，后悔一辈子’。某个孩子如果这样，我们就唱这个歌。这孩子往往不好意思得一天不敢再出来玩。这八个霍尔特土地，就是我们当年过穷日子，我父母的以及他们父母做雇农的穷日子和我所有一切苦难的报偿。我们已经等了一千年。一千年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天不在希望脚下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一千年以来等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弄这一块土地，一千年来就是靠这个希望挺过来的。现在终于有了。我分得了八霍尔特，在我的这一代，这个日子到来了。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有过多少丘科什·楚哈，他们受

苦，关监牢，掉脑袋，就是为了我这个丘科什·楚哈分得这一块土地。现在总算有了，从我的手里谁也休想夺走。不，就象当年我请那位老师写的那样，就象我那时为了给别人做榜样时候说的那样。即使是上帝，也只有让我死了才能从我手里把这块地拿走。这块地就被叫做了‘楚哈地’，至少我活着的时候不会变。”

他沉默了，向空中挥了挥手，然后低声说：

“不过我的日子也不长了，……就象狗等肉骨头样，快了。”

“在这一片还有多少个体户？”

“在这一片，一个也没有了。在整个区有人说一共有九户，过去都是雇农，听说只有一户过去自己有点土地……我们就是这几户！”

“您的孩子们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都分散了。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没人管这块地。有的说，爸爸，您不再买一点，扩大扩大‘楚哈地’？他们倒不是生我的气，不过回家的时候老是这么说。有一个在部队当了少校，说得次数最多，一来就笑我：您们也应该加强团结，‘您们九户为什么不搞个组织，开创历史？’我拿他怎么办？也不能生他的气。他不懂这个，他永远不会懂。他不会懂得：一个人春天到地里，到自己的地里，是什么滋味……他是永远也不会懂的。他们这些人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他拿出火柴，擦着了，在烟斗上转来转去，每吸一口，面

颊就凹进去一下。点着烟斗，放在嘴里叼着。他的脸宽宽的，显得很健康，精力充沛，布满了硬硬的皱纹，棕黄的脸皮，就象土地的颜色一样，只是在额头上部有一条淡色的窄条，是戴帽子留下的痕迹，因为这里从来晒不到太阳。宽宽的肩膀，动作稳健而有力——他就这样把火柴放到桌上。

"您还记得上星期我们在凯梅特·比斯图那里喝酒吗？"

"怎么不记得！"

"可是您知不知道，好久以来我那次是第一次出门。除去走亲戚、孩子命名和看病人，一年来这是头一次。这一次也只是为了尤什卡才去的。他亲自来约我，这使我特别高兴。还有，当然，比斯图的酒好。还有，说老实话，我也是特别想见见人。"

"这我不明白。这里的人都对您挺好，也尊敬您。"

"话是这么说，可就是人家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好。"

他抬起头。脸上露出柔和、安详而爽朗的微笑。他静静地、慢慢地说着：

"就象我说的那样！起初他们来看看我，是出于好奇。那时候他们还知道问什么：麦子打下多少，玉米收成怎样，想看看谁好一点，是他们还是我？来对比一下，如果他们不入社，那么自己今年可能怎么样。我对他们说什么？今年小麦收成不错，可是玉米比他们差。明年，小麦、玉米都不如他们，可是后年我的小麦又比他们多了……这样谈不了几年。谈一年可以，两年也可以，但是再谈这就不行了，他

们在想别的事了——今年有没有机器？区里会不会拨下来？谁当队长，谁下台？种不种矮果树？苗会不会给兔啃了？果园是不是要围起来？有没有铁丝网？等等。如果我在场，他们就看看我，我知道，和他们在一起有点碍事。为什么碍事？因为他们要找我插得上嘴的事谈一谈，那么……这样很困难。于是他们又问：我的麦子收了多少？其实收麦子的时候他们早问过了。恐怕还有别的东西碍事。早一些时候他们也说，宁可让水淹了，也不要搞合作化。那时他们是和我一起骂的，可是现在……他们入社了，入社有了入社的问题，那么在我面前说这好吗？全村是一个世界，我自己和他们不是一回事。他们不愿意伤害我，总是小心避免，哪怕有一句话让我听了不舒服，他们也不说。许多事情可以很小心，但是讲话总是难免碰撞。既然那样，我何必成为人家的累赘，为什么让人家不方便，干吗让人家连讲话也受限制？”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双臂支在腿上，两只手在膝盖中间摆来摆去。

“这块楚哈地就象我自己这个人！”

他看着我继续说：

“我孤家寡人了。我常自己对自己说——因为我老这样在想：我孤家寡人了。”

他看着桌面，慢慢低下头。已经相当白的细细的头发垂下在前额。就这么沉默着。突然他一扬头：

“好！那么请跟我来！”

我站起身来，他搂住我的肩膀，带到门前，用烟斗指了指对面的房子。两所房子中间隔着各自的院子和大路。篱笆旁边是桑树，树枝已经伸出篱笆以外去了。他用烟斗指了指：

“嗯……那天我就站在这门槛上，看瓦尔加他们到哪里去？后来我看见他们推门进了科奇什·本雅明家去了，他们看不见我——要是不回头，那是看不见我的——我就往前走了走，直到这棵桑树下面，那里的事既看得到，也听得见了。那时我很紧张，因为我了解本雅明的脾气，他这人是不会象我这样逆来顺受的。在那以前我们家就被翻了个底朝天，跟我说话就象是审犯人似的。我还没走到树底下，就听到背后有人，是村前的瓦尔尤·拉斯洛。您知道，那时候，在路的这边，我的房子是全村最后一家。‘出什么事了？’他悄悄地问我。他只穿条裤衩，大概听到刚才瓦尔加到我家来了，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对他说，‘拉斯洛，你赶紧穿件衣服，跑到农场告诉尤什卡去，叫他快来，越快越好，这里要出事！如果他问什么事，你就说瓦尔加在折腾！’

“瓦尔加·拉斯洛马上走了，我站在树荫底下。那天月亮很亮，我就在树荫下看那面的事。只听见瓦尔加用冲锋枪敲科奇什·本雅明的门：‘开门！’瓦尔加喊道。在我家也是这么敲来着，敲了一刻钟，我只好起床开门去了。”

“他们几个人？”

“两个！这个瓦尔加和一个警察，叫舒巴，他不是本地人，您不会认识他。人们说当瓦尔加从林子里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警察也和他们在一起，但他听了尤什卡的话自己回家睡觉去了，没跟他们在一起。瓦尔加敲着门，我就在这边听着。”

“是谁？”本雅明喊，好象同时也就打开了门，因为声音听得很清楚。

“是你们没想到的人！”是瓦尔加的声音。

“你想干什么？”

“让我们进去，回头你就会知道。”

“半夜三更把人吵起来干什么？你给我回去，夜里是睡觉的时候！”本雅明说。

“闭嘴，让开！你们本来是等圣诞老人夜里到这里来的，对吗？走开，别挡路……”

“我问你，你来干什么？半夜把人家吵起来是为什么？”

可以听得见瓦尔加推枪栓的声音。

“你们的好日子过完了。你们本来以为永远见不到我们了，对吗？现在你们该学会什么叫秩序了，混帐东西！躲开，要不我就开枪了！”

在我家也是这样干的，一丝不差！全村挨家挨户走一遍。他说，要教训教训大家，他瓦尔加又来了。枪放在哪里？我徒然向他解释，我没有枪，他就是不相信。就那么扯着嗓子喊，说他要我尝尝向共产党开枪是什么滋味。你们没有一个好人，他就这么喊，没法和他说话。

听得出来，本雅明已经开始发火，有点按捺不住了，

他说：

“听着，瓦尔加·山多尔！从前你不是个好长工，也没有当过好人。你是个疯子，就这么回事！你给我回家去，好好睡觉……”

“你让开，我命令你！”

“你最好到林子里给猫头鹰下命令，我不理你！”本雅明说着就关上了门。

于是瓦尔加喊道：

“开门！我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你！”

一面说，一面也就开了枪。他朝门，朝他觉得本雅明站在门后的地方，从上到下斜地扫射了两次。有点象拖拉机喷烟时的声音一样。我连火光也看见了。

接着，顿时没声音了。枪声在我耳边刚响完，传来了本雅明妻子的哭声：“本尼！本尼！”

这混蛋，把本雅明杀了！我穿过大路跑进他们的院子。

“站住！”瓦尔加喝道。

但是别的人也跨过篱笆过去了。他们也都听得一清二楚，也听见了瓦尔加对我喊叫。可是人们都到了。瓦尔加在这里纵然是支部书记，可是大家都恨他！我也恨他，但人家手中有枪，而且他这人不正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开枪，所以得抓住他的手，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他干什么。我们得教训他几次才够啊？

“回去！”他嚷着，举着枪对着我。

“你干了什么，这个混帐东西！？”我喊。

他就象发狂一样地贼叫：

"回去！小心我也给你教训！"

"你干了什么了，这个混帐东西！"

本雅明的妻子一直在屋里哭，号叫着，喊着她男人的名字：

"本尼，本尼，本尼！"

不少人跑到门边了，头一个是尤哈斯·安德拉斯大叔。

"开门，好孩子，开门！"老人站在门边说。瓦尔加还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这时人越来越多了。

"他妈的，朝共产党员开枪，你们想反天？看，谁敢。这只是开始，别的以后让你们尝尝！"

他就那么捏着枪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快去叫大夫！"尤哈斯大叔说。说着站了起来，转身对瓦尔加说：

"你把他杀了，山多尔！"

大叔又转身向别人：

"死了，被他打死了！"

"回头你们也会跟着他走的！我本来就是你们的主人，但是你们忘记了！没关系，你们重新又会记住的！"

这时候尤什卡来了，瓦尔尤·拉斯洛跟在后面，两人都跑着，尤什卡脚上套了双靴子，穿着大衣，但是里面什么也没穿，只有一条裤衩，他们跑进院子，这时候尤哈斯大叔走过去说：

"尤什卡，他把本尼杀死了……"

尤什卡跑到本雅明那里，在旁边蹲下。

“本尼，”他说，“本尼，你听见了吗？”

可是本尼已经死了，一点气也没有了，浑身都是血，躺在门槛旁边。

我告诉您：尤什卡我是看他生下来，看着他长大成人的。还当是孩子的时候，发起火来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怕他三分。可现在，好象都不是他了。他也不喊本尼的名字，就那么蹲着，蹲在本尼旁边。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一声不响，哪里也不看，就只盯着本雅明的脸。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也象他那样蹲着——我干吗蹲着，自己也不明白，而这个尤什卡就象石头一样。他从来也不是这样的。无论什么事，什么情况，他总是知道该做什么，而且是立刻就做。可是现在，他好象没有气了，象是也死了。他的脸象是冻僵了，纹丝不动。我就在他边上，手里拿着电灯，那是我从里面接出来的，我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他动了，把电灯拿到手里，照着本尼，然后把本雅明的头转向自己那边，象是把睡着的孩子的脑袋正一正一样。然后他站了起来，脱下大衣，慢慢慢地、稳稳当当，这样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把大衣盖在本雅明身上，站了起来，转身向院子走去。尤哈斯·安德拉斯大叔站在那里。他向大叔说：“大叔，请您让一让！”他说话的声音那么小，几乎听不见，而且也不象是他的声音了，变了。在门槛上他停了一停，看着瓦尔加。那天晚上月亮很亮，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着瓦尔加，从门槛上走下来，向瓦尔加走去，尤什卡平日动作很快，您也

知道。但是如果您那时在场，您恐怕也认不出这是他了。他慢慢地向瓦尔加走去。我们都看着：要发生什么事？他向瓦尔加走去，当走到一半的时候，瓦尔加说话了：

“别发疯，尤什卡！”但他的声音也小极了。

看起来瓦尔加比我们大家都更了解他；他们是在一起当长工的，尤什卡、本雅明和瓦尔加，他们互相比谁都了解！

“你别糊涂，尤什卡！”瓦尔加说着把枪口转向了他。

他还是一步一步地过去，就象刚才那样，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也还是慢慢地、一点也不加快。上帝保佑我，别有一天他也这么朝我走过来……

“回去，你听着……”瓦尔加说。可是尤什卡还是一步一步地过去，好象什么也没听见！

“回去，我要开枪了！”

但那时候他已经走到瓦尔加身边了。刚才他不动声色，可这片刻突然全变了。只见他提起一脚，瓦尔加就摔倒在地了。

以后就没有什么事了！他就象对付狗一样地打瓦尔加！用靴子拚命踢瓦尔加的脑袋，就象疯了似的，就象狗一样地呜噜呜噜哼哼着。他把瓦尔加举起来，天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举到自己头上，又摔在地上，再踢，又再举起来！尤哈斯·安德拉斯大叔怎么也拉不住。我们大家一起都几乎拉不住他。“尤什卡，你松手！”我们只会这么说，可他就只会象只狗一样呜噜呜噜，他好象完全疯了。当我们

松开手的时候他就象瘫了似地倒下了，就象一块抹布一样。先是跪倒，后来向前趴下，跟狗在河边喝水一模一样。他就这么跪着，脑袋几乎要钻到地里去。而瓦尔加的脑袋上就象小溪一样地淌着血……

尤什卡就那么在地上哼哼，象一只狗，哼哼着……

## 十五

九点钟

“您几点钟上床？”

“这不取决于我，可惜……大概总要到半夜一点钟，如果有事，可能要两点钟。”

“那您妻子有没有意见？”

“习惯了……结婚的时候我就这样了，她知道谁当她的丈夫，她就得去适应……”

“不容易。”

“当司机的妻子确实不容易。”

前面是公路和铁路的交叉点，他减低速度四周看了看，又加大油门，越过了轨道。

“有孩子吗？”

“感谢上帝，有两个。一男一女。现在快生第三个了。”

“原来就是这样计划的吗？”

“是。早就是这样打算的。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将来最好有三个孩子——真正的家庭总得有三个孩

子！”

“有道理……经济状况怎么样？”

“您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不喝酒，不乱花钱，我妻子一直是工作的，也有收入。生了第三个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让她再工作。有了三个孩子，家务事恐怕太多了。她本来是农村的，学了速记和打字，家里所有的事她一个人都包了。我们有个小院子，现在还养着一只老母猪，这几天就要下崽了。我们自己留两只，其余的打算在二、三月份卖掉。她每年都这样，这样就有钱做衣服或用在别的花消上。养鸡也有收入，她在这方面也有一套。常常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过来告诉我又存了五百福林‘私房钱’，她就这么说的……”

“这样的妻子真是金不换……”

“我可以告诉您，对我说来，世界上没有比她更珍贵的了。我虽然只有三十四岁，可是看看眼下的这些年轻人，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活着？在一起混上一年半载，不要孩子，为的是可以多些钱来胡闹，他们把这叫‘及时行乐’。后来就分手了，散伙了，就象换一件衣服或者一双袜子似的。这些人真是不幸，然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有多么不幸！……哼！要是我有权的话，我就对不起，打个粗比喻——我就不允许他们象扔掉烟头似的刮掉孩子。这算什么法律？这种法律对谁有好处？从前，谁哪怕有十个孩子，哪怕穷得精光，也不许去搞人工流产。可现在，随便得很，只要到街上一转，全解决了，到医院动一下手术就象上厕所

一样方便。……这算什么？如果这不叫自私，那什么叫自私？您信不信？他们就那么想：管他什么世界，管他什么道德，只要能'及时行乐'就行！就这么回事！这算什么，'按照新的道德标准去教育人们'？如果这叫做社会主义道德，那么我就算该绞死的疯子，否则制定这条法律的人就是疯子！"

"高明！"

"如果我有权，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成人了？要结婚了？那么就用成人应该遵守的标准去约束自己的行动，要学会对家庭负责任！要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懂得：你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样，当你考虑别的问题的时候，情况也就不一样了。肯定不一样！象现在这样可不行！"

"您说得完全对……"

"我为什么说这些？因为有些事和大的政治问题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看一看这些事，不免就会产生问题：我们是朝什么方向教育人……我承认，自己不懂政治，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人们在议论什么……"

我们都点了支烟。

"您在区里多久了？"

"十年——还有四年！"

"那一共十四年……"

"不，是七年……"他笑起来。

"这是什么闷葫芦？"

"您最好去问问红十字会书记马特同志……"

"不能说得简单些?"

"当然可以……今天下午我正好又想这事,我开车送屈勒什同志到那位里莫齐那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他,但肯定和马特有关系。因为书记先找的他,讲话里老是说到里莫齐。后来马特下车了,屈勒什同志叫我开到里莫齐家去,其实本来是没有这计划的,而且他住得又远,有四十公里……这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差一点对书记说,请他最好另外找司机到那里去,为了马特的事,我谁也不愿意拉。肯定是为了马特上大学的事去找里莫齐的。我可以告诉您我和这位马特,就是现在的红十字会书记有过什么事……"

他哈哈地笑着,看了我一眼:

"真有意思,红十字会书记。见鬼!"

"这工作不坏。"

"敢情不坏!谁说坏了?"他又笑起来。"是不坏,而且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当然了。不过难道我们工作不这样?几个人的命在我手里!有时一次就六个……当然和马特的没法比,红十字会在他手里,至少管四万人。一点不错,见鬼!"

他满脸是顽皮的笑容。

"我和这位马特就有过一件事……"

"就是这位管红十字会的?"

"就是他!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早先在这里当书记——就是当区委书记,后来又到别地方当书记去了。我那时候

也是当司机，总是我给他开车。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了，那是春天，我那时候已经给他开了两个月车了。有一天我去上班，人家告诉我，其实是悄悄对我说——真有意思，那时候每个人说话都是悄悄的——马特同志被撤职了。我说，不可能！人家说，'是真的，可别告诉别人。'那时候就那么古怪，谁都说什么事也别告诉别人，可是谁什么事都知道。反正马特同志被撤职了，我猜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老兄怎么了？我给他开了两个月的车，怎么也看不出这人还能出什么事。……究竟什么事。过了几天我搞明白了。原来是那位书记，就是接替他当书记的那个新书记向上级汇报说前任书记，就是这个马特，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作为区委书记，居然在小资产阶级圈子里鬼混。'比这个罪名大的恐怕只有帝国主义代理人了，'区委里的工作人员这么告诉我。'不可能，'我说，'我了解他，我跟他走来走去，说别的我相信，可是说他出了这个问题，我不相信！'您知道，凡是我们了解一个人，你对他就会有看法，当别人说他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得对不对。对一个人，每人都应该有看法，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就这样，不管怎么说，他被撤职了。不过暂时没有事，他只是不到区委来了，不过问任何事，就这么在家等着。那时候他住在城里，妻子生着病，孩子住校。所以只好自己上街买菜。人们都躲着他，象是见到麻疯病人似的。您当然记得，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挺着腰杆过了几天，好象满不在乎。可是后来出门就溜墙根走了，宁可到天黑时出门，就是说精神垮了，真可怜。后

来有一次州里负责干部的人到区里来，我对他说我怎么也不相信马特同志会有问题。这负责人问我，马特常到哪里去？'就干工作，'我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事可以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或别的什么事！'我说，'马特同志不象小资产阶级，如果是的话，总有地方看得出来，'我说，'最好再去查一查报告，我看他不象这方面的人。'我说的话这个人不爱听，可是我不说真话说什么？我想，说真话才是帮助党。有一天我去看他。因为我不愿意象别人那样把他看作麻疯病人，我到了他家门口，他让我进去。我跟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一定是什么人把事情搞错了。深信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到头来一切都会解决。问题解决以前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尽管说好了。其实我知道帮不了他什么忙，但我的本意是想让他得到一点安慰，让他感到尽管在审查他什么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躲着他。看得出来，我去看他，他很高兴，尽管当时那样的处境他很难堪，可那是没办法的事，碰上了嘛！原来他还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事被抹下来了。我跟他说，听说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他简直吃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说他小资产阶级？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后来弄明白了。原来马特喝上了咖啡。那是大夫建议的，每天至少喝两次。因为自己煮不好，所以每天上咖啡馆去喝，喝完后在那里坐一会儿，然后走回家或者上班。就这么回事。那位接他职务的新书记报告的就是这件事，说他喝咖啡，到小资产阶级圈子里鬼混……您记得那年代是

什么样的，对吗？”

“当然记得！”

“就是这么回事！审查了他三个星期，大整了他一顿，这倒楣家伙人也瘦了，面孔塌进去了。特别是当他还不知道究竟审查他什么事那几天最难受。后来事情过去了，通知他继续工作，云开雾散，雨过天晴，还是当他的区委书记。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除了他恐怕就是我最高兴了。我等着和他见面，高高兴兴地、热烈地握一握手，说一句——感谢老天，总算过去了。……可是您猜，后来怎么了？我被通知休假去了，等我休假回来的时候通知我调动工作，去给蔬菜公司经理开车。……我不明白，就去找马特，想和他谈谈。您猜怎么了？区党委里人们对我的那个态度就和几个星期以前对马特一样，只是哼哼哈哈地应酬几句。什么毛病？我干了什么事，弄得在区委不能工作，只好到蔬菜公司去？……不管我怎么问，没人对我说句明白话。我对自己说，找马特去！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就去了。我站在门口，他只好放我进去。您听，马特对我说了什么？他说，当他接受审查的时候，我的表现不符合党的原则。因为如果党组织审查一个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停止工作，那么一个好的党员就应该相信党，不应该和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发生任何联系。一字不差，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时我想我怎么办？啐他？我有家室，不是一个人，不能这样做，而且我是党员，不能啐区委书记，他是党安排做书记的。我什么也没说，也没打招呼，转身就走了。……但是人家从此就觉得我有点问题，就

是说我这人不干净。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到运输公司去了。这事还得感谢屈勒什同志，是他安排我到那里去的，因为到后来我连给蔬菜公司经理开车也不够格了。看来经理也听到了什么情况，虽然大概他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总而言之，我这个人不适合给他开车。”

“那时候屈勒什同志已经在区上了？”

“已经在……是区委里的一个普通干部。我去找他，他把我安排到运输公司去了。后来一九五八年他当了区委书记，便把我调回区委，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这里总共是七年……”

他打开车灯，把大路照得雪亮，躲开一辆拖拉机，看我一眼，又笑起来：

“真见鬼！”

“您笑什么？”

“我笑红十字会……可是您别误会，那是个大机关，责任重大。当然是这样，我没说这不是责任重大的机关……”

他微笑着在驾驶盘上俯下身子。

路边的树叶在灯光中显得婆娑有致，一只兔子横窜过亮得发白的大路。

停了一会儿他说：

“您猜，我对这整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严肃地说，“您想一想，关于一个人，我说了我心里想的实在话，结果得了这个报应，这对我说来意味着什么？我可以不可以说：管他全党在干什么，管他别人碰到什么，管他谁当书记哩！我仅

仅因为刚才说的那件事就被一脚踢出去，让我转了这么一圈，而谁也不告诉我究竟为了什么。一点罪过也没有，只不过因为我‘不干净’。谁也不管我究竟哪里‘不干净’，但反正‘不干净’。一个人不是长脚的政治小册子，他也有自己的感情，用我的话说是——还有他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就我而言，我只能凭自己的良心办事！结果就是这样！

他往后挪了挪身子：

“马上就到合作社了……”

## 十 六

十点钟

这是乌伊法鲁什的科苏特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合作社主任鲍科·伊斯特万向管委会汇报合作社的夏季生产情况及可望达到的收成，然后提出供管委会讨论的议程建议。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汇报，并同意会议议程。接着，鲍科主任请与会者发言。

屈勒什·亚诺什同志（区党委执委会书记）：同意鲍科主任关于本社今年收成较去年为佳的估计。本合作社今年的劳动组织情况有明显的改善，社员积极性增加，工分值肯定高于去年。然而应该指出，不应该有任何自满情绪。尽管单产产量提高，但是各项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

主任最引为自豪之处正好是缺陷所在，如玉米产量即为一例。

鲍科主任：与去年相比，每霍尔特玉米增产一点二到一点三公担，如此成绩可谓不差。

屈勒什书记：与去年相比产量固然有所增加，但关键在于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若以干籽粒计算，一九三〇年每霍尔特平均产量为六点八公担，一九五二年只有六点四公担。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则今年产量可谓不错，进展不小。即使与去年每霍尔特单产十二点四公担相比，今年预期可达十三公担半到十四公担，与全国平均产量相差无几，也相当说得过去。然而若与附近国营农场相比，该处土地大体与本社相似，但该处去年每霍尔特平均产量较本社高二点三到三公担。请主任和管委会考虑，此一情况是否发人深思。

纳吉·安德拉斯（管委会委员）：除个别社以外附近各社产量甚至不到平均十三公担。因此本社今年产量可谓差强人意。国营农场条件好，产量高不足为怪。

霍尔瓦特·尤若夫（生产合作社支部书记）：去年根据支部建议，本社曾派出一个八人小组前往国营农场交流经验。该处专家提出，用化学办法种植玉米产量高，省工。我们看到农场玉米地并未锄草，实际上往往四五步之内并无一棵杂草，其实同一地块已连续两年使用化学剂。以上情况全体成员均可证明。

屈勒什书记：本人当时也参加了这个经验交流会，并在

发言中建议生产合作社也使用化学剂，指出即使种植成本因此增加，但从根本上看仍是合算的。本人在各种场合曾多次强调此一看法，然而毫无反应。生产合作社中一般认为不宜推广此办法，主要理由是考虑到花钱过多，宁可用劳动力锄草，即使一年三次也在所不惜。

鲍科主任指出社员都不主张使用化学剂，领导也无法左右，只能按社员意志办事。

盖尔盖伊·伊姆雷农艺师：社员大会几乎通过决议，要求按人口分配三霍尔特自留地，并希望不要分玉米，而按工分付现金。社员往往看不到长远利益。

鲍科主任：社员中在三年前曾有人提出此一要求，但实际上后来已经认识到这样做对整个生产合作社不利。

乔莫什·加博尔(管委会委员)：用化学剂成本太高，而锄草则可用社员人力完成。既然不花钱也办事，何必费钱买化学剂去干？

屈勒什同志指出，这样考虑问题有很大缺点。为什么不能进行合理经营，用企业方式进行生产？乔莫什同志是否认为用化学剂费钱太多，而用人工锄地则不必费钱？

乔莫什·加博尔重申说他如此认为。

屈勒什同志：应该认识到，小土地经营者的想法是：只有自己没法完成的事才肯花钱。有时即使看到了优越性，比如用拖拉机耕地既快又好，但由于要花钱，宁可用自己的劳力。在小块地经营的时代，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但请乔莫什同志考虑：生产合作社锄一遍玉米需要多少人力，几天

才能完成？折合多少工分？工分值若干？折合成多少钱？而这笔钱合作社需要向社员支付，可见锄地并非是无偿的。

乔莫什·加博尔：实际情况是合作社因锄地所付的钱由社员收入，而没有流到合作社以外去。

屈勒什同志指出，这说法不能成立。用人力锄地，玉米每霍尔特去年收成平均十二公担，而如用化学除草剂，则每霍尔特可达十六到十八公担。即每霍尔特相差四到六公担。增产量全归社员收入，工分值将显著提高。就是说，到年终结算时，用化学剂后社员实际收入比用人力锄地要多。他重申应学会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农业的重要性，应按这一办法进行工作，考虑问题。用人力锄地，出工的人每人可得十公分，但公分值因而减低。要看到，社员的全部利益并不是当即可以放进口袋里的那点钱。举一例说明：本社本来可以用自己的种子播玉米，但结果还是买了杂交良种，因杂交良种产量高。在讨论这问题时并未有人反对，因为社员都看到这样做合算，书记问：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不要事事都要先吃一堑，然后才长一智？书记说，他自己从前也是在这里当雇农的，和这里的大部分社员一样。请大家回忆一下，连地主当时也听专家的话科学种地。

纳吉·安德拉斯(管委会委员)：早些年这事连讨论也没有基础，因为普遍认为玉米不锄就不能生长，因此对化学剂无人问津。但上次就化学剂进行表决时仅以九票之差被否决。可见人们虽然相当缓慢地，但毕竟正在接受先进的方

法。因此，工作中需要有耐心。

屈勒什同志认为：工作中需要耐心是没有问题的，但人们应该以较小代价认识到先进方法的优越性。过去穷困的原因在于必须对旧事物吃够亏，才能接受新事物。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既然有了现成的先进生产方法却不在自己的生产中推广，实在使人感到惋惜。

恰萨尔·伊姆雷（管委会委员）说，他本人和他儿子今年已得到五百多工分。他们属于合作社利益和个人利益完全一致这样的家庭。尽管如此，在有些问题上看法还是有分歧。即以化学剂一事为例，合作社为什么需要为化学药品付钱，为什么不能由国家无偿拨给？现在每个单位都向合作社要钱。国家建设工厂，但并不向将来在那个工厂工作的人要钱。国家建立厂房、安装机器、买来设备和工具，然后对工人说，一切就绪，你们可以来工作了，到时候你们领工资。现在大家都说，在匈牙利农业是第一位，看来确实如此。因为如果农民不生产，谁也没有吃的。没有农业就没有面包，没有肉，也没有牛奶，什么也没有。既然农业这么重要，要进行企业式管理，那么在用钱上也应和它的地位相称。而不是组织一个生产合作社，一切钱都要它自己掏。由于人们思想落后，组织合作社本来就困难，但还要它这里也掏钱，那里也付款。既然工人得到的是现成的工厂，那么农民为什么要自买机器和劳动工具？请你想一想，生产合作社哪里不花钱？哪里都要花钱！你要盖房子？用机器？用化肥和农药？那你交钱！不是企业式经营吗？那么请把

造工厂的钱给我们！至少先给农业两三年的钱，让我们造厂，让我们具备进行现代化的生产条件！

拜尔科·亚诺什（管委会委员）：应该说，给农业的贷款也是钱。国家给农业的钱肯定也是从别的地方挪过来的。由于发放了农贷，别的计划上用钱就要减少些，有些建设就没法搞了。农贷也是国家的钱。所以国家用在农业上的钱也是不少的。

恰萨尔·伊姆雷：农贷也好、信贷也好，到头来都要还。那些工分值还不到二十福林的绝大多数生产合作社怎么办？既然国家造工厂工人不付钱，生产合作社为什么要付钱买农业机器？工业为什么不能放慢速度，让农业得到较多的钱？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屈勒什同志：请问恰萨尔·伊姆雷，在本州有没有失业现象？

恰萨尔·伊姆雷表示对此不十分清楚，因为他只了解自己的那个村。不过他想，大概州里是没有失业现象了，因为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做，至少本生产合作社就是这样。

屈勒什同志：恰萨尔·伊姆雷说只了解自己的村子，同时不清楚全州是否尚有失业现象。而屈勒什同志则清楚：本州已经没有任何人失业，但指出，将来会有失业现象。请谁都不要吃惊！州领导了解，几年以后全州将要有一万五千至一万八千人失业，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问题在于：如果农业机械化按预定计划进行，即根据远景规划，生

产合作社就全部实现机械化，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劳动，即按机械化的企业以可能和应该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那么有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将出现近两万的失业人员。大家是否明白这点？农业机器将代替许多人进行劳动，化肥、除草剂将节省许多劳动力，运输机械化也将带来类似情况，施肥、收割等劳动的机械化也这样。过去六个人，十个或十五个劳动日的劳动量现在一台机器由一两个人操作用两三天即可完成。机器越多，地里所需要的人力就越少。根据计划，在不远的未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生产合作社的机械化。请问恰萨尔·伊姆雷同志，有几个孩子？有三个！三个孩子中有两个还在上小学。孩子大了怎么办？如果合作社要不了这许多劳动力，不能给村里的每个人都安排工作，那将发生什么情况？这两个孩子想当教员或者工程师？好，就这样。但如果当不了工程师，当不了教员，也当不了机关干部，也没有在村里当医生，那怎么办？

霍尔瓦特·尤若夫支书认为年轻人实际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都想将来在城里做事。

屈勒什同志请恰萨尔·伊姆雷回答：他刚才谈到的这些人怎么办？刚才提到没法在农业就业的近两万人怎么办？他可以告诉恰萨尔：可以在工业找到事情做。因为如果农业安排不了他们，那么就应该给他们创造别的就业机会，也就是在工业领域安排就业。就是说要进一步使国家工业化，在这个州里也同样要工业化。这样做当然不仅是为了这两万人，同时也是为了使国家能生产应有数量的工业品，

当然这个工业也就提供了就业机会。那么，国家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都给农业呢？如果认真地考虑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未来，那样做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应该把工业的基本建设停下来？请恰萨尔·伊姆雷回答？

恰萨尔表示一下子回答不了这问题，但他理解屈勒什同志的话。他表示虽然现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以后还是可以就此进行讨论的。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本社去年建成了配种场，今年新的牛舍落成。如果全部靠本社自己的力量，这些建设实际上无法实现，或者工分值将因此大大降低。由于得到了国家贷款，而且是长期的，这样，使工分值只降低了几个福林。更不谈到如果不发展工业则无法解决合作化所需要的机器供应了。可见其意义远远超出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失业问题。建议下面讨论果园问题。他本人建议扩大果园种植面积。去年和今年的情况充分说明种果园最能赢利，今年至少应扩大四十霍尔特。如果管委会同意，他计划相应把园艺组人力从眼下的十二人增加至二十五人。

科瓦奇·基什·拉约什（管委会委员）：同意扩大果园种植面积，但想了解在什么地方扩大果园？

恰萨尔·伊姆雷：果园最好连成一片，否则在管理上往来走动费时过多，同时浇灌方面也将发生困难。可以考虑将靠劳波什村的那块八十霍尔特玉米地中划出四十霍尔特种果园。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表示他本人也是这个想法，请大

家发表意见。

布尔库什·盖扎(管委会委员):这是否就是说,明年种植计划中玉米将减少四十霍尔特?如果这样做,他本人将投票反对。但不反对从小麦地中划出。总之,希望不要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因为社员需要每一粒玉米。去年各户所分玉米并不富裕,有些社员甚至颇感不足。

拜尔科·亚诺什表示如果划玉米地改果园,表决时他也将反对。

基什·尤若夫、安陶尔·彼得、纳吉·山姆、盖莱盖什·费伦茨等管委都表示不同意缩减玉米种植面积。

鲍科·伊斯特万认为有些人是在考虑自家副业的利益。所以坚持不同意减少玉米地。

拜尔科·亚诺什表示:确实如此。他本人也已经签订养猪合同。如果他完成饲养计划,也符合国家利益,而养猪需要玉米做饲料。

恰萨尔·伊姆雷表示他也签订有养猪合同,但他认为个人利益应与集体利益——即合作社的利益互相协调。既然是集体经营,则应优先集体,因为如果扩大果园面积,工分值将相应增加。

科奇·盖尔松(管委会委员):没有人反对扩大果园,问题在于缩小何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据他的看法,区里不可能批准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尽管他本人也需要玉米。

盖尔盖伊·伊姆雷农艺师:某种作物的产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种植面积。前面所说的四十霍尔特土地按过去平均

产量计算生产玉米五百到六百公担。但应力求做到即使缩小土地也能增加产量。建议管委会表决通过用化学剂在玉米地除草，并提交社员大会通过。如此，即使减少四十霍尔特种植面积，总产量也不会降低。这样做是合理的。因此不应单纯考虑土地的数量，主要是应该考虑它的产量。

恰萨尔·伊姆雷表示他去年即已投票同意使用化学剂，同意盖尔盖伊·伊姆雷的意见。应该采用新方法，并加以推广。

盖尔盖伊·伊姆雷农艺师表示：如果管委会批准买化学剂，他本人保证玉米产量不下降。

霍尔瓦特·尤若夫支书：请在座诸位根据是否继续以旧的方式考虑问题、经营合作社，还是采用新方法这一基础进行表决。土地的数量并不是一切，每人都需要认识到这点。要勇于学新的事物。别的地方已经成功的经验，如果推广得当的话，这里也不会起坏作用，合作社应该在较小面积生产更多的玉米才是正确的方向。

屈勒什同志表示他本人了解全区情况，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曾经计算过全国各区生产若干粮食才能满足国家收购计划，本区也有自己的指标。

拜尔科·亚诺什问：是谁计算的？是怎样计算出每人应该让国家收购多少？

屈勒什同志：是专家计算出来的，是真正懂行的专家计算出来的。先是高级机关在布达佩斯算出下一年全国需要

粮食若干——国家加工若干、群众消费若干。专家们计算出各方面不断的发展逐年对粮食增加多少需要，即下一年比当年要多若干。当他们算出这个数字以后就下达给各州。这个州应该生产多少，那个州要生产多少才能保证全国的需要。我们的州也就分到自己的一分。州然后下达到各个区，我们便据此下达到各个生产合作社。这个数量必需保证，不错，家庭副业需要玉米，但国家需要面包。而国家的利益是第一位。

纳吉·山姆(管委会委员)表示他认识到国家利益应该列第一位。他本人是第一批入社的社员，自从合作社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劳动，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请问区委书记：建社章程既然规定，按照民主办社原则，合作社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决定行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任何人无权过问。那么为什么区里对合作社的计划可以干预、进行修改，甚至不予批准？这算什么民主办社？他承认区委书记说得有道理，但既然如此，何必不从合作社章程中取消合作社事务他人不得过问这一条？

屈勒什同志承认章程中确实有这一条。如果大家坚持，他可以不就玉米和粮食的产量发表意见……但他问主任，本社是否提出了购买“泽多尔”牌拖拉机的申请？据本人所知，业已提出。

恰萨尔·伊姆雷：合作社就象人需要面包一样地需要机器。

屈勒什同志表示他相信生产合作社象人需要面包一样

地需要机器，但是国家和城市人口也象需要面包一样地需要粮食。如果上面请他考虑把拖拉机先拨给哪一个合作社（因为提出申请的合作社很多），那么他将会表示不要给本社。生产合作社根据章程确实有权利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象纳吉·山姆所说的那样。而他本人也可以决定把机器拨给哪一个合作社，因为这是他的职权，至少他可以这样发表看法。因为如果说生产合作社迫切需要机器，那么国家需要粮食的程度也不亚于此。如果说粮食可以变成面包，那么面包也可以变为机器。他认为问题可以这么看。

纳吉·山姆认为不能这么看。因为这是做买卖，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法。

屈勒什同志：可是把自留地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那也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做法。请问农艺师，如果管委会通过使用化学剂，他是否可以保证玉米产量？

盖尔盖伊：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提出书面保证。

恰萨尔·伊姆雷、莫尔纳尔·尤若夫、基什·巴尔代表各该生产队表示如果管委会决定，各队都保证产量。

恰萨尔·伊姆雷：通过讨论表明：对全社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有利，这是今后考虑问题的方向。有时如果讨论没有结果，也不要紧，到头来正确的事物终将胜利。他相信使用化学剂可以把不足的玉米补上。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请管委会对此事进行考虑，并提交社员大会通过。下一项议程为：管委会委员赛凯尔·亚

诺什提出辞职。主任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就他本人而言，建议管委会不同意赛凯尔辞职，并希望他本人撤回辞呈，因此举显系一时激怒所致，主任认为流言蜚语不必介意。个别人信口开河，并不代表广大社员看法。但管委会应引起警惕，不要使某些不负责任、不以全局为重的人造成混乱。

安陶尔·彼得(管委会委员)：不同意主任认为个别人的意见可不予理睬的看法。实际上此类人虽然不多，却也不少。他们说过去的富裕农民① 最后才参加合作社，是吃现成饭，因此没有资格参加领导。本人即多次听到此类议论。如屈勒什·拜尔道朗前不久在一次作物收割时就发表过此种看法，说什么现在是从前雇穷人的有钱人当领导，向社员发号施令。发表这种看法的人破坏合作社的团结，应该对他们加强教育，而不要听任熟悉农活、又有经验的正派人，由于这种不三不四的话放弃领导工作。本人没有当过雇农，因为过去有土地，但不能算富裕农民，因为当年土地很少。现在发表的都是实在话，不倒向任何一边，不偏袒谁，主要是看合作社的利益。

纳吉·山姆表示，从前自己也在富裕农民和中农那里当过雇农，给赛凯尔也当过。不过那是从前的事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过多想没有什么意义。本人对屈勒什·拜尔道朗就说过：这种话影响不好，到头来吃亏的是整个合作

① 通常指上中农。

社。现在大家都在一个整体里，大家给合作社出多少力，就可以相应地得到好处。

拜尔科·亚诺什认为问题不在于屈勒什·拜尔道朗好象在挑起一部分人特别是土改时分到地的那些人的不满。问题在于许多富裕农民和中农确实是最后入社的，虽然从纸面上看他们也是社员，可是实际上直到现在还是不干集体活，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条件。有的甚至以此为荣，说什么他们光靠自己就够了，不用靠合作社。他们当然有条件，因为他们有存款，他们入社的时候，社里把牲口、工具都折成现钱给了他们。他们可和别人订各种合同赚钱，因为他们也分得了自留地，所以他们不稀罕工分。他们只要看别人干活就够了，用不到关心集体。

布尔库什·盖扎：拜尔科说的是实际情况，但是说这些让人不痛快的话，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尽管有的富裕农民确实是最后入社的，可是他们积极工作，对集体全心全意，为什么还要老是挂在嘴上？只要积极工作，谁也没有理由议论他们，何况过去吃苦的人中间现在不爱干活的人也不是没有。

拜尔科·亚诺什说：这些人机灵。有的活工分多他们就来，为的是挣到足够的工分以后就有权利搞自留地了。他们只挑工分多的活干，而别人却什么活都得干。在那次收割和脱粒的时候自己就发表过意见：那些小活不爱干的人这些工分多的活也不让他们干，应该让挑肥捡瘦的人知道：谁想要投机，自留地就搞不成。可是结果那些人还是都去收

割和脱粒去了，工分也挣够了。今天在会上也不隐讳这点：这是赛凯尔·亚诺什干的事，因为那工作他负责，他怎么决定就只好怎么干。

赛凯尔·亚诺什(管委会委员)：只想说明一点。请大家回忆：上次收割和脱粒的整个一星期中是不是一直有可能要下雨。如果这工作当时是拜尔科·亚诺什负责，他可能怎么做？为了粮食及时上垛，及时脱粒，他有别的好办法没有？赛凯尔本人认为，如果当时伯爵要来劳动，他也是会同意的，为的是粮食不受损失。所以那些愿意来的人他都同意了，而且还打发人通知上面提到的一些人来劳动。请问拜尔科·亚诺什或者屈勒什·拜尔道朗，如果合作社粮食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当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本人是中农，也是最后入社的，在当个体农民时也从来没糟蹋过一粒粮食。现在也是以负责的精神，象过去那样工作。所以当时作出决定的时候并非是为了自己同一类人的利益。重申辞去管委会委员职务，他本人并不稀罕这职务，只要有一双手，就能干活，就能养活自己。

布尔库什·盖扎认为赛凯尔·亚诺什说的有理。从前自己也给他当过雇农，谁都承认，全村没有一个人比他能干。只要看看他的院子就行了，谁都一清二楚，他那里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另一部分人的意见也有道理，但是这些人对事情不加区别。本人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双方都有道理：上星期有一部分人到派莱盖地块去割草，有个过去的中农，(如果诸位想听，他可以说出这人的姓名来) 坐在树荫下乘

凉，看着大伙扛着镰刀去干活，就朝他们发笑。同时过去的雇农中也有人，几个星期不露面，不参加劳动。所以事实是什么人都有，不在你过去是什么。本人认为如果有人只是吃积蓄，不干活，他肯定是个精神病；因为吃亏的不是合作社，而是他自己。不错，现在积极劳动，为的是集体越来越好，从这方面看，我们替这些人流了汗，但要不了多久，他们也会认识到这点的。从来没有吃不完的积蓄，积蓄再多，也有吃完的时候。

拜尔科·亚诺什表示他不愿为某些人将来坐享其成而现在积极劳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流汗，他们看到我们干活，讥笑我们。到一切都好起来，他们就来享受，就象布谷鸟占别人的窝一样。

恰萨尔·伊姆雷说，他也和拜尔科·亚诺什一样是第一批入社的，那时一共二十二户，刚开头时连这点也没有。请拜尔科回忆一下，当时大家是怎么说的！当时说，没关系，我们先把困难承担起来，总有一天全村都会进来的。我们承担了困难，同时也听了不少挖苦话。现在，果然全村都入社了，就象当年盼望的那样。当年肯挑重担的，怎么现在反而在小事情上纠缠呢？就他本人来说，对赛凯尔·亚诺什没意见，对别的人也没意见，只对不爱劳动的人有意见，而这些人当中既有过去的穷光蛋，也有过去的富裕农民。至于自己，要是能象赛凯尔·亚诺什那样擅于种地，那就谢天谢地了。他本人在赛凯尔领导下劳动，没意见，因为无论是农活还是为人之道，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霍尔瓦特·尤若夫支书：当年带头就是为了全村都能跟我们走，参加到合作社里来。现在既然都在社，那么全村的人在领导中都有代表就是合情合理的事。当年不就是这个目标吗？赛凯尔·亚诺什可以不要计较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管是屈勒什·拜尔道朗说的，还是别的什么人说的。

屈勒什区委书记对正好是他的哥哥说了那些话表示遗憾。他说赛凯尔·亚诺什想必知道，拜尔道朗性情急躁，脾气爽快。他本人早已对哥哥说过：如果他在过去的雇农和过去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社员中间制造纠纷，那么不待社里的党组织采取措施，书记本人就将要求把他交纪律委员会处理。当然，并不是每个富裕农民都表现得和赛凯尔·亚诺什那么好。到现在还有人说不愿到社里在那些脏雇农的手下干活，宁可吃积蓄。这是些什么人？肯定，他们不是聪明人。好在这些人不多，而且越来越少。事实是恰萨尔·伊姆雷现在在赛凯尔·亚诺什领导下工作。去年一年，今年一夏都在他手下，而赛凯尔·亚诺什则是在鲍科·伊斯特万领导下工作，鲍科·伊斯特万从前在赛凯尔·亚诺什家当过雇工。但是他们都配合得很好。

鲍科·伊斯特万、恰萨尔·伊姆雷、赛凯尔·亚诺什一致表示：是这样。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请赛凯尔·亚诺什考虑全社利益，不要计较流言蜚语，撤回辞呈。

恰萨尔·伊姆雷要求区委书记再和他的哥哥谈一次，

因为如果拜尔道朗不改变，恰萨尔作为纪律委员会书记将要过问此事。建议管委会就赛凯尔·亚诺什辞职一事进行表决。

表决后鲍科·伊斯特万主任宣布：除拜尔科·亚诺什一票外，管委会其他成员全都不同意赛凯尔·亚诺什辞职。建议进行下一项议程：讨论向区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赛格泰尔基附近一段公路进行修理一事给予支援。

霍尔瓦特·尤若夫支书：修理此段公路约需款二十万福林。如国家筑路队能在秋耕开始前着手，则合作社就可出约值六万福林的义务劳动工。如合作社领导能保证此举实现，则预计修路工程进展可大为加快，国家筑路队亦可提早列入计划，否则将旷日持久地等待。

拜尔科·亚诺什建议在得到区政府关于国家筑路队的具体答复前，合作社不进行实质性讨论。他建议：如果有可能，生产合作社争取尽量不出义务工，因为社里反正总有活可做。不是非承担不可的义务就不要承担。和区政府交涉时开始最好别提本社可出义务工。如果交涉不通，再提出合作社可承担一部分。

鲍科·伊斯特万、恰萨尔·伊姆雷、布尔库什·盖扎、纳吉·山姆一致认为可按拜尔科·亚诺什的意见办，并请区委书记不要透露今日会议的讨论情况。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下面讨论整治土壤问题。社员中近来关于这问题议论很多，请管委会认真考虑。罗卡地块不断受到河水的侵蚀，大约有一百一十霍尔特耕地受到威

胁，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则大路以南大片土地都将受到破坏。现在许多地方拖拉机已经无法作业。

盖尔盖伊·伊姆雷农艺师：请管委会认真考虑，因此项工程绝非儿戏，既费工又费钱，而且不能向国家贷款，要由合作社自力完成。上星期请了农业局的一位工程师来，仔细考察了三天，该工程师认为可以采取措施，但费用很可观。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如果合作社需要自己出钱动工，明年的工分值将受到影响。但这牵涉到一百一十霍尔特大块土地，同时如果不及时解决，河下游的另外一百霍尔特耕地也将受影响。现在的情况是要根治，就得我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但受益的首先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以后的人。可是即使如此，本人还是认为应加以根治，不能眼看土地毁坏。

拜尔科·亚诺什认为对此事不宜轻率作出决定。因此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掏钱更糟糕的事情了。请问全部开支约需若干？

鲍科·伊斯特万：不可能少于二十万福林，但从长远看将来可以受益。所以牵涉到的问题是未来和土地，是和我们子孙后代息息相关。

布尔库什·盖扎认为拜尔科说得对，付钱谁也不情愿，因为钱是流汗得来的，而且这钱在自留地上也有用。

科奇·盖尔松：鉴于没人发言，建议讨论下一议程，在讨论过程中还可以继续考虑。说到家里要用钱，这也是实

际情况，何况事情总是：如果开始时说二十万到头来恐怕要花三十万。

鲍科·伊斯特万：还有两项议程，一项是法拉戈·安陶尔申请补助。他们就是老两口，没有别的经济来源。老婆婆久病不起，老头本人劳动也很困难，老头本人没有正式提出申请，只是有这方面的意思。主任本人认为可以作为正式申请看待，并建议管委会批准给他两百福林补助。

恰萨尔·伊姆雷问福利基金还有多少？

蒂萨·尤若夫会计：还有一千六百福林没动用。如果老人实在有困难，即使不正式申请，给些补助社里的钱是够的。

恰萨尔·伊姆雷：问题在于两百福林解决不了法拉戈的全部问题。本人也亲眼看到老人劳动实在有困难，相当受罪，长此以往有朝一日会出大问题。应该设法帮助他解决劳动问题，一劳永逸。

纳吉·山姆表示他本人也想到了这点，需要设法解决。秋天巴伊·安德拉斯退休，到时候可以让法拉戈接替巴伊夜间去喂牲口。活不多，他干得了，还可以有正常收入。此外同意在解决工作以前给他临时补助。

拜尔科·亚诺什：法拉戈只有当巴伊·安德拉斯退休后才能去当饲养员，但是巴伊想在退休前把房子修好，把夏天用的厨房扩建完。如果一退休，就完不成了，应该等他结束修房再让他退休。

科奇·盖尔松：如果这样，法拉戈还得等一年。

布尔库什·盖扎：最好研究一下老头修房情况，看能不能加快一点速度。

恰萨尔·伊姆雷建议主任去看一下，如果扫尾工程不大，用钱不多，社里能不能帮助一下，好让法拉戈的问题及早解决。

科奇·盖尔松：我们有木料，砖头也还有一些。管委会如果能通过一项决议，作为对老头迄今为止所完成工作的表扬，在他退休之际，由合作社承担修建房子的其余部分，那问题就解决了。

蒂萨·尤若夫会计表示他本人在工作中出于权宜，有时也对会计制度作些小的变通，但科奇·盖尔松的建议超过了限度，他不敢负责。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请问区委书记有何意见，如果这样做了有多大程度的不妥当？

屈勒什同志：章程规定根据合作社民主，合作社有权自行决定社内各项事务，他人不得干涉。

纳吉·山姆(管委)：希望区委书记在别的问题上也采取类似态度，而不光是在这件事上这样做。

鲍科主任要求就此事进行表决。通过。主任表示会计可以相机行事，但不要引起问题。最后一项议程为萨波·卡洛伊之子的求学问题。

霍尔瓦特·尤若夫支书：有三点理由支持管委会同意此项建议：一、孩子，即萨波·盖尔盖伊自小学至中学毕业都是优秀生；二、如果作为合作社资助的学生，则大学毕业

取得文凭后作为专家仍可回到本社；三、如果由社里承担费用，对他父母说来可以减轻不少负担。但最主要的则是将来作为本地的年轻专家和社里的其他专业人员一起工作。我们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们，了解这里的人们、这个村、这片地。

布尔库什·盖扎问有何保证使萨波家的孩子取得文凭后肯定回本社而不是到别的地方，如大城市或是大城市郊区？提这个问题并不是认为这孩子不合适，而是大家都清楚，现在的青年对农村有什么看法，他们一有机会就插翅高飞。

科奇·盖尔松认为布尔库什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他觉得不如这样提出问题：有何保证使国家或学校不把孩子分配到他们认为更需要的别地方去？因为和萨波家的孩子还可以，和国家就很难讲道理了。

霍尔瓦特·尤若夫支书：国家的利益并不要求把一个合作社出助学金的学生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何况孩子本人还要写书面的东西，保证学业完毕后回到本社，萨波·盖尔盖伊这个孩子大家都熟悉，是个正派、谨慎的年轻人，不会言而无信。四年以来每逢暑假，他都参加劳动，这点大家都清楚。

恰萨尔·伊姆雷问助学金需要多少？应如何支付？交给谁？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助学金每月五百福林，如果他学习成绩优良，可享受学校免费食宿。在这种情况下，这五

百福林作为他的其他花消——购买文具、添置衣服等。

纳吉·山姆表示他支持这件事，过去当还只是随便议论时他就表示过这一态度。但五百福林不是小数目，如果学校能保证食宿，那么孩子还要这许多钱干吗？年轻人不费力气学会用钱没有好处。

科奇·盖尔松：五百福林要说少确实不少。但他认为孩子本人不是无偿地拿这五百福林。他本人住在萨波家附近，看到孩子下午四点钟乘区间火车回家，一吃完饭就看书写字，只要不放假，每天这样，整年如此。清早四点半就起床，赶火车上学。他虽然不是干劳力的活，但是他花在念书上的时间比一个成年人的劳动一点也不少。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说他的儿子也是中学生，也在准备考大学。有时读书要读到半夜。星期六老师也留作业，就是说星期天也得念书，可是别人那天都休息。他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当学生的差不多只是考试的时候才去学校，平日不是你不去，就是我不去，到后来是怎么毕的业都记不清楚了，因为还需要放牛、喂羊，当然还要割草。他本人认为萨波家的这孩子将来会替合作社挣回现在花在他身上的钱的。而且请管委会注意，萨波家还有六个孩子，这么多张嘴吃饭，再给大小伙子添置衣服，确实有困难，何况又是到城里上学，在那里不能太寒酸。

布尔库什·盖扎：要学五年，每月五百福林，一共三万福林整，实在是笔大款子。

拜尔科·亚诺什：如果是一次支付而不是五年分期，那

才算一笔大款子。他认为这不重要，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的孩子能上大学，拿回文凭来，回不回社都无所谓。就他本人来说，派谁的孩子去都无所谓。

恰萨尔·伊姆雷：这是大道理，但还有更实际的道理是这孩子将来回到自己的社里来，就是说将来有个本地的专家，在合作社的领导人中间有我们自己人里出来的专家。这就是合作社的利益。合作社有了本村的人当专家，这可不是小事情。要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人当专家，这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怎么说都是好事情，怎么想都成。

科奇·盖尔松：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如果这样，那么事情的多一半已经没问题了，别的都好说。

布尔库什·盖扎、纳吉·山姆、赛凯尔·亚诺什、基什·巴尔、莫尔纳尔·尤若夫一致表示同意。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提交表决，通过：萨波·盖尔盖伊（萨波·卡洛伊之子）由合作社资助上大学。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称已无其他议程，是否再回头研究整治土壤问题。主任表示：发言者提到可能到头来费用超过二十万福林，但问题在于什么态度看待土地质量。个人利益固然重要，工分值高当然每家都高兴。说实话，如果根治这块土地工分值肯定会降低，个人收入就减少，但是从长远看，这合乎集体的利益。请管委会委员们根据各人看法表决。

纳吉·山姆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意见。

布尔库什·盖扎：考虑到大家都不发言，他建议主任付表决。

鲍科·伊斯特万主任提付表决。表决结果无反对票，管委会决定整治罗卡地块。

## 十七

十一点钟

“将军”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找我。顶着耷拉着边的帽子，脚上那双破烂不堪的皮鞋擦得锃亮。他缓缓地、庄严地推开门，神情严肃地、以似乎即将发生重大事件的神态向屋里看一眼，然后把门推到最大限度，自己则挺直腰板收进肚子靠边一站，以便给跟在后面的贵客让路。这一切都表示自己是这位大人物忠心耿耿、毫不动摇、可以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追随者。他紧紧地在门边贴墙站着，举手敬礼，露出无限景仰的表情。但接着横跨一步，自己站到门中间，昂首阔步跨过门槛进了屋。门呢，是我关的。

“欢迎您，”我说，“您能想起来看我，实在使我们高兴。”

他在屋子中间站住，环顾四周，一面脱下薄薄的、到处开绽的手套。然后以楚楚有致的动作摘下帽子，先是伸一只手，然后是另一只手抓住帽檐，轻轻地放在手套旁边。两只眼睛在皱着的眉毛下面扫了我一眼，双手背在身后，然后突然转身走向窗户。

"我不打扰您吗?"

"不,对您来访我深感荣幸……"

"敝人历来不拘小节,对于他人以类似方式与我接触同样深为欣赏。当足下前往舍间时敝人并没有表示,甚至也没有透露该时间多少有点不妥,然而敝人根本不予计较。"

他转过来,微歪着头看着我,然后高高仰起:

"不对吗?"

"不,正如您说的那样……请坐。对于您没有忘记我,实在深为高兴。"

"敝人一生中被人们无情地遗忘到如此程度,以致深感不可以世人待我之道待诸世人。当然一般说来,我判断自己行动的正确与否是视其在多大程度上与世人相同或相异而定。与世人相异越大,日后就越证明其正确与高尚……不必忙碌,请坐!"

他用不停比划着的手指指沙发,接着自己也直挺挺地坐了下来,双手按在膝盖上。

我的"将军"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访的,他到达以后好久,在窗外还可以长时间地听见跟随而来的孩子们的喧闹声,最后孩子们喊叫着,吹着口哨逐渐散去到林子里玩狗或用弹弓打鸟去了。"将军"喜欢他们,他们对"将军"素来也是紧追不放,象这样热中如一的兴趣也只有在孩子们身上看得到。

今天,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分"将军"又来了。

"有什么新闻?"我打开烟盒递过去。

他脸色苍白,颤巍巍地坐着。然后抬头看我:

"您说……"他声音显得既特别又疲乏,"您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愚不可及?"

我捏火柴的手停住了:

"我不懂您的意思……"

他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满面劳顿,眼睛失神,惊恐地从一个家具移到另一个家具。

"我想,"手指在膝盖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我是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不,您不必安慰我,确实这样,我业已濒临绝境。势必如此,在劫难逃。"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点事也没发生!……"

"不可能没有发生事情……"

"真的什么事也没发生。"

"您在瞒我?"

他抬起头:

"我是怕您不理解我……"

"别这么说,您知道,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毫无此意。"

"那么我洗耳恭听。"

"今天我去找大夫去了……"

他站起来,反剪着双手走到窗口,外面是一片漆黑。他的脸在玻璃上一闪。

"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他的手指颤抖着，互相找来找去，最后十个手指互相顶在一起了，接着又分开，然后又顶在一起。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沮丧的自我感觉，经常对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位将军发生怀疑。当然任何人都可能对自己的职务或者甚至不妨说对自己的能力发生怀疑。这原也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可以说是使人兴奋的。因为人们可以有机会再一次来考验一下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以便克服怀疑！可是，在我心中日益频繁地出现的疑虑却不是这一类的，相差远矣！我的疑虑有点接近病态，类似幻觉，至少是差不多。大夫非常非常认真地作了检查，并且要我放心，尽管如此，我依然极度恐慌。就是这恐慌更大程度地动摇了我的信心。我从不知道恐慌为何物，而今日却深有体验了。"

他对着我说：

"我如实奉告了。"

"感谢您的信任！"

"这是一种极端可怕而又不幸的状态！"

他从屋子的这边走到另一边，然后在我面前站住：

"象我这样一个人，以自己的全部经历向皇天后土证明无愧于所承担的职责，我多年的服役和行动使我片刻也没怀疑过自己的信仰和真理，而今突然失去了信心，有如土地离我脚下而去。您能理解到这可怕的心理状态吗？"

"如果我相信，我想是能充分理解这点的。"

"如果您相信什么?"

"如果我相信您的怀疑是合乎逻辑的,而不是每人都可能发生的那种情况。您承担和完成的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它会使您无比坚强。"

"您这么看?"

"我这么看!我深信,全部问题在于您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任务,那因精神集中而造成的高度紧张、那为了实现目标而产生的既自然又合理的情绪激动,造成了您刚才所说的情况。您应该休息一下,这些现象就会消失……"

他竖起眉毛,脸色苍白地看我:

"您怎么会认为,"他慢慢地、字斟句酌地问,"您怎么会认为我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任务?"

"朋友,我只是推测……"

"我问的是:您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我正在准备采取一项行动?"

"请相信,我只是推测。"

他点点头,半闭着眼睛看着我说:

"我相信您!不要求解释。"

他缓缓地、庄严地走向窗口:

"其实,我的前任也是经历了类似的精神危机。我不是说,似乎撒旦[1]在教堂顶上许下诺言,把庄园和职务还给我

---

① 魔鬼,出自《圣经》。

的这位前任，可笑！……但请回忆一下：当他诅咒天父遗弃了他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发自心田最深处的呼喊吗？诚然，造成他悲剧的是他本人深感有必要返回天父身边。虽然我理解他为何有此一举，但我还是应该责备他，因为虽有得于此却有失于彼。他对于世人的灵魂了解过分肤浅！”

“您看，这完全可能……”

“请不要以为我故作耸人听闻之论，但对于我能如此洞察世人的灵魂深处往往连自己也不胜惊讶。”

“真了不起。”

“这是我所能设想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能力。意义重大。”

“可见……那么您还为那种瞬息即逝的情绪而伤脑筋吗？”

“对……对……我想您是对的。您确实认为这只是因为精神高度集中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吗？我可以说这是一种疲劳吗？”

“我深信如此……我个人认为，正好象您刚才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坏东西。”

“我往往连自己也吃惊于能多么深刻地观察到最秘密、最不可觉察的东西——人类灵魂的奥秘！我假设您不怀疑我的话？”

“怎么会？！”

“我厌恶那种最恶劣的伪善。似乎关于我自己也不能说有任何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力求在任何事物上尊重

真理……难道用种种手法促使别人歌颂自己倒是正派一些？我毕生尊重真理，从不计较其后果如何！”

他用脚跟转过身来，伸出手臂指着我：

“您说得对！关于我当将军那一段经历中的任何怀疑都是对我的不敬，然而怀疑却又是事业的推动力，从而激发人们夺取胜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喔，当然！”

“问题就在于此！正因为如此，敝人毫无沮丧的理由！喔，您大概永远也不会感受到什么叫做重任在肩，什么叫做献身人类！上帝怜悯您！您以为我的瞬息即逝的弱点和惊恐可以诉诸我的下属吗？您大错特错了。他们什么也不应该知道！一个将军是不可能软弱的——一个将军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和怀疑，一个将军坚如钢铁，稳如山岳，以气壮山河、威不可挡之势，仰首挺胸面对风暴！”

“我们意见一致，您不愿意就座吗？”

“在我承担责任伊始就深信信念将横扫一切！敝人就是在此一信念的伟大感召下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教员成为将军，成为我军常胜的司令官！”

“您不想就座吗？”

“不！我重又感到浑身有雷霆万钧之力，从而又可率领军队百战百胜！我头脑清醒，心脏有力，血管中奔腾着信仰的洪流！生活的崇高目标重又在我眼前闪耀。对它不能不俯首听命！噢！卑贱之徒，鼠目寸光之辈，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象黑暗在旭日下消失一样躲到地狱之最低层去了！

噢！多么神圣、伟大而与无与伦比的力量，这是么什样的幸福之感啊！”

他走向桌子：双目炯炯，脸上的皮肤轻轻颤抖、嘴唇微微跳动，把右手套往左手上戴，更正过来后伸手去取帽子。

“我该走了，朋友！……我不以向您推心置腹而有所后悔，我并不因让您看到了我心灵的搏斗而遗憾。我不应该为了真实而悔恨，因为我的所有痛苦和斗争是为了整个人类！”

他把帽子按在头上，朝我看了一会儿：

“噢！关于幸福您能知道什么？”

“我知道得很少……”

“我相信这点！”他说，然后向门扬扬头，“门！”

我给他打开门，当他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停了一下，注视着我，可以看见他眼里充满泪水，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了：

“如果您知道我心中充满多伟大的爱，那您一定会跪倒向我膜拜，而我就会把您扶起来，允许您和我拥抱……”

我慢慢地在他身后关上门。

## 十八

十二点钟

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深沉的夜。庄严的白杨树沉默着，

这是什么样的树啊！它的每部分都向上挺，没有一小块有任何妥协，只是向上，向上！矮矮的谦逊的冬青树互相依偎在一起。一只蝙蝠拨动着空气——啪哒、啪哒……当回头去看时，它早已不知去向了。远处传来蛙鸣，在更远的地方，在夜色深处，响着汽车的声音。谁也没有感觉到狗已经轻轻地走到旁边，只是当它的鼻子碰着你的脚的时候，或是当你伸脚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它在黑暗中伸着懒腰，偶尔对一个你根本听不见的声音发出轻轻的吠声。在月光下显得稀疏的星星眨着眼，到处是蟋蟀的声音。

“晚上好！……”

“您好！……”

“又过了一天……”

“又过了一天……”

“对我说来一天刚只是开始……”

“它也会结束的……”

“它也会结束的，什么东西都会有结束的时候……”

火柴燃着了，火焰在烟斗上一亮一亮地象往上爬，然后是一片黑暗。

“家里有信来吗？”

“有……”我说。

“老是一个人可不好……我只是在当兵的那年头才离开家好久。我不愿离开家……”

“您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两次。您知道，象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经历的事，

要是换个时代，恐怕一百年也没有那么多。我这一辈子别的什么也没看到，就只看到了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去，老得谨慎小心，别弄错了……真是什么世道！”

我们俩都沉默了。

“他又到这里来了？”他指了指那屋子。

“来了。”我说。

“他走的时候我看见的……有什么办法？世界上什么人都得有！他也不是坏人！有一次把我的儿子揍了一顿，我的大儿子，在这次大战中先牺牲的那个，盖扎……”

“您牺牲了两个儿子？”

“两个！都是好孩子……看见他们谁都打心眼里喜欢。一个在四三年，一个在四五年。……有过两个孩子，可现在一个也没有了。连埋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打的是大的那个——盖扎，好象在他兜里放了个耗子还是什么东西，盖扎就挨了一顿揍。后来下午到我家来赔罪，要我们原谅他，因为打了我们的孩子。那时他脑子就不很清楚……他的动物怎样？”

“他那里我好久没去了，……恐怕都还在吧！”

“他的队伍，……哼……他是个倒楣的家伙。不过人们说，疯子心里不难过，说不定挺高兴……”

“可能……”

“上星期我送给他一只猫头鹰，一只野的，至于他拿它怎么了，只有上帝知道！也许还会把它驯服了。……那天我给他送去的时候，他说，你进来，别怕！怕我可不怕，可是进

去干什么!?屋里臭得呛鼻子。他说，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看到他的队伍有多棒！到那时我们大家都会羞得无 地 自容。他说，他的狐狸不咬兔子，猫不吃耗子，黄鼠狼不偷鸡……我说，老师，那您就快点训练吧！”

“他需要猫头鹰?”

“您要是看到就好了。他早就要我送他一只了，要越野越好，到头来它会变得特别老实的。您看到过他的那些东西吗?”

“那些动物?”

“对……”

“看见了……”

“真象他说的那样?”

“真的，都关在一起，同一只笼子里。”

“真的谁也不咬谁?”

“我在的时候没咬……”

“您看，到头来说不定真是他对了，我们会羞得没有地方躲……嗯，他就来我们家赔罪，说不该打我们的盖扎，难过得差不多都要哭了……”

一颗流星划过天空。

“它的生命也结束了。……”巡夜的说。

“结束了！”

“要是他死了，那些动物怎么办?那时才真会出问题！”

“会把他吃掉的！”

“吃掉他？”

“要是邻居们没发现他死了，到头来那些狐狸、狗、田鼠、獾就会扑过去，吃掉他……”

“他一心一意养它们就是为了这？真是个疯狂的世界！他说，他没法和人生活在一起，和动物还可以，结果倒是这些动物吃了他！不过直到现在它们都是太太平平待在一起……”

“这夜晚真美！”我伸了伸胳膊。

“是这样。”

“在这样的夜间晚班不特别困难，对吗？”

“不困难！下雨天就不太舒服……在现在这样的时候，一切都是安静的，都睡着了，谁也不惹谁……我当巡夜的已经七个年头了。不管您信不信，这七年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我老跟尤什卡主任说，要是什么事也没有，那我还有什么用？！”

“可别这么说，回头他们会当真的！”

“不会的，宁可我说．我这么说他们就不这么想，他们反而会说：‘不，伊斯特万大叔，夜里需要有人！’‘那好吧！’这样，又是一年。只有一次夜里不太平，不过那次后来我也得了好处。”

“就是鲍洛格·安陶尔那事？”

“就是那件事，……还有尤什卡那件事……第二天早晨尤什卡问我：‘夜里听见什么了？伊斯特万大叔？’‘什么也没听见，’我说。‘那好，’他说，我们就一起喝了一杯。至于

那个鲍洛格·安陶尔，大概就在事情以后一星期，我路过他们门口，他把我叫进去，他说，'那天你在窗底下吗？''什么窗底下？'我说。'那就是你什么也没听见？'他问，'没听见，一句话也没听见！''那好！'我们就一起喝了一杯烧酒。"

"你喝烧酒？"

"喝，为什么不喝？"

我从屋里拿出一瓶：

"那就来一口！"

"好，我来猜猜，是谁的？"

"猜猜吧！"

"是鲍洛格·安陶尔的，对吗？"

"对！尤什卡——鲍洛格的事是八点钟，为什么要在夜里干？"

我们一人从瓶里喝了一口，然后放在身旁的冬青树下。

"是这样，"巡夜的说，"自从安陶尔向尤什卡开了枪，他就不敢上农场办公室这边来。也不上工，等着瞧。而尤什卡无论那时候还是后来，都不让警察把他带走。不光他，别的人尤什卡也不让带走。就这样过了一个月。这安陶尔就一个月没上工，那尤什卡呢，就这么待着，不说，也不催他上工。"

"工资呢？"

"工资发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来了的原因。过了一

个月，他找尤什卡来了，想弄明白尤什卡到底拿他怎么办？那个说，‘我现在没空，晚上我回家，十点钟，以后你到这里办公室来，我听你说说究竟是为了什么。’说完就坐上马车下地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就是一个月以后吗？就是他到尤什卡窗下那晚上以后的一个月。也就是个把月，事情慢慢算是过去了，一切又照旧了……”

“晚上他去了？”

“去了，不去怎么办？”

“您是怎么想的，干吗晚上叫他去？”

“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那时每个人都暗暗瞧着尤什卡，看他怎么办。不管怎么说，总是安陶尔开枪打的他。要是他不允许把安陶尔带走——因为是他不让带走——，那么看你安陶尔怎么还他的账？因为这个尤什卡不管什么从来不让欠账。那个老基什科瓦奇不让吃肉的账到头来也是还了。现在看他要把安陶尔怎么办？”

“安陶尔来的时候您也在？”

“那时候我正好巡逻到办公室附近，看到安陶尔过来。‘主任在吗？’他问，‘你是说尤什卡？’我问。‘当然是说他，’他说，‘还能是说别人？’他就坐在办公室门口的凳子上等着。他没兴致和我说话，我也没说几句。‘他找的你？’我问。‘我自己来的！’‘那干吗晚上来？’‘是你们主任这么说的！’我听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就任他在凳子上坐着，没再

理他。”

我们又喝了一口酒。

“我接着又巡逻去了，不过总走在看得到的地方。后来尤什卡来了，他们进了办公室，灯亮了。……”

“我来了，上午说好的……”

“那你关上门！”

鲍洛格站在门口，慢慢地向前移一步：

“我想要小册子……”

“什么小册子？”

“劳动手册①，在这里工作的劳动手册。”

“啊哈，”主任说，“要它干吗？”

“什么？”

“要劳动手册干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鲍洛格在办公室四下看看。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牛、马、猪、小麦和玉米地以及葡萄园的照片。办公室后门是保险柜，在铁槛杆外面是沉寂的黑夜，屋里灯火通明，吊灯上九个灯泡发着亮光。

“因为我想离开农场……”

“离开农场？”

“是这样。”

“为什么？”

---

① 证明在某处工作的证件，工作调动时随身带走。

主任走到办公桌后面，在椅子上坐下，靠在椅背上，摘下帽子，放到桌上。从清早干到现在，没有休息过，现在刚从第三个地块回来。他在脸上搓了搓，看着在自己面前的农民，已经一个月没见到了。从他靠在厨房墙上那晚上到现在，一个月过去了……鲍洛格·安陶尔……他看着安陶尔，眼光在安陶尔身上扫来扫去，安陶尔站在离门口不远。当年他们两人就是这样站在管家的面前的，就在这间屋子，这个地方。……”

“那就是说，你要劳动手册。”

“对！”

安陶尔看着主任，主任一个月以来是老多了。还是和少年时代一样，每当思考问题，就皱起眉头，两条眉毛儿乎拧在一起了。现在，他就象当年他们两个一起面对宪兵时候那样皱着眉头……他妈的，这个臭农民……他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皱着眉头，沉默着，不看宪兵而是盯着地面，一个声音也不出！

“好久不见了，安陶尔！”

真是好久了。可是……难道不和昨天刚发生的一样吗？……

他又沉默了。接着：

“有一个月了吧，安陶尔？”

“是，有这么长时间了……”

“不算长！”

“不长……”

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两条眉毛还是拧在一起。人们说，他们两人——安陶尔和尤什卡的目光很相似，不管怎么说，眼睛的颜色完全一样的，都是棕色的大眼睛，差不多可以掉换。

"那就是说你要劳动手册？"

"对！"

"你想离开农场？……"

"对！"

安陶尔现在肯定地相信自己不会被警察带走了，其实他早也是这么相信的。他知道尤什卡不让警察带走他。不但是当时，后来也一直没同意。……尤什卡去了州里，还去了别的地方，一个人也不让带走。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农场？"

问这干什么？他知道得和自己一样清楚。

"你说，如果别的方式不行，那在办公室里我想弄清楚，某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离开农场？"

"因为……"

"因为什么？……"

"你自己也清楚，干吗还要问我……我在这里待不下去！"

"有别的地方可待吗？"

别的地方？自己还不老，干得了活，就是去筑路，也干得了，或者到城里什么地方，只要能干活的地方都行……

"总会有地方……"

“你肯定，总会有地方？”

总会有地方……要力气的活他都干得了……

“只要别挑肥拣瘦就行……”

“别挑肥拣瘦？其实可以挑！可以去筑路，可以到工厂，还可以到钻井队或者护林队，附近国营农场也有三个，如果一个也不合适，还可以到城里去当工人，报上登着广告，说是还提供住宿。不但提供住宿，还发靴子，给工作服，供午饭、两道菜，每天吃肉，每月还可以免费乘一趟火车回家。工厂不但给衣服还给车票，不要个人掏腰包。”

尤什卡问这干什么？他问这难道是为了安陶尔不想在这里而打听能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吗？是不是为了显得安陶尔不是被他们剥夺了谋生手段而是自己想走的？

“总会有地方，”安陶尔说。

“怎么会没有地方呢？……我也说会找到地方的，简直可以随便挑，安陶尔，如果从前能有现在一半机会就好了……”

从前为了能找到一个地方，哪怕打一个星期的短工给家里挣几个小钱，往往需要走上三个州。两人一起走了多少路，不知道碰上多少宪兵盘问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说着就把他们拦住了：你们最好还是回自己的地方去，别在这里抢人家的面包！这里想找活干的人也不少……

“哪怕十分之一的机会也够了啊，安陶尔！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什么都记得……

"我问你就是为了想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

应该说点什么吗？但是要说就得说一大堆，怎么开口呢？第一句说什么好？要说的事太多了。

"你想离开这里？"

"想！"

"因为不想在这里了？"

"对……"

"因为你差一点杀了我？"

"对！"

"想到别地方干活去？"

"是！"

尤什卡又皱起眉头，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

"那么在别的地方你能待得住吗？"

"能……"

"你会朝那里给你活干的人开枪吗？"

尤什卡越走越近，在他面前站住了。尤什卡比他矮一点。从小就这样，稍矮一点儿。

"无论你走到哪里，能给你活干的总是那天晚上你朝他开枪的那种人。你要找活干的地方，只有你向他动手的那样的人在管事……"

他们站得特别近，可是和刚才有点不一样了，尤什卡胸膛鼓起来了，急促地喘着气，……声音也变了……他轻声说着话，身体在发抖……

“我说得对吗，安陶尔？”

“把劳动手册给我！”他说，抬起头来看着主任，“你如果要和我算账，那么请吧！怎么干是你的事，我要的是劳动手册，我就是为这来的！”

“你说对了，安陶尔，是要算账，我是要算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怎样算？你不知道，对吗？那让我来理一理……”

主任低声说着，声音是颤抖的……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一遍，你听着：一方面是你那受苦受难的生活，要找比你更苦的人也不容易了。自从你从土里长出来以后所受苦的一半分给六个人都是算多的。你过了半辈子穷日子，贴在你身上的穷光蛋标签没人能揭得下来，那时连你自己也不信世界上会有人能揭下你身上的那张穷光蛋标签……因为你上了一千次当，所以对真想帮助你的人也不相信了。为了让你相信一次别人是为你好，别人要做十次好事才行。这是事情的一半，就是为什么我不让警察把你带走的原因。在那以后别人想那样做也是我拦着。我不让他们把你带走，因为你早已受够了苦。谁想再让你吃苦，那么那家伙肯定比魔鬼还可恨。至于那另一半，就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原因，因为你毕竟是欠着账……”

尤什卡说得太多了，脸发紫了……他已经管不住自己了，喊起来了：

“你说，是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人的？你儿子是当了医生还是当了流浪汉或是又给地主打短工去了？是造了新房子，还是继续住在就象你和我一起住过的那连猪圈都不如

的棚子里？千百年以来受苦的不就是你的祖辈和父母以及和他们一样的人吗？我当年不是对你说过：别躲开，别后退，别松手，别让人把革命的果实从你手里夺走？你呢？'给我劳动手册，'拍桌子！你这算是在承担困难吗？你靠边一站，让不三不四的人占据你的位置，你们都缩着脖子离开了我，让我赤手空拳，看不到几个自己人。我这样拚命干，为的是什么？你们都躲起来，往后退，最好什么也不干，混日子。到头来你们还算国家的主人！你挨饿了，把你的面粉拿走了，小麦和土豆背走了，一扫而光，这都不错，可是你儿子念书花钱了没有？你看病花钱了没有？你不再当长工打短工了，你到底应该打死谁？……你这该死的东西，拿起枪来打我……好吧，这就是你要还的账！"

尤什卡举起拳头全力打在对方的脸上。

"尤什卡！"

"如果不是这个政权，那么是谁把你身上的那张'穷光蛋'标签揭掉的？"

"住手，尤什卡！"

"你到我窗下来的时候住手了没有？当地主命令你八岁的孩子去干活的时候，你对准他开枪了没有？你即便要开枪，为什么对准我？"

尤什卡疯了似的，狠狠地又是一拳。鲍洛格踉跄地退到墙上，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你对地主开枪了没有？他把你的油挤干了，不是为了给你造房子，盖工厂，建学校，不是为了让你的孩子过好日

子，而是为了他自己过得舒服，玩女人，坐马车，造花园，你为什么不朝他开枪？……你就这样对付我！这就是我要和你算的账！”

“住手，尤什卡！”他一把推开了尤什卡，已经失去了自制，并且还手了。难道尤什卡是为了这才不让把他带走的？尤什卡莫非是为了要亲手要还那天晚上的那笔账？……

可是谁和你一起搞的土改？难道不是我？是谁和你一起在这里建党，让人们获得政权，难道不是我？可是又是谁最狠狠地嘲弄了我，难道不正是这个政权吗？是谁选择了瓦尔加这类人和别的乌七八糟的游手好闲的人来这里掌握政权？是谁欺骗了我，说什么都是我们的，可是到头来妇女们甚至被迫要到沟边去摘荨麻做汤？是谁以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从起床到躺下自己总是有罪？当新的书记一下汽车就说这里住的都是法西斯分子，是谁告诉他的？有任何地方有过比这里更多的雇农？那么法西斯分子是在说谁？当自己想说出真理的时候是谁叫我不要出声，因为否则便是帮助了敌人？是谁剥夺了自己本来可以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东西？当全村责问自己：“你在一九四五年向我们许的愿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听你的，拚命，原来是为了这个吗？”到底是谁该对此负责任？当人们的尊严、荣誉和骄傲遭到践踏的时候，侈谈工厂、学校和新型城市有什么用？我宁可不要这工厂！难道有了工厂，人都可以死光吗？吓得每个人都面如土色、杀了一大堆无辜的人，就是为了不叫人们说一句反对的话吗？国家遭到掠夺，可是还是不断地听说：“这

是我们自己的政权!"就这样践踏人哪!

"住手,尤什卡……"

"我住手?当你不光是打我同样也是毁你自己的时候,你住手了没有?即使当你最难受的时候,难道不总还是比当雇农好些吗?你难道不是在那最困难的几年里从雇农屋里搬出来的吗?你儿子不是那时候上的大学由政府培养成人?要是你当长工从早干到晚,他能在学习上花那么多钱吗?你为另外一个孩子学习技术花过多少钱?他连衣服、吃饭都是国家给钱,更不用说学费了,为的就是让他学一门技术,你花过多少钱?"

两人扭打着撞在桌子上,椅子也翻了。拚命地、撒野地扭打着。

然后,没有声音了。

巡夜的举起手杖指了指凳子:"我就坐在那里,听得见也看得见,是尤什卡占了上风,可是到处是血,……屋里有个水管,他洗了洗,安陶尔呢?躺在桌子边上,我想,他大概已经死了……尤什卡在桌边坐下,模样儿也好不了多少。后来他站起来,给安陶尔泼了点水……过一会儿那位也醒来了,尤什卡走出屋来,我呢,就从窗下溜走了。能不被人看见,又何必非让人家看见不可?"

他吸了一口烟。

"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他从牲口棚牵了匹马,亲自把安陶尔送到医生那里去……第二天他派车夫送去面粉和腊

肉。因为安陶尔不劳动，家里没什么东西吃了，他就送给孩子们，他拿自己的东西送去的。……”

“安陶尔他们收下了没有？”

“谁知道！？车夫反正给他们留下了……至于后来怎样，送回来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一个星期以前的一个晚上他们俩一起乘马车从什么地方回来，他们有个亲戚在另外一个村子里，一起参加命名日去了。看见我，坐下来和我一起吸了支烟。可是您看，鲍洛格·安陶尔的儿子，那个在厂里的，他没有回家，现在根还没有消呢。也不和他爸爸说话，因为嫌安陶尔低头了！就在这凳子上……他们和我！”

我们又喝了一口酒，他擦擦嘴：

“天知道，一个人能活多少年，实在太少了。一想到这我就免不了心里难过。可就是连这点时间也不肯太太平平地过。上帝创造了世界，可是人们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意志……有人觉得这样好，有人觉得那样好。……大概以后也是这样吧！这个尤什卡，在这农场里当主任，他工作，拿钱。我也工作，也拿钱。我拿这些，他拿那些，他拿的恐怕能有我的三倍多。他的车夫也工作，也比他拿的少……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没法改变，总有人比别人特殊一点，其实大家都一样老老实实地工作。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一下吗？没有！但如果问题就光是这些也就好了。真正的问题是不论你干什么，你怎么干，一打仗，就把人带走了。是谁？反正不是人们自己去的，是被带走的。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然后叫人把他杀了！历来

如此，永世不变。和这比起来，别的又算得了什么？！别的实在算不了什么，就象手指甲缝里的一点脏东西一样……这就是真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接着说：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很漂亮的好孩子……两个都是细高条结实的年轻人，比得上他们的人不多，……大概总会把他们埋起来的吧？！”

他转过脸来。

“会把他们好好埋起来的，对吗？”

“那一定会……”

“他们的妈总说：说不定连埋也没埋，就那么没铺没盖地扔在什么地方……说完了就哭起来！我告诉她，别难过，总会埋起来的，不会就那么扔在荒地上的。您说呢？”

“当然是会埋起来的！不会那么随随便便的。否则会引起传染病，每个牺牲的人都会被埋好的。”

“哪！第一声叫了！”他抬起头。

半夜里，第一只公鸡打鸣了。

“当然，一定会把他们埋起来的……”他说，“我总是对他们的妈说，你别难过，他们安静地在地下睡着呢！”

## 十 九

十点钟

夜匆匆地过去，又是红日高照，在大地上洒满一片金

辉，世界重又是一片光明了。

越过碧绿的畦埂，沿着覆盆子丛是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有一张躺椅。蜜蜂在空中嗡嗡叫，疲乏的蝴蝶在温暖的空气中懒洋洋地在卷心菜和大头菜之间飘来飘去。

"喔，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伯爵说，"让我们回到童年时代，就象那时候做过的那样重新玩一遍。"

"有意思……"

"它们是害虫，我不喜欢它们！"

我点上一支烟：

"您为什么不用铁锹把整个蚁穴都翻过来？"

"因为这是徒劳，我试过了。到后来还是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重新又出来了，用开水我也浇过了，可是几天以后在园子的另一边又得重新开始……"

"那果然是徒劳无功的了……"

"您这么想？"

"我这么想……"

"可能是这样，但人只要活着，总是盼望着……"

他笑起来：

"您知道，没有目标，人活得就没有意义。至于什么事物赋予生命以意义，那倒是无所谓的，纯粹是个观念问题。至于人家认为我的行动无聊，那于我无损。重要的在于我们自己认为有意义就可以了。……"

"这从前是个罐头，对吗？"

“对的，现在它承担着比从前高尚的职责……哈哈，我的朋友，我会好好把它保存起来的，因为它是我的见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见证和工具。”

“您一次装几只蚂蚁？”

“二三十只……看情况而异。然后我把它们带走，回到这边再开始……”

他看我一眼：

“您得承认，我这想法极有意思……”

“我愿意这样说……”

我们说着话走到了蚂蚁窝附近。在这里草比较稀了，地上有许多小洞，互相有细细的小道相通。

“上帝啊……我已经是多么了解它们了啊！”

“这是今天的第一次行动？”

“不，这是今天最后一圈……”

我们注视着地面。蚂蚁在他们自己的通道里忙碌地来往。没有一只不是在动，每一只都有自己的目的，都在为自己生活的伟大目标而劳动，而忙碌。几只蚂蚁从这个洞里消失了，又有几只在另外一个洞里爬出来。它们爬着，赶着路，互相交叉，互相致意，带来消息，又带走消息。它们拖着草或小片食物挣扎着。停下来，然后又继续前进，不倦地努力着。它们的行动似乎是没有目的，也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在下面，在地面的下面，在它们的窝里，人们可以看到它们为实现目标所进行严格活动的成果。它们精心而聪明地建造起来的大道、小路、纤细的小径联结着一片片堆满食物和养

着为他们提供营养的蚜虫住处。住处的上层是孵化卵和养育卵、蛹和幼虫的地方。要建设、维持、扩充乃至美化这些住处，需要这小小的蚂蚁们付出辛勤的劳动和心血，它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授经验和移交创造出来的东西，人们可以想象在那小小的洞穴里有着多么严格的制度来把这些小动物的精力集中起来，指出每只蚂蚁应完成的劳动，从而体现了为实现自由所需要的最完美的制度而各尽所能。

“您既然在这时候来到，那只好屈尊等我把事情结束……”伯爵一面说，一面把小罐头的盖拿下来。

“请便，就当我没在。您弯腰不感到累吗？”

“可惜！至于成绩，我从来没有寄予丝毫幻想。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也只是尽一己之绵薄罢了。但是您不妨注意它们行动起来是什么情况……”

“您这游戏玩了多久？”

“您不妨问：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他跪下一条腿。有点吃力地挪动着身子：

“幻想，亲爱的……一切都是幻想！”

他抓起一只蚂蚁，放进罐子里。

“这样不会捏死它吗？”

“在如此大量实践之后？您想到哪里去了？……嗯，就这样，让我们轻轻地放进罐子里！什么不寻常的事也没发生——我充其量只是使它们违反了它们存在的基本法则而已。让它们认识到：在这巨大的茫茫之中，万物除了自己的形骸之外又都是别的什么，而它们却只不过是蚂蚁。这就赋

予了它们不可推却的责任——如果它们自己不想有意忘掉的话。至于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找到这方法本身，就是半个胜利……我认为不论成绩如何，这方法本身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他一个一个把蚂蚁从地上捡到手里，然后放进罐头里。这些小小的、灵活的小东西，敏捷地然而却又是不知所措地在罐头里跑来跑去。

“也许关于我的活动已经有了一些传奇故事，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它们每个都深信：为了追求点什么，为了要达到不可知的境地而多少受一点罪是万能的造物主——上帝的旨意。而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影子——‘大角’我想它们给我的手指起了这个名字——把这个和那个从它们的家庭里或家族里抓走了……”

他抬头看我一眼，竖起一只手指：

“亲爱的，我的方法应该受到称赞！使它们违背相依为命、和合群的天意……回头请注意这个游戏的结束部分：当我把它们带到花园的另一边去的时候……”

他微笑地看着我：

“您是不会使我扫兴的，因为我太老而您又太年轻，您完全可以把心中想的说出来……我是个老疯子，对吗？”

“那可能吗！？”

“那么最后再来一次天意审判……”

他又捡起一只蚂蚁，然后自己也直起身子。

“现在将要发生的是在我们这里被叫作历史的事……

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它才可能有幸变成历史。需要时间！当我们在它的发展、形成和动乱中看到一点东西，还远远不能说在历史上将是有意义的或者正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也许是一个时代的发轫或者也许是它的告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想、推论、比较、设法预测。……

其间我们绕过躺椅走向花园的另一端。

“其法有当、胜券在握！请往这边走，沿着灌木丛……”

有个地方响起了钟声。门外拖拉机在路上轰隆而过。

“我今天晚了一点，”他说，“平日这时候我都吃点心了……”

在灌木丛边他站住了。

“到了！”

他手里拿着罐头指指地面。这里也布满着同样的小穴、小道，蚂蚁往来奔忙。

“谁知道它们为什么都互相不和睦？”伯爵说，“不过这是它们的事，不是吗？我想，说到底它们是蠢东西。”

他蹲下来，把蚂蚁从罐子里倒出来：

“请看，伟大的教训！”他说道，“它们难道不都是蠢东西吗？请看，有一个已经被咬死了……”

他敲敲罐子边，把它放在地上，轻轻掸着手，看我一眼：

“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您不这么认为吗？”他说，“请和我一起吃点点心……”

在躺椅旁边的一张小椅子上放着两个杯子、烤面包、茶壶、黄油、蜜和香肠以及餐巾，好象是刚拿来的。孩子气眼神的特丽莎正往屋那边走去。

"您愿意来一点吗?"

"谢谢,我喝一口茶就够了!"

特丽莎向屋子走去，边走边把小鸡、母鸡从地里轰出来。

## 二十

十一点

我躺在刚割过的草地上，仰望天空。太阳几乎已到中天,一望无际的蓝天没有一片云彩,显得异样洁净。从夏日时强时弱的清风中传来各种声音。有人在磨镰刀，大概是给生产合作社或是国营农场割青草，远处轰隆作响的拖拉机拉着拖斗从大路上驶过。再远些是脱粒机,它低沉的声音夹杂着蜜蜂、黄蜂的嗡嗡声以及苍蝇的嗜嗜声。偶尔还可以听到人的喊声,然而距离把喧声冲淡了,在热空气中反而带来了倦意。

马车在路边站住了。我把衬衫搭在肩上，原野在我前面发出耀眼的光芒。

主任向座位的边上挪一挪身子。

"已经找了你一会儿,睡着了?"

"没有……"

赶车的转身问：

“要苹果吗？”

“好……”

赶车的从座位底下拿出几个苹果，递到后面：

“有点酸，不要紧吗？”

“酸的更好……”

“好什么……喝点啤酒或者凉葡萄酒才好呢！我还有，要喝尽管说……”

马互相蹭蹭头，尾巴扫来扫去，接着又抬起头来，慢慢地拉着车起动了，随之小跑起来：

“你的那位伯爵怎么样？”

“没什么！”我说。

“还在那里叫蚂蚁搬家？”

“我去的时候刚好结束……”

“你看，这样可以打发时间……有一段时间每当我乘车路过，他总是向我大声招呼，就是当年我当长工时也没有这样毕恭毕敬。有一次在药房见到他，他站了起来。我对他说，‘您听着！上帝保佑您，为什么每次见我都把帽子举得这么高？我给您当长工时也没举得这么高！您如果打招呼，那就请认真些，别把我当小丑！从前我也没想从心里向您问好，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问好干什么？’从此以后见到我就只点点头了……”

主任欠起身子对赶车的说：

“回头到割草的地方停一下……叫他们给我妻子捎个

信，我不回家吃午饭了……"

他转过头来问我：

"和我一起到区里去吗？"

"干吗？"

"技术中学不肯收科奇什·本雅明的儿子住宿。说没地方了。是他外婆告诉我的……"

"我不去，"我说，"我在鲍洛格·安陶尔家下车……"

主任对赶车的说：

"那就到安陶尔家弯一下……"

他点上一支烟卷，喷了一口烟：

"把小本雅明的事办了……虽然，你看，他理也不理我。他跟谁也不招呼——对区委书记，对乡长都不招呼，连我也不理！……"

他扔掉烟头：

"该睡一会儿了……"

我把头倒在座位背上。

赶车的说：

"这倒楣的家伙在那里找什么？"

原来是"将军"。腰杆挺得笔直，一本正经地象个军人一样在齐步走。当我们走到他附近时，他举起手来。

非常严肃地、就象对同级军官那样地向我们敬了个礼。

柴鹏飞 译

# 作者简介

**德里·蒂博尔**（1894—1978）

一九一八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后长期流亡国外，四十年代回国参加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九四五年再次入党，曾任作协领导人。一九五六年因参加裴多菲俱乐部被开除出党，并判九年徒刑。一九六一年提前释放，宣告无罪。一九四八年获国家最高文学艺术奖科苏特奖。德里主要作品有《没有说完的话》（长篇小说）、《西蒙·麦涅海尔的出生》（电影脚本）、《回答》（长篇小说）、《未作判决》（自传）、《单耳人》（长篇小说）。

**兰德尔·尤若夫**（1896—1975）

匈牙利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党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长期流亡国外。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五年在苏联，起初当记者，并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三八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九五五年恢复名誉后回国，专门从事创作。一九五七年获匈牙利文化部颁发的尤若夫·阿蒂拉奖，一九六三年获科苏特奖。主要作品有《维谢格莱特街》（报告文学）、《普兰·费伦茨坎坷的一生》（长篇小说）、《寻找中国的中心地

带》(游记)、《测量无法测量的事物》(自选集)。

**保洛陶伊·博丽丝**(1904生)

一九四六年任《妇女周刊》编辑，次年起任《人民之声报》文艺部主任，曾两次获尤若夫·阿蒂拉奖。根据她的脚本所拍电影《白昼的黑暗》获洛迦诺电影节特别奖，电视剧《住临建的女人》获蒙特卡洛电影节电视剧奖。《两个菜擦子》获维斯普雷姆电视剧会演剧本大奖。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1912—1979)

早年在法国学化工。第二次大战时因其犹太血统被关进集中营，后成为苏军战俘。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中受株连，创作中断。重返文坛后访问了许多国家，发表过大量作品，包括小说、电影剧本、话剧以及讽刺作品《一分钟小说》。他曾两次获尤若夫·阿蒂拉奖，一九七三年获科苏特奖。

**欧特利克·蘸扎**(1912生)

作家、翻译家。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七年为匈牙利“笔会”主席。

**图尔佐·加博尔**(1912—1979)

早年主要写反映城市资产阶级没落的作品，被认为是“都会派”作家。除小说外，还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和话剧，

并从事文学评论。得过三次尤若夫·阿蒂拉奖。

**罗瑙伊·久尔吉**（1913生）

小说家、诗人，并从事文学翻译。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联合政府时期为民主人民党议员。一九六七年获尤若夫·阿蒂拉奖。

**多博齐·伊姆雷**（1917—1982）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任文学评论周刊《生活与文学》主编。一九五九年任作家协会秘书长，后任主席。

**费耶什·安德烈**（1923生）

当过裁缝、车工。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及专栏文章。一九五九年获全国总工会文学奖，一九六三年获尤若夫·阿蒂拉奖，一九七五年获科苏特奖。他的长篇小说《废铁堆》，描写一个叫哈贝特莱尔的青年工人因受旧社会和家庭的消极影响而杀了人。一九六二年出版后曾在社会上广泛引起激烈的争论。后来，人们把发展着的社会里依然保持着极度落后观念的现象称为"哈贝特莱尔现象"。

**高朗博什·拉约什**（1929生）

毕业于布达佩斯戏剧学院，在一些报纸当过记者。主要作品有《厄运》、《弃儿》等长篇小说和《莠草》等短篇小说集，曾获尤若夫·阿蒂拉奖和总工会文学奖。匈牙利中学文学

史教科书誉之为中年作家的代表。

**高尔戈齐·伊丽莎白**(1930生)

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布达佩斯戏剧学院。一九五〇年开始发表创作，包括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以及大量报告文学。曾获得科苏特奖和两次尤若夫·阿蒂拉奖。主要作品有：《一篮土产》(短篇小说)、《无情的光芒》(社会调查)、《茅屋式的社会主义》(报告文学)、《检察长的妻子》(剧本)、《蜘蛛网》(中篇小说)。

**约凯伊·安娜**(1932生)

中学教员，曾获得尤若夫·阿蒂拉奖和总工会文学奖，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主要有：《四四四七》(长篇小说)、《欠款与索债》(长篇小说，后改编为剧本)、《球》(短篇小说)。

**拜尔陶·蒂尔丘**(1935生)

作家、记者，曾任地方报纸的文艺部主任。三次获尤若夫·阿蒂拉奖。

**山陶·费伦茨**(1927生)

中学毕业后当工人，一九五八年起在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两次获尤若夫·阿蒂拉奖，一九七三年获科苏特奖。主要作品有《冬天开放的花朵》(短篇小说)、《恶狼临门》

(短篇小说)、《第五个印记》(长篇小说)、《二十小时》、《火车上的上帝》(短篇小说集)。

# 译后记

匈牙利自一九四五年解放以来，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解放至一九四八年为第一阶段；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六年为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解放前匈牙利长期受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法西斯德国的盟国，国内进步力量相对说来比较弱小。解放后，在文学领域中基本上也是这个状态。公开宣扬法西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学已无法立足，代表其他各种社会势力和阶级利益的流派，以"人民派"的影响最大。"人民派"在霍尔蒂的法西斯统治年代和战争中，坚持匈牙利民族的进步传统，在政治上要求独立。他们主要反映农民的生活，认为农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其中有不少知名之士，如费雷斯·彼得曾担任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后来当过作家协会主席，萨波·巴尔在逝世前一直是国家主席团成员。前者的《考验》，后者的《一寸土》，早已介绍到我国来了。

另外有一批是大战前和战时流亡国外的作家。他们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反映先进的人和事。但由于他们长期居住国外，作品又是在国外出版的，这使他们的影响受到限制。

一九四八年，工人阶级的政权取代了联合政府。从此文学的内容乃至各流派之间的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学方面，总的说来是歌颂新生活，同时也有不少描述解放前后斗争的作品。

一九五六年事件之后，文学界比以前活跃，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明显的进步。收在这部小说选里的大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本书所收的各篇小说，都是出自现代匈牙利著名作家之手，而且一般还都是他们的代表作。读完全书之后，我们可以对匈牙利解放以来的社会情况、人们的思想状态和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概略的印象。《二十小时》写的是解放后贫农内部的矛盾，我们可以从中感到五十年代初期个人崇拜造成的那种压抑的气氛。写干部作风的《上等人的假期》，写合作化的《骤雨》，叙述旅居异邦的艺术家回国后的心情的《故国依旧》，谈两代人问题的《解与结》，以及其他描写社会问题、家庭生活的作品，不但反映了匈牙利的现实，而且也可能使我国读者有一种亲切感。

最后，附带作一点说明：

一、匈牙利人的姓名排列和我国一样，即姓在前，名在后，妇女结婚后通常改用丈夫的姓名，再在后面加上个“妮”字，意即某某人之妻。如《骤雨》中的玛丽莎，她丈夫姓保托，名伊斯特万，她便叫保托·伊斯特万妮或保托妮。

二、匈牙利语中的尊称“您”，除表示对于对方的尊重外，还有一个极为普通的用法，两人在谈话过程中，往往最

初表示亲昵以“你”相称，但后来表示疏远就改为以“您” 相称了。

柴 鹏 飞

一九八二年三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作者＝德里
页数＝４９９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２０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０６月第１版